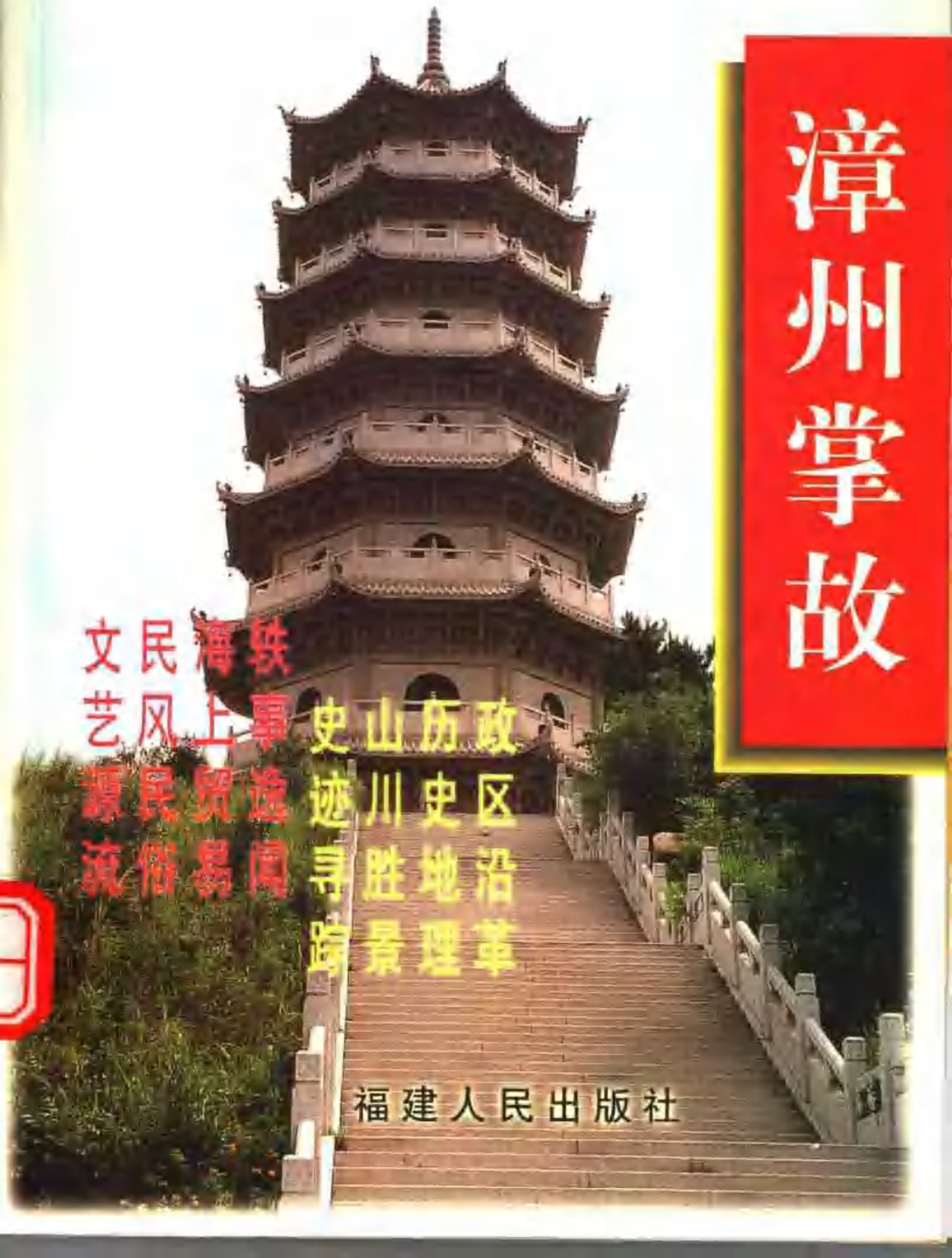
漳州掌故



海峡
文明
艺术
源流
流传

风土人情
民俗风貌
易闻乐见

历史沿革
政区变迁
山川形胜
名胜古迹
寺庙楹联

福建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刘亚忠
装帧设计　池民海

ISBN 7-211-04066-1
9 787211 040667 >

ISBN 7-211-04066-1
K-334　定价：18.00 元

漳州掌故

陈侨森 李林昌 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漳州掌故/陈侨森，李林昌著.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12(2004.2 重印)

ISBN 7-211-04066-1

Ⅰ.漳… Ⅱ.①陈…②李… Ⅲ.漳州市—掌故 Ⅳ.K.295.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0709 号

漳州掌故

ZHANGZHOU ZHANGGU

陈侨森 李林昌 著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编：350001）

福建省地质印刷厂印刷

（福州市塔头路 2 号 邮编：350011）

开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9.875 印张 8 插页 230 千字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1001—2500

ISBN 7-211—04066—1

K·334 定价：1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陈侨森，1941年出生于漳州，现任职于漳州市芗城区地方志办公室。从小好古，拓临许多漳州历代石碑，摩崖石刻、墓志铭，收藏地方史志、古籍、笔记资料，注重收集地方史料。1985年主编《漳州市对外经济贸易志》。1987年任漳州历史学会理事，漳州市人物研究会首届理事会理事，同时主编《漳州市对外贸易史》，由鹭江出版社出版。参加编撰《漳州市志》。参与编纂的《芗城区志》1999年由方志出版社出版。2000年应聘参与编写漳州近、现代史《芗江风云》等书。



李林昌，1920年出生于漳浦。抗日战争期间，担任《闽南新报》等报记者、编辑，抗战胜利后任《厦门日报》等报编辑，散文集《小港的风帆》由上海南极出版社出版。新中国成立后，息影田园。1980年起聘为漳浦县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编辑《漳浦文史资料》。后又应聘为《漳州市对外经济贸易志》编辑、《漳浦县志》副主编，与陈侨森等编撰《漳州掌故》，自著《九十九峰起伏漳浦史》、《漳浦与台湾关系史》、《漳浦掌故》等书。

威镇阁（俗称八卦楼）
建于明隆庆六年（1572年），
毁于“文化大革命”中
高南君／摄于1953年





威镇阁夜景
高南君／摄于1955年



20 世纪 30 年代漳州城（八卦楼下）九龙江旧貌



1998 年重建的威镇阁　　郑文华 / 摄

龙文塔（位于旧县学腾龙山）
建于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
毁于“文化大革命”中
摄于20世纪60年代
由漳州二中供稿





1998年新建的龙文塔
（位于龙文区蓝田镇凤山）



漳州文庙　　郑文华/摄



塔口庵经幢
建于宋绍圣四年（1097年）　　郑文华/摄



南山寺大雄宝殿　　周卓谦／摄



旧江东桥　建于宋淳祐六年（1246年）
摄于20世纪70年代，漳州市方志办供稿



旧江东桥　　林建荣／摄于2001年



建于1992年的新江东大桥　　林建荣／摄



天宝威惠庙的出水石莲花　　芗城区方志办供稿



晏海楼（位于龙海市海澄镇）　　漳州市文管会供稿



石矶塔（位于云霄县漳江入海口）
建于清康熙九年（1670年）
漳州市文管会供稿



三平寺（位于平和县文峰乡）　林建荣/摄

前　言

掌故包括历史故事、人物、风土、民情、典章等等，为人们所喜闻乐道。

漳州历史悠久，掌故丰富多彩，口头传述容易失真，因此有必要从各种古籍上去探求和印证。我们细心研读明清各朝漳州府的有关志书和资料，以及现在漳州市所辖各县各种志书和私人有关著作，加以对照，对比研究，希望能准确介绍各种掌故，以期不负漳州历史名城称号。

漳州掌故包罗万象，记述难尽，我们认为有些内容应当有所强调：

一、漳州自内陆至沿海奇峰罗列，气象万千，如南靖县鹅髻仙峰，平和县灵通岩、三平山，华安县北溪诸峰，长泰县天柱山，龙海市南太武山，龙文区云洞岩，芗城区天宝大山，漳浦与云霄二县的界山梁山，云霄与诏安二县的界山乌山，诏安县九侯山，东山县铜山等等，其间文物古迹极其丰富，令旅游者流连忘返。

二、漳州滨海古火山地貌具有科研价值，是独具风采的旅游景观，值得重点介绍。

三、北溪“仙字”、佛昙大荟山等处“岩画”，以及各地出土的新、旧石器时代石器、陶器，还有商周时代的青铜器与石器、陶器共存的现象，都是研究古人类活动乃至商周时代闽越族与中原关系的文物，十分宝贵。

四、漳州有很多“开漳”古迹，如唐高宗时归德将军陈政最早开发的云霄“火田”和他命名的“漳水”（即漳江），陈政之子陈元光建立的漳江北岸最早的漳州治所遗址，30年后陈元光之子陈珦移设州治于李澳川（今漳浦县城）的官署遗址，陈珦建立的浦南松江书院，贞元二年漳州刺史柳少安移设州治于龙溪县（今芗城区）的官署遗址，陈政、陈元光、陈珦三代人坟墓，陈政部将许天正、李伯瑶、林孔著、宋用、卢伯道、戴君胄等人的坟墓、祠堂、庙宇，还有唐太傅陈邕所建的南山寺等，不仅是唐代古迹，而且是涉侨的“唐山”文物，因为这些“唐人”祖先从漳州发祥，传衍众多后裔于闽粤台及海外各地，祖坟、祖祠、祖庙是侨胞心向祖国故乡的精神支柱。

五、漳州城乡及各县县城城垣多已拆除，而许多古迹富有文化内涵。沿海的镇海卫及所属陆鳌（今漳浦六鳌）、铜山（今东山铜陵镇）、悬钟（在今诏安梅岭镇）等守御千户所，是明代海防重地，有的城垣至今尚存，也有重新修复或新建的，现在都成为旅游景点，其历史应予介绍。明清时代绅士兴建的民间城堡，如漳浦湖西赵家城、诒安城，龙文区长桥城等，都是具有防卫性能的花园式居民城；南靖、平和、华安、漳浦以及漳州其他地方，有许多明清时代土楼，也都是具有防御性能的族人聚居点，历经多次大地震，至今楼墙不倒，引起中外专家兴趣，陆续前来考察，旅游者也纷至沓来。这些古建筑不能不记。

六、中国瓷器风靡世界各地，其中很大部分出自漳州，宋、元、明、清各个时期瓷窑遗址至今历历可辨。

七、漳州历代有很多杰出人物，其爱国爱民反对邪恶的精神永垂青史，如南宋高登、陈景肃等，与奸相秦桧斗争到底，宁死不屈，陈格、陈植、陈碧娘抗元到底；明代周起元、陈天定等反对权阉魏忠贤把持朝政的正义斗争，黄道周慷慨抗清，从容就义

等事迹可歌可泣。

八、漳州有很多革命史迹、革命文物，为人们所感念，敬仰。

九、漳州民间传说为群众所喜闻乐道。其中有些故事与史实有相当距离，我们认为，民间传说与史料可以并存，但指出两者的异同点是有必要的。

十、漳州有丰富的谚语，富含哲理，而且大都押韵合辙，朗朗上口，所以长久传诵。我们广泛搜集，忠实记录，分门别类，去芜存精，编为一辑。

漳州掌故如此丰富，而我们精力不足，搜集难全，且限于水平，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望读者不吝赐教。

作　者

2003 年 8 月

目　　录

政区沿革

漳州一千多年沿革 …… (3)
绥安改设漳浦县 …… (4)
南靖分设平和县 …… (6)
漳江之滨云霄县 …… (7)
诏安县与东山县 …… (8)
从武德场到长泰县 …… (9)
龙溪分成四县（市、区） …… (10)

历史地理

“芗江”与“霞漳” …… (15)
漳城壕沟与桥亭 …… (16)
漳城九街十三巷 …… (18)
衙门遗留的地名 …… (21)
名人遗留的地名 …… (23)
浦头港变迁 …… (25)
闽南重镇石码 …… (27)
林士章与长桥城 …… (28)
驿、铺遗留的地名 …… (29)

野象留下的印记 …… (31)
“金漳浦”美誉之源 …… (33)
多处大帽山易误会 …… (34)
何处是“界外” …… (36)
“礼氏列岛”名从何来 …… (37)
“白水仔赢”成地名 …… (39)
千年沧桑佛潭桥 …… (41)

山川胜景

天宝山与漳城龙脉 …… (45)
芝山的沧桑巨变 …… (46)
碑林世界云洞岩 …… (48)
瑞竹岩与石室岩 …… (50)
故事离奇石狮岩 …… (52)
圆山和琵琶坂 …… (53)
双第山的来龙去脉 …… (55)
屹立海疆南太武 …… (57)
三平寺与祖师公 …… (60)
媲美黄山灵通岩 …… (61)
人间仙境鹅髻峰 …… (64)
紫玉异彩天柱山 …… (65)
海岸古火山奇观 …… (66)
九龙江北溪壮观 …… (67)
南溪蜿蜒三县市 …… (69)
鹿溪与李澳川 …… (70)

梁山古今不相同 …… (72)
蓬莱深处清泉岩 …… (73)
风光无限海月岩 …… (75)
漳江两岸四名山 …… (77)
中流砥柱石砚塔 …… (78)
九侯山二十四景 …… (79)

史迹寻踪

“仙字”之谜 …… (85)
越王城与赵佗故垒 …… (86)
神秘的越王潭 …… (88)
蒲葵关与葵岗寨 …… (90)
漳州最早州治 …… (91)
将军山下陈政墓 …… (94)
“开漳圣王”墓 …… (96)
“开漳”诸将墓 …… (98)
千年古剎南山寺 …… (100)
奸相梦断木棉庵 …… (103)
柳营江与江东桥 …… (104)
漳东门户万松关 …… (106)
明诚堂与邺山讲堂 …… (107)
松洲书院全国最早 …… (109)
八卦楼重建更辉煌 …… (110)
嘉济庙碑与李宓 …… (112)
防倭要塞镇海卫 …… (114)

铜城重建英姿在 …… (116)
陆鳌古城今犹存 …… (117)
忠勇祠与剿倭碑 …… (118)
“宋城”赵家堡 …… (120)
南靖太监墓 …… (122)
角美林氏义庄 …… (124)
屿仔尾南炮台 …… (126)
漳州到处有土楼 …… (128)
“一都”金溪山银矿 …… (131)

轶事逸闻

白云岩与朱熹故事 …… (135)
高东溪“获鹿感鱼” …… (136)
高东溪“朋东仇桧” …… (138)
塔口庵的传说 …… (140)
陈北溪与朱熹 …… (142)
萧状元故事 …… (143)
南宋末代皇帝的传说 …… (145)
揭开马口“皇帝城”谜底 …… (147)
黄侍臣之裔“五狮” …… (148)
杨国勇的后裔 …… (150)
杜浔小山东 …… (151)
陈碧娘一门忠烈 …… (152)
漳州帖姓源流 …… (153)
姜知府兴利除弊 …… (155)

壮元林震的传说 …… (157)
浪荡公子谢能舍 …… (158)
“机易山”事件 …… (160)
周起元之冤 …… (161)
林钎正直无私 …… (163)
颜继祖之屈 …… (164)
黄道周之忠烈 …… (166)
黄道周“不二色” …… (168)
陆希韶“一夜渡南台” …… (169)
“贝勒夫人”传说 …… (170)
漳州“前五虎” …… (173)
“后五虎”的传说 …… (175)
史志记载的“后五虎” …… (179)
黄公爷与公爷街 …… (181)
第二代三次海澄公袭爵 …… (182)
海澄公的跋扈传说 …… (184)
刚直正义的唐朝舜 …… (186)
乾隆年间的海澄公 …… (188)
蔡相爷和他的何夫人 …… (189)
“尿鳖”换“大厝” …… (191)
漳州“活佛”奇闻 …… (193)

海上贸易

明代海禁与寇乱 …… (199)
月港外贸利国利民 …… (201)

番银滚滚来 …… (202)
引进农业新品种 …… (204)
商贸促进工农业发展 …… (205)
月港的衰落 …… (206)
清初外贸政策 …… (209)
乾隆朝鼓励番来进口 …… (210)
近代的进口商品 …… (212)
近代的出口商品 …… (213)
漳州近代糖业 …… (215)
漳州水仙花 …… (216)
神州妙药片仔癀 …… (219)
八宝印泥 …… (220)
抗战时的特殊贸易 …… (222)

民风民俗

漳州岁时风俗 …… (227)
端午节挂菖蒲和艾 …… (229)
清朝死人穿明朝服 …… (231)
死后女皆孺人男皆进士 …… (232)
出嫁不见天立地 …… (233)
带路鸡与连尾蒸 …… (234)
妇女的“哭调” …… (236)
漳州品茶之风 …… (237)
乌龙茶工艺源于漳州 …… (238)
百花村长福 …… (240)

在世姓廖死姓张 …… (242)
王游两姓闽台亲 …… (243)
两岸同祀大道公 …… (244)
“关帝”崇拜与传说 …… (246)

文艺源流

傀儡（木偶）戏 …… (251)
古老的竹马戏 …… (253)
芗剧与歌仔戏 …… (254)
闽南和台湾皮影戏 …… (257)
漳州民间舞蹈 …… (258)
漳州民间曲艺 …… (260)
漳州民间谜语 …… (261)
漳州木版画 …… (263)
书画之乡诏安县 …… (265)
细腻雅致的漳浦剪纸 …… (266)

谚语及谚语故事

谚语 …… (271)
处世谚语 …… (271)
世态谚语 …… (274)
气象谚语 …… (279)
农家谚语 …… (280)
谚语故事 …… (282)
嘴吃尻川（屁股）痛 …… (282)
王公斗（凑）鬼吃弟子 …… (282)

细汉偷割鞄，大汉偷牵牛 …… (283)
四书读透透，不识壹整龟鳖灶 …… (284)
九归熟透透，半斤歼（提）头缕 …… (284)
乞食恰猛庙公 …… (285)
无某（妻）无猴 …… (285)
无猫无加令 …… (286)
七十二万造响水桥 …… (287)
水鬼叫摆瑞 …… (288)
王爷公的火油也敢偷倒 …… (289)
做事要有“班母” …… (290)
“陈仔雪”成口头语 …… (291)
恰猛蔡牵 …… (291)
邱蒙舍放大炮 …… (292)
破“尿鳖”拼孟臣罐 …… (293)
给人卖去吃 …… (294)
乌吉隆仔拖给红毛仔吃 …… (295)
糊兄吃饼屑 …… (295)
胡江舍怕江鱼仔 …… (297)
茈（嫩）番老台湾 …… (298)
未到台湾地，先食台湾米 …… (299)
后记 …… (301)

政区沿革



漳州一千多年沿革

南朝梁天监年间（502～519年），朝廷将晋安郡（郡治在今福州）一分为二，南部设南安郡，郡治在东安县（今南安县之丰州）。大同六年（540年），朝廷又将东安县南部划出，分设龙溪、兰水两县。龙溪县以北溪“九龙戏水”取名，辖域包括九龙江北溪及西溪下游至两溪合流以下沿海。兰水县以兰水（今九龙江西溪上游）取名，辖今南靖县一带。隋朝开皇九年（589年），朝廷将建安（闽北）、晋安、南安三郡合并为建安一郡，郡治在闽县（今福州），各县并为闽县、建安、南安、龙溪四县。兰水于开皇十二年（592年）并入龙溪县，原属岭南的绥安县也于大业三年（607年）并入龙溪县。这样，龙溪县管辖范围就包括除长泰（宋朝才从泉州划属漳州）以外的今漳州市，明、清漳州府，解放初龙溪地区的各市、县了。由于官员兵丁很少，对僻远地带鞭长莫及。与岭南的潮阳县毗连之绥安县地，发生“蛮獠啸乱”（“蛮”指其野蛮，“獠”指以狩猎为生，“蛮獠”是官府对南方少数民族的蔑称），唐归德将军陈政于总章二年（669年）奉派到泉潮二州毗连处平乱，死后其子陈元光奉命继其职务，平定地方，于垂拱二年（686年）奏准划龙溪县南部（故绥安县地）增设漳州，辖漳浦、怀恩二县。初以漳江北陈元光屯军处为州治及漳浦县治，开元四年（716年）以该处瘴气甚重，州、县治一并移设李澳川（今漳浦县城）。开元二十二年（734年），漳州从福建划属岭南。开元二十九年（741年），怀恩并入漳浦，龙溪县从泉州划属漳州。天宝元年（742年）改漳州为漳浦郡，还属福建；天宝十年（751年）又改属岭南。乾元二年（759年）漳浦郡复名漳州。大历十二

年（778年）划汀州的龙岩县属漳州。漳州辖地扩大到闽西，李澳川作为州治，地点已不适中，贞元二年（786年）迁州治于龙溪县，即今芗城区。漳浦县治不变。宋朝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划泉州的长泰县隶属漳州。元朝升漳州为漳州路，至治年间（1321～1323年）划龙溪、漳浦、龙岩三县毗连地带成立南胜县（后迁治所改名南靖县）。明朝升漳州为漳州府，正德十四年（1519年）从南靖县分设平和县；成化三年（1467年，一说成化六年），从龙岩县分设漳平县。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又从龙岩县分设宁洋县。清朝雍正十二年（1734年）升龙岩为州，辖龙岩、漳平、宁洋三县，从此不属漳州管辖。

明朝在省与府之间设有“道”一级。漳州起初属福宁道管辖，成化六年（1470年）改属漳南道。漳南道管辖汀漳两府，衙署起初设在上杭，翌年移至漳州城内。嘉靖年间倭寇猖獗，巡海道一度移驻漳州，漳州府受两“道”并管。漳南道由一名福建参政或参议任长官。清朝改漳南道为漳龙道，增设龙岩州后改称“分巡海防漳龙地方道”，专设一名道员为长官。民国初年废府存道，后因军阀轮番统治，政制无常规。民国15年（1926年）起实行省、县二级地方政制。民国23年（1934年）在漳州设立福建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只负督察之责，不构成一级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漳州设福建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所辖区域同清代漳州府。1978年3月改为龙溪地区行政专员公署。1985年6月改为漳州市。

绥安改设漳浦县

漳浦县的前身是绥安县。但历史上有6个绥安县，最早的一

个绥安县是三国吴永安三年(260年)从建安郡的建安县校乡分出建县，于东晋义熙元年（405年）改名绥城县，辖今福建省建宁、泰宁一带地域，县治设在今建宁城西（见于《福建通志》、《建宁县志》、《泰宁县志》等书记载)。而明代《漳州府志》、《漳浦县志》误将建宁县前身绥安县的建县时间当作漳浦县前身绥安县的建县时间。那是因为，漳浦县前身的绥安县隶属从岭南东官郡分设的义安郡（郡治在今潮州)，早期的《八闽通志》没有记载这个绥安县的建县时间。实际上，南北朝的《宋书》已经在《州县志》里记载："义安太守，晋安帝义熙九年分东官立，令县五：绥安令、海宁令、潮阳令、义招令。何志（注：齐朝何承天所撰州县志)：与县俱立。晋地记（注：晋太康地记)：故属东官。"康熙《漳浦县志》已知道明代府县志的错误，说："旧志载，吴永安元年（按，元年为三年之误）析建安校乡西偏置绥安县，乃建州之绥安，即今建宁也，误。"并说："潮阳志载，绥安属义安郡。"但又说"绥安县不知何时置"；并且由于晋代从建安郡分设晋安郡而误以为绥安县属于晋安郡。《大清一统志》卷三二九《漳州府》已明确记载："漳浦县……汉冶县及南海郡揭阳县地，晋义熙九年分置绥安县，属义安郡，宋齐以后因之，隋开皇十三年并入龙溪，唐垂拱二年始分置漳浦县，并置漳州，贞元二年徙州治龙溪，以漳浦为属县，五代宋元因之，明属漳州府，本朝因之。"

漳浦县设置于唐垂拱二年，辖域与绥安县大抵相同，包括今漳浦、云霄、诏安、东山、平和一带。元至治年间（1321～1323年）划出西部合龙溪、龙岩二县毗连处设立南胜县（后改为南靖县)，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南靖分设平和县，嘉靖九年（1530年）漳浦县再划出南部设诏安县，隆庆元年（1567年）再划出东北部合龙溪县沿海地方设立海澄县。清嘉庆三年（1798年）漳浦再划出第六都合平和县及诏安县部分地方设云霄厅（民国2年改

县)。东山县则于民国5年从诏安分设，漳浦县划出古雷半岛属东山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漳浦县与邻县毗连地带的归属再作若干合理的调整：1955年12月，古雷半岛由东山县归还漳浦。1957年3月，划南靖县程溪区的马苑、南浦、中西三乡归漳浦县管辖（今为南浦乡及中西林场）。同年8月，划漳浦县的三美、董浦、山边三乡归海澄县（今龙海市）管辖。

南靖分设平和县

元朝为加强对漳州路僻远山区的统治，于至治年间（1321～1323年）划龙溪、龙岩、漳浦三县毗连地带（包括今南靖、平和二县及漳浦、云霄、龙海三县市部分地方）设立南胜县，县治在矾山九围之东，即今平和县南胜镇。山区地广人稀，为凑足一个县的人口数，南胜县范围划得很广，县官及官军鞭长莫及，畲民起义此起彼伏（畲民指山区人民，不一定全是畲族），至元三年（1337年）的李志甫起义甚至围攻漳州城。后南胜县县治移至琯山之阳，即今平和县小溪镇旧县村，至正十六年（1356年）又为避瘴而迁县治于双溪合流处，即今靖城镇，改名南靖县。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因靖城常有水患而北移县治于大帽山麓，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迁回靖城镇。民国27年（1938年）7月，南靖县政府迁至山城镇。

平和县是从南靖县分设的。明朝正德年间，政治腐败，民不聊生，闽粤赣三省毗连处山区农民起义此起彼伏，闽南粤东交界处大帽山以詹师富（詹师傅）为首的农民起义军与闽粤赣三省交界处农民起义军形成遥相呼应局面，给朝廷以很大威胁。正德十

一年（1516 年）正月，朝廷任命佥都御史王守仁巡抚南赣汀漳，屯重兵于上杭。并檄调福建、广东两省会兵，于正德十二年（1517 年）正月起，先后攻破江西大庾、横水的陈日龙农民起义军、广东俐头的池仲容农民起义军，接着进攻福建南靖与广东饶平交界处大帽山，先后占领南靖（今平和）的长富（今长乐）、象湖、流恩、芦溪，及饶平的可塘、大伞、箭罐等起义军据点三十多处。至此，闽粤赣毗连处农民起义均告失败。为便于统治，王守仁按进军先后连续奏请增设县治，正德十二年从江西横水上犹县分设崇义县；正德十三年（1518 年）在广东俐头和平巡检司增设和平县；正德十四年从南靖县分设平和县，县治设在坪和社（今九峰镇）。和平、平和两县命名虽各有所本，却都寄望于“地方平定，政通人和”。平和县治于 1949 年移设于小溪镇。

漳江之滨云霄县

云霄县是陈元光“开漳”时已经开发的重镇，武则天赐陈元光在云霄建一座“燕翼宫”，他作《落成会咏》两首，第一首说：“泉潮天万里，一镇屹天中。……带砺大江雄，轮奂云霄望。”第二首说：“云霄开岳镇，日月列衙瞻。”

垂拱二年（686 年）陈元光奏准在漳江北岸设立漳州，辖漳浦、怀恩二县，江北属漳浦，江南属怀恩。开元四年（716 年），漳州及漳浦县治一并移设于李澳川（今漳浦县城），开元二十九年（734 年），怀恩县合并于漳浦县。从此，云霄成为漳浦所辖的一个镇，历经唐、宋、元、明、清五朝代，共 1055 年。

清嘉庆元年（1796 年）福建总督姚棻以云霄镇地当浦、和、诏三县要冲，奏改漳州府南胜同知为抚民同知，移驻云霄，割平和

25保、诏安2保（13个自然村），并合原漳浦县丞所辖30保，归其管辖。同时改盘陀巡检为云霄照磨兼管治安、司法。这个由三县一部分地方合并而成的行政区域称为云霄厅。自厅治东至海滨漳浦白衣保20公里，东北至盘陀岭顶20公里，东南至诏安竹港25公里，南至诏安梅州20公里，西至平和石梯顶20公里，西北至平和半地岭脚25公里。

由漳浦划属云霄厅的30保保名为：镇东、镇西、镇南、镇北、镇田、溪尾、宫前、新福、广庆、后汤、莆尾、前图、南陂、后坪、上坂、吉田、古楼、中山、高广、佳溪、盘石、陈埭、礁尾、江头、圳屿、梅安、青油、竹塔、荷步、荷西。由平和划属云霄厅的25保保名为：何地、马铺、龙坑、十二牌、呈奇岭、峰头、上河、下河、圆峰、大坑、高地、山前、佳栋、和瑞堂、东车、孙坑、世坂、西林、下坂、岳坑、象坑、船场、洋下、白塔、下坛。由诏安划属云霄厅的2保保名为：南山、赤罗。

辛亥革命后，取消“厅”的建制，民国2年（1913年）改云霄厅为云霄县。

诏安县与东山县

诏安原名南诏，据旧志记载，是因为古时有一个云南南诏人来到这里，惊叹：“这里的风土与我们南诏一样啊！”从此以南诏为地名。

唐垂拱二年（686年）陈元光建立漳州，这里称南诏堡，为陈元光所设四巡逻台之一，原属怀恩县，开元二十九年（741年）怀恩县并入漳浦县，南诏从此属漳浦县管辖。宋代为南诏场，明弘治十八年（1505年）设置南诏守御千户所。

南诏属漳浦县管辖达789年之久，而南诏距漳浦县城有100多公里之遥，中间隔着几座大山，有盘陀岭、蒌岗山（余甘岭）等，山高路险，交通不便，官府鞭长莫及。况且这里是闽省的极南，隔分水关与广东交界，节制不易。明代中叶以后，政府腐败，在这边远地区就更容易生乱。早在弘治十七年（1504年）已有乡民许仲远等申请建县。正德十四年（1519年）、嘉靖二年（1523年）、嘉靖四年又有乡人三次申请，均未获朝廷允准。后经在朝中任职的南诏深桥人叶璧极力奔走游说，朝廷才批准南诏人建县的请求，于嘉靖九年（1530年）划漳浦一都、二都、三都、四都、五都设置诏安县，县名取“南诏平安”之义。

五都在东山岛。东山岛因有一座东山得名。明初设守御千户所，建所城，以地连铜坑、铜钵，命名为铜山城，从此，东山岛地名改称铜山。该岛除铜山守御千户所所城（今铜陵镇）仍属漳浦县以外，其余全划属诏安。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划漳浦县铜山所所城属诏安，从此，东山全岛都属诏安。民国5年（1916年），划漳浦县第十都的古雷半岛合诏安所属东山岛建县，为避免与江苏省铜山县（徐州）同名，以古地名东山为县名。1955年，古雷半岛划还漳浦县管辖。

从武德场到长泰县

今之长泰隋代属南安县武德乡崇教里。唐代贞元十九年（803年）划永丰、明盛、绥德、武德四乡设置大同场（今同安县）。乾符三年（876年）从大同场分出武德乡设武德场。文德元年（888年）改名武胜场，不久，改为武安场。南唐保大元年（943年）建立长泰县，取“长安久泰”之义，仍属于泉州。由于长泰距泉州

有150多公里之遥，管理不便，赋税征输困难，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年），泉州知州林金吾疏请将长泰县改隶漳州获准，从此，长泰县属漳州管辖。

龙溪分成四县（市、区）

分设海澄县

出漳州城东南二十几公里，为龙溪县八都、九都地，是九龙江出海处，港湾如偃月，故名月港，舟楫云集，自唐宋以来为海滨一大聚落。明朝开国以后，严禁民间对外贸易，而政府没有在月港分设机构，也无驻兵，自正德年间起，已有豪民私造“违规”大船，出海贸易。嘉靖九年（1530年）巡海道柯乔建议在月港建县，经巡抚福建的都御史金城上疏申请，未获批准。嘉靖三十年（1559年）在月港建靖海馆，调漳州城兵丁往来巡缉。嘉靖三十五年（1564年）海寇谢策侵犯月港，漳州城兵丁防堵不及，致月港受劫掠屠杀。过后，巡抚福建的都御史阮鹗令当地人筑土堡自卫。但当时倭寇极其猖獗，又有土寇张维等“二十四将”分别占据各个群众的自卫城堡，抗拒官军。嘉靖四十二年（1570年），巡抚谭纶请准改月港靖海馆为海防馆，设海防同知主持。翌年，巡海道周贤宣诱捕张维等“二十四将”，地方稍静。在朝廷任官的本地人李英、陈奎等疏请建县，皇帝下旨令福建地方官议复。漳州知府唐九德建议，割龙溪县一都至九都及二十八都五图、漳浦县二十三都九图合设一县。嘉靖四十五年，巡抚汪道昆、巡按王宗载上疏报准，赐县名“海澄”。翌年（隆庆元年，1567年）县治建成，正式设县，辖三坊五里，东至镇海卫、海门，西至祖山与龙溪县交界，北至海沧与同安县交界。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又

划漳浦县二十三都八保(即八图,今港尾镇及隆教乡一带)属海澄。

分设华安县

龙溪县二十五都(宋游仙乡九龙上里)有华封岭,高千余丈,岭下为九龙江上游,怪石嵯峨,滩濑奇险。民国17年(1928年)5月,以华封(今作华丰)镇为主体,合二十三都、二十四都(宋游仙乡龙州里)的银塘、沙建一带,另立一县,本来还拟划入安溪县的龙涓一带,故取华封、安溪两地首字"华安"为县名(后龙涓仍属安溪)。现辖湖林、马坑、高车等3乡及华丰、丰山、新墟、高安、仙都、沙建等6镇。

分设芗城区及龙海市

1951年6月1日,在龙溪县治所在地建立漳州市(为县级市)。1958年8月划龙溪县的古塘、岱山、农友等行政村及上街、诗墩自然村属漳州市。1961年6月,划龙海县地的天宝、浦南两公社和上墩、林内、前山、店上生产大队及后房农场属漳州市。1985年,龙溪地区改为漳州市,原漳州市改为芗城区。现芗城区辖市区的东铺头、巷口、西桥、新桥、南坑、通北六个街道,郊区芝山、天宝、浦南、石亭四个镇。1960年龙溪、海澄两县合并为龙海县,县治从漳州移设石码镇,辖石码、海澄、紫泥、榜山、颜厝、九湖、程溪、步文、郭坑、角美、白水、浮宫、东园、东泗、港尾(后分设隆教乡)等乡镇。1960年原属海澄县的海沧划属同安县(今属厦门市)。角美部分地方原属同安县,这时全划属龙海县。1993年,龙海撤县改市。

分设龙文区

1996年6月,划出龙海市的步文镇、郭坑镇设立漳州市龙文区,划芗城区下洲和白土村共26个村民组属龙文区,区政府设步文镇。1997年3月,全区划分为步文、郭坑、蓝田、朝阳四个镇。

历史地理



“芗江”与“霞漳”

自明初以来，由于文士提倡，群众认同，“芗江”便成为九龙江近漳州城一带河段的代称，进而又成为漳州城及附近四乡一带的雅称。芗，古书上指一种可用于食品调味的香草，也指五谷的芳香气味。“芗”字又与“香”字通用，所以，龙溪县东北郊九龙江北溪之滨香洲社（自然村，已废）的渡口，明嘉靖《龙溪县志》写作“芗洲渡”，清乾隆《龙溪县志》则写作“香洲渡”，《读史方舆纪要》也写作“香洲渡”而加注“芗一作香”。在距香洲渡不远的翰林社（今龙文区步文镇内林自然村）有芗江书院，始建于明初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可证“芗江”被作为地名雅称不迟于明初。本来只作为九龙江北溪近城河段的代称，后来逐渐成为漳州城和四郊一带河段和地域的代称，不论是北溪还是西溪，自清代至民国时期已广泛应用。如云洞岩上有一处“踏起青云”题刻，署名“芗江林编”，林编为清乾隆年间漳州名士；民国13年（1924年）漳州城有芗江女子师范学校；民国24年龙溪中学（今漳州一中）校长王秀南作校歌，开头有“芝山召召，芗水滔滔”之句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化部门召集戏曲界整理歌仔戏改良调，命名为芗剧，便是因为“芗江”已被普遍认同为漳州的代称。1985年龙溪地区改为漳州市，原漳州市（县级市）改为芗城区，命名亦源于此。

同时，“霞漳”作为漳州城及四乡的总雅称，与“芗江”并行不衰。这是由于漳州城南门外有一座丹霞山，以“朝丹暮霞”景色得名。宋代设驿馆于山下，称丹霞驿。南宋林宗臣有诗以“丹霞”代称漳州城：“笑凭诗句说丹霞，城郭人家千万家，礼接紫阳

风俗厚，学传邹鲁道源赊。”清乾隆《漳州府志》载：“郡之四郊皆称霞东、霞西、霞南、霞北。”清代，漳州城东南隅有丹霞书院，北门有“霞北书院”，东门外浦头有“霞东书院”；民国时期，巷口有“霞东小学”，北门有“霞北小学”等。

“霞漳”不仅可作为漳州城及四郊的代称，还可以作为漳州府（今漳州市各县、市、区）的别称。如白礁慈济宫门联嵌入“霞漳”二字；黄道周自称“霞漳人”等。

漳城壕沟与桥亭

自宋代始建漳州城至明代，渔民可驾小船进城内街市卖鱼。因为宋初所建的漳州土城周长仅 2 公里，咸平二年（999 年）开凿壕沟，引九龙江西溪之水绕城；祥符六年（1013 年）在外围竖木栅为外城，长 7.5 公里，原来的土城成为内城，同时加凿一条西濠，城之西南开一个水门通西溪。绍兴年间（1131 年以后的一段时间）拆除内城，将外城除南边临溪以外，都改筑为土城。以后城垣逐步完善，连同临溪的一段都砌石为城垣，开设东西二水门。西溪绕漳城西南边的一段叫南河，又名南门溪，溪水受潮汐顶托，每日夜进退有序地进出东西二水门，通城内壕沟。今北京路北段与南昌路西段转接处的三岔路口，地名渔头庙，因该地常有渔民驾小舟来卖鱼而称“渔头”，此处又有一座祀保生大帝（“医神”吴夲）的庙宇，被叫做渔头庙，庙名遂成为地名。

嘉靖年间（1522～1566 年），漳州知府李侨为防倭寇入城，将东、西二水门用铁栅锁住，只能通水不能通船，渔民不能驶小船进城，改在东门外浦头卖鱼，浦头形成盐鱼市，地名至今沿用。隆庆年间（1567～1572 年），倭患平息，拆除了东、西二水门的铁栅，

改设闸门，派官兵管启闭，因此有东闸口、西闸口的地名。清初，西溪河道淤浅，潮水不能再将溪水顶托入东、西二闸口，城内壕沟不能再通舟楫，只能起到排泄废水的作用，逐渐壅塞。乾隆六年（1741 年），知府张廷球主持疏浚壕沟，从水位较高的西闸口引水入壕，流经西桥、西沽桥（即西沟池桥）、观桥，转入硕仁桥，过北桥、丙申桥、太古桥，折向东，由东闸口出溪。壕沟宽如小溪，水流保持澄清。在壕沟穿越街道处建石桥十五座，桥上建亭的七座，称七阴桥，无亭的八座，称八阳桥。

七阴桥为：一、金水桥，在开元寺前（今胜利西路市委前），始建于宋，明代改建。今壕沟与桥亭皆无存。二、北桥，又名中清桥，在北桥街（今大同路），始建于唐，宋重建。明万历年间（1573～1619 年）亭改建为观音亭。壕沟尚存，桥与观音亭于 1992 年拆除，改建为北桥菜市场。三、硕仁桥，在上街（今青年路尾转向大通北路处），宋建。桥南北两端原有祠庙，今桥亭与祠庙皆已无存。四、东铺桥，在东铺头（今新华西路东段）。今壕沟与桥尚存，亭无存。五、名第桥，即东桥，在城东南，桥、亭皆唐开元年间（713～741 年）所建，建成之日刚好周匡物中进士，为漳州最早登科第者，因而命名为名第桥。亭在桥北，于明万历年间改建为三进庙宇，祀观音，今大部分已修建。六、天庆观桥，简称观桥。天庆观为唐开元观所改名，祀玉皇上帝（俗称天公）。桥、亭始建于宋，清雍正十年（1732 年）重建。今地名观桥顶（新华西路的一段），桥与壕沟尚存，亭已废。七、西清桥，在修文西路，古名登仙桥。桥北建观音亭，二进，俗称西桥亭。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亭被洪水冲毁，民国 24 年（1935 年）由同善堂药局等捐资重建。观音亭（庙）于 1993 年修葺一新。

八阳桥为：一、洗马河桥，在知照巷。河与桥皆已无存。二、丙申桥，在海道衙后（今瑞京路东端），唐元和丙申年（816 年）建，

宋淳熙丙申年（1176年）重建。三、太古桥，从前桥边有东沟池及太古庙。今地名太古桥，壕沟与桥仍完好。四、龙眼营桥，旧称龙骇瀛桥，在城东，今地名龙眼营，桥已无存。五、东闸桥，今地名东闸口，在北京路南端，桥已加宽至与新建的路面一致。六、西闸桥，今地名西闸口，桥仍完好，在人民市场边，与西桥亭南北相望。七、西沟桥，在西沟池边，南台街西侧壕沟上，今华侨新村边，壕沟尚存，原石板桥已拆除，另建钢筋水泥桥。八、天妃宫后桥，在今南昌路西端，桥尚存。天妃宫已无存，天妃宫旁的一颗大榕树尚存。

漳城九街十三巷

自唐贞元二年（786年）漳州州治从漳浦迁到龙溪（今芗城区）后，200年间一直未建州城。宋初开始有土城，周长2公里，南宋才有周长7.5公里的石城，明代历次修筑，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郑成功在撤出漳州之前，将城拆毁。清军占领漳州后重建石城，东西南北四城门都建楼。民国7年（1918年）粤军陈炯明驻漳时拆除城垣，拓宽改建街道，仅存东门尚有残迹。随着旧城改造，东门城垣遗址也在1996年被拆除，现已无处寻觅，但从旧志的记载仍可以考查出：城垣绕西北隅的芝山、保福山及日华山后山腰（东麓）蜿蜒而过，穿过今胜利西路（旧西校场边），向西延伸，经今漳州市医院至西门（即太平门），在旧肃清宫直街（今英雄路）附近，顺三湘江转向南，将龙文、虎文二山围在城内，折向东，沿今之博爱道（旧名城背顶）经西闸口、南门（今香港路末端旧名南门头）至今之漳州大桥头转向北，从威镇阁（八卦楼）经过，又沿今之新华南路至东城门（文昌门），再沿今之新华

北路，经汽车站、外贸大厦，越过胜利东路至马道底（原体育场北侧）经女排三连冠纪念碑边，转西横跨延安北路，折向北至北门（太初门），即今市图书馆地方，旧名北郭顶，即北门城顶。城垣延至芝山东麓。以上所说为绕城一周。

故老相传，漳州城内有九街十三巷。而明万历《漳州府志》所载有二十一街，清《乾隆漳州府志》增为二十七街，加上城外东门街（今新华东路）共二十八街。巷道也不只十多条。民间所传九街十三巷只是就具有特色的街巷而言。由于“九街十三巷”不见于史志记载，只凭口述流传，人言言殊，旧街巷多已改建，名称多已改易，人们爱听爱谈旧事，而有不知所云之叹。

这里根据熟悉地方历史的耆老口述，参照历史资料，列举较有特色的九街十三巷于下。

九街为：一、府前街，又名府口街，因在漳州府衙署前得名，今为台湾路中段。二、雨伞街，因曾是雨伞作坊荟萃之区得名。地处昔时漳州府衙东边的崇仁门外，由于从前有一座崇仁庙，所以也有人称那地方为崇仁庙。（崇仁门外另有一条南北走向的直街，昔日称旧府路，今称共和路。）三、马坪街，是以前漳州城内最宽的街道，以有马坪许氏宗祠得名（马坪是明代南靖县居仁里，即今龙海市程溪镇人家、上坪至漳浦县马苑一带乡村，住民为陈元光的副将许天正的后裔）。马坪街今为延安南路北段。四、十字街，位于道口街、渔头庙、东铺头、市仔头四条街道交叉处，过去和现在都是漳州城区的商业中心。五、联仔街，又名做灯街，北联瑞京路，南至中山公园的东门，西侧是中山公园的围墙。六、公府街，又称公爷街，以清代一等海澄公黄梧府第所在地得名。原名上街，明宣德二年（1427 年）进士第三名谢琏在此建府第，并立“探花”牌坊，该街遂名探花街。至清康熙年间，探花府为黄梧所占，改称公爷府，街随之易名。今为南昌路西段。七、丝线

街，在东门内，西连东铺头，以曾是丝线、布匹商行荟萃之区得名，今为新华西路东段。八、草花街，原名叫做花街，因此地有许多制造纸花的店家得名。后来进口一种草纸为制花原料，所制假花叫做草花，街名随之称为草花街。下段原称济美巷，今统称平等路。九、炮仔街，以曾开设许多鞭炮店得名，今已无鞭炮店，而地名沿用。它东接新华南路，西接北京路（旧名市仔头），地邻太古桥。

十三巷为：一、给事巷。二、尚书巷。三、经历巷。四、卫内巷。五、漳南道巷。六、杨老巷。（以上请参阅《衙门遗留的地名》和《名人遗留的地名》两篇）七、振成巷，即枕头巷，在今华侨新村南台路之东。巷中有一座林氏宗祠，古朴精致，规模宏大，列为文物保护单位。八、箭弓巷，在今胜利西路漳州一中旁边，原是漳州镇台（总兵）制造弓箭的地方。九、山顶巷，在塔口庵与北廓顶之间，即今大同路西侧北边。巷内有尼姑庙，奉祀“太阳星君”（俗称太阳公），塑像如帝王装扮。太阳公诞辰为三月十九日，据传，该庙为明末遗臣集资所建，旨在纪念甲申年三月十九日缢死的亡国之君崇祯帝。现山顶巷拆建为展览馆，尼姑庙仅存菜堂一间。十、图龙巷，即土砻巷，有人谑称为屠人巷，在今胜利西路与大通北路交叉处。十一、丹芝巷，取丹霞、芝山两山之名为巷名。原巷道西通北京路，北通新华西路，南通炮仔街。经过旧城改造，此巷已不存在。十二、甘蔗巷，原是大同路（原北桥街）与民主路之间的通道，随着房屋改建，巷道已不存在。十三、乌衣巷，以晋代江宁府（今南京）城内乌衣巷为此处巷名。晋朝江宁乌衣巷为王、谢两姓贵族住处，其子弟均着乌衣，故名。漳州乌衣巷也是王、谢两姓望族住处，故援引江宁府的巷名为漳州巷名。解放后，此巷拓宽改建，称大通北路。

衙门遗留的地名

明清时代，漳州城内有道、府、县、卫等衙署，都遗留下地名。

卫口街与双门顶

“卫”是明朝的地方军事指挥机构。漳州卫始设于洪武二年（1369年），衙署在漳州城内，遗址现为居民点芳华里至芳华横路南侧，衙门前的街道得名为卫口街（今台湾路西段）。

卫口街附近（今香港路北段）地名双门顶。双门是宋代漳州铃司署的左右门。铃司署是军事判官（知州的佐官之一，管军事）的衙门。名人蔡襄曾任漳州军事判官。

府埕与府口街

明、清漳州府衙门沿袭宋代漳州衙门旧址，在今中山公园南边，衙门前的广场得名为“府埕”，府埕前面的街道得名为府口街（今台湾路中段）。

经历巷

“经历”是官府的重要吏员，负责文书、庶务等工作。漳州府经历司公廨（办公厅）设在府衙西边（今芳华北路），后成为居民点，名经历巷。

海道后

明朝省一级的行政机关是布政使司，设左、右布政使管理全省民政、财政、赋税等政务，下设左、右参政，派出分管各道，一道辖几个府和州，称分守道，监督府、县工作。又有按察使司，主要职责是监察、检察。设按察使、副使、参议、佥事，有时也派出副使、参议或佥事为一个道的长官，称分巡道，职责与分守道一样。又有巡海道，管理沿海府、县，监督民政工作兼管海防。明

初，漳州属福宁道管辖，明成化六年（1470年）改属漳南道。漳南道管辖汀漳二府，衙署起初设上杭，翌年移设于漳州。嘉靖九年（1530年），为防御倭寇，巡海道衙署从福州移驻漳州，至万历七年（1579年）巡海道衙署移驻兴化（后迁回福州），驻漳期间四十多年，衙署设在漳州府衙署之东北方，今南昌路西段之南，大门向南，故今瑞京路东侧“水仙花园”及其附近旧名海道后。

卫内巷与漳南道巷

旧志记载，明洪武三年（1370年）在元朝漳州访廉司旧址建按察分司，成化七年（1471年）改建为漳南道衙署，址在府、卫二署之间，三个衙门都朝南，共一座鼓楼，同一个仪门出入。府衙在左（东），道衙居中，卫衙居右（西）。自万历七年巡海道移驻兴化后，漳南道衙署便移至原巡海道衙署；明亡后，漳州卫衙署移作别用（康熙年间一度被福建总督姚启圣用作“修来馆”，对郑经部下进行策反）。后来，漳州卫和漳南道衙署旧址都成为居民区，形成两条巷道，称为卫内巷和漳南道巷。民国初年，漳州卫衙署旧址成为居民点“芳华里”。民国7年（1918年）陈炯明建设街道，辟芳华横街，卫内巷被截为两段，一段在芳华横街北侧芳华里，一段在芳华横街南侧，现名南华小巷，通卫口街。漳南道巷在芳华里东边，北接芳华横街，南接卫口街，地名沿用至今。

道口街

清仿明制，省辖道，道辖府，府辖县，不同的是，明朝的“道”属于省的派出机构，由省派出属员为主管，清朝则自雍正以后，“道”为固定的一级政制。顺治年间（1644～1661年），漳州设巡海道；康熙十七年（1678年）增设汀漳道；康熙二十一年（1681年），合并为“海防汀漳道”，雍正十三年（1735年）从漳州府分设龙岩州，全称“分巡海防汀漳龙等处地方道”，简称汀漳龙道，专设道员为长官，尊称道台，改明朝的巡海道衙署为汀漳

龙道衙署，范围甚广。址在今瑞京路之南，中山公园之东北，即延安南路北段，衙署前面（东边）的街道称道口街。

县前街、县后街

龙溪县衙署原在古县村（今龙海市颜厝镇），唐代漳州治所从漳浦移至今之芗城区之后，龙溪县署也移至府衙之西方，一直沿袭到民国时期。其后面的街道得名为县后街，前面的街道得名为县前街（今新华西路西段），其中一段称“百里弦歌”，原因是，明嘉靖十年在县署前当街立两座石牌坊，分别嵌“一方民社”、“百里弦歌”匾，“一方民社”坊在右（西），“百里弦歌”坊在左（东），惟独“百里弦歌”成为地名。

名人遗留的地名

杨老洲与杨老巷

漳州城西有杨老洲和杨老巷，因是明代乡贤杨联芳住处面得名。杨联芳字蘅苑，万历辛丑科进士，任行人（掌传旨、册封等事），后外放任杭州知府。因伸张正义而得罪权贵，被调到边远的贵州任副使，后来又受诬告，便致仕（归休）家居。他不畏权贵，对待百姓很随和，虽贩夫走卒，也与之谈笑风生。他还乐于为群众排忧解难。人们不尊称他为“大人”或“老爷”，而亲切地称呼他为“杨老”，因此，他出任之前的居住地称杨老洲，归休之后的居处称杨老巷。

给事巷与尚书巷

漳州城内渔头庙（今芗城区北京路北段），从前有一座“都宪坊”，是明朝成化六年（1470 年）朝廷为副都御史潘荣敕立的。潘荣的故居就在渔头庙边的小巷里，“都宪坊”就立在巷口，而那条

小巷却叫做“给事巷”。这是因为，潘荣于正统十三年（1448年）中进士，景泰元年（1450年）任吏科给事中，那条小巷开始被叫做给事巷，后来潘荣升了几次官，而巷名不改，沿用至今。潘荣任吏科给事中期间的功绩也永记青史。天顺六年（1462年），琉球中山国王尚泰久过世，第三子尚德继承王位。琉球为中国属国，新王继位都要经过中国皇帝册封。英宗皇帝派潘荣为正使，行人司行人蔡哲为副使，率领一支援助琉球振兴经济的技术人员，包括造船、航海、手工业等方面的能手，近三百人，乘坐一艘大型的“封舟”，航行七日七夜，至琉球进行隆重的册封典礼。由于这批技术人员的努力，使琉球改变了造船和航海技术的落后面貌。这批技术人员留在琉球，传衍后代。清道光五年（1879年），琉球被日本兼并为冲绳县，那些华裔仍不忘祖地，直至现在，仍然常回漳州一带寻根认祖。

潘荣出使册封琉球国王事毕，皇帝甚为满意，成化六年（1470年）升他为吏科都给事中，不久再升为南京太常寺少卿，再升为南京户部右侍郎，调任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督南方粮储，兼理屯田事。漳州潘荣故居“给事巷”前的“都宪坊”就是那时敕立的。但是巷名叫惯了，一直没有改。

潘荣于成化十七年升任南京户部尚书。弘治元年（1488年）70岁时，告老还乡，在漳州东铺头（今新华西路东段）建新府第，被称为尚书府，府第通大街的小巷被叫做尚书巷，沿用至今。

潘荣78岁逝世，追赠太子少保。墓在今龙海市九湖镇岭兜村后小山上，那小山因此被叫做“尚书岭”。墓碑为篆文“明故资善大夫南京户部尚书赠太子少保潘公墓”。墓前路口有一个半月形池塘，面积约三亩，人称“尚书潭”，至今尚存。原有墓前仪制石羊、石马、石翁仲，及社口路头一座三丈多高的墓道碑，于“文化大革命”时被破坏。当时有人乘机挖墓，据传尸体完好，袍服如故，

接触空气后袍服化解；后尸装原棺，埋入原墓。棺中出土宝剑一把，光彩如新。

何衙内

何衙内在东坂后（今青年路），是明朝忠臣何楷故居，自成一巷。何楷字玄子，号黄如，原镇海卫人，天启五年（1625年）进士，任崇祯朝户部主事，累升工部侍郎兼户部侍郎。崇祯亡后，何楷出任在福州称帝的隆武朝户部尚书兼管都察院。时黄道周虽为武英殿大学士，为内阁首辅，而朝廷实权却在拥有兵力的郑芝龙手里。郑芝龙专横跋扈，隆武帝事事受制，黄道周、何楷不能施展抗清抱负。一次隆武帝赐宴大臣，郑芝龙踞坐首位，何楷等认为，自明太祖以来，文臣座位都在武臣之上，群起力争，芝龙只得坐次位。何楷处处受郑芝龙打击，见在朝廷无可作为，便辞职回乡。郑芝龙对何楷含恨未息，派家人假充强盗，伏击何楷于途中，将他耳朵割掉一只。他回到漳州，闭门隐居，于清军入漳时大哭而死。

浦头港变迁

从前，浦头港水深而且避风，地势平坦，距城近，所以船舶喜欢在那里停泊。早在明代，它已经是漳州的重要港口。浦头大庙原码头上遗存万历十年（1582年）所立碑石一方，铭刻："公议凡渡船在此停泊者，每日头摆渡布施钱四十文，二摆渡布施钱二十文，以为香火之赀，不得违误。"（注："头摆渡"、"二摆渡"指一天间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出航，乃漳州方言）。

浦头大庙码头是漳州通石码、海澄、厦门的渡船码头，自明代延续至清代。乾隆《漳州府志》卷六《津渡》记载："浦头渡，

在城东南五里许，通厦门、海澄、石码各处。”另有一个“定潮楼”码头，是航行厦门、福州及江、浙、粤各埠货船停泊的码头，今码头遗迹及“定潮楼”碑石尚存。定潮楼建在码头上，类似城门楼，始建于明，清代重建，改名文英楼，祀三国名将周仓，俗称周爷楼（讹音珠仔楼）。楼与清嘉庆十三年（1808年）所立《重建文英楼碑记》至今尚存。该碑镌记：浦头为“漳之澳区，吞吐潮汐，巍然屹峙，为一方巨镇，鹭岛贾舶咸萃于斯，四方百货之所由也”。

郑成功踞厦门抗清时，几次派船从浦头港登陆，进军漳州。如顺治九年（1652年）郑成功包围漳州城的十万大军，就是从江东桥和浦头港两处登陆的。《明清史料》收集的清廷档案中，有《吏部残题本》云：“顺治九年正月初七日，据漳州署都督佥事管副将事王邦俊塘报，本月初三日晚刻，右路总镇马得功到漳安营，戌时据报，贼船（指郑成功的兵船）约有二千余号，俱各扬帆开驾，一股向江东，一股直驶浦头，距城五里之地。”又江日昇《台湾外纪》记载，顺治十一年，清军管漳州城门的千总刘国轩乘总兵张世耀初到任人地未熟的时机，到厦门约郑成功来取漳州，“十一月初一日，成功令洪旭、甘辉、林胜、陈尧策、陈斌、戴捷等坐快哨船入海澄，连夜至浦头，放火箭，国轩应之，世耀仓卒，乃降”。

清代，浦头港逐渐繁荣，使自漳州城东门外至浦头的五里地带由荒野成为居民荟萃之区，纺织工业繁盛，并由于商贸的发达而形成一条五里长的东门街（今新华东路），是乾隆《漳州府志》和《龙溪县志》所载在城外的惟一街道。

清末“五口通商”，厦门正式辟为外贸口岸后，以浦头为厦门的辅助口岸，延续至民国时期。至20世纪30年代初期，浦头港出西溪处的碧湖港，由于地头豪霸为独专运输之利，策动农民建

港闸，企图使船只及竹排木筏停泊碧湖港港外，改雇他们用小船将货物转运到浦头。这一措施造成碧湖港淤塞，船舶、竹排、木筏改泊于漳城西南的杨老洲至新桥一带，造成溪边澄观道的繁荣，浦头港航运之利尽失。以后，浦头港淤塞日益严重，现在几乎成为一潭死水。

闽南重镇石码

今龙海市人民政府所在地的石码镇，古名石溪，是以溪名为地名，有十社（社即自然村）：公地社（即霞庵社）、许厝社（今许厝街）、登鲁社（今东路）、沙埭社（今沙埭内）、东效社（今玉田街一带）、训经社（今存训经地名）、溪边社（今打石街）、田里庵社（今存地名田里庵）、北岸社（南台庙大埕一带）、龙楼社（今存龙楼地名）。明宣德年间（1426～1435年），石溪为十社乡民龙舟竞渡争夺锦标处，因此称为锦江。明弘治元年（1488年）置锦江埠，已是闽南水陆运输的枢纽。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逐渐密集，使“古乡十社”连成一片，成为一大集镇。由于江岸受海潮冲蚀，屡有崩溃，群众集资在沿岸要害处垒石为“码”，建十二堤以保护江岸，“石码”即成为地名（“码”是俗名俗字，意为“支架”）。嘉靖年间（1522～1566年）已称为石码镇。据《石码志》记载，嘉靖己未“探花”（进士第三名）礼部尚书林士章（漳浦人）在石码设市，分上下码，编千字文为号。万历年间（1573～1619年），兵部尚书戴曜（长泰人）增设新市。

清初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廷下令“迁界”，翌年（康熙元年）漳州开始执行，在石码建一座城堡，可见石码没有划在“界外”，石码城是一座守“界”的军事城堡。始撰于乾隆十八年

（1753 年）的《石码志》（作者林龙津，生于康熙十九年）载："镇城建于康熙元年，拆镇门城改筑于此，城周百五十余丈，高二丈二尺，厚一丈有奇，为门三，东曰受贡，西曰万悦，各建楼，北曰安澜，水门临江为濠。背环官港，马道覆石板，上列女墙，筑方台置炮位，旁修窝铺。城外居民稠密，市肆云连，延袤数里。"

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清朝统一台湾后，解除海禁，石码海运便利，很快繁荣起来。康熙四十八年填筑下码河滩，增辟顶、下新行街。康熙五十九年（1719 年）移设柳营江巡检司于石码。乾隆八年设置石码厅，以漳州府通判为石码厅长官。所辖区域，东至角尾墟，西至同第乡，北至东尾街，东南广 32.5 公里，南北长 18 公里。镇内有街 93 条，巷埕（巷内广场为埕）49 条，市集 15 处。宣统二年（1910 年）撤销石码厅，地划属龙溪县第六区。民国期间，石码一直为龙溪县的一个区，民国 24 年（1935 年）一度设立特种区，直属于省。

石码为货物集散地，自清代至民国及解放后都设有海关。

林士章与长桥城

漳州芗城区香港路北端"双门顶"当街立着两座石牌坊，是至今尚存的市区四座大型石碑坊中属于明朝所立的两座（余两座为清朝所立，在新华东路"岳口"）。香港路石牌坊以匾额一边镌"探花"一边镌"尚书"的一座最著名，是万历三十三年（1605 年）林士章所立。林士章字德斐，号璧东，漳浦人，嘉靖三十八年（1559 年）进士第三名，称探花及第，先后任南京及北京国子监祭酒，最后任南京礼部尚书，于万历七年（1579 年）致仕（归休），选择在漳州城东北郊的"长桥"（桥仔头墟）地方建城筑楼

居住（今地名“楼内”，属龙文区朝阳镇）。《龙溪县志》载：“长桥城，里人林士章建。”《漳州府志》则载：“进士林士章建”。林士章的墓志铭是万历朝东阁大学士于慎行所撰，说林士章“卜居郡北之长桥，栖迟二十载，卒年七十有七”。

入清之后，林士章之孙已经失势。康熙年间（1662～1722年），以叛郑成功降清受封为一等海澄公的黄梧，在占据明朝宣德二年（1427年）探花谢琏的府第为公爷府后，又占据林士章的长桥城及城中的楼房为别墅。黄梧只付为数不多的一点钱给林士章之孙，算是买的，还留一些房屋给林士章之孙居住。

江日昇所著《台湾外纪》及漳州人写的小说《台湾外志》都说，康熙十三年（1674年），镇闽的清靖南王耿精忠呼应吴三桂叛乱，传檄到漳州的时候，黄梧正患背疮，在桥头墟城里别墅养病，当他接读耿精忠的檄文时，刚好突然发生响雷，他猛地一震，疮毒发作，不治而逝。

今这座城堡残存。城中住民，一部分姓黄，是黄梧族人的后裔，一部分姓林，是林士章的后裔。城墙高7米，厚2～3米，周长千余米。城东西直径250米，南北直径200米，椭圆形，面积2000多平方米。城内有楼、台、阁、水榭、花坛、广场。西北城墙于1958年拆毁，现存东南城墙，东门门额镌“迎台门”，南门门额镌“孚兑门”。小河绕城东南流入九龙江北溪。《漳州府志》及《龙溪县志》记载，林士章还建一条长堤障小河之水，使流入北溪，叫做“翰林岸”。

驿、铺遗留的地名

驿道是我国古代官方传递文书物件的大路，驿设馆舍，是过

往官员的招待所，驿以下设铺，为分站；到明代，发展到十里设一铺。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今十里一铺，设卒以递公文。"闽南方言将十里叫做"一铺"，成为计程单位。

漳州的驿道，主要是上通省城、京城，下通广东的大路。明太祖定鼎南京时，全国驿路分为八大干线，南京至漳州居其一。

自泉州同安县深青驿（灌口）进入漳州的第一驿是江东驿，在宋代叫通源驿，元代至正年间（1341～1368 年）才改称江东驿，从此"江东"成为地名，原来宋代叫虎渡桥的，也从那以后被叫做江东桥。

设在漳州城南门外的驿馆叫丹霞驿，以址在丹霞山下得名。驿馆前那条街叫驿路街，那里的一口井被叫做驿口井，地名沿用至今。

丹霞驿北距江东驿，南距甘棠驿各 20 公里，是龙溪县三驿的中心驿站（甘棠驿在漳浦县界的马口，但驿务归龙溪县管理）。甘棠驿在甘棠溪之滨。甘棠溪的得名，传说是唐代高僧杨义中（即平和三坪祖师）当初从潮州来漳州设寺，经过马口时饮溪水止渴，感到异常甘冽，所以叫它甘棠溪。唐代，马口已经有一个甘棠村，而且有一个甘棠人潘存实中进士。今甘棠村虽不存在，却留有"甘棠寨"遗迹。

漳州最早的驿站要推"漳浦驿"。在唐开元四年（716 年）以前，漳州州治兼漳浦县治设在盘陀岭南麓漳江以北，并在盘陀岭上设"漳浦驿"，建驿楼为过往官员招待所，至今留下"古楼"地名，在今云霄县火田镇境内。

宋代改漳浦驿为仙云驿，元初改为"临漳马驿"，驿馆设在仙云坊，即今漳浦县城西街与麦仔市街衔接处，尚存"驿内"地名及驿庙一座，被绥西老人协会利用为活动场所。自元至明、清，设云霄驿于望安（墓庵）山下，故望安山又名驿后山。明代改临水

驿为南诏驿，在今诏安县南诏镇。

明、清时代，驿路上十里设一铺。漳州府衙署前面设一个铺，后来移设于府衙署东边天后宫（水德宫）前，那地方被叫做东铺头，地名至今沿用。龙溪县设13铺：东路（通同安）有赤岭、鹤鸣、马岐、江东、石井、管桥、龙江7铺；西路（通南靖）有溪口、乐仁2铺，乐仁铺在天宝，今存“茶铺”地名；南路（通漳浦），有橡林、木棉、马坪3铺；东南路（通海澄），有莲浦、西莲2铺。漳浦县自北而南有甘棠、三古、盘石、长林、罗山、县前、梅林、无象、盘陀九铺。罗山铺后面的村庄叫“铺后”，县前铺前面的街道叫“铺仔口”，地名至今沿用。盘陀岭以南的火田、径口、云霄、白泉、径心等铺归云霄驿管辖。油柑（余甘）岭以南的深田、善护、大悲、半沙、竹林等铺属南诏驿管辖。

野象留下的印记

现在我国境内，即使是云南边境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里，野象也已经很少了。而在汉代，闽南的梁山，曾以产象牙、犀角著名，成书于汉代的《尔雅》记载：“南方之美者惟梁山之犀、象。”至唐、宋时代，闽粤毗连处高山连绵地带，原始森林仍然茂密，常有野象出没。唐代《岭表异录》记载：“广之属郡，潮州（今潮汕至梅州一带）、循州（今龙川、和平、连平一带）产野象。”北宋彭乘《墨客挥犀》载：“漳州漳浦县地连潮阳，素多象，往往十数为群，然不为害。惟独象遇之逐人，蹂践至骨肉糜碎乃止。盖独象乃众象中最犷悍者，不为群象所容，故遇之则害人。”南宋绍兴十九年（1149年）叶廷圭的《海录碎事》载：“象洞在潮梅之间，今属武平县，昔未开拓时，郡象止其中，乃谓之象洞。”说明闽西

武平县象洞地名的由来。闽南梁山北麓漳浦县盘陀镇也有“象洞”地名，云霄县有“象坑”地名，平和县有“象湖”地名，至今沿用。

闽粤毗连处的野象属亚洲象，母象喜欢群居，成群出游觅食，以素食为主，所以不害人，但损害农作物。而那种“最犷悍”的独象是公象，只有春天母象发情期才伴着母象，在完成交配任务后便为母象所不容，独自出游，人遇到它往往被“蹂践至骨肉糜碎”。

象牙质坚，细致洁白，可作牙箸、杯、盘及工艺品，十分珍贵。从前朝臣上殿向皇帝奏事，双手奉笏（俗称奏板），上录提要。象牙是笏的上等材料，高级大臣才能使用，因此，象牙就成为地方官向朝廷进贡的上等礼物，价格昂贵。地方官定下“猎象交牙”的不成文陋规，影响人们猎象的积极性。《漳州府志》记载：南宋淳熙三年（1176 年）漳州知州赵公绸为消除象害，禁止官吏向猎户索取象牙；又载：淳熙十五年（1187 年）知州傅伯寿始创“立庵设铺”办法，叫和尚管理驿路小站（铺）的事务，有一个游方和尚吴祖华带着徒弟来到梁山下建庵立铺，引来群众聚居，人口渐多，野象渐绝，潮州知州黄定经过那里，题“无象庵”匾额（一说黄定写给“无象庵”匾额后象迹遂绝，这不符合科学道理），因此庵叫无象庵，铺叫无象铺。后来，庵、铺分设，无象铺移设于盘陀村附近，今讹称“牛上铺”；无象庵仍在原地，南宋理宗淳祐年间（1241～1252 年）加以扩建，改称无象院，又因为当地地名叫和坑，俗称和坑院。明弘治九年（1496 年）重建，所立《重修无象院碑记》尚存。

“金漳浦”美誉之源

据旧省、府、县志辑录的文献资料，“金漳浦”美称最早出现在南宋卓遵《请蠲经总制钱记》：“漳之南，其县名漳浦，俗厚，讼稀，赋人饶羡，故为邑者不劳而富，旧以金名焉。”说明当时漳浦县民富，官府赋税收入充裕，因而有“金浦”的美誉。乾道六年（1170年）知县薛世清将“经总制钱”（经制钱与总制钱合称经总制钱，是宋朝为支付军政费用而增设的捐款）从原来每年一万缗（一千文钱为一缗）增加到二万二千缗，得到朝廷记功，然而百姓负担沉重，接任的县官感到征收困难。嘉定四年（1211年）漳州知州赵汝谔报经福建路长官转奏朝廷获准，每年减征五千七百余缗，漳浦绅民都称赞：“以为合浦还珠仅见前史，漳金如旧乃在今日。”

南宋说漳浦“旧有金名”，等于说在南宋之前已有“金漳浦”美誉。旧志记载，漳浦在北宋经济发展较快，文教随之兴盛，学塾、书院遍布，庆历四年（1044年）开始设立县学，人才辈出。大观年间（1107～1110年）漳浦知县傅希龙率领群众开凿一条人工河，被称为傅公河，从县学的泮池通南溪，南溪通鹿溪，潮汐推动溪水进出泮池，市区废水也从而排出大海。傅希龙作《印石记》镌于印石上，说“漳浦为邑，濒海枕山，居民富庶，虽号僻远，诚为乐土，自圣朝承平二百年，登桂籍者岁常一二。……关成而路聚成一市，有亭可观，有桥可步，舟车之往来，商贾之出入，井烟繁阜，有无贸迁，万口同音，功施罔极”。

鹿溪出海口也形成一大集镇，名敦照镇（即今旧镇），商贸发达（据北宋《元丰九域志》及《宋史·食货志》）。

宋代佛昙白石郑解元作《鸿江赋》，歌颂沿海一带农、渔等生产条件的优越和壮丽景观，也提到“金浦”美称，说鸿儒江（佛昙江）在“金浦之郊坰”。

唐、宋县分七等：赤、畿、望、紧、上、中、下。漳浦在唐代为“中下”等县，至宋代跃升为“望”县，即除京畿以外的头等县份。

从以上资料可知，漳浦自宋代起有“金漳浦”的美誉，确实名不虚传。明代，漳浦更加繁荣，泉州进士何乔远在所著《闽书》中说“漳浦旧有金名焉，谚谓之金漳浦、银同安”，金浦、银同的美称流传更广。

多处大帽山易误会

各地以“大帽”为名的大山很多，单漳州地区就有：平和县与广东饶平交界处的大帽山，南靖县又名欧寮山的大帽山，长泰、漳浦、云霄、东山的大帽山。一些发生在大帽山的史事更容易混淆。明代正德年间（1506～1521年），江西与福建交界处的大帽山，福建与广东交界处的大帽山，先后发生过大规模起义，有的图书就误以为是同一个大帽山。

福建与广东交界处的大帽山农民起义，发生在今平和县与广东饶平县交界处。漳浦二十八都（今漳浦县与龙海市交界处）也有大帽山，由于漳浦县丞纪镛奉召率领民兵参加大帽山会剿而战死，康熙《漳浦县志》也误以为那次大帽山之战在漳浦大帽山。

1979年版《辞海》“大帽山起义军”条说：“正德二年（1507年）起，起义军就屯聚在绵亘数百里的大帽山（在江西寻乌南，地当江西、广东、福建交界处）中，进行反明斗争。曾攻占瑞金，杀

知县万琛。……起义军首领张时旺、黄镛等牺牲，何积钦等突围后，不久又被左都御史陈金杀害。但起义群众仍坚持斗争。正德十年（1515年）詹师富等又在此起义，与赣南谢志山（一作珊）等起义军相呼应，十一年王守仁调福建、广东兵合力镇压，次年，詹师富战败被俘，牺牲者达七千余人。”

其实，正德十二年失败的詹师富起义是在闽粤交界处，今平和县与饶平县交界处大帽山，与正德二年闽粤赣三省交界处（江西寻乌县南）大帽山起义不是同一地点（请参阅本书《政区沿革》篇的《南靖分设平和县》一文）。

王守仁以佥都御史身份出任南赣汀漳巡抚，镇压了赣南陈日龙农民起义军、广东俐头池仲容农民起义军后，屯兵上杭，檄调福建、广东两省会兵，并命漳州府以地方兵力会剿，全力镇压闽粤交界处大帽山起义。漳浦县丞纪镛奉令率民兵参加这次战役。康熙《漳浦县志》的《名宦传》记载：“纪镛，江西永丰人，正德六年任浦邑丞。十一年广寇滋蔓，为民害，南赣巡抚王守仁破贼于长富村，追至象湖，镛率民兵蔡统等从巡抚会兵追捕。贼遁，溃围而出，镛马惊坠坑塹中，被杀，体无完肤，当道以事闻，荫一子入太学。”这记载与《漳州府志》的《名宦传》相符，史实无出人。但同一部县志的《建置志》载“大帽山寨，在二十八都，正德十一年为广寇所据，县丞纪镛率兵击之”这一条是错误的。由于纪镛战死在围剿大帽山起义军之役，县志编纂人误以为漳浦二十八都的大帽山寨曾“为广寇所据”。其实，纪镛传记中所载“南赣巡抚王守仁破贼于长富村，追至象湖”这些地名都在平和而不在漳浦。长富村即今长乐，由于它曾是詹师富起义根据地，在官军平了詹师富起义后，为肃清詹师富的影响，便改长富为长乐。王守仁并奏准从南靖县分设平和县，以加强这一带地方的统治。

何处是“界外”

清廷为杜绝群众对郑成功的接济，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下“迁海令”，强制广东、福建、浙江、江南（清朝的江南省即明朝的南直隶，相当今江苏、安徽、上海一带）四省海滨居民内迁15～25公里，建墙为界，界外城堡全部堕毁，民居和船只烧毁。界墙跨越溪涧处竖大木椿为栅，在临界要道建城堡驻重兵，日间派游哨巡逻，夜间伏路把截，并在高阜上设瞭望哨、烽火台、炮台，发现越界者立斩。于是，人民流离失所，界外赤地千里，界内盗贼丛生。漳州府于九月开始迁界，翌年（康熙元年）在临界处建城驻兵，如在石码城、旧镇以北的霞陵城、旧镇以西的秦溪城等处驻兵，作为守界据点，旧镇城被摧毁。可见石码没有划在“界外”，旧镇划在“界外”，这是按康熙元年建城和毁城情况推断的。

“界”在何处？各县县志记载极其简略。杜臻《粤闽巡海纪略》有比较详细的记载，这里只录福建部分。福建之“界”北接浙江的沙埕，南抵诏安分水关与广东方面衔接，全长910公里。

漳州府滨海四县的诏安（包括五都东山）、漳浦（包括云霄及东山之城关）、海澄、龙溪，因“迁界”报荒田地2783顷。

诏安县之“界”，自分水关经南山、凤安亭、大兴寨，至梅州寨。大兴寨、梅州寨都成为守界城堡。悬钟所、西岐岭、竹港、梅岭一带划在“界外”，报荒田地384顷。

漳浦县之“界”，南接梅州寨，经油柑岭、高塘洋、云霄镇、梁山、高洋口，至横口。杜浔堡被利用为守界城堡。后葛司、旧镇、六鳌、莆头、月屿、赤湖、佛昙、官浔一带划在界外，报荒田地1163顷。

海澄县之“界”南接横口，经洪礁、独石山、庙村、蔡家庄，至三叉寨。三叉寨被利用为守界城堡。陈辉村、甘辉村、太江一带划在界外，报荒田地 784 顷。

龙溪县之“界”，南接三叉寨，经江东桥、东尾、九头、马鬐山，至莲花村。海沧、乌臼、姚屿、石尾一带划在界外，报荒田地 382 顷。

泉州府滨海四县的同安、南安、晋江、惠安，因迁界报荒田地 5474 顷。

兴化府辖莆田、仙游二县，因迁界报荒田地 4511 顷。

福州府滨海五县的福清、长乐、闽县、连江、罗源，因“迁界”报荒田地 2441 顷。

这是最初“迁界”的情况。康熙八年（1669 年）有过一次“展界”。康熙十三年（1674 年）靖南王耿精忠响应吴三桂叛乱，郑经乘机攻入闽南，迁移的百姓纷纷回归故土。康熙十五年耿精忠降清，康熙十七年十二月郑军败退，清廷下令再次迁界。至康熙二十年清军攻克厦门，遂宣布复界。

“礼氏列岛”名从何来

菜屿列岛曾经被叫做礼氏列岛。它位于漳浦六鳌、古雷两个半岛之间的浮头湾，由 17 个岛礁组成。著名的有：菜屿，以盛产紫菜得名（《明史》写作“甲洲”）；巴流屿，以利于竖桁挂网截捕鱼类得名把流屿，转音为巴流屿；横屿，以横向排列为长形而得名，距六鳌最近；红屿（《明史》作“洪屿”），以礁石呈红色得名；沙洲，以有沙滩得名，距古雷最近；井坡，以常有渔船、商船在那里汲取淡水得名。此外，青草屿、内鹰屿、外鹰屿、东赤

屿、西赤屿、鸽沙屿、小狮球礁、龙虾白礁、妈祖印礁、破船礁、土礁、圣杯屿（“圣杯”是竹头剖成两半，用于向神像问卜的器物，地图上误为“圣林屿”）等，各以其形态和特色得名。从前没有“列岛”名称，由于巴流、菜屿、红屿、井坡、沙洲五个岛屿有渔民建简单的房屋，在那里长年作业，所以统称那一带岛礁为“五屿”。为什么被称为“礼氏列岛”？这可有一段惨痛历史：

明代万历年间(1573～1619 年)，荷兰人战胜葡萄牙人而占领爪哇、苏门答腊、努沙登加拉、马鲁古等群岛及马来半岛的若干地方，将经营这一带贸易的公司组成东印度公司，总部设在爪哇岛的雅加达（荷兰人将其改名为巴达维亚），拥有武力。荷兰国会还授予其对外宣战和缔约的特权，实际是统治殖民地的总督府。该“公司”于 1622 年（明天启二年）组成一支拥有 11 艘三桅大夹板船、1200 人左右的远征队，任命纳里斯·雷约兹（Cornelis Reyrtsz，一译雷尔生）为司令，于 4 月出发，向澳门发起三次进攻，被葡萄牙人开炮击退。雷约兹知道澎湖没有设防，转去占领澎湖。7 月，这支船队在澎湖风柜仔澳停泊，强迫当地住民为他们采石、运土建城造屋，劳力不足，财物欠缺时，便派舰艇到海上拦劫商船和渔船，到闽南海岸抢劫，掳走渔民充当劳工。《明史·荷兰传》据《东西洋考》记载这支荷兰远征队的活动地点是：“泊舟风柜仔，出没浯屿、白坑、东碇、莆头、古雷、洪屿、甲洲、沙洲间。”荷兰人不懂地名，就将莆头（即赤湖将军澳）以下六鳌、古雷两个半岛之间的洪屿（红屿）、甲洲（菜屿）、沙洲一带岛屿用他们司令的名字命名为雷约兹（一译雷尔生）列岛，许多中国走私商人到那里与荷兰人做买卖，由于译音不准，叫成“礼氏列岛”。

雷约兹派舰艇到厦门，向厦门地方官提出只让中国商船到澎湖与荷兰人贸易，禁往吕宋等不属荷兰管辖的南洋其他地方贸易

的要求，遭到拒绝，发生过战斗。天启四年（1624 年），福建巡抚南居益派水师进攻澎湖荷兰海军基地，荷兰人被迫毁城转往窃据台湾，又在闽、浙、粤沿海亦商亦盗，所谓的礼氏列岛便成了他们的巢穴。此时，中国沿海盗贼纷起。至崇祯元年（1628 年）朝廷招抚海盗商人郑芝龙，利用他消灭其他海盗，屡次打败入侵闽南一带的荷兰舰艇，荷兰人才不敢再犯闽南。

1661 年 2 月（清顺治十八年二月，即南明永历十五年十二月）郑成功逐走荷兰侵略者，收复台湾。而由荷兰人命名的“礼氏列岛”却为清朝所沿用，至民国未改。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将这一系列岛屿定名为菜屿列岛。

“白水仔赢”成地名

龙海市白水镇原名白水营，不是由于那里有一个兵营和有一条碧溪得名，相反，“碧溪”是“白水”的雅化。而“白水”之名也不是由于那一条溪的水特别白，“白水营”其实是由于“白水仔”渔民斗“赢”市霸而得名。

“白水仔”就是蛋户，他们以船为家，或运货或捕鱼为生，常年漂泊水上，所以人们称其为“白水仔”“或“白水舶”。据宋代乐史所撰《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二《泉州·风俗》篇：“泉郎即州之夷户、亦曰游艇子，即卢循之余。晋末，卢循寇暴，为刘裕所灭，遗种逃叛，散居山海，至今种类尚繁。唐武德八年（625 年），都督王义童遣使招抚，得其首领周造、麦细陵等，并受骑都尉，令相统摄不为盗。贞观十年始输半课。其居止常在船上，结庐海畔，随时移徙，不常厥所。船头尾高，当中平阔，冲波逆浪都无畏惧，名曰丁鸟船。”福建师范大学教授朱维幹在所著《福建史稿》中将

这事写得通俗易懂：东晋末年，江浙一带发生抗拒兵役的大规模农民起义，东晋皇帝靠北府兵首领刘裕将他们镇压下去。刘裕乘机推翻东晋，于公元420年建立宋朝（史称刘宋，刘裕为宋武帝）。农民起义军首领孙恩战死，他的妹夫卢循继起领导余众，以船队从温州入闽，转往广州，转战江西，最后失败。余众一部分留在闽海，其后代叫“游艇子”，也叫做“泉郎”，这是由于唐代早期还没有“福建”名称而叫做“泉州”。泉州名称始于隋代，治所在今福州，辖域大抵为今福建省。按此说，水上居民被叫做“白水仔”、“白水舶”，一方面由于他们常年漂泊水上，一方面是“泉”字的拆字。

在明代的地方志中没有“白水营”地名，只有“方田”（今白水镇市区靠山的一个村），因为今之白水营市区老早只是一片无名冲积地，无人居住。由于它是很好的避风港，“白水仔”常来停靠。他们捕获的鱼货大都拿到方田出售。市霸重秤收购，轻秤售出，“白水舶”深受其害。消费者也愤愤不平，有的便直接去找“白水舶”买鱼。后来，“白水舶”尝试着在作为船坞的岸上自售鱼货。由于没有中间盘剥，价钱便宜，人们宁愿多走一段路去岸边买鱼，方田鱼市就冷落了。方田市霸多方干扰破坏“白水舶”的新兴鱼市，但群众支持“白水舶”，他们与市霸的斗争得到最后胜利。“胜利”闽南话叫做“赢”，白水仔斗胜市霸的消息一传开，人们奔走相告：“白水仔赢了！”从此，这块无人居住的船坞岸边，买卖的人逐渐增多，便叫做“白水赢墟”，起初只是对那地方的谑称，后来成为地名。因为“赢”与“营”同音，为了书写方便，就写成“白水营”。

千年沧桑佛潭桥

佛昙古代写作佛潭，以芙蓉山顶峰有一块天然大石形状如佛头，映照在山下一口潭中而得名，是以潭名为地名。横跨在鸿儒江上的桥梁叫佛潭桥，是以地名为桥名。后来又反过来以桥名为地名，今佛昙镇古名佛潭桥。最早出现“佛潭桥”三字的诗文，当推“开漳”刺史陈元光的《晓发佛潭桥》诗，记人地方志的最早的佛昙军政机构是陈元光建立漳州后设行台于四境之中的东行台，设在佛潭桥，巡逻范围及于南太武山。陈元光常到各行台视察，参加巡逻，《晓发佛潭桥》写的就是陈元光参加东行台官兵出发巡逻的雄壮场面。

历代的官方文书和地方志上，都称呼现在的佛昙为佛潭桥。而在群众口头上，则叫做“浮南桥”。一说，“浮南桥”是由“佛潭桥”转音而来。一说，在佛潭桥（桥名）之西的莲山（今中心小学处）原是一个江中小岛，在这小岛之西，另有一条浮桥通现在的杨氏大祖祠（明代曾有梅月城）地方，所以那地方叫“岸头”（明代叫“西墟”），清代设墟场，称“桥头墟”。那条浮桥在南边，所以叫“浮南桥”。总之，“佛潭桥”是官定地名，“浮南桥”是群众叫法。再后来，“佛潭桥”简写为“佛潭”。至民国初年，当地人士为渲染佛境气氛，将“佛潭”写作“佛昙”，慢慢成为习惯写法，解放后沿用，定为标准地名。

陈元光时代的佛潭桥是一座什么结构的桥，无从稽考。见于地方志记载的佛潭桥为元代至正六年（1346 年）乡人陈重显所建。旧志没有记载该桥的结构，而它直到现代还存在，是一座全长 200 多米的石梁桥，由五条石板并铺，宽 3.3 米，共 18 间（孔）。桥

中两条石板分别刻字“陈重显建”和“赵夫人修建”。这显示着，在元代，佛昙的主要居民是陈姓，是且出了有能力建一座横跨鸿儒江大石桥的富户陈重显。而不久，赵姓也在鸿儒江畔崛起，那是元初逃来积美隐姓躲避元兵追缉的赵宋皇族赵若和所传衍。赵夫人修桥时间应在明代，因为在元代，佛昙赵姓还是假冒黄姓，到明初洪武年间才复姓为赵，也才敢亮出“赵夫人”的衔头。据当地老人回忆，从前有目共睹的，除两条石板上的刻字外，还有立在桥西端的元、明、清历代修桥碑记，在1955年改建木质公路桥时被埋掉，没有人记下碑文。据杨氏族谱记载，曾任广东副使的杨守仁曾于明万历庚子年（1600年）倡修佛潭桥。佛昙杨姓是宋末从福建南迁广东的宋末端宗皇帝（赵昰）之母杨太后胞弟（《宋史》记载为弟，族谱记载为兄）杨亮节第三子世隆的后裔，明代成为超过黄、赵、陈等姓的佛昙大族。元代，又有林姓在佛昙港头开居，明代蔚为望族，清初有林承，任兴化总兵。佛潭桥于“迁界”时毁坏，林承于康熙三十年（1691年）以母亲名义修建佛潭桥，立一座功德碑于岸仔头，至今尚存。佛潭桥经多次修建，而元代石桥板大部分沿用，有残缺的也按原来规格补全。

1938年5月，厦门被日军占领，国民党福建军政当局下令破坏闽南公路，以防日军机械化部队入侵。佛潭桥虽不是公路所经桥梁，也炸断2间石板，群众只得架设木板通行。1945年，占据厦门的日军流窜潮汕，于7月8日经过佛昙，再炸断佛潭桥石板3间和木桥板2间，以杜追兵。之后，群众自发集资架设木板通行。1955年，建一座单车道木质公路桥于原石板桥上游一侧。1962年9月，利用古桥墩重建一座13孔双车道石结构公路桥，从此再也见不到古代石板桥的影子。

山川胜景



天宝山与漳城龙脉

漳州市区西北方的山脉是博平岭山脉自南靖向东的延伸。第一座高峰是石蛎山，以山上有附着牡蛎壳的岩石得名，在市区以北20公里处。南下5公里为天宝大山，海拔918米，绵亘于九龙江西、北二溪之间，长50多公里，雄视漳州平原。天宝山有宝石洞、芙蓉城、百丈泉、鬼潦坑等名胜，既严峻又秀丽，“宝峰飞翠”为漳城八景之一。它不但是景色优美的游览胜地，而且盛产茶、果，堪称“物华天宝”，但它的得名不是缘于这一名句，而是一则传奇故事：宋朝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年）有一颗大宝珠从这山上飞入九龙江，被渔夫邱颤网得，漳州知州王冕将它贡献朝廷，皇帝赐这山名为天宝山。《漳州府志》载有王冕《漳州进珠表》原文和一篇刻于公厅石碑上的《序》。《序》说那宝珠是渔夫邱颤从九龙江网得，围阔三寸七分，中有小珠七颗如七曜，次于七曜的小珠不可胜数。有《进珠表》和《序》可证“漳州进珠”之事属实，但《表》和《序》都没有说邱颤获珠的具体地点。而府、县志都记载那令人难以相信的“山上飞珠入江”事；并记载邱颤获珠具体地点在北溪大濑，因此大濑又名宝珠滩；滩上有巨大岩石，那珠以岩石中间的洞穴为巢，因此那岩石得名为宝珠石。

天宝山有四角林，有雷层、鳄鱼二寨，是军事寨堡。

《漳州府志》说：“天宝山为郡之镇，五峰峭峒……南行逶迤到郡城共有十二峰……过乌石、油车而为望高山，在郡城西北，明秀耸特出于众山，南为紫芝山，郡城绕焉。”（注：紫芝山即芝山，城垣从山腰绕过，将芝山顶端围在城内。）府志将这一条山脉称为

漳州城的龙脉，经城西北绕到城西南。府志接着具体地说，芝山的左（东）边是日华峰、万松峰、禅月峰、保福山、隆寿山；右（西）边是净安峰、腾龙峰，都在城内。腾龙峰又名龙文山，在城西南隅，平地突起，奇石攒凑，俯瞰西溪，相传有龙腾于溪。山上曾建亭，后来亭圮，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龙溪知县刘天授在亭的遗址上建一座石塔，称龙文塔，后坍。清雍正十年（1732年）知县刘良璧发动富绅林编捐资重建。与龙文山相对的是虎文山，又名凤山，原来有亭，为宋代名士吴勉读书处，后来亭圮废，明隆庆五年（1571年）龙溪知县李联芳在亭的遗址上建一座石塔，称文昌宝塔，后来圮废没有重建。龙文、虎文二山在龙溪县学前（今漳州二中前面）。龙文塔于“文化大革命”时被毁（1999年重建的龙文塔在龙文区，与已废龙文塔不在同一地点）。

芝山的沧桑巨变

芝山在漳州城西北隅，是天宝山脉“排闼十二峰”逶迤南来到望高山，再延伸到城区的“城之镇山”，原名登高山。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山上生紫芝，知府徐恭将这“国之祥瑞”上报，明太祖赐名紫芝山，后来被简称为芝山。自望高山之下脉分三支，形成芝山、日华山、保福山“三台鼎立”，顶上各建一座石构凉亭，统称芝山三亭，突出于青松翠柏之上，蔚为景观，是登高眺望漳州平原景色和休憩的好去处。明正德年间（1506～1521年）知府陈宏谋有诗赞道：城上孤亭四面空，满城风景入亭中。溪流东下潮声壮，山势西来地脉雄。边檄无虞钲鼓静，黎民有喜岁丰收。公余到此情无限，北极迢迢望未穷。

三亭的由来：

甘露亭，在芝山主峰，是三亭中地点最高的一座亭，明嘉靖十六年（1537 年）“天降甘露”，福建监察御史李元阳上表朝廷庆贺“祥瑞”，知府孙裕在芝山顶建甘露亭纪念。

日华亭，在芝山主峰东边的日华峰，不知始建于何代，明末圮废，清乾隆五年（1740 年）漳州富绅林编重建。

威镇亭，在芝山的次峰保福山，始建于明弘治年间（1496 年左右），嘉靖年间（1540 年左右）府同知谢宏重建，后圮废，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 年）再度重建，改名为万寿亭。

这三亭并无“仰止亭”之名，而人们总是误称甘露亭为仰止亭，讹音为“老鼠亭”。

其实仰止亭在保福山山腰，也是孙裕所建，但清初已经圮废，以后没有重建。它别有一则故事：孙裕十分崇拜朱熹，未出仕时，曾梦见朱熹嘱他办理后事，后来他任漳州知府，到芝山南麓拜谒朱子祠（即芝山书院），感到与他梦中会见朱熹的地方很相似，说：“梦其徵矣！”就从祠东开一条路通保福山山腰，建一座三进的讲堂，上挂“协梦”匾额，并建一座凉亭，名仰止亭。这事见于府、县志记载。另据清末曾文虎《漳州杂诗》注：“仰止亭于康熙二十三年圮废，不再重建。”人们大都只看到府、县志而没有看到《杂诗》，难怪以为甘露亭便是仰止亭。

芝山下原有多座寺庙，著名的有：开元寺，唐开元年间建在漳浦，贞元年间随州治移建于龙溪芝山下。民国 18 年（1929 年）被利用为兵营，民国 24 年为福建绥靖公署驻地，抗日战争期间为管理兵役和训练壮丁的龙溪团管区驻地。法济寺，在开元寺西边，始建于南唐保大十一年（953 年），元代元贞元年（1295 年）重建，明初利用为军储仓，明末圮废，民国初年基督教会在其遗址上建寻源中学。1932 年春，毛主席率中央红军东路军进驻漳州期间，在

寻源中学红楼办公。抗日战争期间，寻源中学内迁，驻漳75师利用其校舍为师部。保福净众禅寺，始建于后梁贞明二年（916年）。南宋芝山书院便建在此寺附近。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废科举兴学校，芝山书院改为漳州府中学，民国时改为福建第八中学，又改为龙溪中学，今为漳州一中。

碑林世界云洞岩

云洞岩在漳州市区以东10公里处，今龙文区步文镇境内，国道324线附近。它原名石壁山，以岩石高耸峭壁陡立得名。又名鹤鸣山，以隋代有一个潜翁在那里养鹤得名，亦称鹤峰。有“仙释”传说，载《漳州府志》、《龙溪县志》，说：“石壁山高出云霄，宋代开元寺僧从谦往游，见二士对弈于亭，就之，化为白鹤冲天而去，余一棋子，取吞之，因辟谷不食四十年，寿百岁。”

石壁山除石壁之外，净是形态各异的大小岩石相叠，参差交错，构成许多大小不同的洞穴和石室。树木只是在岩石间“见缝插针”。南边一洞深广各3米多，天将下雨便冒出云雾，称为云洞，石壁山因而改称云洞岩。石壁上多题字石刻，被誉为碑林世界。游客来到山下，首先看到小溪边两块巨石对峙如门，上镌“振衣所”三字，据说是僧人用来提醒朝山进香的信士，要先在这里整肃衣冠。过小溪上的“云渡桥”便到佛庵。佛庵的左角有一间“鹤室”，为明代蔡烈读书、著作、讲学处。他隐居不仕，人们尊称“鹤峰先生”。鹤室内至今保存篆字石刻“蔡鹤峰先生神位”，还有一段《易经》石刻。庵旁有两处“云洞”明代题刻，一是曾任布政使的周瑛所写楷书，一是考功郎林达所写篆字，各有风格。过庵院便看到“别有天”题刻。从“别有天”北上，经过朱子祠，再

攀登一里许，便到顶峰“天柱”。有一片巨石，只根部小部分搁在盘石上，大部分向空中悬出，好似摇摇欲坠，上刻“风动”两字，《龙溪县志》说它“撼之即动，刚风至亦然”。下面峭壁垂直，植根险谷，有“搔首”二字题刻，每字约2平方米，高距根部约200米，令人难以想像当时是怎样搭架攀上去镌刻的。“天柱”下有“千人洞”，洞口狭窄到只容一人匍匐而入，洞内宽阔可容千人。千人洞下有一个巨石平盖的石室，南宋理学家朱熹在任漳州知州时，在这上面留下“石室清隐”题刻。

从“别有天”分路向东环山而行，曲径通幽，过了“仙岛”又到“霞窝”，有朱熹题刻“溪山第一”四个大字。“霞窝”二字则是明代被贬到镇海卫的翰林学士丰熙的题刻。“霞窝”右边有一个两头都可进出的大石洞，洞口题刻“月峡”两字，洞顶有“天窗”，洞内有泉窟，每当月挂中天，照射洞内泉窟，反映在石壁上，形成“三个月亮”，所以月峡又称三月峡。穿过月峡，便看到东边的“三川风月”题刻。从“白云深处”北上，经过“天梯径”，便到仙亭岩，中有“瑶台”，石刻“许碏寻偃月子至此”八个大字。《龙溪县志》引据《名胜志》记载，许碏为南唐保大年间名士，自称高阳人，他到处寻找偃月子，在多处人迹罕至的山间留下与云洞岩这一处相似的石刻。偃月子是实有其人的隐士还是虚无缥缈的神仙？这个谜增加了云洞岩的神秘感。

云洞岩共有摩崖题刻200多处，题刻时间最早在五代，最迟是清代道光年间。其中有两处最大型的题刻，一是丰熙写的《鹤峰云洞记》，一是林达写的《鹤峰云洞续记》。云洞岩石刻之丰富，书法艺术之精湛，文化品位之高尚，让游览者叹为观止。

瑞竹岩与石室岩

瑞竹岩（庵）在岐山上。岐山又名马岐山，在漳州城东门外15公里处，今龙文区步文镇梧浦村。庵始创于五代，传说住持僧楚熙伐竹当水管，引泉水饮用，竹触地，日久复活生笋，称瑞竹，因此称瑞竹岩（庵）。有石禅床，传说为楚熙“入定”处。明代名士林钎、陈天定两个表兄弟早年曾在瑞竹岩读书，林钎筑八角形凉亭，名“介石之窠”，陈天定开辟山路，曲径通幽。悬崖上镌“海日江春”四大字。后林钎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考中“探花”（进士第三名），由翰林编修升官至国子监祭酒（最高学府的长官）。天启年间，林钎因反对太监魏忠贤专权乱政而受迫害，弃官回乡。陈天定于天启四年（1625年）中进士，也因为不愿意附和魏忠贤而辞官回乡，两人都撰联镌在瑞竹岩大殿的石柱上，分别为“夙根有慧皆森发，上善无声自广长”和“风静潮初满，山空月正中”。天启皇帝在位七年而逝，其弟接位，是为崇祯帝，复林钎原职，升礼部侍郎兼侍读学士。林钎陈述用人、理财、靖寇、宁边四策，得皇帝器重，升东阁大学士，入阁参与军国大事，因积劳成疾，于崇祯九年（1636年）去世，谥文穆，赐祭葬，墓在故乡洞口（今属步文镇蓝田村）。岐山顶建有“林文穆公祠（已废）。岐山下为万松关。清代黄禹咏岐山诗云：“一径周遭石几弯，晴空浮翠俯回环。高僧定后篁根古，相国祠边鹤语闲。返照射江双镜水，秋钟度树万松关。前溪我亦先庐在，他时归耕近此山。”

瑞竹岩附近有聚奎岩，原名瑞龟岩，以有石似龟得名，也是楚熙所辟。宋代名士陈格早年曾在瑞龟岩的龙公洞读书，始雅称瑞龟岩为聚奎岩。清康熙元年（1662年）僧顺熙重修聚奎岩，辟

石室一处，可坐一百多人，从此聚奎岩又名石室岩。石室的地板也是岩石，有泉从裂隙涌出，清澈甘冽。由于聚奎岩之西原有一个石室岩，称聚奎岩为东石室。

聚奎岩西边（今步文镇西坑村）的西石室岩才是老牌的石室岩，有天然的石室多处。庵为明代高僧樵云禅师首创。《漳州府志》和《龙溪县志》记载：樵云原是开元寺苦行僧，万历初年，万松关未辟为大路，却是一条漳州通省城的捷径，很多人走这条路，樵云在距小路不远处的石室设庵，白天在路边亭里为过路人免费供应茶水，夜间在庵里读书，几年以后，通晓诸佛经，成为著名的高僧。万历皇帝之母李太后病逝，征聘天下高僧晋京诵经超度，漳州地方官推荐樵云应征。佛事完毕，皇帝赐给紫衣，即紫色袈裟，是皇帝赐给高僧的很高荣誉。皇帝并令府县为其营建梵宇于原来结庵处，挂“闲云石室”匾额。今庵无存，石室及石塔一座尚存，塔上镌“保国佑民”四字。民间另有一种传说：樵云俗姓郭，漳州东乡霞洲榴阳（今龙文区步文镇赤岭山头顶社）人，幼年出家于山头顶社桥下庵（今觉皇院），专做打柴挑水之类苦工，后来结庵于石室岩。他不识字，只会念一句“阿弥陀佛”，而他天生有无穷的法力，只凭一句“阿弥陀佛”便超度皇太后于西天极乐世界，为来自全国各地的僧众所不能及，皇帝赐他金银财宝都不受，只一味看着皇帝的“龙裤”，皇帝说：“你若喜欢这种裤，朕叫人做一条新的给你。”樵云说：“皇上现穿的这一条裤就好，不必新做。”皇帝乃将现穿的那一条裤赐他，并赐“龙裤国师”称号。石室岩前面那座石塔也是万历皇帝赐的，樵云运用法力，将塔收入袖中，辞别皇帝，腾空凌云而归，将塔放在庵前，叫做“飞来塔”。民间故事将樵云说成天生的佛骨，不识字也能成为高僧。他原来不识字当是事实，但经过多年苦学，非但识字，而且是通晓各种佛经的高僧。他的几位学生也是高僧，如临济宗禅师净柱，字

远门，著《五宗续略》22卷；憨山禅师，字德清，著《楞伽笔记》、《醒世歌》；元贤字永觉，鼓山住持，著书20种80余卷。

故事离奇石狮岩

漳州城南门外的山脉自靖城双溪口逶迤东来，经西天山，至圆山、琵琶坂，转南经大帽山，以下分东西两脉，东脉经九龙岭至名第山，西脉经石狮岩山至南山。

石狮岩山又名南岩山，在城南3.5公里处，延袤数公里，有7座山峰，从前都有佛庵，称虎峒岩、石狮岩、罗汉岩、玉泉岩、普陀岩、紫云岩、日照岩（方言称山间庵院为“岩”），因此石狮岩山又名七首山，为内七首，与东门外以云洞岩为主的“外七首”同为游览胜地。

石狮岩是“内七首”的主峰，山上多怪石，有似蟾蜍的，有似雄狮的。从前有圆明、石门、龙泉、妙峰等佛庵，今只存石狮岩庵。有多处石洞，其中一洞叫虎峒，当是从前曾为老虎巢穴。传说，唐代曾在洞口筑一座“伏虎亭”，山中有一位无隐禅师，经常在那里讲经，一只老虎常坐石头上听讲，无隐禅师总骑着那只老虎入市买肉喂它。有一天，无隐禅师忘记骑虎入市买肉，虎饿得长啸不止，无隐禅师伸出一条臂膀去喂它，老虎吃完一条臂膀即止，不伤禅师主体。过后，禅师又长出一条新的臂膀。

石狮岩有一只古朴大石狮，至今尚存。传说，那石狮从前能每天从屁股间生出一撮米，不多不少，刚好够住持老和尚和他的小徒弟两人一天食用。后来小和尚想，天天去石狮屁股下取米费事，就自作主意，背着老和尚，将石狮的屁股眼挖大一些，以为这样一来，米可以出得既快又多，只需几天来取一次就可以了。哪

里知道，石狮因此伤重致死，不能再生米了。这故事虽离奇，却寓有不可贪心强求之意。

山上有摩崖石刻多处，刻在“石门”上的“石狮岩”三字是明代贬谪镇海卫的李见罗所书。一块平削的大石上镌“薛公桥”三个大字，旁边所镌原是宋代修建南龙津碑记，明代李材改镌“修身为本”四个大字。“虎拜石”后面大石上镌明代漳镇总兵马负所书“大观”两个大字。另一处石刻“停骢处”不知何时所镌。

罗汉山是石狮岩的旁峰，岩石上镌“罗汉峰”三个大字。明代有罗汉寺，黄道周题匾额“南岩第一”。后寺坍圮，清乾隆元年（1736年）曾重建，有观音阁、超然阁、怀德楼、敬善堂、捧日亭，今皆无存。

又一旁峰普陀岩，有普陀石，刻普陀佛像。

另一旁峰玉泉岩，有泉自石上喷出，名“玉泉”。石上镌“含晖”两字。

虎崆岩、紫云岩、日照岩也都是石狮岩的旁峰，风景秀丽。虎崆岩与日照岩已由乡人集资重建。

石狮岩右边有万石岩，明代名士张燮在那里开山建屋，才发现那里有一处庵院遗迹。山中有蝙蝠洞、廉泉洞、石航洞、层霞洞，还有大隐屏、小隐屏等奇石。从前有隐书巢、步虚坛、梅花楼等名胜，今无存。

圆山和琵琶坂

圆山在九龙江西溪南岸，漳州城西南5公里处，平地突起，挺拔雄伟，山体浑圆，珑玲秀丽。俗语云：“圆山十八面，面面有风景。”《龙溪县志》则说它：“前后望有十二面，如覆盆然。”无论

站在哪一个方向望去，都可以欣赏它的另一面风光，说它十二面也可以，十八面也可以，总的说来，它是圆的。它高出周围平地约500米，山上有“仙脚迹”、“石碾槽”、贝丘等古迹；有石池、“啸台”等自然景观。《龙溪县志》说：“每云气覆之，天必雨。”

圆山南麓的蔡坂、梅溪、新塘等村（今属龙海市九湖镇）是闻名世界的漳州特产水仙花之乡，年产数十万颗优质水仙花头，畅销国内外。人们认为，圆山山影覆盖的地方才能生产好的水仙花。比较符合科学说法的是：圆山南麓有它特别适宜培育水仙花的土壤和气候，另一方面，也是当地花农的辛勤和技艺才造就了这个世界第一的水仙花生产基地。

圆山东麓有一片形如琵琶的山坡，叫做琵琶坂。这片山坡古木参天。密林深处有一座供奉“仙祖”的古庙，称“康仙祠”，俗称“岱仙岩”。宋宣和四年（1122年）徽宗皇帝敕庙名“昭仁庙”。《龙溪县志》记载一则“仙话”，说康仙是唐代人，乾符年间（公元876年前后）在京城长安卖药，中丞黄碣遇到他，问他哪里人，他答是“漳州圆山琵琶坂康长史”。后来黄碣因公事到漳州，向人打听，都说琵琶坂没有一个康长史。黄碣自己到琵琶坂寻找，见到祠庙中的神像和当年在长安卖药的那个人一模一样，才知道所谓康长史就是这个神像的化身。黄碣想将那祠庙移到圆山上去，夜里梦见那个康长史来对他念道：“卖药因循未得还，却因耽酒到人间，一心只恋琵琶坂，无意更登山上山。”黄碣才取消了要将那祠庙迁到山上去的打算。

又一则“仙话”说：有一年，“仙祖”寿诞，很多人到康仙祠烧香礼拜，非常热闹。不知从哪里来一个卖“圆仔”（汤圆）的老人，边卖边唱道：“泉水清清天蓝蓝，青松树下卖汤圆，两粒要卖一文钱，两文出你吃不完。”人们纷纷来买汤丸吃，都是付出两文钱，尽量吃到再也吃不下为止。只有一个叫陈成的，只付出一文

钱，吃了两粒汤丸。老人说："再付一文，便可以随你吃个够。"陈成说："这样你太吃亏。"老人说："你是一个老实人，我卖了大半天，卖得很累了，就是找不到一个老实人来替我卖，你愿意替我卖吗？"陈成就替他卖起汤丸来。陈成本来看锅里汤丸不多，打算替他卖完就走，但卖到日落西山，锅里的汤丸还是不见减少。陈成说："我必须在天黑以前赶回家，不能再替你卖了，这些卖到的钱就交给你吧。"老人笑呵呵地说："这些钱全都给你吧，你可用它作本钱，养活一家老小。"话说完，老人就不见了。大家才知道，卖汤丸的老人是康仙的化身。因为汤丸在漳州叫"圆仔"，所以人们便将琵琶坂后面的山叫圆山。

上面两则"仙话"传说被文人作为吟咏题材，收入府、县志《艺文》卷。有宋代诗僧宝玄《康仙祠》诗："南望青山十里赊，五云深处问琵琶，从知天子封侯庙，原是神仙卖药家。"有明代举人郑爵魁《琵琶坂》诗："圆峤何来碧海涯，翠微深处问琵琶。虚疑洞府飞丹鼎，旧是神仙卖药家。董奉灵峰通地脉，紫阳山廓满云霞。西来拄颜凝朝望，秋盼晴分面面嘉。"

台北也有一座圆山和一座芝山，据说是祖籍漳州的台胞为纪念祖地面命名。

近几年圆山山麓蔡坂村，又建一座名曰"琵琶岩"的庙宇，据说原来也是供奉康仙祖，规模大，香火颇旺，招来许多香客和旅游者。

双第山的来龙去脉

漳州城南15公里处的九龙岭，以处在闽粤交通孔道面扬名。它的"来龙"起自南靖县的靖城双溪口，逶迤东来；"去脉"循南

溪北岸，经渐元、渐山，至双第山。双第山原名天成山，唐代开元年间，山下居民周匡业考中进士，开创漳州科第的先声，天成山改称名第山，以后，匡业之弟匡物也中进士，名第山又改称双第山，也叫同第山，周围一带叫“同第内”，今为双第华侨农场，安置许多越南归侨，盛产茶、果。

双第山向东逶迤15公里，直至石码附近，中间有“龙潦”瀑布，有鸟翠峰。

“龙潦”瀑布倾泻之声隆隆，因此有“水吼”地名。瀑布冲成深潭。叫做龙潭。山下有莲花、八斗等乡村，人们将这南溪之北的四个地名与南溪之南的两个地名连串念成“龙潭水吼，莲花八斗，官浔横口”。这些地方虽隔着一条南溪而地域相连，有桥相通，“龙潭水吼”与“莲花八斗”之间是“官浔横口”，是往返石码的商贸通途，也是漳浦县城往返石码、海澄的捷径。在未通汽车以前，漳浦一带花生油等土产，一部分肩挑经九龙岭至漳州，一部分经官浔，循“龙潭水吼”之下的小路至石码，再经角美，销售于泉州一带。

这一条道路所经净是丘陵与平地相间的地带，沿途可望见许多削平的山头，是明代乡民为避乱筑寨而削平的。这种用石头砌成的山寨能瞭望远近，易守难攻。现在还知道寨名的有育翠寨、牛牢寨、登高寨等。还有一个大石洞，可容纳1000多人，也是乡民避乱处。这些丘陵是双第山的余脉。其中一座凤田山，山口是商贸交通孔道，距石码两公里多，因有一座岳庙，所以叫岳岭。岳庙祀“阎君”，又叫阎罗王，两庑列鬼卒像，而目狰狞。从前，人们发生纠纷，往往相约到岳庙向阎罗王投诉，咒誓“自己若枉屈人，定遭阎罗王勾命”，若不敢这样发誓，便算认输。

鸟翠山俗名鱼嘴山，是石码所能望得见的最高峰。山间岩石含石英，阳光照耀之下晶莹夺目。传说，从前山下居民于天气晴

朗时，常看到满山闪耀，好似晒金，近前一看，却不见有什么金子。有故事说，元代福建行省平章陈友定战胜漳州路总管罗良而占领漳州后，曾在鸟翠山驻兵，埋下三大窖黄金作为军饷。后来明朝军队战胜陈友定，占领福建，陈友定被俘。而那三窖黄金则由陈友定事先杀死的一个妹妹的鬼魂看管着。从前人们对人迹罕至的深山有神秘感，所以有幻想故事。鸟翠山景色幽美，登上顶峰，石码、海澄镇市历历在目；九龙江与海潮交汇处，中浮乌礁、浒茂两洲，下又汇流合一出海门，一派水乡景象，尽收眼底。

屹立海疆南太武

太武山在龙海市港尾镇海滨，与金门太武山隔海相望。为了易于区别，称金门的太武山为北太武，港尾的太武山为南太武。南太武山海拔560米，由于屹立海边，显得格外高耸挺拔，海外归航将它作为回港的航标，自古誉为闽山第一峰。

太武山是闽南话“太姥（母）山”的同音异写。从前这山上有太武夫人坛。许多地方志引据宋《漳州图经》说：“闽中未有生人时，有夫人拓土以居。”这便是太武山得名的由来。“太武夫人”是原始时代母系社会的领袖。

南太武山自古为闽南屏障，明末清初名士张士楷的诗很能显示它的雄伟气魄：“闽天不长海天长，狂澜直欲翻闽漳。诸山迤逦障不住，太姥屹立成堤防。”

从南麓攀着峻峭的岩石上山，一路可看到许多天然奇石，大字石刻“象径”、“云根洞”也出现在眼前。游人循逶迤的曲径跋涉到“云根洞”时，已经在山腰上了。在这里，人们又可细读许多前人题咏石刻。其中，明万历三十年（1602年）三位负海防重

任的将领所题，令人读来感慨万千。一是福建南路参将施德政题："立马闽山第一峰，海山无际豁心胸。身凌霄汉星堪摘，界限华夷户可封。蹑蹬喜寻仙子迹，登台羞问宋玉踪。千年光景百爵酒，兴尽归来月满堂。"一是游击陈一斋题："临风清啸共徜徉，东望沧溟思渺茫。古塔嵯峨云不散，故宫寂寞夜偏长。岩头荒草理仙迹，春尽花飞满佛床。偶尔升尊问卫霍，停看雄剑挂扶桑。"一是浯屿水寨钦依把总沈有容题："携尊登眺兴偏浓，景物清恬日色溶。波浪千层翻地轴，风云八阵结天冲。塔边残垒空芳草，泉上悬崖有老松。把剑专从飞将后，壮心直欲扫妖凶。"沈有容、施德政都曾于天启年间（1621～1627 年）赶走窃据澎湖的荷兰侵略者。沈有容并曾于万历年间（1573～1619 年）赶走窃据台湾的倭寇，《明史》有传。陈一斋是施德政的部下，出入战阵，同与有功。

见于史志记载的南太武山古迹有：

越王城，又名建德屯，在南太武山之巅。汉元鼎五年（前 112 年），诸侯国南越发生宫廷政变，丞相吕嘉立建德为王，发兵拒汉失败。据传，南太武山的越王城是建德拒汉之城。南宋蔡如松已辨说："建德城守在番禺（广州）而不在闽"。南太武山的越王城可能是闽越所建。闽越与南越（粤）同是汉朝的诸侯国，均因反汉被讨平。清代地方志说越王城"故殿基尚存"，今已无存。

延寿塔，亦在南太武山之巅。据地方志记载，该塔共七层，四方形，中空，可坐十多人。从前曾被当作航标，游客可登塔尽览海天景色。今仅存塔基及南宋绍定五年（1232 年）所镌"普明延寿之塔"石额一方，可知该塔的建筑年代。

现山上仅存一些天然岩石古迹：

浴仙盆。在海拔 300 多米处一块平滑的大石板上，有三口泉窟，其中一口较大，直径 2 米多，深 0.3 米，其他两口较小，也都如浴盆，盆中水常满溢。旁有石刻"浴仙盆"三字，传说为八

仙云游到此沐浴处。

石眼泉。在距“浴仙盆”百余步处，一块巨石兀立，石上有泉眼，直径 8 厘米，下有流水形成的一道石痕，但泉已枯竭。

弥陀石。在“石眼泉”旁岩石下，有一道峡谷，其间两块黛色奇石相伏，叫做“和尚背尼”，即二十四境之一的“弥陀石”。

经“弥陀石”东上，过棋盘石、日月石、象径、石屏、烟雾石，便到山巅。这里原有延寿塔及越王城，今已无存，只有天然大石上镌“太武名山”四大字和周围许多石刻，并有足迹“印”在石板上，长约 90 厘米，即所谓的仙人迹。“仙人迹”之北有一块附着蚝壳的奇石，称“飞来石”。它并非“飞来”，却可证实古代“闽在海上”之说。这石上不知何时被刻上“眼底东京”四字以附会“浮福建沉东京”的传说，说的是本来在这石上可以望见“东京”，后来“东京”沉入海底才看不见。

山北是“百丈石”，一块巨石从山巅直插海底。石上镌“百丈丹梯”四个大字。前人有诗赞叹：“闻说丹梯有万寻，幽崖迢遍旦山阴。谁能从此凌云上，直入蟾宫抱月吟。”

自山巅向西北下行，到一处“安乐窝”。在层岩叠石之间，青松掩映下，有天然石室，横长各十七八米，深入地下 3 米多，“屋顶”是一块 50 多平方米的大石块。洞口镌“天然安乐窝”五个大字。洞内冬暖夏凉，洞外青松翠竹，据说是从前村民避乱的安乐窝。

太武山从前还有古刹、栖云楼、锦亭峰、石镜台、涧谷桥、九霄岩、香炉石、马蹄石、狮子迹、仙灶、石门、石屏、龙潭等景致，还有传说中的“宋少帝驻跸处”，除属子天然岩石的以外，旧构都已无存。而解放后建成的水库，开辟的茶园，种植的佳果，使太武山更添风韵神采。改革开放后已辟为休闲度假区，增添新的游览景点，配备服务设施，游客络绎不绝。

三平寺与祖师公

三平寺是一座名闻遐迩的千年古刹，址在平和县文峰乡的九层岩上，山路险峻，跋涉不易，而游客络绎不绝，每年朝山进香礼佛者多达数十万人次。近及漳、泉、厦，远至港、台、澳及东南亚各国，以至欧美各地，许多善男信女，每年必到三平寺进香一次方了心愿。这座古刹几经沧桑，多次重建、扩建，现在总面积三千多平方米，殿堂、僧舍结构严密，主次分明，充分体现我国南方古代建筑的艺术风格。其所以能有这种盛况，是“三平祖师公”唐代高僧义中卓锡于此，圆寂于此，成为佛教圣地之故。

三平祖师公即义中法师，俗姓杨，父亲是陕西咸阳高陵县人，携眷来福建任官。义中于唐德宗兴元元年（784 年）正月初六日生于福唐（今福清市），14 岁拜宋州玄用禅师剃度出家，27 岁受“具足戒”（一种最隆重的接受戒律之仪式）成为比丘，后持锡杖云游天下，先后拜怀晖、智藏、怀海、慧藏等大师受教。南游至潮州，参见大颠禅师，得其指导，造诣达到“妙悟空中，深了无碍”的程度。宝历元年（825 年）辞大颠，从潮州来漳州，在开元寺后的三平山（即芝山）半云峰建立“三平真院”（现存“三平半云峰”石刻），自立门户，聚徒传经。

唐武宗取缔佛教，于会昌五年（845 年）四月起在全国各地采取灭佛措施，至八月结束，所拆寺院 4600 多所，还俗僧尼 26 万余人（据《旧唐书·武宗本纪》）。义中预先率领徒众转移到当时尚属“化外”（皇命难到之处）的地方，即今之平和文峰乡九层岩密林中，避过灭佛之“劫”，经过一番披荆斩棘，重建三平寺，并制服了野兽及附近野蛮土著，使酋长“大毛人”成为他的“侍

者”，人们称为“毛侍者”。义中又有“蛇侍者”，可能是以蛇为图腾的闽族遗裔酋长，甘心来当义中侍者的。至今当地人还有崇蛇习俗，称为“侍者公”，与之“和平共处”。

三平寺所在地，“三平”便成为地名。由于方言称山间局部平地为“坪”，有的人宁愿多写几笔，不写“三平”而写作“三坪”。

大中三年（849年），唐宣宗降旨恢复佛教，漳州重建开元寺。巡礼僧常肇和维建等20人向朝廷推荐，说义中是一位继承达摩正统和南宗衣钵的高僧，漳州刺史郑薰平特地去恭迎义中下山，住持开元寺，并奏请皇帝敕封义中为“广济大师”。至咸通七年（866年）义中86岁，因思念他亲手创建的三平寺，乃毅然重返九层岩，把三平寺修葺一新，又在寺西侧建一座草堂，作为“坐禅”的静室。咸通十三年（872年）十一月十六日，义中禅师圆寂于草堂，增加闰月计算92岁，僧腊（自受戒之日算起的“僧龄”）65年。由于他晚年静坐辟谷，肉身不腐，弟子们将其饰为“金身”。在草堂原址上建石塔，祀义中金身，尊称为祖师公。塔高2米多，呈正方形，面积200平方米，现称塔殿。

三平不仅是佛教圣地，而且是旅游胜地，山清水秀，气象万千，有龟蛇峰、和尚潭、虎跑泉、仙人亭、侍郎亭、龙瑞瀑布（百丈漈）、虎林等八景。

媲美黄山灵通岩

大峰山如神仙境界，所以又名灵通岩。它屹立于平和县大溪乡，虽属内地，站在峰顶却可以望海。海上航船也能望其顶峰，因而海外归来的游子在船上望到它，便欣然说：“回到故乡了！”

历史名人黄道周因直谏被皇帝罢官，于崇祯五年（1632年）从

南京出发，游览了天下名山九华与黄山，于“坐卧云海，栖迟莲荫，仿佛梦寝”之际，忆起故乡山水，作《梁峰二山赋》，将漳浦的梁山与平和的大峰山同九华、黄山相比，说梁山“九十九峰高峭遐邈，一一与九华相似，或有过之而无不及”。又说大峰山“飞颉搀睨，亦有万仞，洞壑绵亘，钩梯悬绝，猿鸟四时腾空塞径。其岩廊诡嵌，或数十步，皆在山脊，如束腰帛。其垂瀑飘注，或数万尺，皆自山卣而下，如散髻髻。其峰有狮子、文殊、玉女、灵洞、莺嘴、白塔、积石、天池、龙蹲、鸾举，三十有六，一一与黄山相似，当无不及，或有过之”。其所以不能与九华、黄山齐名，是因为“僻在遐荒，舟车阻修，瓢鼓限于鱼津，冠盖回于雁翼”。现在已经有公路直达山下，可通汽车，游人络绎不绝，大峰山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了。

黄道周说大峰山有三十六峰，民间则将其分为七峰、十寺、十八景。七峰是狮子峰、紫石峰、石屏峰、栖云峰、擎天峰、大帽峰、小帽峰。十寺是白花寺、碧桦寺、灵通寺、狮子岩寺、天中岩寺、旭日岩寺、修行岩寺等。这些寺宇因年久失修坍圮，现已部分修复。十八景是：菊花引路、三虫游斗、仙人聚会、三童弄狮、画眉跳架、巨柱擎天、七井排星、珠帘化雨、玉洞回峰、云梯取月、石蝉饮露、猛虎守峡、九牛拖车、和尚背尼、五鲤朝天、神碑庇航、击鼓回音、狮峰跳海。山中又有许多天然石室，著名的有仙盆、仙池、仙蹄、龙泉和风洞、雨洞、猿洞、猴洞、蛇洞、蟑螂洞、蝴蝶洞等。

从南麓拾级登山，一路两旁野菊列队迎接，这便是游客第一个欣赏到的大峰山景致：菊花引路。到半山有朝天寺，这里已是怪石与丛林相掩映的景色。有一块巨石如大蛇，伸颈凌空。这“蛇石”下有一块小石如青蛙状。蛙石后的一条石级小径如蜈蚣蜿蜒，称为“三虫游斗”。此景之下有白花寺，寺旁有石洞，宽约 20

平方米，可容 30 多人。洞水从洞内流过，清澈甘洌。

循山菊小径再拾级而上，到青云垵，狮子峰便呈现在眼前。狮子峰以肖似猛狮雄踞得名，在青云垵可领略它的雄风，但必须盘过几座山峰才能亲临其境。它是大峰山最高峰，海拔 1282 米。唐代陈元光建漳州的同时，立行台于四境，其一在大峰山。后来陈元光将父亲归德将军陈政遗骨从云霄将军山迁葬大峰山狮子峰，传说后来陈政自己迁回将军山，因此有两个陈政墓，并且至今都还存在，任人景仰。

狮子峰之背有三石，远看如童子在戏弄狮子，称为“三童弄狮”。狮子峰之北原有青云寺，面对两座并肩屹立的石峰，千尺笔直，插人云霄，两峰之间的中缝为“一线天”，直如鬼斧神工劈削而成。过青云寺，所见峭壁巍峨挺拔，如巨柱擎天，故名擎天峰。有名士张理吾题刻“擎天”两个大字。过擎天峰下，有七口天然石井，山泉从石缝中涌出，大旱不竭，甘洌异常。七井布局如北斗星座，故称七星井。过七星井便到灵通寺。寺建在大岩洞中，可容纳千余人。这里处在四面高峰之间，有“空谷传声”的奇妙境界，只要一声高呼，便引来回声阵阵，经久未息。灵通岩居于万仞深壑之上，却处在万仞高峰之下，仰首可望见飞泉奔泻直下，水珠飞溅，缭绕如云雾，称为“珠帘化雨”。

从灵通岩再向上攀登，叫做“云梯取月”。从“云梯”直上分水垵，可见到一块大石如虎，叫做“猛虎守峡”。

取道旭日岩，来到狮子峰东侧，可见到摩崖上的“峰山第一”和“自度度人”大字题刻。再往上攀登，便到达大峰山极顶——狮子峰的狮头上，可以一穷千里目了。

人间仙境鹅髻峰

鹅髻峰以状如鹅头，顶峰有石形如鹅冠而得名，在南靖县金山乡，自古是游览胜地。前人筑有石级小径，游人拾级而上，行二里许，在悬崖峭壁上有一个凉亭可供休息。坐在亭里石板凳上，观赏那垂挂在青山翠谷间的瀑布，只见瀑布从山腰直泻而下，到这亭的下面，便张开翻滚，如万马奔腾，十分壮观。这亭叫“飞瀑亭”，又因筑在悬崖边突兀的岩石上，好似凭空飞来的一样，所以又名“飞来亭”。亭呈正方形，用四根石柱支撑着叠檐架梁式的屋顶。两侧石柱上刻着一副对联：“人游天堀天堪步；梦人亭阴水亦飞。”亭右石壁上镌“山高水长”四个大字。

再沿石级小径直上一里许，涉过一个山壑，便可看到崖壁上镌着“云梯直上”四个大字。过一座小桥，转向右行不久，可看到一处庙宇遗迹，大门尚存，门额上大书“九鲤飞真”四个字。这庙建于宋仁宗年间(1045 年前后)，是宋朝开国功臣郑恩的后代郑英魁从仙游九鲤湖携带“九鲤仙祖”香火前来开建的。由于年久失修，解放后已残破。原来大殿上供奉九尊“九鲤仙祖”，“文化大革命”时遭破坏。

从“仙祖庙”遗迹处再循羊肠小道向上攀登，小心涉过苔藓滑路，在丛林荆棘间攀藤附葛而上，便可登上千米海拔的鹅髻峰极顶。在这里，近可俯瞰金山风光；远可眺望九龙江西溪逶迤穿过南靖大地，319 国道上汽车川流不息，农舍田畴清静幽雅，就是 30 多公里外的漳州大桥也隐约可辨。

鹅髻峰以祀“仙祖”而被称为“鹅髻仙峰”。“仙祖庙”年久坍圮，今又重建。青山不老，飞瀑长挂，清风习习，更以它的宁

静幽雅而宛若人间仙境。

紫玉异彩天柱山

天柱山高数百仞（实测海拔933米）。主峰绝顶有巨石耸立，色白如玉，高近40米，宽6米多，直插云天，称为天柱，该山因而称为天柱山。它是安溪娘仔尖山脉延伸入长泰部分，绵亘50多公里，成为龙溪（今龙文区和龙海市）、长泰、同安三县界山。登临极顶可遥望海上景观，厦鼓风光也历历在目。

长泰县在群山环抱中，除天柱山最高峰外，见不到海上日出，但每当晓色朦胧，从县城可仰首望见十五六公里外的“天柱”映现紫红异彩，故天柱山主峰又名“紫玉峰”。

天柱山还是长泰人观测晴雨变化的“天然气象台”。如果山岚冉冉上升，便是天气晴朗的征兆。如果凝云沉积，就预示将阴霾成雨，人们便应未雨先绸缪了。

天柱山古已驰名。北宋崇宁三年（1104年），龙溪道人杨虔诚从天宝山望见远处有“天灯云旗”景象，循方位跋涉而到天柱山，喜爱这里气象万千，便结庐定居终老。遗诗一首云：“远远巍峦叠叠峰，白云深处一岩空。十方世界檐楹外，万里山河指掌中。蟾柱影交岩桂影，天灯红映佛灯红。芒鞋竹杖登临处，疑是青霄有路通。”

自杨道人之后，名士陆续来游天柱山。南宋绍熙三年（1192年）长泰知县黄淳父等于石壁镌文记胜；绍定六年（1233年）有名士曾循来游，作《天柱山记》称赞它“高峰琐云，四面斗绝。下临尘寰，一目千里”。又有传说元朝状元黄思永吟咏云：“几载翘瞻玉柱峰，兴来登陡欲翔空。半天风月出尘表，大地山河人望中。

昼夜暗分岩树绿，春光都入涧花红。夜深依旧天灯见，心事从来造物通。”明万历年间，长泰知县管栝邀请本县绅士唐尧钦（太仆寺卿归休）、王一范（户部郎中归休）、戴燦（江西副使归休）、杨钟英（卢部主事归休）等同登天柱山，欢饮于岩寺，步韵联诗。管知县还请福州进士曹学佺、泉州进士何乔远等同游天柱山，作记游诗文 50 多篇。

天柱岩寺始建于宋，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 年）重修，清初再修一次。康熙五十七年（1718 年），薛合等 40 多人踞山造反，官府来剿，寺庙及楼台亭阁毁于一旦。

现在的天柱山除为旅游胜地外，并为国营林场，林繁果茂，油茶、紫胶、茶叶、烟草等各种经济作物极盛。

天柱山北峰有“风动石”，高十六七米，围 50 多米，可用人力摇动，大风也能使之摇动。

海岸古火山奇观

漳州沿海古火山喷发带在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西部。在距今约 700 万年前，由于太平洋板块俯冲插入亚欧板块，形成福建沿海地质历史上自长乐至南澳的深断层带，从 80～100 公里的地壳深处向上喷发岩浆，造成一系列火山岛及海岸火山岩。

龙海市隆教畲族乡白塘村因一个白塘湖而得名，而白塘湖就是火山喷发造成的。在白塘湖之西，有一个自然村叫湖西社，为杨姓聚居地。祖祠建在状如鹅冠的山下，周围净是大大小小的橄榄形玄武岩，当地人称之为鹅卵石，把这里的地理形态称为“天鹅孵卵”。其实这地理形态全由火山浆凝结构成，且有明显的火山喷发口。

在鹅冠山火山口以北 1 公里处有牛头山，山的东南方海边有一个古火山口，呈椭圆形，高 40 米，宽约 70 米，由北向东伸展，长约 200 米，开口处顶端直径约 50 米，底部约 3 米，涨潮时为海水所淹没，退潮时露出水面。周围有许多玄武岩，是火山喷发的岩浆凝成的。火山口中心是直径约 30 厘米的圆形喷气孔。地质历史上的三次火山喷发熔岩界线明显可辨：最初喷发的一次，形成橄榄石包体的橄榄玄武岩，露在最外一圈。内圈的含角砾粗玄武岩则是最后一次喷发所形成。中间一圈是第二次喷发的粗玄岩，已经发育成柱头节理石柱，横断面有的呈五角形，有的呈六角形。

白塘村以南 3 公里，属漳浦县前亭镇海域，在离岸 2 公里处，有一座叫林进屿的无居民小岛，是有多处火山口的火山岛。呈圆锥形，东西长 370 米，南北宽 180 米，顶峰海拔 72.7 米。岛上净是玄武岩，五彩纷呈，千姿百态。除岛东有一凹岸可供小船停靠以外，四周都是陡岸峭壁。岛上有淡泉，无居民，植被 70%，有因放养而繁殖下来的羊群。

林进屿附近还有南碇、临门、外屿等火山岛。

这些岛屿在前亭镇后蔡湾，海岸上有 4 座玄武岩山体，其中两座有明代防倭烽火台遗迹，分别叫做烟墩山（海拔 84 米）和烟楼山（海拔 78 米），又名“皇后乳山”是火山喷发形成的。烟楼山有 8 个环形火山喷发口。

九龙江北溪壮观

九龙江是福建省仅次于闽江的第二大江，它的得名是由于南朝梁大同六年（540 年）这一条溪的漫潭上出现“九龙戏水”。那一年成立龙溪县，县名也由此面来。九龙江原来只指这条自北而

来的河流，后来将自西边来汇的支流称为西溪，又将南边的一条支流称为南溪，北边的这条主流就称为北溪。三溪合流直至出海口统称为九龙江。

北溪也分为东西二源，东源出自安溪，西源出自连城梅花山经宁洋，汇合来自龙岩、漳平之水，经华封溪，出漫潭，至香洲汇合来自长泰的支流，过蓬莱峡、柳营江，至三岔河与西溪汇合，东下经福河、锦江，至浮宫汇合南溪出海门。

北溪上游河道最险峻。1956 年建成的鹰厦铁路自漳州段以上就沿着北溪河谷直上至三明，旅客沿途所见净是高山峻岭、峭壁绝崖。建铁路以前，华安县第一辆自行车是架在肩上抬进去的，当地人惊为怪物。华封溪有三十六险滩，溪道曲折，流水湍急，从前，木材输出只能扎排顺流而下。溪内亦可行小舟，但很危险，要降浮十多次。下行时，舵工立船头，见到有岩石挡路即必须敏捷地举篙去抵挡，用力要恰当，过弱则挡不住，船会触礁；过猛则船头会转过去触在另一块岩石上，都会导致船破人亡，所以有“纸船铁舵工”的俗谚。上行则必须拉纤。三十六险滩以白湖、二碶、筒头、三花、虎头等滩为最险。自鲤鱼滩以下流水才有所减缓，所以有“过了鲤鱼滩，才得客心安”的谚语。鲤鱼滩以下有天宫大濑，又名宝珠滩，以宋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 年）渔人在溪边石穴里取得一颗大宝珠送官府献给皇帝而得名。那穴中出珠的巨石也得名为宝珠石。滩上有瀑布一丈多，倾泻溪中，冲成深潭。瀑布冲潭的响声如漏鼓（古时利用漏壶滴水计时，分一夜为五更，在过更时刻击鼓报时）所以叫更鼓水。宝珠滩以下，溪水急转直下，冲成大潭，潭水平缓，称漫潭，为“九龙戏水”处，又名龙潭，在两山夹峙中，峭壁上有为人们所不能理解的古代象形文字（或称岩画），俗称仙字，故漫潭又称仙字潭。两岸峭壁绵亘近 10 公里，称汰内（今属华安县）。出汰内为浦南，今属芗城

区。浦南以下流水开始平缓，河道渐宽，解放前曾有帆船和汽船通厦门。浦南柚子嫩而多汁且甘甜，从厦门输出称“厦门文旦”。浦南以下为蓬州，是南宋理学家陈淳的故里，陈淳自号北溪。与蓬洲隔溪相对为蓬莱峡和香洲，出长泰的支流（龙津溪）在这里汇入九龙江。再下为绿洲溪，以溪中有树木繁茂的冲积洲得名。从前，下游溪水受潮汐顶托，能涨到这里。蓬莱峡以下为柳营江，以六朝以来（一说唐末王潮率军入闽时）在这里“插柳为营”得名。柳营江以下为江东桥，此处已进入平原，河宽水平，舟楫云集。再下至三岔河，为西、北二溪交汇处。

南溪蜿蜒三县市

九龙江南溪，一源于漳浦、平和二县交界处石屏山南坡，流经内过溪、内堀；一源于石屏山支脉平和三平山，流经老灶山下，绕千里亭山北麓，至合水潭，两源汇合，南流经美林、龙溪墟，在墟附近作 100 度大转弯，北流经兴巷、马苑、火烧埔（以上旧属南靖县，今属漳浦县），流经宫园，纳上坪、石门两支流（旧属南靖县，今属龙海市），转南流经漳浦县辖的马口桥、溪坂、省炉、横口、赵厝、官浔，有源自长桥的支流汇入，流经龙海市白水镇辖内的董门头、白水营，再折向北，至浮宫汇入九龙江下游。主河道 55 公里。上游在山谷间，随山势逶迤如龙，故称龙溪，龙溪溪名成为地名，为区别于龙溪县而称为小龙溪，以水源丰富土地肥沃而别称锦田，有墟市叫龙溪墟，为南靖、平和、龙海、漳浦 4 县市毗连处山区土产集散地。南溪上游盛产竹木、稻米、水果，在中游未建陂闸以前，有小舟通官浔、白水营。

南溪上游风光幽美，旧《南靖县志》记载：“老灶山，在县治

（靖城镇）南八十里，为南溪发源地，上有风动石，风吹即动，上可坐百余人。山麓二水汇流，中多巨石，北有龙飞潨，四周石壁陡绝，测杳莫汇。从老灶山东行，循南溪两岸，历大坪林山、竹美林山，至马铺，东方木，西方金，南方火，北方水诸山，越火烧埔山，摩顶山，真武山，榕树桥而抵官园之茂林山，隔溪缘水奔流岭而与九龙岭相接。”又载：“九曲溪，南溪之源，在老灶山下，巨石盘桓，水流九曲，故名。北有龙潨百丈，流入南溪。”

南溪中下游为商贸发达地区，著名的集镇有漳浦的官浔，龙海市的白水营、浮宫。

从前称为漳浦、南靖、海澄三县交界处，今为漳浦、龙海二县市交界处的马口桥，自古为水陆交通要冲，今为324国道重要路段。漳州市“闽南花卉中心”设在桥南，花卉基地5000多亩，有1000多家海内外花卉公司和场圃在这里从事花卉种植和营销。十数里之内万紫千红，花香扑鼻。每年一次博览会，万人云集。

鹿溪与李澳川

漳浦县的主要河流现在统称鹿溪，以前则是分段命名的。上游自平和五寨至漳浦车田（今石榴镇）称西溪，其间有几条支流汇人。石榴坂以下梅林附近有九曲山，溪流顺山势蜿蜒，称九曲溪，有南来的绥安溪（盘陀溪）汇人，稍下又有源自东庄（陈井）、掷石的岩前溪自北来汇，至乌潭埔，又有源自石古的马坑溪来汇，过博济桥（在县城西门外2.5公里处，南宋庆元二年建，长6米多），绕包仔山，汇人九曲溪。溪水经高罗山绕县城西南，这一段称南溪，即古李澳川。流经城东，有源自水磨岭的北溪来汇。自城东2.5公里以下为鹿溪，有鹿溪桥，始建于南宋庆元四年

(1198年)，明嘉靖七年（1528年）重建，清初桥圮，而村名“鹿溪桥”一直沿用至今，简称“鹿溪”。自鹿溪桥至鼓山下柘港，曾是舟楫云集的水运枢纽。“鹿溪春涨”为漳浦八景之一。鹿溪以下为英山、后港，再下为前溪（秦溪），入海处为旧镇港。

李澳川既是溪名又是地名。溪湾处称为澳，唐代以其为李姓聚居地而得名为李澳川。唐开元四年（公元716年），这地方成为漳州的政治中心，漳州和漳浦县治从原陈元光屯军处迁到这北面负山、东西南三面环水的地方（70年后州治迁龙溪，县治仍旧）。南宋未建县城而先建三个城门，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始建县城，三面以溪为护城河，北面挖堑为壕。

南溪（古李澳川）有一个石邪。是一条断断续续横过溪道的天然石线，中间有一块大石，形状好似浴桶，被称为石脚桶，写作石脚盆，从明末黄道周所说“石邪之涨纳于西湖，鹿溪之涨纳于泮水”这句话可以知道，在明代，海潮能将溪水顶托到城西以上的石邪一带，从斗门纳入西湖，并进出于始凿于宋代大观年间的傅公河，直至县学里的泮池（今公安局院内）。

明万历年间鹿溪（以下按现在通称整条溪为鹿溪）中游改道从地势较低的京仔村附近（今鹿溪桥闸处）直至鹿溪桥村。为保地势较高的城西南一带农田灌溉，崇祯六至七年（1633～1634年）在梅林村下方（岩前溪汇入鹿溪处）建筑双溪坝，拦水入李澳川故道（南溪），一部分水仍走新河道（见黄道周《署邑陈侯新筑双溪口惠政碑》）。双溪坝几次被洪水冲毁，清康熙年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都曾重建，后又被毁坏。岩前溪已改道从棕口、高罗山汇入鹿溪，双溪坝原址不再是双溪合流处，无再建坝的必要，县城西南方的农田用水及西湖之水靠高罗山附近的梧桐陂接济。西湖扩建为公园；鹿溪桥闸处也辟为游乐园。鹿溪桥闸建在得仙桥（始建于明万历三十七年）处，与始建于宋庆元四年

的鹿溪桥不是同一地点。如果要领略古鹿溪桥遗址处的“鹿溪春涨”风光，得出东门兜走 3.5 公里到鹿溪桥村（今简称鹿溪村）。

梁山古今不相同

梁山又称梁岳，是博平岭山脉自平和矾山向东南的延伸。出漳浦县城南门 10 公里便到梁山南麓，而梁山绵亘五六十公里，及于海滨。《古记》说：“梁岳，闽中之望也。”民谚“一梁二灶三太武四大帽”讲的也是漳州滨海的四座大山。在山上可以监视海上外来的侵犯活动，以梁山为最高最长。

梁山古代有很多现在已经绝迹的野兽，《尔雅》说“南方之美者唯梁山之犀、象”。宋代还有野象出没。

梁山山脉有多少峰，难以尽数，见于旧县志记载的有莲花、玉女、狮子、金刚、双髻、长剑、七星、八柱、观日、临海、晋亭、青阁、紫云、金鸡、丹灶、香炉等峰名。明末黄道周作《梁峰二山赋》说“梁山九十九峰高峭遐邈，一一与九华相似，或有过之，当无不及”。但他也只增列出爵目、瑞屏、齐帝、葛仙、隼立、鸟翔等峰名。还有一些山峰，群众用大尖、小尖、鸟嘴、鸡笼等命名，难以尽述。

莲花峰是梁山的中峰，在今漳浦县沙西镇与云霄东厦镇交界处，海拔 960 米。整座顶峰由巨石构成，状如莲花。有齐帝石，据传南北朝的南齐武帝萧赜未登帝位时曾在那里聚兵，故而得名。莲花峰东北边有天然大石洞，可容纳 200 多人。有瀑布泻入莲花峰东北 2.5 公里处的合水潭，冲成奇渊数丈深，在丰水期，瀑布能激起潭中浪花一丈高，响声闻于一公里之外。水汇入白沙溪，流经“海金刚”（即金光峰）下，纳于祖妈林水库。

莲花峰之西为水晶坪，在盘陀镇界内。元朝大德年间(1297～1307年）皇帝曾派太监来监采水晶，有太监墓，今淹没在水库下。

莲花峰东南为吴公坪，在杜浔镇辖内，因宋末元初有一位吴姓人士隐居得名。吴公坪是山谷盆地，鱼米能自给自足，如世外桃源，从前有3个自然村，村民有终生不曾入城的。曾是革命根据地，后村民被国民党移迁于古大路边的龙潭村。杜鹃花布满吴公山，明末清初名士陈祖虞诗云："三月吴公春，杜鹃红于锦；七月吴公秋，杜鹃凄已甚。"形容其锦绣却荒凉的情景。

莲花峰西北有玉女峰，海拔986米，余脉延伸到云霄大臣山。

莲花峰之西为良山（也写作梁山），海拔530米，在盘陀镇辖内，山谷内原有内曾、中周、口黄三个自然村，因建水库移民于盘陀镇其他乡村。良（梁）山之西为雀目山（爵目山），海拔644米。雀目山之西为盘陀岭，介于漳浦盘陀镇与云霄火田镇之间，自古为闽粤交通孔道，唐代建漳州和漳浦县时，在盘陀岭上设漳浦驿，有驿楼供过往官员住宿。岭路崎岖曲折，明代登州知州、龙溪人林弼有"盘陀岭上几盘陀"诗句。解放初开通公路，路途仍甚险峻，事故多发。今有两条隧道，一来一往，虽然车流量增加到每天2000多辆次，仍无堵车现象。

蓬莱深处清泉岩

清泉岩位于漳浦县城西南六七公里处，梁山北坡，今大南坂农场下楼村界内。有著名古刹清泉岩寺，始建于宋代。最初是利用天然大石室加以修筑，称"丹霞洞天"。明成化年间(1465～1487年）再就一处石室筑为禅房，称"蓬莱深处"。嘉靖二十年（1541年）进士陈梧，曾任广东佥事等职，归休后隐居清泉岩，重新修

筑寺院。清康熙十三年（1674年）发生“三藩之乱”，漳浦西湖人蔡而煜避乱隐居清泉岩附近的下布村，清泉岩成为其子孙辈蔡世远、蔡新等的读书和游乐处。以后蔡氏族人多入朝或外出为官，还有几位虽考中进士或举人，却不出仕而留在家乡，协助住持对清泉岩文物加以维修和保护。雍正朝礼部侍郎蔡世远和其堂侄、乾隆朝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蔡新，归休后也为清泉岩的文物保护尽心尽力。清泉岩环境清幽，离县城近，游客及香客络绎不绝。抗日战争期间，闽南地方革命武装红军独立第三团被国民党一五七师以合作抗日为名骗到漳浦缴械，逃出的战士在清泉岩集合，编入新四军，北上抗日。留下部分工作人员在梁山一带活动，当时的中共漳浦县委机关驻清泉岩附近的下楼村。清泉岩为革命根据地的一个据点。后来由于国民党军警的“清剿”，清泉岩一度荒凉。解放后恢复生机，改革开放后成为旅游胜地，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清泉岩寺已修葺一新。寺后悬崖石壁高数十米，清泉奔泻直下，流过寺边，迂回于寺前岩石之间，绿树之下。寺院周围至今保存多处石刻。大字的有“蓬莱深处”、“茂林修竹”、“渐隔尘寰”、“清泉洞”、“蟠桃坞”、“说梦台”、“不涸池”、“登临驻节”，都是按景观题刻，称为八景。其中“登临驻节”可能为蔡新年老归休后所镌，其余可能是早期所镌。每字40～80厘米，都是楷书，十分壮观。又有“觉岸”二字，正中刻“乾隆御笔”和篆印，下有小字“赠臣蔡新”。因此有蔡新引导乾隆皇帝游梁山的传说，其实是蔡新在朝为官时，向皇帝求得的御书。大幅的有陈梧的行草《清泉始隐》诗8首，诗和书法艺术均令人叫绝。全篇高300米，宽220米。有一块“心经石”，镌《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运笔如狂注，书法奇特，章法结构跌宕，似龙飞凤舞，而全篇浑然一体，起落有序。据旧县志记载，是身毒（印度）僧人所书。后有楷书

落款“万历癸酉岁腊月清泉翁虚谷道人比丘智山镌石”。又有乾隆九年所立《清泉岩传灯遗产记》碑刻，记载老住持僧惟诚师翁将寺产田地传给新住持僧永慧管理，由蔡淮及其兄弟辈3人监证之事。碑是蔡淮所写的楷书，书法也受称赞。

由于自古至今保护良好，清泉岩仍然给人以“蓬莱深处”的感觉。现在有公路直通，该地就更成为受人们欢迎的旅游胜地了。

风光无限海月岩

海月岩又名海月庵，位于梁山东麓，漳江入海处，漳浦县沙西镇涂楼村界内，方圆5公里。它背靠梁山，面向东山湾海域，山岩奇兀，海波浩渺。日间游人不绝，一些游客偏喜其月夜，说海月岩胜景由海、月、岩三项自然风物融成。

海月岩历史悠久，现存明代碑记说“创基已古，宋重兴”，旧县志记载其重建于南宋咸淳年间（1245年前后）。年久失修，明嘉靖年间（1550年前后）依例官卖，邑绅王氏购为己有，而任其荒芜，万历年间，兴教寺僧性德赎回重修，辟山为田，奉佛之外，兼事耕牧。开辟“蒔蔬圃”，自种蔬菜，引“功德泉”灌浇。从“不二门”修筑石梯道，便利游客上山入庵拜佛。开辟山下温泉为浴池。又增辟景观，成为游览胜地。

佛庵利用天然石洞建成，“屋顶”是一片巨石，长31米，宽13米。内壁是天然石壁，浮雕如来佛一尊，每当旭日东升，照射庵内，叫做“日出窥禅”；每当中秋之夜八时半，岩下“羊角潭”月光反映，恰好照在佛的胸部，叫做“月照禅心”（今羊角潭已湮，这一景观不复存在）。佛殿对联云：“海气凝云，云气结成罗汉相；月光映水，水光反照菩提心。”

海月岩有内十景、外十景。外十景为山中所能望到的外围景观。这里仅记内十景：落伽境，在庵西南200米处，有一块天然石屏，浮雕观音菩萨像，上镌“落伽境”三字。这里可眺望漳江入海处石矶塔及周围渔帆点点的壮丽景观。石上有仰楼和尚题刻七绝一首：“峰外长江不尽流，巍巍片石几春秋，自从题刻观音后，万古清风应祷求。”知止洞，在“落伽境”东几十步处。洞已被流沙淤积，洞口石僧也残缺。现存仰楼题刻七绝一首：“凌云石室自天然，江日峰僧印洞前，功德水流施法界，海花现出观音禅。”无住境，在庵南100米处，石上镌“无住境”三个大字。站在石上，北可仰望群峰，东可远眺海景。卓石桥，在庵南15米处，一条长石天然地跨在深谷上。有石刻题诗：“云根叠叠拥深坑，架作桥梁济客行，不用施工巧制琢，共夸天地自生成。”不二门，在庵东15米处，有两块斜立的长石夹峙如门，两边是乱石坑，前面是深谷，万历年间建石梯通道于深谷上，使游客可越过深谷，经“石门”直入佛庵，此外别无途径，故称“不二门”。功德泉，在庵西10米处，一股清泉钻出石缝，流入上下相连的三口石窟中，甘洌异常，大旱不竭。泉上石壁有明代进士刘庭兰题刻七律一首：“何来圆觉隐西天，布地先开玉井泉。错落瑶华诸念净，空明石乳一方禅。雨花飘向经堂寂，法水纷披讲钵传。认取元劳困彼岸，恒河沙数只涓涓。”大山岩，在庵西北一里处有大石洞，明代始辟为大士室。洞上石壁镌七绝一首：“峥嵘块石似禽形，石室玲珑隐牧耕。今日经营为福地，梁山又见觉王明。”息樵石，在庵东50米处，有一大盘石恰在乡人樵采所必经的路上，旁有泉水，可饮可浴，樵夫经过必坐下来休息。苍松岭，已不知具体地点。莳蔬圃，在功德泉前面。

游览海月岩内十景，眺望外十景，令人流连不倦，真如前人所吟咏：“胜景真无住，风光说不完。海浮七级塔，云绕百重山。

出没船千艘，萦回水一湾。流连日已暮，明月伴人还。”

现在有公路通山上，旅馆、酒家、小食店、茶室等服务设施周全，游人日夜不断。

漳江两岸四名山

漳江自西而东贯穿云霄县，至下游为云霄、漳浦二县界溪，流入东山湾海域，这是就现在情况而言，而唐垂拱二年（686年）陈元光建立漳州和所属漳浦、怀恩二县时，漳州和漳浦县治所都设在漳江北岸，怀恩县设在漳江南（后并入漳浦县）岸。漳江得名的由来，据旧志记载：陈元光之父、归德将军陈政奉旨率兵入闽平乱，至云霄，指江水对兵将们说：“此水如上党之清漳。”因为陈政曾随父陈克耕（唐太宗李世民部将）战斗于上党一带，此时入闽平乱，将士们很多是参与上党一带战斗的老部下，陈政对他们说这番话，是为了安慰他们初入边荒地区的焦躁情绪，鼓励大家发挥昔日战斗精神，开辟新区。故而云霄溪叫做漳水，也叫漳江。乾隆《漳州府志》引据旧志说：“自西林出者为西林溪，源出平和。南流过于云霄镇城之北，又南流而东纳梁山以南诸水入于海，为古之漳水，亦曰漳江。旧志云，溪水自西林而出，海水自铜山海门而入，清浊合而成章，故名。又云，昔陈元光之父政至漳，曰此水如上党之清漳，漳浦名县本此。江在六都云霄。”这是记载在《山川》条目里的。而记在《建置》卷里的，则说陈元光开屯于漳水北，后奏准设立州县，就屯所为漳州州治及漳浦县治。后来州、县治一并移设李澳川（今漳浦县城），州治后又移设于龙溪（今芗城区）而“漳江”名称一直沿用至今。

漳江两岸山明水秀。漳江以南属乌山山脉，漳江以北属梁山

山脉。有四大名山，谚云“将军对大臣，玉女对仙人”。将军山以“昂然独立似大将据帐幄”得名，一说以葬唐归德将军陈政得名，与属梁山山脉的大臣山隔江相望，一在东，一在西，各为云霄八景之一。大臣山以“端重严凝有垂绅持笏之象”得名。晨曦最早照耀大臣山山头，而以山的立场，则说“大臣”将一轮晓日从海上扶起来，取景名“臣岳扶曦”；每逢望日深夜，一轮满月落在将军山山头，景名“将军挂月”，这两景在市区附近。漳江下游两岸，还有更高的两座山峰遥遥相对，从市区望去，更具情趣。江北的玉女峰，为梁山最高峰，海拔 986 米，如天女亭亭玉立于云雾缥缈之际，景名“玉女云鬟”。江南的仙人峰，有棋盘石，传说为仙人下棋处，故名。八景的命名者将这山峰比做一个若隐若现的仙人，常常只将发髻露出于云雾间，取景名“仙人露髻”。

漳江汇矾山、梁山诸水，且潮汐进退有序，桅樯飘摇，两岸田畴遍野，镇市、村庄掩映于茂林翠竹之间。“漳江澄清”为云霄八景之一。其他三景：獭港秋潮、虎潭夕霁、石矾砥柱，也都在漳江上。

中流砥柱石矾塔

石矾塔在漳江入海口，今漳浦、云霄二县界河主航道北侧的一块礁石上。这里原有一块垂直的奇石兀立，高数丈，叫做石笋，雅称石矾，形象如“华表捍门”。云霄是最早的漳州州治和漳浦县治所在地，当地人认为“名山环映，独缺东南一面”，刚好在这门户处有这么一块石矾，足以“钟灵毓秀”，所以明代人才辈出，科甲鼎盛。清初郑成功以沿海为抗清基地，这石矾便成为郑军系船的天然石碇，在一次台风中，石矾被一条颠簸的大船曳倒破碎，云

霄人认为，人文从此转衰，皆因石矶破坏之故。康熙九年进士云霄乡绅陈天达募建石塔于原来石矶处礁石上，以补其缺。但高不及一丈，后倾颓。康熙三十三年（1694 年）五月，云霄诸生集书院会议，分头募款，共得白银 4700 多两，于初秋动工，阅四月，完成重建石塔工程。重建后塔高达 27 米，空心七层，八面玲珑。上辟四门，正门镌“斯文永昌”。又用余款在漳江北岸石蛇尾渡头（今漳浦县沙西镇辖内）建石级 30 多米，在漳江南岸乌丘渡头（今属云霄）建津亭一座。这是俗称“龟蛇把水口”的漳江入海处对渡渡口，行人称便。嘉庆三年（1798 年）成立云霄厅，同知薛凝度立《新建云霄石矶塔碑记》于漳江北岸漳浦地界，今碑石尚存。

石矶塔自始建至重建时，云霄属漳浦县，石矶塔属于漳浦县文物，没有异议。自嘉庆三年云霄设厅，民国 2 年（1913 年）改为县，石矶塔是属于漳浦县还是云霄县的文物，便有争议。20 世纪 90 年代经上级调解，两县协议，以石矶塔是云霄人集资所建，则文物由云霄县保护；而其址在漳江主航道北侧，按历来该处滩涂皆漳浦沙西人所经营的历史习惯，则滩涂使用权归漳浦县沙西乡（今沙西镇）。

石矶塔以屹立波涛间而成壮观。兴建中的漳诏高速公路将建一座大桥通过漳江下游，完成后，将是更为壮丽的景观，南来北往的旅客都有机会欣赏。

九侯山二十四景

九侯山是乌山的支脉，在诏安县城西北十几公里处，方圆五六公里。其得名的由来，一说由于“九峰列峙，尊若公侯”；一说

由于“大禹后裔九人人闽，殁而为神，各主一山”。据碑记，早在唐代，已经有佛教禅宗高僧来建九侯禅寺，修禅传经。北宋时，高僧云岳又在九侯禅寺附近建福胜庵（即福胜岩），奉祀“遁地佛”，并建“飞来亭”祀“飞来佛”。以风光幽美而名闻远近，宋《元丰九域志》记载漳浦县胜景，只记两处，一是李澳溪（在县治所在地），一是九侯山（当时属漳浦）。南宋时，又有高僧齐思发动徒弟们化缘重建九侯禅寺。元代的高僧无碍在九侯禅寺传经。思齐在寺内留有题刻，无碍在悬崖峭壁上题刻“九侯名山”四大字。许多名儒慕名来到九侯山隐居，研究学术。如陈景肃等“七贤”因为力主抗金，与奸相秦桧不和，辞官隐居九侯山，他们的书室“西斋”两字为后来朱熹所题，至今尚存。南宋光宗时，朝廷党争牵涉学术，韩皇后的叔祖韩侂胄擅权结党，排斥丞相赵汝愚，禁理学，汝愚被罢相，指为“伪学”罪首，朱熹、赵嘉客、周直吉、伍仲求等59人列入“伪学逆党”，其中赵嘉客、周直吉、伍仲求及以“大林飞仙”和“石屏翁”为号而隐其名者，共5人到九侯山隐居，讲论学术，辟寺右一个天然石室为“五儒书室”，匾额至今尚存。

出诏安县城，朝西北方向行10多公里，便到九侯山下，见悬崖峭壁，上镌“天开”两字，下有两块巨石构成门户。游人穿越这个“天开”孔道，有一股强劲山风迎面袭来，如果时在夏令，游人便感到暑气尽消，凉爽异常。

过“天开”石门转向东北曲径，便见到元代寺僧无碍所题镌“九侯名山”四个大字及明、清许多书法家题刻，如“巨岩洞天”、“万山第一”、“群芳独秀”等。一路翠竹青山蔽荫。游人循曲径前行，便到“牛眠石”。再东行，抬头可望见一块巨石如人形屹立山顶，旁边小石如瓶、缸，这便是“观音三宝石”。游人来到“三宝石”下，也就来到九侯禅寺了。这座古寺始建于唐，宋淳祐五年

（1245 年）重建，清乾隆及光绪年间两度重修，均立碑记。寺前山门石额刻“大名山”三字。寺中正殿挂黄道周所题“洗心之藏”匾额。

寺右有“望海楼”，登楼望海，水天一色，浩瀚无际。

寺门左侧深涧里有一巨石，状似鲤鱼跃起。这“鲤鱼石”下有泉涌溅，岸上镌“松泉”及“涤尽烦襟”等字。此泉甘冽异常，品茗最佳。泉前有天然石室，可坐数十人，即上面所说“五儒书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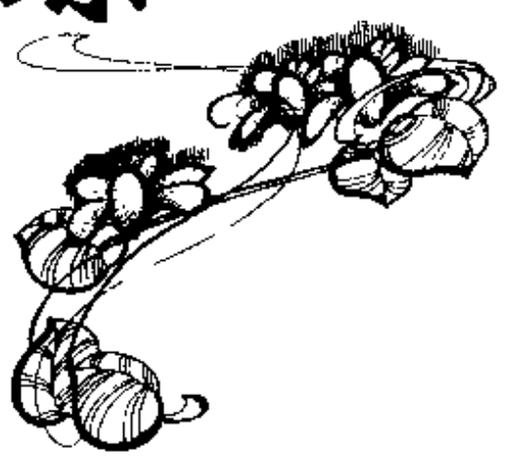
九侯山有很多巨石相叠，欲坠不坠，其中有一块叫“风动石”，悬临绝崖，崖下深涧千丈。游人循曲径而行，越田畴、溪岸，再登险崖，经过一条叫做“小天门”的河谷小道，便可登上更加险峻的狮子峰。它确实很像一匹巨狮，狮头突出，雄视众出。

循“云根石”登石阶 60 多级，便到“福寿岩”，有石室，是宋末沈子真隐居处。岩（庵）东有石亭，亭内有“飞来佛”石像。

那缥缈云际的“香炉峰”和“花瓶峰”，对于一般游客来说，则是可望面不可即。

九侯山巍峨高大，不愧“南闽第一峰”称号。它有二十四景，前人用一首诗加以概括：“风动花瓶月案开，三宝腾空松涧回。瀑布泉生鲤跃浪，天然桥畔牛眠笞。香炉烟透云根里，雾锁茶园望海台。”

史迹寻踪



“仙字”之谜

九龙江上游汰溪（在今华安县境）流水急转直下，冲成深潭，东岸30米高的峭壁上，散布着古代刻画的5处共20个象形文字（或称岩画），有的如蛇似虫，有的如舞女似武士，不可理解，被叫做“仙字”，该深潭也就叫做仙字潭。

最早记载这古迹的是唐代《宣室志》，后来为《太平广记》所转引，说“泉州之南有山焉，峻起壁立，下有潭，水深不可测，周十余亩……元和五年，一夕闻山南有雷暴震数百里，若崩之状，一郡惊惧……旦往视之……石壁上有凿成文字一十九言……后有客于泉者能传其字，持至东洛，故吏部侍郎韩愈自尚书郎为河南令，见而识之，其文曰：诏□黑视之鲤鱼天公畀杀人牛壬癸神书急急。”

清嘉庆年间（1796～1820年）蔡永蒹《西山杂志》说仙字潭石刻是“七闽古文”。民国4年（1915年）广州岭南大学教授黄仲琴（漳州人）往实地考察，作《汰溪古文》发表于《岭南学报》，说那象形文字“疑即古代蓝雷民族所用，为爨文或苗文之一种”。

1982年《福建文博》第二期刊登福建师范大学教授刘惠荪的考证文章，他将仙字潭石刻与甲骨文、金文作比较研究，认为大体可读为：“昱，酋夷俘越，□吴王，昱，吴战越，战番，□番。”1986年，《漳州历史与文化论集》刊登厦门大学人类学教授陈国强的一篇文章，认为：一、在福建古代历史上从无“吴族”活动的记载，用甲骨文、金文去类比破译仙字潭石刻为“吴战越战番”是不可靠的。二、台湾高山族被称为番族是清朝的事，王铁藩先生根据刘惠荪教授的破译加以引申，写成《台湾高山族和华安仙字

潭图象文字》(载1985年6月24日《华侨日报》),说“番族的一支战败逃往台湾”,不可信。

一般认为,漳州在商周时代属于“七闽”范围,那仙字潭摩崖石刻可能是闽族的图像文字,但迄今无定论,那20个“仙字”到底记的是什么,谜底还未揭开。

越王城与赵佗故垒

南太武山(今属龙海市港尾镇)曾有一个古城遗址,南宋淳祐(1241～1252年)《漳郡志》记载当时传说为“越王建德抗击秦兵”的城堡,这是牛头不对马嘴。因为建德是末代南越王,生活于汉武帝时代而不在秦。要说真有抗击秦兵的越王城,应是“赵佗故垒”,赵佗生活于秦汉之际,是第一代南越王,传到建德已是第五代,时间相距近百年。

“赵佗故垒”在漳州最早的地方志宋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所纂《漳州图经》里可能有记载。可惜《图经》已失传,只遗留《序》一篇,是宋代著名藏书家吴与所写,对古迹略有记述,其中说到“赵佗故垒,越王古城,营头之雉堞休然,岭下之遗基可识”。但只凭这寥寥几字,不知“赵佗故垒”与“越王古城”是同一城堡还是一垒一城。按“岭下之遗基可识”句,可知城在山下而不在山上,那便不是南太武山上的所谓越王城。或可理解为山上有垒,山下有城。南越都城在番禺(广州),赵佗怎么将城堡建到现在属于福建的漳州地区来?这可从《漳州图经·序》开头的话来找根据。《序》开头说:“按本州在禹贡为扬州之南境,周为七闽之地,秦、汉为东、南二粤之地(‘粤’通‘越’),汉武平粤,为东会稽冶县并南海揭阳之地,晋、宋以来为晋安、义安二

郡之地。”在秦以前，今漳州地区一部分（北部）属闽越，一部分（南部）属南越。秦朝划闽越为闽中郡，南越分设南海、桂林、象三郡。闽越与南越属僻远地区，朝廷鞭长莫及，地方势力互相兼并。赵佗初任龙川县令，建县城名曰佗城。龙川是秦代南海郡最接近今漳州地区的县份，辖地包括汉代的揭阳县（今潮州），当时县界现在不清楚，但可从漳州“秦汉为东南二粤地”这话推知，今漳州南境秦代必属龙川县。赵佗以善扩展辖地著称，而闽越“为秦始皇所不取”（只给闽越族领袖无诸一个“闽中郡长”虚衔，而没有派官派兵来），赵佗的势力可能发展到今漳州地区许多地方。后来他任南海郡尉，兼并了南海（今广东）、桂林（今广西）、象（今越南北部）三郡，拥兵自立，引起秦始皇出兵讨伐，他在今漳州地区建城抗拒秦兵，这种事是可以理解的。但《漳州图经·序》没有说明赵佗故垒、越王古城的具体地点，现在还是不能肯定“赵佗故垒”便是南太武山“越王城”。

赵佗是河北真定（今正定）人，汉族。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后 11 年（前 196 年）封他为南越王。他的后裔世袭为南越王，其孙赵胡为第二任，曾孙婴齐为第三任。婴齐未接王位前曾到汉朝都城当人质，娶邯郸女蓼氏为妻，所生之子名赵兴。回南越后又娶一个越女为妾，生建德。婴齐接王位后，蓼氏成为王后，子赵兴接王位，尊蓼氏为太后。元鼎四年（前 113 年），南越丞相吕嘉（南越人）杀蓼氏及赵兴，立建德为王，出兵拒汉。翌年，汉武帝刘彻派兵讨伐，一年后讨平。即是说，建德抗拒的是汉兵，不是秦兵。南太武山的古城也并非建德抗拒汉兵的城堡，南宋漳州史学家蔡如松对当时所流传的地方史之谬误提出“十辨”，其中指出“建德在南越，其城守在番禺而不在闽”。但明清地方志编修者宁信建德在南太武山建城拒汉是实，辩道：“南越为汉兵所破，建德逃人海上飘摇入闽，理固有之，不必疑也。”然而对照正史，对这

种说法还是不能无疑。据《史记》卷一一三《南越列传》载：元鼎六年冬，汉伏波将军路博德于黎明攻破番禺城时，“吕嘉、建德已夜与其属数百人亡入海，以船西去。伏波又因问所得降者贵人，以知吕嘉所之，遣人追之，以其故（原南越）校尉司马苏弘得建德，封为海常侯，越郎（原越南郎官）孙都稽得嘉，封临蔡侯”。福建南太武山在番禺（广州）之东而不在西，吕嘉与建德既“以船西去”，便不是“飘摇人闽”来到南太武山。何况，伏波将军路博德既是从降臣口中得知吕嘉、建德的逃亡地点，即派兵追捕，又是由南越旧臣俘获吕嘉、建德来献，因功封侯，便不可能再有建德逃到南太武山建城拒汉之事。

神秘的越王潭

梁山下有一口大潭，有时能发出声响，人们以它为天气变化的征候。传说那便是“越王潭”。旧《漳浦县志》引据曾到绥安县审核案件的刘宋钦差大臣沈怀远所著《南越志》说：“绥安县北有连山，昔越王建德伐木为船，其大千石，以童男女三千人举之，既而人船俱坠于潭……”该志并录载沈怀远所作《次绥安》诗，诗中有“馀善既辞师，建德乃伐木，番禺竟灰烬，冶南亦沦覆”之句，指汉武帝讨平南越王建德和东越王余善的史事。

南越王建德的事已在《越王城与赵佗故垒》一文里说到，东越王余善的事得补叙一下：余善是闽越王郢之弟。汉建元六年（前135年）郢用武力迫使东海王摇带全部军民迁居于江淮间，占领了东海王的封地（今浙江省西南部一带），又出兵攻南越，招致汉武帝出兵讨伐，余善杀郢，投降汉朝。汉武帝改封没有参加叛乱的无诸另一后代丑为闽越繇王，余善不服，自立为王，汉武帝

乃从闽越划出一部分地方另封余善为东越王。元鼎四年（前113年），南越丞相吕嘉立建德为王，发兵拒汉，余善上书自效，愿出兵八千助汉征伐南越，但他兵到揭阳（潮州），便以受海风波所阻为理由，不再前进，暗中与南越勾结。汉楼船将军杨仆平定南越后，请命乘胜讨伐余善，汉武帝不许，只命他驻兵豫章（豫章是汉朝郡名，郡治在今南昌，辖境相当于今江西省，广义的豫章指江西，狭义的豫章指南昌），防备余善。而余善索性先发制人，于元封元年（前110年）出兵攻占武林、白沙、梅岭。汉武帝这才令杨仆反攻，并令驻在会稽的横海将军韩说从海路攻入东越。余善退守险要，后来被建成侯和闽越繇王合力击杀。

余善与汉楼船将军杨仆争战的梅岭、武林、白沙在豫章。唐朝国子博士、弘文馆学士司马贞为《史记》作《索隐》，在《东越王列传》里注道："豫章（南昌）三十里有梅岭，在洪崖山足，当古驿道。……今豫章北二百里接鄱阳界，地名白沙，有小水入湖，名曰白沙坑，东南八十里有武阳亭，亭三十里地名武林，此白沙、武林当今闽越京道。"可见元封元年所进行的是一场作为战略要地的豫章郡治（今南昌）的争夺战。余善既是从闽越分出一部分地方封为东越王，其封地当在闽越东北部，即闽东、闽北、浙西、浙南一带，而闽南闽西仍是闽越繇王封地。余善当初自愿出兵助汉征南越，兵到揭阳（潮州）走的是海路，否则，"海风波所阻"便不能成为不能继续向番禺前进的理由。他退兵也必循原来航路回去。他出兵攻豫章，必从闽北出去，汉军反攻，陆路也必入闽北，海路人闽东。余善在闽北有六座拒汉城堡，即邵武肩城、汉阳大潭城、浦城县的浦城和汉阳城、临江城、武夷山市的古粤城，经考古学家证实为汉军与余善战争之城。"汉兵破蒲葵关而入"之说不确。

传说南越王建德在番禺城破之后逃到梁山下伐木造船，这与

“建德在南太武山建城拒汉”之说一样，与正史“建德以船西去”的记载不符。何况随建德逃亡者只数百人，不可能有三千童男女共举大船。沈怀远生活在刘宋时代，距离汉武帝平东、南二越时已五百多年，他只是根据传说记述，应以汉武帝的太史令司马迁所著《史记》的记载为可信。旧漳浦县志又说越王潭上“时闻拊船唱唤督进之声，往往有青牛驰而与船俱见，盖神灵之事也”。那无非是将风吹水动之声附会于越王建德和三千童男女的神灵活现。唐代李郢的诗句“谢氏海边逢素女，越王潭上见青牛”，指福州螺女庙及闽越王铸剑处欧冶池，旧漳浦县志截取后半句附会为漳浦越王潭。

蒲葵关与葵岗寨

漳浦与云霄二县交界处盘陀岭，古代生长着很多蒲葵树，汉代为闽越与南越二诸侯国分界的关隘，叫蒲葵关。

原来，在闽粤交界处另有一个地盘比较小的诸侯国，与闽越国一样是闽越族聚居地，首领名叫织，也是秦汉之际闽越族首领无诸的后裔，由汉高祖封为东海王。后来，因为不服汉朝统治，被汉武帝迁居于上淦（今江西靖江县），其在闽粤毗连处的故地便被南越和闽越二诸侯国所瓜分，其分界线便在盘陀岭，南越在岭上建关隘，以防闽越人侵，这关隘便是蒲葵关。

后来，南越和闽越也因为出兵反汉，被汉武帝讨平。南越（自今广东、广西至越南北部）在秦始皇时便已迁入很多汉人，而闽越则仍是闽越族聚居地，汉武帝平闽越后，将闽越族迁往江淮，但很多闽越人逃避入山，过后又回到平原居住，汉朝乃在闽地设立冶县（又名东冶县）来管理闽越族。闽越与南越两个诸侯国已

不存在，蒲葵关也只存遗迹。

宋淳祐《漳郡志》记载蒲葵关的遗址“在驿西南一舍”。“驿”指宋代设在漳浦县治所在地的仙云驿，距盘陀岭正好是一舍（古代三十里为一舍）。康熙《漳浦县志》在卷十九《古迹》里说“关当作邑之南今盘陀岭是也”，应该是准确的。

但同一部县志又误以为盘陀岭就是葵岗山，因而误以为宋代的葵岗寨也在盘陀岭。如在卷一《方域》关于梁山盘陀岭的记载里说“汉蒲葵关、唐漳浦驿、宋葵岗寨、明盘陀司皆在于此”。

其实，宋代设葵岗寨的葵岗山属乌山支脉，在今诏安、云霄二县交界处，西距诏安县城27公里。《天下郡国利病书》、清《一统志》、《漳州府志》都没有将葵岗山与蒲葵关混为一谈，而是泾渭分明。仅录乾隆《漳州府志》卷二十二《兵纪》的记载如下：“葵岗寨军，乾道三年有马武翼者，白于州守林孝泽，请拨左翼军队将一员领兵更番防守，寨在葵岗山，在诏安县东四十五里，两山对峙，号相见岭，有古关隘，叠石为之，乃诏安，云霄孔道。天启年间，知府施邦曜设名色把总，领兵六十名防守，驻大兴公馆。”（“公馆”本是供过往官员住宿的招待所。）

以前驿路从葵岗山相见岭经过，崎岖陡峭，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诏安知县夏宏改路于山腰，自诏安深田铺（养心墟）至云霄径心铺，长六七公里，山间多油柑（余甘）树，被叫做油柑岭。

漳州最早州治

隋朝的郡，唐朝改为州，县属于州管辖下的地方政区，而漳州却是从龙溪县划出南部地方设置的，其所以有从一个县划出一

部分地方设一个州的反常现象，在于隋朝的裁并郡县和唐朝的增设州县。

龙溪县设立于南朝梁大同六年(540年)，辖域包括今华安、芗城、龙海、龙文等县（市、区）部分地区。兰水县同时设立，辖区包括今南靖一带。两县都是从南安郡的东安县分设的。设立于东晋义熙九年（413年）的绥安县，属于郡治在今潮州的义安郡，辖域包括今漳浦、云霄、诏安、东山、平和一带。隋开皇十二年（592年），绥安、兰水二县并入龙溪县（一说大业三年即公元609年绥安并入龙溪）。这样一来，龙溪县辖域就包括今漳州市（原龙溪地区）除长泰县（宋太平兴国五年才从泉州划来）以外的10县（市、区）了。由于官员兵丁少，对僻远地区鞭长莫及，故绥安县与广东潮阳县交接地区发生了“蛮獠啸乱”（“蛮獠”是官府对南方少数民族的蔑称），朝廷派归德将军、左郎将陈政出兵平乱，其子陈元光继其未竟事业，平定地方，奏准在泉潮二州之间故绥安县地增设漳州，辖漳浦、怀恩二县，漳水以南属怀恩，漳水以北属漳浦（后怀恩并入漳浦）。

漳水的得名，据旧志记载，因陈政率军至云霄时，指江水说：“此水如上党之清漳”；旧志并说“溪水自西林出，海水自铜山海门入，汩杂有章，义取于此”。明代成化年间（1465～1487年）出版的《八闽通志》及万历年间（1573～1619年）编成的《闽书》都说漳州最早州治在云霄镇。万历元年《漳州府志》还说“唐嗣圣初（按即垂拱二年）置州于漳浦县西南八十里，即今云霄也”。万历四十年《漳州府志》开始纳入《白石丁氏古谱》（以下简称《丁谱》）之说“漳州在梁山之阴，即盘陀西岭下”，有人便据此而认为漳州最早州治在盘陀。

康熙《漳浦县志》依万历四十年《府志》纳入《丁谱》之说，同时提出疑问：“然则，陈政之前尚有曾镇府，前此诸志皆未尝言

及，而邑志并无丁儒之名，何耶?”并说唐代州一级并无“承事郎”官职，但只按唐制将丁儒的官衔改为录事，而没有排除其人为唐漳州职官。该志认为漳州最早州治不在云霄镇，说：“按旧志，元光开屯漳水北，后就屯所为州，县属之；又云其南漳水出焉，漳水自西林出，云霄在其南，不宜称漳水北，则不在云霄明矣。”

乾隆《漳州府志》仍认为漳州最早州治在云霄镇，辩说：“漳水自西林出，云霄在其南，不宜称漳水北，想记者偶误也。”

嘉庆《云霄厅志》首创“西林城即最早漳州城”之说，自认为既符合“漳水北”之说，又符合《丁谱》“漳州在盘陀西岭下”之说。

由于旧志记载互相矛盾，甚至同一本志书也自相矛盾，造成后代争论不休。“云霄说”以云霄不在漳水北而受怀疑。“盘陀说”以盘陀虽在梁山之阴（山北）而不在“盘陀西岭下”且距漳水甚远而站不住脚。“西林说”则虽可说西林在盘陀西岭下，但不在梁山之阴，而且《云霄厅志》所据以证明西林城为最早漳州古城的城垣、盐馆、尚书府、总兵府、监狱、军营等，其实都不是唐代建筑而受怀疑。自隋至唐开元以前没有实行盐专卖，陈元光时代没有盐馆；尚书府是明万历工部尚书蔡思充的府第；西林城，据明代《漳州府志》记载，是元代陈君用或陈世民始建。军营是清初的，康熙《漳浦县志》说“顺治戊戌己亥间，镇帅移驻西林”；总兵府是康熙年间总兵蔡禄的府第，《云霄厅志》说“总兵蔡禄拆西林城建私寨”，现残存城垣是康熙年间重建的“私寨”。

宋《漳州图经》存有一篇吴与写的《序》，说陈元光建州在漳浦水北（漳浦水即漳水，亦即漳江）；早期的《漳州府志》也说“陈元光开屯漳水北，后即屯所为州”。那时可能未有居民城而只有寨子之类的军事城堡，建在还未有地名的地方，所以旧志只能说“就屯所为州”，过 30 年便为避瘴而迁治李澳川，遗迹年久

湮没。

将军山下陈政墓

旧志载：归德将军陈政入闽平乱，进抵云霄，卒于凤仪二年（678年）四月，朝廷令其子陈元光袭职。陈元光葬父于云霄将军山，有懂得堪舆术的人来向他道贺，说他父亲墓地有王者气，子孙能出帝王，他为避割据为王的嫌疑，迁葬父亲于平和大峰山。到了南宋，竟有陈政自己迁回原葬地的说法。有一个神奇故事：泉州人林机来报，说普贤院后出现一块砖，有陈政题字，是他神灵嘱托，要回葬原地。起初人们以为林机是一个疯子，后来果然在普贤院后掘出一块如林机所说那样的砖。不久，人们就远远望见将军山下有很多人在那里修墓，近看却只有林机一人，而送去许多饭菜，都被吃个精光。过了十多天，墓已修好，名士吴大成亲眼看到，有一队唐朝兵马，手执黄旗，鼓吹奏乐，从大峰山凌空飞来，直抵将军山下。那时陈元光已被宋朝皇帝封王，民间称他父亲陈政为王爹，说王爹自己从大峰山迁回将军山了。

“王爹回迁”这种事，按科学的分析，有两种可能：一、陈元光实际没有将父亲遗体迁葬，只是为了避“王者气”之说引起朝廷对他想割据为王的嫌疑，将墓的仪表毁掉，而在大峰山造一座假墓，说已迁葬。二、实际迁葬了，南宋时没有迁回，只是在将军山原墓地恢复了唐代的宏伟规制。这两种情况都需要造一番舆论，说“王爹自己迁回来了”。主持这事的，可能是陈元光的后代陈景肃或其子孙，他们都是南宋进士。吴大成是与陈景肃同称为漳山七贤的南宋名士，说话很有分量，由他说亲眼看到仪仗队拥陈政凌空而来，人们认为可信。

1984年12月28日至翌年1月1日，福建省考古队王振镛等配合漳州市和云霄县文物干部，对将军山陈政墓进行清理研究，发现有三个不同时期的台基叠压：（一）早期遗存为红色花纹方砖台基，方向100度，通面阔13.7米，通井深8.4米，四周用长28厘米、宽26厘米、厚4厘米的水波纹红方砖叠砌，残高约20厘米，散水宽23厘米也是用同样的方砖平铺。西面当心接一红砖甬道，方向约92度，宽5.15米，残长3米。道旁用长50厘米、宽32厘米、厚4.5厘米的莲瓣纹红砖盖面，下叠砌薄红砖四至六层。路面用红方砖斜铺，两旁散水用方砖平铺，宽约20厘米。这组遗存是早期墓葬享堂遗址。从红色方砖和部分红色瓦当的纹饰看，属于唐代至宋代早期的遗存。（二）中期遗存为条石台基，叠压在早期红砖台基之上，方向101度，通面阔12.9米，通井深7.8米，高0.34米。地面平铺红色方砖，大小厚薄比较杂乱。四周用宽约30厘米、长约140～150厘米、厚约12～15厘米的条石叠砌（正面叠石二层，其余一层），石料均经细琢。正面正中有石台阶2级，残宽2.2米。残存石柱多根。其中一根完整，通高1.70米，约0.34～0.40米见方，基部呈四角形，高约0.3米，其余凿成小八角形，顶端琢平，并凿有方形小榫眼，以便放置木构架。其中一根残柱上有“嘉熙庚子春建坟前仪制十事”及“会首进士陈哲夫、陈缄”等刻字。遗存石翁仲文武各一，石马、石狮各二，石羊一，莲石柱基座二，均严重残缺。这些石雕均具宋代特点，可能即是“坟前仪制十事”的残存部分。（三）晚期遗存，利用南宋遗物重修享堂及墓埕、台阶等。据台阶方向，这次重修的墓向为75度，偏离早、中期墓向20度左右。

按以上三个时期的台基叠压看，早期的遗存应当就是唐代陈元光建而又毁的残件；中期遗存当就是南宋所谓“王爹回迁”时所建；按中期遗存石雕严重残缺和晚期墓向与早、中期遗存不同，

墓形为钟形（风字形）这些情况，不能排除明清之际的动乱时期此墓曾受到破坏而后重建的传说。

现在的陈政陵墓建得富丽堂皇，规模宏大，海内外前来瞻仰者络绎不绝。人能永垂青史，而遗骨不能永存，陵墓是一种纪念建筑，不论陈政的遗骨是在将军山还是大峰山，并不影响人们对陈政丰功伟绩的纪念。

“开漳圣王”墓

陈元光于唐总章二年（669年）13岁时随父归德将军入闽平乱，仪凤二年（677年）陈政病故，时元光21岁，被朝廷授职为中郎将，接任父亲“岭南行军总管”一职，继父亲未竟事业，平定龙溪县南部（故绥安县地）的动乱。逢广东豪强陈谦联结山区少数民族首领苗自成、雷万兴攻陷潮阳县，潮州刺史常怀德无力进剿，檄调陈元光前往讨伐，克复潮阳，平定了叛乱。永隆二年（681年）陈谦又策动雷州半岛“崖山王”攻打南海郡边地，循州司马高琮奉令专征，未能取胜，檄调陈元光前往征伐。元光凯旋回军故绥安县地。永淳二年（683年），朝廷以陈元光有功，晋升为正议大夫、岭南行军总管。垂拱二年（686年）陈元光疏请在泉、潮二州之间故绥安县地增设漳州，领漳浦、怀恩二县，朝廷任命陈元光为漳州刺史。不久，元光的祖母魏氏病逝，葬云霄半径山，元光在那里结庐守墓。前被镇压的“潮寇”首领苗自成、雷万兴之子聚众起事，潜入梁山支脉岳山，陈元光率少数骑兵往战，大队步兵赶到时，元光已被“蛮将”蓝奉高杀伤致死，权葬绥安溪大峙原。朝廷命元光之子陈珦接父亲职务，在夜袭“蛮蜩”杀了蓝奉高后，于开元四年（716年）将漳州州治和漳浦县治从漳江北

岸移设于李澳川（今漳浦县城）。开元二十九年，怀恩并入漳浦县，并将原属于泉州的龙溪县划属漳州管辖。贞元二年（786年），州治移设于龙溪（今芗城区），陈元光及诸将遗骨移葬于九龙里松洲保（今属芗城区浦南镇）。

浦南陈元光墓有两处。一在浯浦村石狗山，墓前有石羊、石马，右下方有五叠石，镌清康熙《漳州府志》主编蔡世远写的《修墓记》："公讳元光，谥文惠，开漳惠民，历代累封侯王。原葬云霄大峙原。贞元二年徙州治，奉敕移葬此山。岁久，墓旁居民侵地种园，坟脑仅存其半。于是，乡绅士庶呈官示禁，鸠金修坟。呜呼！叔子风流，尚存残碣，召伯遗爱，勿剪甘棠，嗟我后人，勿侵斯冢。"此山周围地名苏坑。乾隆《龙溪县志》卷十一《古迹》记载："唐漳州刺史陈元光墓，初在绥安溪大峙原，元光战殁于此，遂权葬焉。贞元二年奉敕改葬松洲堡，因立庙石鼓山下。按石鼓有苏坑山，石马羊兽累累犹存，土人呼将军墓。"按照"石鼓有苏坑山"句理解，"石鼓"是包括"苏坑山"在内的总地名，因而一般认为"石狗山"是"石鼓山"的讹音，符合府、县志舆图所画一座山标"石鼓山，唐陈将军葬处"位置。唐代漳州除陈政、陈元光父子外，别无陈将军。此墓已列为漳州市第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并由漳州陈氏宗亲会扩建为"开漳圣王陈元光陵园"。另一处陈元光墓也在九龙里松洲保（今松洲村一带），址在高坡山，今属何厝村。高坡山是石鼓山的高坡。漳州府志《宦绩》卷的《陈元光传》载："贞元二年复徙州治龙溪，敕有司改葬于州北九龙里松洲保之高坡山。"唐贞元八年（792年）进士欧阳詹所撰《龙湖行状》说：陈元光骨殖"改葬州治之北九龙里松洲保林宅内猴坑高坡上"。林宅指陈元光姐夫林孔著后裔聚居地溪西一带，石鼓山位于溪西内地，称林宅内。猴坑在石鼓山北面，其高坡称"龙脊"，另一座陈元光墓即在该处。唐开成三年（838年）进士，

任漳州司马的欧阳秬为陈元光之子陈珦所写墓志铭说："贞元迁州，遂以松洲书院祀龙湖而葬之。"龙湖是陈元光的号。墓志铭这一段文字是说，州治迁龙溪后，以陈珦所创设的松洲书院祀陈元光，并将陈元光的遗骨迁葬子松洲书院附近。松洲书院成为祀陈元光的庙宇，旧志所说"立庙石狗山下"指此。宋代，祀陈元光的庙宇开始由朝廷赐给"威惠庙"称号。明漳州名士陈天定所作《北溪纪胜》说："由溪西直上三里许，则唐将军威惠庙在焉，古所谓苦草镇松洲保是也。"陈元光的后裔，近代漳州绅士陈智君带头修建松洲威惠庙附近（今何厝村）的高坡山陈元光墓（即上面所说另一座陈元光墓），墓碑上方镌"清宣统辛亥桂月"，中镌大字"唐世守漳州威惠圣王陈公墓"，下镌"阖族裔孙立石"。墓碑尚存。两处陈元光墓各有实物和历史资料，大概一处葬遗骨，一处葬衣冠。

"开漳"诸将墓

唐贞元二年（786年），漳州州治从漳浦移设龙溪县后，开漳刺史陈元光及部将李伯瑶、马仁、林孔著等遗骨都迁葬于龙溪县游仙乡九龙里松洲保（今芗城区浦南镇松洲村周围）。后，陈元光的副将、宣威将军许天正、府兵队正宋用等遗体也葬子松洲保附近。其他地方还有陈元光部将之墓。

一、陈元光的副将、宣威将军、漳州别驾许天正墓。《龙溪县志》记载"在二十四都樟公树"，《漳州府志》则记载"在香洲马栏桥头"，许氏族谱记载与府志同。三家记载实是同一地点，"樟公树"是因为墓前有一棵大漳树，被称为樟公，而成为地名。该地有一座石桥称马栏桥。许天正墓在马栏桥头偏左处，称樟公墓，

墓碑镌“许先生墓”，其后裔，清康熙年间总兵许凤重修。该墓距香洲两公里，中间隔九龙江，想是因为香洲知名度高，所以府志及族谱记为“香洲马栏桥头”。过去，曾有海外许氏后裔来到香洲找不到“马栏桥”和“樟公墓”。其实该地现属诗朋村。海外许氏宗亲会寻找此墓多年，至1992年始得到确认，加以修建。

二、唐军谘祭酒林孔著墓。林系陈政的第九女婿，陈元光的姐夫。贞元二年州治迁移龙溪，其后裔移居香江，定居溪园，后裔遍布各地。林孔著遗骨迁葬于龙峙山“品”字形三块天然岩石下，穴号“渴马饮泉”。1996年其后裔修建陵墓，墓碑镌“唐开漳军谘祭酒林府君墓”。

三、唐威武辅顺将军李伯瑶墓。李氏族谱和《漳州府志》都记载。原葬漳浦北山，后随着州治和后裔的迁移，由黄妙应择地，移葬虎形山，即今芗城区渡东村虎仔山。墓至今完好。

四、唐威武辅顺将军马仁墓。志乘失载，但陈元光府兵队正宋用的后裔宋正直墓在华安县丰山乡碧溪村蛇形山（浦南对岸江边），世代相传，宋正直墓后之墓所葬是马仁，墓碑用大石磨成半圆形，因年久失修，碑面图案和文字漫漶，无法辨认。

五、唐府兵队正宋用墓。宋用奉陈元光之命驻松洲保行台，卒葬石鼓山南，后应黄妙应献吉地迁葬石鼓山北，地名猴坑，穴号“猴王坐殿”，墓名“水流破军”。附近有水流社，雅称水潮社。

六、陈元光的女婿，分营将戴君胄，传裔龙溪县墨场及长泰、云霄、漳浦县城，及佛昙东坂、马坪文店、霞美戴坑、大南坂官径。墓在盘陀岭北碧云峰（云霄火田镇辖内），有郡马亭（宋朝封戴君胄“郡马”）。

千年古刹南山寺

南山寺历史悠久，是漳州一带最大的古寺院，址在漳州南门外，九龙江西溪南岸。后依南山，前有放生池六十多亩（据乾隆《漳州府志》所载），风景清幽，历代名士咏诗甚多。如元代林广发诗云“翘首城南上，悠然见此山。竹藏秋雨暗，松度晚风寒。佳色催黄菊，晴光上群峦。倦飞何处鸟，日暮尽知还。”

旧志记载，该寺原名“报劬院”，唐开元间原太子太傅陈邕所建。宋乾德六年（968年），陈邕的后裔、漳州刺史陈文颉重建，改名“南山报劬崇福禅寺”，明代始称南山寺。

族谱记载，陈邕原籍京兆万年县（今陕西西安），唐中宗神龙年间进士，担任太子李隆基的教师，封太傅，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因与奸相李林甫不洽，被贬谪入闽，初居福州，后迁兴化枫亭，最后迁居漳州，建宅西溪之滨南山下。由于规模宏大，有五个大门，违犯规制，被人密报朝廷，说他造皇宫想造反，皇帝派钦差前来调查。陈邕事先已得朝中朋友来信告知，但苦无对策。他女儿金花含泪求父，舍宅为寺院，让她削发为尼，以保全家性命。陈邕只好照办，将新建宅院改为寺院，名“报劬院”，到云岭请高僧常公禅师为住持，自己迁居于三都后水头。钦差来到，见陈邕所建是寺院，回报朝廷，陈邕才免死罪。

陈邕之于夷则等，于建中二年（781年）举家迁居嘉禾屿（今厦门），后裔分居各地。至五代十国时，夷则的后裔陈洪进，居仙游，为闽国泉州指挥使留从效的牙将。闽国降南唐，南唐以留从效为清源军节度使，领泉漳二州，陈洪进为统军使，从效死后，泉漳二州为陈洪进所据。南唐亡，陈洪进向宋太祖上表称臣，宋太

祖任命陈洪进为“节度泉漳等州观察使”。宋太祖死后，陈洪进入朝向宋太宗“纳土”，宋太宗加陈洪进“检校太师”，迁居京师，而以其子文颢、文颉分任漳泉二州刺史。乾德六年，漳州刺史陈文颢重建报劬院，改名“南山报劬崇福禅寺”。

南山寺总面积4万多平方米。过了山门，进入并列的五个大门便是天王殿，正中奉祀一尊笑迎来客的弥勒大佛像，两旁分列四大金刚。弥勒佛背后是一尊护法韦陀，两手按住一杆“降魔杵”，直插地面。过了天王殿是大雄宝殿，正中奉祀三尊佛像，称三宝佛，是宋初乾德六年陈文颢重建寺院时所塑，其特征是两个耳朵下端成尖形。解放后，改按唐代的佛像特征，重塑耳朵下端圆形的佛头，而佛像踞坐的石殿和“桌裙”仍是宋代的，基座则是唐代遗构。

大雄宝殿的左侧有一个石佛阁，所祀大佛是利用天然“石笋”雕成，高6米，脸相丰圆，体形壮硕，左手托珠至胸前，右手下垂于体侧，赤足立于莲花座上，佛衣的领、襟、袖口和下摆均浮雕莲花纹饰，造形艺术的精湛，使参观者叹为观止。而传说，初雕成时，有一个小孩一语道破：佛像的手这么大，手指怎么能伸进去挖“鼻屎”。石雕师傅听后惭愧得连一文工钱也不敢要就溜走了。据《漳州府志》记载，这石佛系唐代所雕，而现在有专家认为可能是宋代所雕。

大雄宝殿的左角悬挂一口大钟，口径1.27米，高1.8米，重约0.65吨，元代延祐六年（1319年）所铸，有当时住持僧古愚的题铭，并有两个铜钱和一支梅花纹饰。那纹饰被附会上一则故事，说寺僧为铸这口大钟而到处募缘。有一个孤苦的老妇献出一支自结婚时珍藏至老的梅花钗，一个乞丐献出他仅有的两文钱，寺僧虽收纳，却认为无关轻重，放置一旁。大钟出炉时，钟面有两个圆窟窿和一条裂痕，经过几次重新熔化浇铸，总是不能排除那两

个缺点，后来想起那孤老妇人和乞丐所献物件，拿来一比，完全吻合，而且自然粘附了。这故事虽然是附会的，却隐喻着“不可轻视微小贡献”的哲理。

大雄宝殿后面高坡右边是藏经阁，内珍藏60橱佛经，其中无价之宝血书《华岩经》据传是明天启年间一个叫“融”和一个叫“莲山”的和尚及一个叫“莲”的尼姑，三人用三年时间，刺血写成，共81卷，笔法端秀，字迹金黄，可惜“文化大革命”时受破坏，仅存残页。还有光绪皇帝所赐《龙藏经》，福建省只有鼓山涌泉寺和南山寺两部全藏本。《龙藏经》计三藏十二部，7376卷，也是珍贵文物。玉佛殿中有一尊白玉佛像，高2米，是光绪三十年（1904年）华侨所献，从缅甸运来。

高坡左边是陈太傅祠，据传是陈邕故居，后人改建为祠。太傅祠后而有楼，楼上供奉自陈邕之父陈忠以上五代祖先神位，称“五祖楼”，后人讹称“小姐楼”，传说为陈邕之女金花小姐的闺房，也有人称为“姑娘楼”。金花削发为尼，长兄夷则过继一个儿子给她为后嗣，陈洪进属这一系后裔。陈洪进为南唐清源军节度使时，疏请皇帝敕封金花为“金花郡主”。金花墓在寺后山上，称“姑娘墓”，解放后移葬于藏经阁后园，立碑刻文“唐诰封金花郡主玄妙之墓”。玄妙是金花的法号。

大雄宝殿、石佛阁、玉佛殿、太傅祠、修真净室、金花郡主墓，以及已毁的梅庄、栗园号称南山寺八胜。

大钟、血书《华岩经》、御赐《龙藏经》和一株300多年古老红茶花树合称南山寺五宝。贝叶经原从印度传来，是以印度一种贝多树的叶子作为纸张写成的经卷，棕黑色，字白色，梵文。已子民国8年（1929年）被陈炯明部偷走，卖到香港。

1930年至1931年，中共闽南特委机关秘密设子南山寺德星堂（在石佛阁右邻，原为客房），特委书记陶铸在那里领导闽南革

命活动。

奸相梦断木棉庵

木棉庵又称木棉铺，在龙海市九龙岭下，是南宋淳熙十五年（1188年）漳州知州傅伯寿所设自漳州城至南诏，由和尚管“铺”（驿路分站）的十多座佛庵之一，因为是郑虎臣诛奸相贾似道处而留名青史。明嘉靖年间剿倭名将俞大猷在庵前立“宋郑虎臣诛贾似道于此”石碑，清初断为两段，经乾隆十三年（1748年）龙溪知县袁本濂摹原字重新镌刻，立于原处。民国25年（1936年）福建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朱熙在庵前公路边建木棉亭，立《木棉亭记》碑，并将俞大猷的碑刻及历年题咏石刻集中于亭中。现庵、亭及碑刻列为漳州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贾似道，浙江台州人。其姐贾玉华被选入宫，为理宗皇帝赵昀所宠爱，封为贵妃。因此，本来是市井无赖的贾似道受重用，官至右丞相。元兵步步进逼，贾似道向皇帝隐瞒军情，及至元兵攻鄂州（武昌），他才着急，自己统率大军出援。他私自求和，答应称臣纳贡。元军统帅忽必烈因蒙古王蒙哥死，急于回蒙古争夺王位，答应退兵。贾似道冒报战功，诈称“大获全胜”。他得到理宗信任，专断朝政。理宗死后，度宗继位，国事专赖贾似道主持，封为太师、平章军国重事。他在西湖葛岭建府邸，朝廷大事在他府邸处理决定，而他不以国事为重，襄阳要镇被元军包围多年，他不发兵救援，不让皇帝知道。度宗荒淫过度，三十多岁便“崩”了，贾似道立全皇后所生四岁幼儿赵㬎为帝。德祐元年（1275年）元军沿长江直下，朝野震惊，贾似道被迫率兵抵抗，在鲁港（今安徽芜湖西南）大败，全军覆没。朝中大臣群起疏劾贾似道误国，要

求诛贾似道以谢国人，谢太后将贾似道贬谪广东循州，须遣派一名要员为监押官。郑虎臣的父亲郑隆原是太学生，被贾似道脸上刺字，发配恩州（今河北清河县），死于路上。郑虎臣原是武学生，考中武进士，派充会稽县尉，为报父仇，自愿担任押送贾似道下广东的苦差，预谋在路上结束贾似道性命，以免他日后复职又误国害民。

郑虎臣监押贾似道从仙霞岭入闽。贾似道还带着两个儿子和侍妾、奴仆数十人，金银财宝十多车。行了几天，郑虎臣说人太多，行李繁杂，耽误行期，逼迫贾似道将财物发给那些侍妾奴仆，予以遣散。沿途遇到寺庙，就逼贾似道施舍财物。一路经建宁府（今建瓯）、泉州，至漳州已是秋天十月。漳州知州赵介如是靠贾似道升官的，想在驿馆招待贾似道，便以招待郑虎臣为名，请郑虎臣坐首席，让贾似道坐在下侧。赵介如看出贾似道衣食受节制，就取一些衣物送他，都被郑虎臣截下，寄驿吏收存。第二日郑虎臣催促起程，来到木棉庵，贾似道借口患病，要求暂宿。郑虎臣心想，贾似道爪牙不少，必然还有像赵介如这样的权势人物来掩护他，不如及时结束他的生命，以杜后患。当夜，贾似道以上厕所为名，企图逃跑，郑虎臣追到厕所，一锤将贾似道打死，又将他两个儿子击杀，埋葬于庵边空地里。过后，他跑到福州自首，死于狱中。

柳营江与江东桥

江东桥在漳州城以东 20 公里处，横跨九龙江北溪三叉河附近的柳营江上，是国道 324 线的重要路段。柳营江的得名，据早期《漳州府志》的记载，是唐末光州固始县人王潮、王审知兄弟在进

取泉州之前，曾在这里屯驻重兵，阻江为界，插柳为营。万历四十年（1612年）《漳州府志》开始接纳《丁氏家谱》之说，将“插柳为营”的时间提前到“六朝以来”，并说唐总章二年（669年）入闽的归德将军陈政以柳营为基地进军到江之西。但旧志所载陈政的军事基地在上游的九龙山。柳营江地势险要，扼水陆交通要冲，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多次发生重要战役，则是有史可稽的。

桥始建于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年），是一座以船相连，上铺木板的浮桥。嘉定七年（1214年）始筑石桥石墩，架木板为桥，由漳州知州主持修建。嘉熙元年（1237年），木桥被火烧毁，行人复靠摆渡过江。漳州知州李韶接受地方人士建议，捐钱十五万缗（一千文为一缗），并发起建石梁桥募捐活动。本地人士陈正义等及迁浚僧师徒分头到各地劝募，原知州庄夏的儿子梦说、曾任吏部尚书的本地人颜颐仲等亦捐巨资。共募资30万缗，历时三年建成大桥，命名为虎渡桥。得名的由来，一说由于它的地点在漳州城“寅”方，寅属虎，故名。一说柳营江水深流急，桥墩屡建屡坏，后来看到一只老虎负一只小虎过江，泅到中游，站在水中休息，建桥者循老虎泅渡的路线，探到一条横过江底的石线，沿那石线建桥墩，才获得成功。后一说娓娓动听，但属于民间传说。其实，在未建桥之前，这个渡口已经叫做虎渡，在虎渡建桥，所以叫虎渡桥。虎渡桥又称通济桥，以宋代在该处设通源驿得名。元代改通源驿为江东驿，江东遂成为地名，从此，桥又叫江东桥。由于工程浩大，所以虎渡桥与泉州洛阳桥一样有许多神奇的传说。它是仅次于洛阳桥的福建省第二古石桥，共15间，每间3条石梁并铺，每条长20多米，宽厚各2米多，石梁之间留空隙，用石板横铺弥合，使桥的宽度达到6米多，两边有扶栏。桥全长千米，两端设关门，门额上一端镌“三省通衢”，一端镌“八闽重镇”。

清康熙初年，退守台湾的郑经乘“三藩之乱”派刘国轩打进

漳州，为阻碍清军反攻，将江东桥部分桥梁炸毁。清福建总督姚启圣只得督铺木板以利行军。清朝统一台湾后，福建陆路提督蓝理募款修复石梁桥，又有本地人郭元龙加以完善。

1938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第二年，厦门被日军占领，国民党福建军政当局下令破坏沿海公路，江东桥被炸毁。解放后利用旧石墩铺设公路桥，现在，船从桥下经过，可以看到公路桥下古桥墩上还架着6条石桥梁。据现代科学的强度理论验算，那些石桥梁的长度，在自重作用下，已达到其自身抗拉极限强度的十分之九，就是说，如果石梁再长一点，在自重作用下就会断裂，可见古代漳州桥梁技术的高超。中国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曾考察江东桥，赞叹不已。他说，在未有起重机时代，如何将那样每条重约200吨的桥板架设在30多米高的石墩上，至今还是一个谜。《中国名桥》一书用大量篇幅记载这座世界上罕见的古石梁桥。

漳东门户万松关

万松关在漳州东乡（今龙文区步文镇）的乌岐、鹤鸣二山峡谷中。二山联峙，耸立于九龙江之滨，延袤5公里。万松关距漳州城15公里，是从前漳州通省、通京捷径，因为那时绕岐山至江东桥要多走许多路，不似现在有324国道那样便捷，所以很多人要走峡谷捷径。明初，陈克聪沿那峡谷栽松成荫，行人免受烈日曝晒之苦，那山道遂得名为万松岭。后来由于缺乏管理，松树稀疏，暴露出漫山岩石，堆叠如云。明万历年间（1573～1619年）督学沈儆炌称其为堆云岭，而群众仍称为万松岭。

天启年间（1621～1627年），荷兰侵略者窃据澎湖、台湾，常派出舰艇侵扰闽南沿海。当时，在朝廷任国子监祭酒的龙溪县洞

口村（今属龙文区步文镇）人林钎，因为反对太监魏忠贤擅权乱政而受迫害，弃官回乡。故乡父老对他说，在岐山（即马岐山）与鹤鸣山（即云洞岩）之间的峡谷中建一个关隘，派兵把守，可保卫东乡及漳州城。林钎感到确有这个必要，将这群众的要求转告漳州杜知府。杜知府采纳这建议，开始发动民工为建造一座万松岭关城挖地基。但城未建而杜知府奉调离任。崇祯元年（1628年）林钎奉召回朝复职。崇祯二年，施邦曜以工部主事外放任漳州知府，与乡贤陈天定等商议捍卫地方的措施，决定兴建万松关城堡。由里人王必标负责施工，共用一万多工日，当年完成。现在，这城堡门楼已毁，城墙和关门尚存，大学士林钎撰写的《施公新筑万松关记》残存。城墙以条石砌成，高25米，宽7米，周长100米，上有炮门3眼，关门上嵌一块青石匾额，镌“天宝维垣”楷书四字。站在城墙上，可见到一条大道循着山谷，穿过关门，延伸于关外群峰之间；关内漳州平原市镇、村舍、果园、稻田历历在目。

现在有324国道沿鹤鸣、马岐二山南边直通江东桥，南来北往的人们不必再走万松关老路，而这两座山峰依旧巍然屹立，雄镇漳州东大门。可以想见，在土炮火力还不强大的明清时代，建造万松关对保卫漳州平原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明诚堂与邺山讲堂

黄道周在朝廷几上几下，曾在多处讲学，最著名的讲学处是漳浦县城东郊的明诚堂书院和漳州江东桥附近的邺山讲堂。

崇祯十三年（1640年），江西巡抚解学龙举荐黄道周“可以入阁办事”，被疑为结党。两人被捕入狱，拷刑追究“同党”。之后，

黄道周被遣戍辰阳，崇祯十五年应召回朝。他面见皇帝，请假获准，翌年回到漳州。他在漳州和漳浦的学生和朋友分别集资，将漳浦东门外他曾教过书的东皋书舍改建为明诚堂书院，在漳州江东桥附近建邺山讲堂，供他讲学。

明诚堂先于崇祯十七年三月初落成。黄道周于三月十日起在明诚堂主持有一千多人参加的讲学大会。五月初，黄道周前往邺山避暑，各地学子闻讯，纷纷赶到邺山，一时间，邺山下停泊小船一千多只。

邺山在九龙江北溪江东桥西侧，原名蓬莱峡，以两边石壁夹峙，屹立江边，宛如蓬莱仙岛得名。山上有十多尊状如翁仲的奇石，乡人称为石仙，黄道周则以其状如挂剑执笏的大臣而称为邺侯，因此称蓬莱峡为邺侯山，简称邺山。黄道周五月初来邺山避暑时，主讲堂乐性堂尚未落成，而学子云集，只好以刚建成的三近堂让一千多名学子挤在一起住宿，讲学大会则在用于祀朱熹等先儒神位的与善堂举行。那时漳州还不知道崇祯皇帝已于三月十九日败亡，讲学大会还是开得轰轰烈烈。过了十多天，五月二十七日，黄道周和学子们才闻知“神州陆沉，鼎湖战血”。黄道周率诸弟子在邺园袒发而哭三天。南京诸臣于五月十五日拥立福王朱由崧称帝，改元弘光，有旨来召。这时，邺山主讲堂乐性堂落成，而黄道周却在地方官催促下匆匆就道。不久弘光亡，黄道周等在福州拥立唐王朱聿键，改元隆武（1646 年闰六月）。黄道周任武英殿大学士，募兵抗清，于隆武元年十二月在江西婺源战败被俘，翌年三月五日就义于南京。隆武帝追赠黄道周文明伯，赐明诚堂名为文明书院。而不久，隆武又亡，漳州一带成为郑成功与清军反复争战的地区，邺山讲堂就荒废了；明诚堂改为佛院。

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 年）漳浦知县陈汝咸赶走和尚，复设书院。以后经历任县官维护，明诚堂得以保存下来，今为黄道周

纪念馆，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明诚堂占地1058平方米，内有黄道周所创石砌方台“天方图”，边长3.78米，盘面刻纵横交叉的线条，构成16284个小方格，并以内外八个圆圈与方格交错，500多年来一直无人破解其奥秘。有人认为是讲解易经的教具，有人认为是演绎天体运行的仪器，但谁也说不出怎样运用。

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分巡汀漳龙道单德谟出资倡导，募款重建鄀山三近堂、乐性堂、与善堂，仍作为讲学场所。今仅存遗迹和黄道周手书摩崖石刻“蓬莱峡”、“芙蓉峡”、“鸟道不绝风云通”、“墨池”、“游磐”等5处。

松洲书院全国最早

旧志记载，陈元光之子陈珦，得力于许天正教导，学识丰富，于万岁通天元年（696年）以明经登第，授职翰林承旨直学士。当时武后称帝，他见朝廷权位斗争激烈，便辞职回漳州，主持“文学”（文化教育），后又应龙溪县（当时还不属于漳州）县令席宏聘请，主持乡校，创办松洲书院。未及三年，陈元光于景云二年（711年）战死于大峙原，朝廷令陈珦“夺情”代理州事，期间又于开元十九年（731年）登进士第，开元二十五年辞职，再到松洲书院讲学，至天宝元年（742年）62岁病逝之前为止。墓在始安乡会同里（今木棉村）之南山蕉仔坑。漳州司马欧阳秬为作墓志铭云：“景云二年，龙溪县尹席宏隆礼聘主乡校，府君辟书院于松洲。贞元迁州，遂以松洲书院祀龙湖而葬之。”（松洲书院只是以前落祀陈元光，后落仍为书院）。席宏给陈珦的聘书写道：“吉甫归而万邦为宪，太丘处而四境无盗，为导民于礼乐，无混迹于渔樵，且十室之内必有忠信，而滨海无仕进者，实无教之尤，非生

资之丑。盖鹿鸣不闻清音，龙门焉敢高仰，望惟开其茅塞，勿托疾以薪忧。”席宏是殷切期盼陈珦通过办书院，以文化教育的影响来巩固军政成果，改变过去这个介于泉潮二州之间的边荒地区“盗贼混迹于渔樵”的情况，进而改变“滨海无仕进”面貌。

有唐一代，福建登科第者155人，其中漳州12人，占7.74%。漳州是一个新开发地区，能有如此成绩，与陈珦奠定文教基础是分不开的。漳州文化教育肇基于唐，发展于宋，繁盛于明，人才辈出。清代在漳州城西南隅虎文山边建一座“忠义孝悌祠”，祀乡贤数十人，头名陈珦。《漳州府志》为陈珦立传，并加以评论：“陈珦，将家子，揭德振华，能以儒术显功名于景云、开元间。清漳自宋迄今（清代）多巨人长德，以鸿文粹学，衣被天下，先河后海，必以珦称首焉。”

《中国教育史》说，书院作为学校名称“始于唐代丽正修书院”，时在唐开元六年（718年），而漳州的松洲书院创办于景龙二年（708年），比丽正修书院早10年，应是全国最早的书院。

八卦楼重建更辉煌

威镇阁俗称八卦楼，屹立在漳州城东南方城边（城内）。城东南濒临九龙江西溪，是漳州通各大埠的门户，往来的人未到达漳州城，先望见威镇阁，所以威镇阁与泉州的东西塔一样，被作为这个城市的象征。它的兴建原因和经过，据明万历元年（1573年）《漳州府志》卷二《宫室》记载：隆庆六年（1572年，即万历元年的前一年）知府罗青霄认为，漳州城地势西北高，且背靠山峰，而东南低，又无山峰以护“风气”，乃与同知罗拱宸商议，共同主持将原来一座木结构的城楼加以重建，增加高度，门首挂

“威镇阁”匾额，与西北角芝山上的威镇亭相匹配。它八面开窗，取象八卦，故群众皆称为八卦楼。楼上有一副楹联：“五名山，二秀水，城外风烟连海峤；七真儒，三及第，漳南文献甲闽瓯。”五名山指城内芝山、日华山、保福山、龙文山、虎文山。二秀水指九龙江北溪和西溪。七真儒指唐代龙溪县人周匡物、漳浦县人潘存实，宋代龙溪县人颜师鲁、陈淳、王遇，漳浦县人高登、吴与。三及第指明宣德五年（1430年）“状元”（进士第一名）长泰县人林震，宣德二年（1427年）“探花”（进士第三名）龙溪县人谢琏，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探花”漳浦县人林士章。

乾隆《龙溪县志》卷二十四《艺文》采人蒋允焄《重修丹霞书院及威镇阁碑记》，该碑记说“万历六年（1578年）太守罗公青霄、司马罗公拱宸即城为基，架阁其上，额曰威镇，与西北之威镇亭对峙”，将威镇阁的始建时间推迟六年，乃考据失误。蒋允焄是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漳州知府，主持修建过威镇阁，他所撰《碑记》记述清代威镇阁的毁坏和修建经过则是准确的。该《碑记》说“遭海氛而阁毁”，当是指清初郑成功及其子郑经与清军进行过几次漳州争夺战时，威镇阁毁于战火。该《碑记》又说，乾隆二年（1737年）漳州知府刘良璧主持重建威镇阁，砌石为基，高六丈多。乾隆《漳州府志》卷三《城池》则说，重建的威镇阁“基与城齐，耸出城六丈有奇”，当是石基六丈多，与城垣齐高，阁又高出城垣六丈多。乾隆二十二年及二十四年两次雷击，威镇阁有损坏，知府蒋允焄重修。

威镇阁为三层楼，八面开窗，登上顶层，城内外风光历历在目。民国时期，龙溪县消防队曾驻于此楼，以顶层为瞭望台。后来消防队撤消。抗日战争时期，漳州城十分荒凉，威镇阁人迹罕至，常有人在此上吊自杀，因此有“跳水南门头，上吊八卦楼”的俗谚。

“文化大革命”时，威镇阁为武斗一方所占用，被另一方开炮击毁。建设漳州战备大楼时，楼基被夷为平地。

1997 年 7 月 23 日开始重建威镇阁，1998 年 1 月 26 日落成。重建的威镇阁占地 6000 多平方米，比旧威镇阁扩大 3.1 倍，立面高度 51.88 米，比旧威镇阁高 2 倍多，总建筑面积 7300 多平方米，分为基座和主楼两部分。基座三层，底层为停车场，二层为商场，三层为娱乐场。主楼按照旧威镇阁式样，三层，八角形。高 38.48 米，贴金嵌铜，古朴大方，是由北京故宫、天安门彩绘师绘制的，水平首屈一指。阁前街灯与青松翠柏相辉映，东边有铁塔，高 8 米，铁塔边有喷水池，9 条青龙与 2 条红鲤鱼喷水不停。4 根浮雕“九龙”的青石柱组成山门，其中 2 根大龙柱各重 28 吨，是目前东南亚一带最大的龙柱。两边用“九龙璧”（又称华安玉）雕成的大石狮守门。门额镌“威镇阁”三个大字，为书法家启功所题。周围有四角亭、四方亭，为休闲游览胜地。

嘉济庙碑与李宓

漳州嘉济庙碑全名《修建嘉济庙圣迹碑记》，是继唐代漳州开元寺威通碑之后的又一名碑。嘉济庙与开元寺两座寺庙是人们已经淡忘的已废古寺庙，而两碑至今尚存，其名声超过两座寺庙，因为其书法艺术高超，被称为无价之宝。

嘉济庙碑是明代后期著名书法家李宓所书，楷法结构工妙，被誉为“铁画银钩”，历来为书法界所重视，常有各地文人墨客慕名前来欣赏。李宓字羲民，龙溪县人，居住万松关下，博学能诗，一生潜心书法艺术，并精于雕刻，不追求名利，自甘布衣。传说，漳州芦柑于明代已大量从海路销往江浙一带，李宓常为柑农包装柑

橘的竹筐书写标记；柑销到松江，筐上标字为大书法家董其昌所赏识，探听到是李宓所写，恨无缘相见。当时有漳州人以重金向董其昌求字，董说："何必舍近求远，你们漳州为柑筐写标记的李宓写得比我好。"传说不尽可信，但李宓的书法为董其昌所赏识是事实。《龙溪县志》记载，董其昌尊崇李宓的书法，自叹不如，曾写信并寄润笔资向李宓求字。由于董其昌对李宓如此推崇，使李宓名声大振。李宓各种字体都写得很好，当时漳州的琳宫梵宇的碑记多出自他的手笔。他晚年续写《黄庭内景经》3000字，填补王羲之《黄庭外景经》之缺，时人有"结体工妙，纤人无纶"，有"如天女散花，繁采丽密，自然飘逸"的赞语。他的缩写小楷《兰亭序》比廖莹中"玉枕小字"更小，尤为精绝，先后为王弱林、岳小琴、黄小松、崇彝等鉴赏家所推崇。其手书并亲自雕刻的《黄亭内景经》石屏后来被漳州知府张西圃购去。李宓在写嘉济庙碑前9年所写《三平大师碑铭》及后来于天启元年（1621年）写的《心经》小石屏，崇祯年间写的《陈祝皇先生救荒功德碑》等，在不同时期都表现出不同手法，可见其功力之深，在书法艺术上堪称一代名家。

李宓不但书法造诣高，还精于雕刻，在他书写的那么多碑文中，有的碑记还是他亲自雕刻的，如上述《黄庭内景经》、《兰亭序》和小石屏一类，真是书刻双绝，堪称瑰宝。漳州人颜继祖在京任吏科都给事中时，常写信请李宓"多制茶盘、石屏，寄人长安"。

嘉济庙碑拓本流传甚广，过去凡是到漳州任官的，几乎都要购一两份该碑拓本，作为珍贵礼物赠送亲友。

嘉济庙在漳州东坂后街（今青年路10号），明万历四十六年（1612年）修建，当时漳州郑重其事，特请乡贤林钎（崇祯年间任东阁大学士，人们称"林阁老"）撰碑文。林钎以高风亮节闻名

于世。

嘉济庙碑高 1.42 米，宽 1.2 米，碑文共 32 行，每行 52 字。这块名贵丰碑，长期严密保护在木栅内，门上扣上一副铜锁，人们可望而不可即，非经地方名望人士许可，是不能随便临拓的。由于郑重保护，虽屡经战乱，而此碑至今完好无缺。

嘉济庙现在成为民居，木栅虽已撤除，而户主不可能常时恭候，远道前来观赏者，常有向隅之叹。

防倭要塞镇海卫

明太祖朱元璋为防御倭寇犯境，于洪武二十年（1381 年）派江夏侯周德兴到福建督办海防，福、兴、泉、漳四府每户三丁抽一为兵，移置卫所于要害处，建城防守。在漳州府沿海设镇海卫，建卫城于南太武山下（今龙海市隆教乡镇海村）。防区北至浯屿，与永宁卫中左所（厦门）接界，南至南澳，与广东方面接界。辖前、后、中、左、右五千户所及陆鳌（今漳浦六鳌）、铜山（今东山）、悬钟（今属诏安）三守御千户所，每所官兵千名左右。配备有巡海哨船，实行屯田制度，精锐者为现操兵，老弱者退为屯田兵，以耕种所得充军费。在明朝前期，制度健全，巡海得力，海域基本宁静。

镇海卫卫城周长近 3000 米，城墙高七八米，宽 4 米多，上加女墙，有垛口 720 个，窝铺 20 个，开东西南北四个城门及一个水门，门上各有楼。南门为正门，有两重城门，内外城门之间称月城。南门外设教场，中有演武亭，亭边有将台。城建在临海的山上，城内有后山、古山、召山、曜山、仓山，统称五星山，合城外的“熬酒桶头”、“土地公”两山，称为“七星落地”。城南的象

鼻山与岐尾山之间为避风良港，称鸿江港，舟楫云集。

城内多井，据说共99口。传说井为江夏侯周德兴所凿，其实是历代多次增凿。镇海卫虽是军事机构，却与县级行政单位一样，设有卫学，其生员与府、县学的生员同样有应乡试（考举人）的资格，出了不少人才，每有一位生员中举，便在卫城中开凿一口井，蔚为风气，解决了居民吃水的困难。著名的井有两口：一叫七星井，口很宽，用一块七孔石板盖住，以防有人掉进井中；一叫柳树井，井栏八角如菱花状，汲水桶的绳索痕迹深入石栏一寸许，可见井水之深及井的历史之久。

明朝后期，政治腐败，卫所军官以有功之将的后代世袭充任，一般兵丁则世袭为兵，形同农奴，士无斗志，以致嘉靖年间倭寇长驱直入于漳州各地。嘉靖年间进士林楷春作《兵防总论》，说漳州海防卫所“久而寝懈，渐已无存，其存者则又苟且虚名，全无实用，其至镇海为饶贼所袭，悬钟为倭奴所残，铜山为海寇所焚毁，楼船战具蔑然一空，弗能自保，乌能保人”。其中所说“镇海为饶贼所袭”，指嘉靖四十年（1561年）闰五月二十日之夜，广东饶平张琏袭破镇海卫城之事。后来，戚继光、俞大猷从浙江率兵入闽，才肃清倭寇及其他海寇的祸患。

清初“迁界”时，镇海卫卫城被毁。康熙二十年（1681年）清朝统一台湾后，重建该城。清朝军制与明朝不同，不设卫、所，镇海驻水兵把总，隶属金门镇右营。

今镇海卫城内全属民居，四城门残存，南门和水门比较完好，尚有城墙数丈。

铜城重建英姿在

铜山守千户所设在东山。东山是古地名，建所城时，以地连铜坑、铜钵，命名为铜山城，因此东山改称铜山。《铜山志》记载：城垣周长571丈，墙堞864垛，高2丈1尺。辟四门，东门名“晨曦”，西门名“思美”，南门名“拱极”，东西南三门都建门楼，独北门封闭，不建楼。嘉靖五年（1526年）巡海道蔡潮议开北门，挖出一块石碑，上镌“遇潮即开”。嘉靖十三年，守城把总陈言增建北门城楼。（《漳州府志》说，西南二门各建城楼，东北临海，二门俱闭塞，嘉靖十年漳浦知县郑禧始议开二门，东门增瓮城，嘉靖二十二年把总陈言创二门楼。）

明亡后，铜山为郑成功抗清基地。清康熙三年（1664年），郑成功已去世两年，郑成功之子郑经退守台湾。福建总督李率泰执行清廷“迁界”命令，毁铜山城及一切房屋，强迫居民内迁。康熙十九年“复界”，副总兵詹六奇重建铜山城。民国5年（1916年）设立东山县，县政府设在铜山城。民国16年，海军驻东山，拆毁城垣一角，将城石移去建码头、道路、防波堤。其余城垣陆续受破坏。1980年和1988年，省、县人民政府拨款修复东隅临海城垣长600米，重建东门城楼。

古嶂山自铜山城西门内延至东门内，形如雄狮，又名狮山，山上可瞭望东城外海域。明嘉靖九年，巡海道蔡潮在山上建朱子祠，名南溟书院，东边有宝智寺、关帝庙，都面向东边海域。宝智寺已废。南溟书院遗址上今建黄道周纪念馆。

关帝庙是明洪武二十年与城同时兴建的，正德三年（1508年）扩建。康熙三年“迁界”，与城同毁，康熙十九年“复界”，与

城同时重建。往台湾的移民带这关帝庙的“香火”往台湾宜兰建庙，再“分香”到台湾各地，建了许多关帝庙，因此，台湾信徒尊东山关帝庙为祖庙，常来朝拜。1995 年，“东山帝君”曾渡海到台湾“行香”半年，受台胞膜拜。

古嶂山上怪石嶙峋，有两处奇石最值得欣赏：

风动石，高 4.37 米，宽 4.4 米，重约 200 吨，底部呈弧形，仅有几寸搁在盘石上，其余悬出，背景是海，显得它如临悬崖，危危欲坠。旧志说它“风至能动”，大概指飓风。人仰卧用脚去推，如果用力处角度恰好，能使它稍微晃动。郑成功据铜山抗清时，曾任明朝巡按御史的路振飞来过此处，在风动石上题刻黄道周、陈士奇、陈瑸三位明朝忠臣姓名，故风动石又名三忠石。石上还有其他名士题刻。

风动石附近有一块长石直立，状如和尚合十行礼，面对东门屿，屿上有蔡潮建的石塔，故称石僧拜塔。

关帝庙、风动石、石僧拜塔、重建的东城城垣和城门楼，与海上渔帆点点，构成一幅靓丽风景图。

陆鳌古城今犹存

陆鳌（今作六鳌）是介于漳浦浮头湾与将军澳之间的半岛，自古为海防要地。元朝在半岛的青山上设青山巡检司，明初洪武二十年（1688 年）青山巡检司移设莆头澳（即将军澳），在青山上改设守御千户所，与铜山（今东山）、悬钟（在今诏安县梅岭镇）同为镇海卫所辖守御千户所之一，各有兵千名左右，都建一座城。陆鳌守御千户所所城绕青山山腰而建，旧志记载，它北面临海为壕，形状好似“巨鳌载岳”，所以命名为陆鳌城，守御千户所也以陆鳌

为名。乾隆《漳州府志》卷二十《兵纪》载："陆鳌所，原额官兵一千二百有奇，万历末年只存旗军四百八十名。"

清朝不再实行卫所军事制度。顺治十八年（1661年）为防郑成功而下令"迁界"，沿海划为"弃土"（俗称界外），陆鳌城被拆毁。但城石仍可利用，康熙十八年（1679年）"复界"后就复建陆鳌城，派兵驻守。后来不再驻兵，成为居民城。

清初"迁界"时，"界外"森林均被烧毁，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现在陆鳌城几乎全为大榕树所荫盖。改革开放后，居民已陆续迁移下山，陆鳌古城成为一座空城。现在已着手开发，利用为旅游胜地。

陆鳌城周长1815米，绕青山山腰一周，依山势地形起伏弯曲，全部用长条花岗岩石砌筑，上加三合土女墙，高5米。全城平而略呈三角形。有南、西南、北三城门及五座水门，东而临海，无门（旧志虽记载"北面临海为壕"，而又载"教场在北门外"，可见北门外不是海，应是东面临海为壕）。南门为正门，进深10米，面宽4米，门外建瓮城，两边各建一座4米见方的碉堡。城内是一座山，山中多巨石，有观察台，有兵营。原有碑刻多座，现只存碑座4个。巨石上有两处石刻，一是五绝诗："嵯峨一片石，独对海中天，大地东南去，群山不敢前。"一为"海天一览"，全刻高1米，宽1.2米，每字0.25米，落款漫漶不可辨。

半岛的末端是虎头山，雄视海面，南来北往的船只尽在眼中。

忠勇祠与剿倭碑

漳浦县盘陀墟南侧有一座"忠勇祠"，祀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在盘陀蔡陂岭剿倭阵亡的将士80多人，并有隆庆元年（1567

年）巡抚谭纶为表彰戚继光指挥蔡陂岭战斗功绩所立的《大都督南塘戚公功德碑》。“忠勇祠”已圮废，“忠勇公”牌位被当地群众移到附近的关帝庙继续崇拜。剿倭碑尚立于原地，高 2.8 米，宽 1 米，额首刻篆字“大都督南塘戚公功德碑”，正文用楷字，下段石面剥落，仅存上部，仍可读识其基本内容。主要段落为“自倭夷煽……天子恻焉，遂用都御史二华谭公为提督，公为总兵，率师经……焉。癸亥冬，倭几二万，复集合攻仙游，仙游之城……公同二华公领将兵直抵于漳……公履……危之功居多，凡此战惟蔡陂岭尤险而奇……”。

据旧《漳浦县志》记载：“嘉靖四十三年二月，倭入八都汤坑蔡陂，总兵戚继光攻之，斩首数百级，官兵死者八十余人，立忠勇祠祀之。”

戚继光字元敬，号南塘，山东蓬莱人，是一个文武全才，嘉靖二十九年十七岁袭职登州卫指挥佥事，嘉靖三十四年调任浙东参将，驻台州。当时浙东屡受倭寇侵犯，戚继光感到原来官军腐败难以御敌，乃招募义乌人组成新军，加以严格训练，被称为“戚家新兵”，屡次打败倭寇，声威大震。倭寇在浙东受打击，转犯福建，嘉靖四十一年，倭寇连犯长乐、连江、福清，继续南犯，到处杀人放火抢劫。浙江总督胡宗宪令戚继光率领其新兵八千人进入福建，先消灭了盘踞横屿的倭寇，然后打败占领福清的倭寇，收复牛田岛，斩杀倭寇一千多人。戚继光回军浙东后，又有新的倭寇数万人来犯福建，攻占兴化府城和平海卫城，八闽震动，朝廷震惊，嘉靖四十二年，特派谭纶为巡抚都御史，率领俞大猷、戚继光二总兵入闽剿倭，收复了兴化府城及平海卫城，解除了倭寇对仙游县城的包围，追击倭寇南下至漳州，时嘉靖四十三年年初。倭寇分两路南下广东，一路从平和，一路从漳浦。俞大猷负责追击取道平和的倭寇，戚继光负责追击取道漳浦的倭寇。倭寇不敢

侵入漳浦县城，逃窜至盘陀蔡陂岭，见地势利于盘踞，便在蔗林中设下埋伏，企图负隅顽抗。二月十六日，官军前阵在蔡陂岭受到伏击，稍有退却。戚继光即斩杀几名临阵退却的士兵，命令全体将士将蔡陂岭团团围住，然后放火烧蔗林。全体将士对倭寇进行围攻，斩获首级数百，烧死倭寇无数。残寇向潮州溃逃。后来，两路倭寇逃到广东海丰，被戚继光和俞大猷合力歼灭。

蔡陂岭之役，官军阵亡80多人，收埋于盘陀，建立集体坟，坟堆高2米，直径8米，光圆如和尚头，俗称和尚墓。戚继光与巡海道周贤宣在盘陀墟口建立一座忠勇祠，祀剿倭阵亡将士（俗称忠勇公）。隆庆元年（1567年），福建巡抚谭纶立“大都督南塘戚公功德碑”于祠内。漳浦县官每年春秋两次宰猪羊各一头致祭。祭文曰：“维神捐躯报国，血战疆场，鱼门落雁，马革名扬，丹心贯日，浩气凌霜，雄垂奕代，卫此一方，惟兹仲春（秋），谨以牲帛香楮，用申奠献，尚飨。”清代两次修建祠宇，今祠圮而碑存，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宋城”赵家堡

漳浦县湖西乡在相距五华里之间有赵家城、诒安城和新城，俗称“五里三城”。其中，赵家城被称为“宋城”，为宋闽冲郡王赵若和第十代裔孙赵范首建，后由赵范之子赵义扩建，是具防卫功能的园林式民居，赵氏聚族而居。

赵若和是宋朝皇族人迁福建的一支。宋朝皇族南迁是应对金兵南逼所采取的措施。宋朝对皇族事务专设“宗正司”管理。景祐二年（1036年）置“大宗正司”于东京（开封），崇宁二年（1104年）增置“南外宗正司”于南京（河南商丘）、“西外宗正司”于

西京（洛阳）。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陷东京，居“大宗正司”的皇族被杀甚多，而分居于南、西二“外宗正司”的皇族幸免于难。南宋，移“大宗正司”于江宁（今南京），后又移至泉州；移“南外宗正司”于镇江；移“西外宗正司”于泰州及高邮，后又移至福州。自从“大宗正司”移泉州，“西外宗正司”移福州后，在福建传下很多赵宋皇族后裔。

宋太祖之弟魏王光美第七代孙赵彦卿，是北宋末年的学士，在“靖康之变”后迁移入闽，居福州凤凰桥。子赛夫（魏王八世孙）为武节郎。赛夫生时晞、时曦、时暌（九世孙）。时晞封宣亭侯，于赵若和（魏王十世孙）。

德祐元年（1275年）元兵占领南宋都城杭州，谢太皇太后（已故度宗皇帝的母亲）投降，小皇帝赵㬎（恭帝）与母全太后被挟北去。翌年，大臣们集合福州，拥立杨淑妃所生皇子赵昰为帝，尊杨淑妃为太后。为笼络在闽皇族，封赵若和为闽冲郡王。时若和方在冲龄，随小朝廷播迁南下。赵昰病逝于广东碙洲，大臣拥立俞修容所生皇子赵昺为帝，仍由杨太后垂帘听政。在崖山决战失败，杨太后投海前，命侍臣黄材及宣慰使许达甫砍断原来钉连着各船的铁链，率十六船护卫赵若和突围而出，欲到福州图谋恢复。船遇飓风，大部分覆没，只剩下四艘，来到浯屿海面，又丢失了杠具，只得在浦东（今龙海市港尾镇辖内）登陆，居银坑。黄侍臣化名清老，以“遇海难的商人”入籍，赵若和隐姓埋名，以黄氏子隐匿黄侍臣户内。后为避元兵追缉，赵若和迁居佛昙积美，仍冒姓为黄。至明初洪武年间，赵若和后裔才经御史朱鉴奏准复姓为赵。隆庆五年，赵若和的十世孙赵范中进士，历任无为州、磁州知州、户部郎中、浙江按察副使等职，归休后，迁居官塘（今湖西），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择址硕高山建完璧楼，万历三十三年建石堡将楼围住，又经20年建设，在堡外建四座五进并列

的大厝（俗称官厅），后面建二层楼住内眷，并建史堂、惠堂、志堂、忠堂四座祠堂。后赵范之子赵义（南京太学生，曾任中书舍人）于万历四十七年续建外城，将上述建筑物全围在城内。又经精心布置，成为一座具防御功能，并有读书处“辑卿小院”、武庙、佛庵（含石塔）、“松竹村”花园、鱼池、汴派桥、凉亭的园林式小城。实测面积，完璧楼三层，周长 80 米；内堡墙高 6.2 米，周长 700 米，占地 4000 平方米。外城墙高 6.3 米，宽 2.4 米，周长 1073 米，占地 9 万多平方米，开东、西、南三门，颇为壮观，是现今保存较好的明代仿宋园林建筑。

南靖太监墓

南靖有一座陈太监墓，民间传说将它说成是宋仁宗时“狸猫换太子”故事中的太监陈琳之墓。其实，南靖陈太监名祖生，是明朝人。但确实经历过类似“狸猫换太子”的事。由于“狸猫换太子”故事编成戏剧，时常演出，为群众所熟知，所以有这个附会。而实际上宋朝“狸猫换太子”故事是虚构的，明朝陈太监之事则于史有据。此事发生于成化年间（1465～1487 年）。《明史》记载：成化皇帝（明宪宗朱见深）的妃子纪妃生下一个儿子，那时万贵妃得宠，吴皇后被废，在西宫内院过着寂寞的生活。万贵妃一心想当皇后，怕纪妃为皇帝生了惟一的儿子，有与她争夺后位的可能，就算是纪妃没有被封为皇后，那个皇子以后也必将继承皇位，这个皇子的诞生对万贵妃极为不利。万贵妃梦想自己为皇帝生下一个儿子，日后继承皇位，自己当太后，因面暗中指使监门太监张敏将纪妃生的皇子溺死，不让皇帝知道纪妃生子之事。张敏大惊，他想，皇上年纪大了，正愁膝下无子，万万不可将这个

龙种溺死，而又不敢得罪万贵妃，就找当内宫太监的闽南同乡陈祖生商量（张敏是同安人）。两人同谋将皇子秘密隐藏，而向万贵妃谎报已溺死。两人并向被打入冷宫的吴皇后报告情况。吴皇后和纪妃秘密将皇子养育在西宫内院，张、陈二太监暗中照顾，输送所需物件。成化十一年（1475年）的一天，皇帝召张敏替他梳头。皇帝照镜，看到自己头发已部分斑白，感叹道："我快老了，可还是没有一个儿子啊！"张敏即抓住时机，跪下奏道："奴才该死，还没有奏报皇上知道，恭贺皇上已经有了龙儿。"皇帝半信半疑，问道："可真有此事，皇子在哪里？"皇帝的贴身太监怀恩跪下奏道："皇子是纪妃生的，抚养在西宫内院，已经六岁了，只是暂时还不敢向皇上奏明。"皇帝大喜，即派了几个太监到西宫内院接皇子。纪妃悲喜交集，对儿子说："孩儿去吧，你能见到父亲了，那个穿黄袍留长须的便是你的父亲。"就将红袍给孩子穿上，扶上小轿。接皇子的太监们簇拥着孩子来到皇帝身边，扶下轿。孩子见到面前果真是一个身穿黄袍留长须的人，就投入他怀中。皇帝抱孩子坐在膝上，看了又看，伤心而又高兴地说："真像我，确实是我的儿子！"就令怀恩到内阁，宣布找到皇子的消息，惊动了朝廷上的臣子们，都来向皇帝道贺，并即办好诏书，颁布天下。皇帝令将纪妃移居永寿宫，给予优惠待遇，数次召见。但皇帝对万贵妃的宠爱不减。六月间，纪妃突然死了，太监与宫女们有怀疑是万贵妃毒死的，有怀疑是被迫自缢的，而皇帝不加追究。张敏深恐自己也会遭受暗算，便吞金自尽。万贵妃不知道陈祖生同谋养育皇子，所以祖生无事，后来告老还乡。乾隆《漳州府志》根据旧志，将此事记载于卷四十九《遗纪》中篇。

陈祖生是南靖县习贤里人，死后葬在（今龙山镇双明村）竹员山北坡。墓埕有石翁仲、石马、石猪、石狗各一对，无墓碑。现存碑记一方，镌"皇帝遣布政司右参政魏瀚祭于南京守备司礼监

太监陈祖生母柯氏惟尔贤淑闺范”。有碑亭，群众称为太监亭。

角美林氏义庄

永泽堂林氏义庄址在龙溪二十九都白石保（今龙海市角美镇）过井社，是角美莆山社（今莆美村）人林颜顺（字安邦，号有成，又号平侯，人们都不直呼他的名讳而称林平侯）在台湾开发土地和经商致富后回家乡所创办、子孙四代续办的赈济机构。

林平侯的父亲林逊伍（字应寅，号敦厚）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入台，居淡水（台北）兴直保新庄，设馆教书，放假时回故乡居住。林平侯子乾隆六十年出生于角美，于嘉庆十六年（1811年）16岁时往台湾省父，受雇为米商郑谷的伙计，诚实勤劳，且很会写信算账，受郑谷信任。后来，林平侯向郑谷借钱，自己经营“捷成”米行，在积累了资本后，与竹堑（今新竹）人林绍贤合办全台盐务，又购置机帆船，在台湾与北方各港之间往来贩运货物，获利数十万。嘉庆二十年，林平侯40岁，向朝廷纳粟，授府同知，曾代理柳州知府。不久，辞职回台湾。嘉庆二十二年迁居大科崁（今桃园大溪镇），兴修水利，开发土地，成为大地主，每年可收入稻谷数万石。又再开垦淡水荒地，开一条道路经三貂岭通噶玛兰（今宜兰），继续开发土地。

林平侯致富以后，不忘祖地，于道光元年（1821年）开始在角美故乡创办义庄。据义庄碑记：林平侯“在淡水海山堡水田四十三甲八分四厘二毫（按：一甲合十一亩三分多）充为原籍本族义田，年收佃租，除完耕谷外，年实收谷一千六百石，按年寄回内地龙溪县白石堡吉上村、潭头村，赡给同宗族人贫乏之用。延请族诚实公正两人经理其事”。义庄每年为莆山（莆美）林氏族亲

贫困户供应大米、棉布，规定：男的每人棉布3丈（10米），未成年人减半，女的发给棉花3斤（1.5公斤），叫她们自己纺织。贫困户娶妻，助银200两，嫁女助银10两。

林平侯有子五人，其中第三子国华、第四子国芳于咸丰三年（1853年）迁居板桥，成为台北地区漳州移民的领袖，号“林本源”。咸丰五年，林国芳率领漳州移民兴建板桥城。国华则接替了老父的家务，继续垦拓荒地，使“林本源”的田产继续增加，每年可收入租谷10万石。他继承父亲遗志，续办故乡义庄。

国华的次子维源（字时甫），将“林本源”的家业扩展到顶峰。光绪十一年（1885年）台湾改为行省，分为台北、台湾、台南等府，林维源捐献巨款资助兴建台北府城，筹建省城（因割让日本，未成），支援基隆抗法战争，朝廷授予太仆少卿，为台湾垦务兼团练大臣，帮办抚垦局。清廷于甲午战败，割让台湾予日本，台湾军民以“台湾民主国”名义抗日，推举林维源为“议院院长”，他推辞不就，捐银100万两资助抗日，随即携眷回厦门，至光绪三十一年病逝，葬子角美莆山故里。他是第三代林氏义庄庄主。

林维源之子林尔嘉，字叔臧，又作菽庄，光绪二十一年随父离开台湾回厦门。不久，清廷委以“道员”官职，调入朝廷，光绪三十一年出任厦门保商局总办兼商务总会总理。清廷筹建海军，林尔嘉捐献巨款，升为侍郎。可是，筹建海军的经费被慈禧太后移作修建颐和园之用。光绪三十四年，南靖水灾，林尔嘉向海外募银3万两修堤筑坝。民国2年（1913年），他在鼓浪屿营建菽庄花园，创办菽庄吟社。他是第四代林氏义庄庄主，每年由台湾运来的赈济米谷，须先返到厦门经他检验，然后运交角美义庄分发，直至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两岸隔绝，义庄才停办。抗战胜利，台湾光复。此时，林尔嘉虽已年迈，但还是回台湾再住进父亲创建的板桥林家花园，以了夙愿，于1951年逝世。

林氏义庄持续办理赈济116年，是闽台关系史上一段佳话。今房舍尚存，很多人慕名前往参观。那是三座并列的两进大厝，前面铺砖埕，后面建两层长楼，每座大厝两边各有一排对向的“护厝”。外面原来还有墙，已坍。林氏义庄是传统的闽南富裕之家“楼仔抱大厝”格式。

屿仔尾南炮台

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闽浙总督邓廷桢为配合林则徐在广东的禁烟运动，在福建建设海防，与厦门岛隔海相望的海澄县(今龙海市)港尾镇屿仔尾是他选择建设炮台的要塞之一。屿仔尾炮台俗称南炮台，配备古式铁炮数门。当年六月爆发鸦片战争，侵华英军统帅义律率兵舰四十多艘进犯广东不逞，转面侵犯厦门，屿仔尾炮台配合北边的厦门胡里山炮台予以迎头痛击，迫使英舰仓皇逃遁。

光绪十七年（1891年），厦门胡里山与屿仔尾两炮台同时扩建。屿仔尾炮城用三合土（砂、礓、灰，加上糯米浆和红糖汁搅拌精炼夯实）筑墙，周长240米，高4.5米，厚1.5米，上加女墙垛口。城内有堡垒、兵舍、练兵场、弹药库、战壕等。炮垒上安装一门280毫米口径的海岸炮，命名“克虏伯”，与胡里山炮台一样，是以600万两白银向德国兵工厂购进的。炮身长近14米，重59888公斤。炮弹每颗重40~50公斤，得用机械吊送。射程6公里，在当时是较先进的武器。另配备15毫米口径的副炮3门，可用手工操作，比较灵活方便，但射程较短，威力较小。

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侵华步伐，强占我国东北，进逼华北，并以台湾为基地，威胁福建，我国军民抗日情绪

高涨。民国25年（1936年）11月5日，厦门海军要塞司令部部署胡里山、屿仔尾、白石头（在胡里山东侧）三炮台演习试炮，以帆船一艘停泊于大担岛附近海面作为目标，令三炮台各试射4发，命中率屿仔尾炮台最高。

民国26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东南沿海战云密布，日舰时时觊觎金、厦等岛。9月3日凌晨4时，日军第三舰队“羽风”、“若竹”等三艘驱逐舰突然高速驶进大担岛灯塔前，列成阵势，进行火力侦察，首先向厦门白石头炮台和曾厝垵海军机场发炮轰击，并即猛攻胡里山主炮台，火力密集迅猛，压得胡里山和白石头两炮台无力还击。屿仔尾炮台瞭望长观察到情况，即向主台官何荣魁报告。何荣魁即下令开炮，一弹击中日舰“若竹”号右舷，续发两炮，一弹击中“若竹”号船头，使其失去战斗力。日舰炮火稍一停顿，胡里山、白石头两炮台立即开炮还击日舰。双方炮战半小时多，日舰见势不妙，由二舰夹着受伤的“若竹”号向台湾方向仓皇逃去。停泊在青屿山鱼雷台后面的日军巡洋舰上飞起3架飞机，掩护3舰退却。而“若竹”号因受伤很重，沉没在青屿以北海域。至10时许，厦门海域的日舰全部撤离。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日舰只游弋在大担岛外海域，仅以远距离盲目射击，虚张声势，不敢进入厦门和屿仔尾大炮射程内海域。

但日本侵略者视厦门为福建门户，不惜以重大代价攫取之。厦门于民国27年（1938年）5月13日沦陷，胡里山、白石头两个炮台为日军所据。屿仔尾炮台继续战斗。日军以5艘战舰，用密集的炮火轰击厦门对岸嵩屿守军阵地，同时以20多艘战舰，在6架飞机掩护下，向屿仔尾炮台猛攻。屿仔尾炮台官兵奋勇抵抗，猛烈还击，使敌舰屡受重创。战斗至翌日凌晨零时45分，日军强行登陆。屿仔尾炮台官兵奉命忍痛炸毁大炮，撤离炮台。日军对炮台再作彻底破坏，将余物劫掠一空，然后撤离。

现在，屿仔尾炮台遗迹以文物保护单位加以修建，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展出。

漳州到处有土楼

漳州各地，不论沿海、山区，到处可见既高又大的土楼，多数在门额石匾上镌楼名，又刻记建筑年代。现尚存门额刻记，可确定其建筑时间的是明嘉靖三十七年（1552年）建成的漳浦县绥安镇马坑村一德楼。嘉靖年间是漳州各地民间建筑城堡和土楼的第一个高峰期，因为那时倭寇猖獗，无城堡和土楼就不能自卫。顾炎武所著《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九十二《福建》第三部分《漳州府》的《兵防》篇说："漳州土堡，旧时尚少，惟巡检司及人烟凑集处有土城，嘉靖辛酉年以来，寇贼生发，民间围筑土城、土楼日众，沿海地方尤多。"由于清初"迁界"，沿海划在"界外"，建筑物全毁，所以沿海明代所建城堡及土楼全部无存，现在沿海所能看到的城堡都是清代重建或新建的，土楼都是清代所建。有人以为沿海明代无土楼，是一种错觉。

有人将土楼叫做生土楼，其实，土楼的墙虽然以红壤生土为主要材料，而重要的是必须加上细沙、石灰（或壳灰），用熟糯米浆加红糖汁搅和，经过反复研舂、碾压、夯打而成，称"三合土"，坚如花岗岩而又有花岗岩所缺乏的韧性。墙上安装木屋架，上盖瓦片，由于环拱板筑结构严密，历经数百年风雨侵蚀和地震摧撼，楼墙不损。有的还设有环楼水槽，可预防火灾。一般每楼只开一个大门，门板选用最坚实的，火烧不着，枪打不透。楼内有水井，只要粮食准备充足，可经受长时间围攻。嘉靖年间倭寇猖獗，不少地方遭蹂躏，有楼堡的，多能保全。

建楼由族长主持，动用全村人力财力，历经数年以至十多年才能完成。个别土楼由巨富一人独资兴建。土楼形式多种多样，明代多方形，清代多圆形，又有在方楼与圆楼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几种楼式，总的可归纳为下列几种类型：

方形楼，俗称四角楼，如南靖县最大的土楼马山“云峰楼”，建于明万历年间（1573～1619年），占地30亩，三层，建筑面积16573平方米，可住数百户。底层开设布庄、五谷行、食品店、药店，庭院作墟场。漳浦赵家城“完璧楼”建在城堡内（先建楼后围城），隆庆进士赵范归休后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独资兴建，三层，周长88米，高13.6米，占地100平方米，底层分十间，第二层九间，第三层不分间，层层有枪口箭眼。

圆形楼，如华安县最大的土楼仙都“二宜楼”，经12年建设，于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落成。外围直径100米，占地约6600多平方米，四层，隔成12单元，共有28厅192间房。底层中央为广场，左右两边各有一口井。清末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火灾烧掉木结构，华侨12人集资重建。平和县最大的土楼芦溪“丰作厥宁楼”，直径77米，占地4000多平方米，四层，高15米，房间一致围绕中央大厅。云霄县和平乡“树滋楼”，经18年建设，于乾隆五十四年落成，底层用条石砌筑，二三层用三合土夯成，总高10米余。每层有前后厅2间，房24间。

内外多圈楼，如诏安山区客家人聚居地官陂乡“在田楼”，外楼圈内楼，外楼外还有一圈平屋，整体直径100米，是官陂乡180座土楼中最大的一座。漳浦县滨海深土镇“锦江楼”，有内、中、外三圈，内圈为经商致富的林升泽于乾隆五十六年所建，中圈为林升泽死后其妻于嘉庆八年续建，外圈为子孙所续建。内圈三层，分12间，中圈二层，分28间，外圈一层，分36间。内圈、中圈顶部都有瞭望台。又灶山上东平村，整座村庄由五圈房屋构成，中

心是圆楼，外围四圈，布局如“八卦阵”，被称为八卦堡。华安县高车乡一个海拔920米的小山顶，也有一座内外两圈的圆楼，内圈居于制高点，只二层，而高过三层的外圈。内圈分18间，每间为独立的单元，各有楼梯，外圈顺应山势建筑，起落有致，四周临谷，显得格外突兀严峻，远看好似一把撑开的雨伞，被称为“雨伞楼”。平和县芦溪乡建于康熙五十九年的厥宁楼有四圈，直径77米。中间两圈一层，第三圈三层，第四圈四层，高19米。全楼分成56个单元，每单元四进。四圈圆楼之外加一圈与三层等高的“楼包”。

月眉形楼。清康熙年间一等海澄公黄梧在他故乡平和县小岭（今名乾岭，属国强乡）所建的“胥岭藩垣楼”依地势而建，形如月眉。

八角楼。南靖县龙山甘棠村“崇兴楼”，建于清嘉庆十九年（1814年），面积841平方米，八角形，二层，每层24间。有大门和侧门。

卍字形楼。漳浦县有两座，一是旧镇石桥村“清晏楼”，乾隆二十一年潘姓海商所建。主体长方形，四角加一个半圆形碉堡，突出于主体之外，状如卍字。楼墙底层用条石精砌，二三层用三合土夯筑。南北宽34米，东西深30米。前后各隔成五个开间，左右各隔成二开间，西边明厅为公厅，有楼梯；东边明厅作门，有楼梯。另一座卍字形楼名“永清堡”，二层，正方形，深宽各41米，四角各突出半圆形碉堡。四面各隔为六开间。楼西面为公厅，东面明间作门，有楼梯。该楼在梁山北麓下布村（今属大南坂农场下楼作业区），西边为乾隆朝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蔡新府第，南边为蔡新花园，该楼为蔡新族人出资兴建，楼门石额镌楼名“永清堡”，旁署“乾隆己丑腊月吉旦建”。

“一都”金溪山银矿

乌山支脉金溪山，在诏安县城西北30公里处，今红星乡辖内，有许多石洞，统称六洞。有银矿，明代前期已开采，当时那地方属漳浦县第一都，所以最早的福建省志，成化年间（1465～1487年）出版的《八闽通志》卷二四《食货志》记载：“银坑在漳浦县一都金溪山。”经多年开采，正德二年（1507年）漳浦知县胥文相据民反映，以银坑矿产已减少，而课税反而加重，特地前往踏勘，作《踏银坑》诗：“南坑已历又经蹊，父老近前指我迷，此日金漳非乐土，当年银坑已陈泥，征徭半减民还病，杭稌重登妻尚啼，顾我才疏仍政拙，闾阎何日饱蒸藜。”旧《漳浦县志》为胥文相立传，说“金溪山有矿，岁久脉微，采取不充，额重为民病，文相奏罢之”。就是说，正德初年（1506年）已罢金溪山银矿不设。自嘉靖九年（1530年）起划漳浦县的一至五都设诏安县。金溪山银矿还有许多遗事，漳浦县志就没有记载。明末顾炎武作《天下郡国利病书》引据其他地方志，说金溪山银矿在“堙塞已久”之后，“万历年间奉勘合开采，陵谷为墟，商贾杂沓，豪民假虎，鸱张更甚，二都之民岌岌更变，幸有旨停革，民乃安堵，今洞已封闭，仍以南诏所千户一员更番守之，然盗矿如故，异日开采薮聚，能无绿林之啸哉！”

这则资料不但使人得知金溪山银矿由盛转衰的曲折过程，而且明白“一都”地域在何处。因为清代《漳州府志》、《诏安县志》在记述诏安设县的区域时，都说“嘉靖九年划漳浦县的二、三、四、五都设置诏安县”，因而使现在一些史志工作者怀疑康熙《漳浦县志》记载“划一二都、三都、四都、五都设置诏安县”是否

多了一个“一”字。明代早期出版的《八闽通志》既然记载“银坑在漳浦县一都金溪山”，而明末清初才成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则说万历年间金溪山银矿在多年堙塞之后重新开采，秩序混乱，“二都之民岌岌更变”，可知明代后期一都、二都界限不很清楚，因而两个都地域合称“一二都”，康熙《漳浦县志》有“一二都”的说法，如《龙溪县志》称分设海澄县的治所在“八九都”一样。

轶事逸闻



白云岩与朱熹故事

白云岩在漳州城南10公里处(今龙海市颜厝镇丹庄村边),是风景清幽的游览胜地,有桐荫漏月、晚浦归帆、何有石、洗砚池、卓锡泉等十景。有黄道周手书“白云深处”大匾。

《漳州府志》记载:南宋理学家朱熹知漳州时,曾游览白云岩,手书“与造物游”四字。又载有联云:“地位清高,日月每从肩上过;门庭开豁,江山常在掌中看。”无确指此联为朱熹所题。《府志》所载朱熹与白云岩的关系只有这些。由于朱熹以注解《四书》著名,漳州民间产生朱熹选择在幽静的白云岩从事注解《四书》工作,并在那里建一座讲解理学经典的“紫阳书院”的故事;并传说,那书院用“使飞瓦”方法建成。朱熹身为一州长官,政务繁忙,还定期于每旬的二日和六日,分别与学官同到州学和龙溪县学讲学,又曾挤出时间到白云岩讲解过《诚意篇》,这已十分难得;但说他在白云岩注解《四书》,并建一座“紫阳书院”,经常在那里讲学,这不切合实际。《府志》并没有记载朱熹在漳州建紫阳书院之事。事实是,明代漳州乡绅为纪念朱熹,将白云岩前落辟为紫阳书院,并在前面建一座“百草亭”,亭中立一道“紫阳夫子讲经处”石碑。黄道周曾在那里讲学,称为“榕坛”,他在那里编写的讲义称“榕坛问业”。

民间传说简直将朱熹说成术士,这与朱熹的理学家形象大相径庭。理学虽然是唯心论,却是反对滥信鬼神和法术的。传说白云岩溪间的“无尾螺”和“红壳虾”是朱熹煮熟吃过,将壳放回溪涧,叫它再活而传衍下来的。这故事与“断蛙池”故事同样流传,说漳州衙署附近有一口丽藻池,每夜蛙声喧闹,打扰朱熹的

注书工作，朱熹乃剪纸为枷焚化，众蛙便皆被枷住颈项，不能发声，因此丽藻池改名断蛙池。朱熹如果在世，听到这故事定将哭笑皆非。

“朱文公使飞瓦”故事倒不是说朱熹有法术能使瓦片飞上白云岩让他盖书院，而是说他运用了谋术。故事说：朱熹前往白云岩，路过东新桥（今名新桥，为钢筋水泥公路桥，在宋代是一座木桥），见它年久失修，当时端午节临近，心想，这里即将举行龙舟竞赛，到时一定有很多人站在桥上观看，桥可能有倒塌的危险。为避免群众死伤，他叫差役逐户宣谕：“五月五日，朱大人要在白云岩使飞瓦，欢迎群众观看。”人们为好奇心所驱使，大都放弃观看龙舟竞渡的机会，纷纷跑去看朱大人用何种法术能使瓦片飞起来。人们来到白云岩山下，只见几个衙役在那里看管一大堆瓦片，告诉大家，每人顺便带一片瓦上山。那一大堆瓦片便都被带到山上去了。大家在那里等着朱大人使飞瓦，忽然有一个差役来报告：“东新桥倒塌，死伤不少！”朱熹对众人说：“我就是怕东新桥倒塌，请大家来这里避难，并顺便帮我将瓦片带到山上来，让我完成建一座书院的计划。现在，大家赶快到出事地点帮忙处理后事吧！”

这故事是虚构的，却有人信以为真。

高东溪“获鹿感鱼”

高登，字彦先，号东溪，是南宋以来为漳州人所景仰的人物。南宋时漳州已经有高东溪祠堂，元代坍废，明代在漳浦重建，都是官方斥资兴建的。高东溪祠堂楹联“获鹿感鱼千秋称孝子；朋东仇桧万古识忠臣”，是南宋理学家朱熹手书。这楹联概括了高东溪“忠孝两全”的事迹。

应该说，高东溪的高尚品德第一是“忠”，第二才是“孝”，而且“忠”是史实，“孝”夹杂传说成分。《宋史》为高东溪立传，《漳州府志》、《漳浦县志》都采自《宋史》，将高东溪的孝行写在末尾，只说“登少事母至孝，尝舟行，阻风封、康间，方念乏晨馔，忽有白鱼跃入。母病思食鹿肉，夜有虎衔鹿置门去。”说详细一些：高东溪于南宋绍兴二年中进士，派往广西任富川县主簿。他带母亲去上任，当乘船从广东封州（今封开县）往康州（今德庆县）时，途中为风所阻不能前进，正苦于早餐没有菜肴给母亲下饭，忽然有一条白鱼跳入船中，解决了佐餐问题。高东溪未出仕时家居，一次母亲患病，想吃鹿肉，夜间有老虎衔一只鹿丢在他家门口。后来经过群众“集体创作”，敷衍成两则有趣的故事。

获鹿

高母病中想吃鹿肉，高东溪无钱可买，一夜苦闷，不能入眠。天麻亮时，忽听一声虎啸，然后有小鹿鸣声，他一开门，便有一只小鹿跳进屋中，直到高母病榻前，高母问：“清晨哪来的小鹿？”东溪答：“想是老虎衔来送给母亲补养身体的。”高母说：“这样乖巧的小鹿，我怎忍心吃它的肉，还是养起来吧。”高东溪遵母命驯养那小鹿。小鹿十分机警，高东溪要买什么东西，只要写一便条，开列品名和数量，连同价款放进一只篮子里，挂在小鹿项上，小鹿跑到市上，商家知道是老主顾的家鹿，便收下价款，将物件如数放进篮里，让小鹿带回家。漳浦县城西街与县前街衔接处有地名鹿市头，相传就是小鹿购物处。

老虎将一头小鹿丢在高东溪门前，这种事并非不可能，但虎牙十分锋利，衔过的小鹿必死无疑。何况高东溪是九都（杜浔）宅兜人，距漳浦县城有 30 多公里之遥，沿途荒山野岭，猛兽弱肉强食，一头小鹿跑到县城买东西是不可能的。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更不会放过这个好猎物，至于它颈上挂着的篮子里有多少财物，与

小鹿本身的价值相比，倒显得不重要。宋代漳浦确实有很多野生的鹿，后来绝迹，完全由于人类的捕猎之故。“鹿市头”这地名，按字义分析，应是买卖野鹿或鹿肉的“市头”。

感鱼

按传记，高东溪在航途中遇到一条白鱼跳进船中，这种事并不奇怪。民间传说则很离奇，说高东溪于任松江知府时，感到松江鲈鱼之鲜美名闻天下，为使母亲在家乡也能享受松江这种特产，将标明“高东溪奉母鱼”的字条装进小竹筒，用蜡密封，系在一条鲈鱼身上，放进松江，那条鱼为高东溪的孝心所感动，自动从海路游到漳浦杜浔港。渔民捕到那条鱼，见到字条，将鱼送到高母手中。高母感激那条有理性自愿献身的鱼，不忍吃它，将它放生，在杜浔港繁殖鱼苗。从此，漳州一带海域、江上才有与松江同样的双鳍鲈鱼（江东桥鲈鱼有同样传说）。

一条鲈鱼有意识地从松江独自游到杜浔港，让渔民捕去送给高母，这种事也是不可能的，而松江鲈鱼成群洄游到漳州一带海域和江上索饵产卵，则是自然现象，不能说漳州一带鲈鱼都是一条母鱼繁殖的吧。何况，宋代没有松江府（元代至元十五年才改华亭府为松江府，治所在今上海市松江县，明清因之），高东溪自然无从任松江知府，他的最高官职是广西古县县令，因为得罪奸相秦桧，便被撤职，受编管，病死于容州。

高东溪“朋东仇桧”

高东溪“朋东仇桧”完全是史实。

宣和年间（1119～1125 年）宋朝处在金兵威逼下。高东溪与镇江人陈东（字少阳）、抚州人欧阳澈等同为太学生，都屡次上书

徽宗皇帝，请诛主张纳款割地求和的权臣蔡京等“六贼”以谢国人。1126 年徽宗退为“太上皇”，于金兵犯京阙时出走。他的儿子钦宗接帝位，改元靖康，一度用主战派李纲为相，积极备战，但仅 70 天就将其罢官，割地对金求和。陈东、欧阳澈、高东溪等率太学生及京城居民几万人伏阙上书，要求恢复李纲兵权，坚决抗战，险为开封知府王时雍所杀。北宋亡，高东溪还乡。康王赵构重建南宋政权于南京（今河南商丘），登上帝位，是为高宗。他召陈东、欧阳澈入京任职。陈东与欧阳澈上书痛斥主和派黄潜善、汪伯彦，主张备战。但高宗只想偏安，将陈东、欧阳澈杀害，而过后又予平反、赠官。高东溪作长诗《陈少阳赠官》，叙述其经过。

后高东溪于绍兴二年（1132 年）考中进士，授广西富川县主簿，任满，照例赴京审察（那时京城设在杭州）。他上疏万言，并献时议六篇，即《蔽主》上下二篇，《害民》上下二篇，《误国》上下二篇，不指名地痛斥廷臣蒙上欺下，误国害民的行为。丞相秦桧感到这些时议是在讽刺他，但又没有理由不照例将他升官一级，就将他派到边远的广西静江府任古县知县。古县有一个武断乡里的土豪秦琥，县里的吏胥都是他的爪牙。他见高东溪到任，便极力阿谀奉承。不久，高东溪发现秦琥侵用办学经费，当面指责，秦琥不服，发生争执。高东溪将事呈报上级，秦琥愤怒致病，不久死去，县人拍手称快。静江知府胡舜陟令高东溪为秦桧建立生祠，高东溪说：“秦桧为相无状，不能为他建祠！”胡舜陟大怒，未经报准就调荔浦县丞康宁来代高东溪的职务。高东溪母亲正患病，也就提出辞职。胡舜陟还不罢休，捏造事实，诬告高东溪擅杀秦琥，报准将高东溪逮捕。那时高东溪奉母回乡，途中母亲死在船上，他草草将母亲遗体暂埋于途次，便从海路前往京城杭州，上疏向朝廷请求准他“纳官赎罪”，让他归葬母亲。有一个在朝廷任官的旧友告诉他：“丞相说过，他曾在太学认识你，你只要去向丞相求情，

便能解决问题，上疏是没有用的。”高东溪说：“我只知道君父而已。”不愿去向秦桧求情。因此，朝廷没有批准高东溪的请求，仍令他回静江府入狱，听候审判。高东溪回家葬母事毕，自己往静江府投到，而胡舜陟先已犯案死于监狱，高东溪案件无人追究，不了了之。他回家途经广州，被留下暂代归善知县。至秋天，委他主持潮阳县考试，他摘经史要语命题，论“直言不闻深可畏”策“闽浙水灾所由”，属意时事。那时，原丞相赵鼎被贬谪居潮州，对高东溪大为赞赏，与他谈论甚为投机。潮州知州李广文将这情况报告秦桧，秦桧大怒，旧案重提，下令将高东溪编管于广西容州。那时高东溪已回到漳州，福建路长官奉令派谢大作持逮捕令到漳州，将逮捕令给高东溪看过。高东溪就要随谢大作去投到，谢大作很同情高东溪，说“你回去告知家人，再走也不要紧。”当夜，一个巡检带领一百多名兵持刀来抓高东溪，谢大作训斥那巡检道：“逮捕令在我手里，何须你劳军动众！”他斥退那巡检，亲自护送高东溪往容州投到。

高东溪受编管于容州，很多人慕名而来，向他求学。他就在那里讲学授徒，从学者一百多人。他十分关心国事，听到军事上有小失便颦蹙忧愁，听到大失便放声痛哭。绍兴十八年（1148年）病逝，临终遗嘱尽谈国事，言不及私。他的儿子高扶从容州运棺将其归葬于漳浦东门外蟠山（俗名蜘蛛山）之麓。其墓地和祠堂得到历代地方官的保护和维修，今为文物保护单位。

塔口庵的传说

乾隆《龙溪县志》卷十一《古迹》记载：“塔口庵，在北门内，元陈友定、罗良巷战处。”又卷二十《纪兵》载：“至正二十六年，

陈友定陷漳州，总管罗良死之。”元末，农民起义纷起，蒙古兵娇生惯养，已失去昔日的骠勇，不得不倚重南人以镇压南人，造成陈友定称雄福建、罗良称雄漳州的局面。两人皆因镇压农民起义而得元朝的高官厚禄，陈友定任福建行省平章政事，罗良任漳州路总管。罗良不服陈友定，因而受讨伐，城破，巷战死。

传说，战死的罗良及其兵将之魂化为厉鬼，搞得当地居民不得安宁，因此建庵和塔以镇压之。其实，该塔不是庵的附属物，面是净众禅寺门前路上的经幢，上面刻有建立年代宋绍圣四年(1097年）可以考据，比陈友定攻破漳州城的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早267年。旧志记载，净众禅寺是一座五代闽国的古刹（王审知受后梁皇帝朱温封为闽王)，建寺的年代为后梁贞明二年(916年)。后与保福寺合并，称万寿保福净众禅寺，地址在漳州城西北日华峰之右（西)，保福山之前。保福山在芝山之东。保福净众禅寺清代已废，清末为漳州府中学校舍，民国时期先后改为福建第八中学、省立龙溪中学，现为漳州市第一中学。从前校门是按保福净众禅寺的座向开的，通塔口庵。庵经修建，经幢（即所谓的塔）至今未坏，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立碑刻明：“宝塔建造于宋绍圣四年丁丑，至明崇祯十五年六月初十日飓风刮颓坏，原任福建中路总兵王尚忠捐金重修。”塔（经幢）有八而，各刻佛像和“南无阿弥陀佛”六字，当时的作用是给信徒口念那六个字绕经幢而行。

庵边山顶巷有一口大井，为防止人掉进井中而加石盖，盖上留七个圆口供人用吊桶汲水，因此称为“七星古井”，井水以甘甜著称。民间传说，古时北桥为拱形，如人的头颅；公爷街（今南昌路西段）与硕仁桥街如人的双臂；北桥直街（今大同路）如人的身躯；以前无胜利路，北桥直街直通到塔口庵处，分叉两路，如人的双脚分开，分叉处的古井为女人阴户，这井水为“桃花水”，

当地妇女因饮该井的水而多淫乱，朱熹任漳州长官时，特地建庵建塔以镇淫乱云云。有人信以为真，认为是朱熹改良漳州风俗的功绩。其实，被称为塔的经幢，可考的建筑年代比朱熹始任漳州（任漳州长官）知府早 97 年，庵的建设则在朱熹之后。可见这一传说荒谬至极。

陈北溪与朱熹

南宋漳州名士陈淳，字安卿，家住九龙江北溪之滨，人称北溪先生，他也自以北溪为号。民间传说中的陈北溪，是一个神奇的画家。相传漳州知州朱熹请他画一幅“百鸟伴凤图”，过了很久未见交卷，叫衙役去催，陈北溪刚在吃甘蔗，就用蔗渣醮墨汁，在一把白扇上一点，叫衙役拿去给朱子。那衙役怕朱子见怪，到店里买一把画得很精致的扇去交差事。朱子看后说：“这哪里是北溪先生的画，你是从哪里弄来的？”那衙役才照实说了，将陈北溪点墨的纸扇献上。朱子看了大喜，叫衙役拿来一把米，撒在那扇上，然后抖落地面，扇上的墨迹随之脱落，即时出现一群小鸟围着一只美丽的凤，在地上啄米，吃完米，跳到扇上，便粘附在扇面，变成一幅“百鸟伴凤图”。又传说，陈北溪用平时所画三大箱画为女儿陪嫁，婆婆说“怎么用这些废纸当嫁妆”，放进灶里烧。陈女急忙去抢，只抢救出两幅：一幅画雨，一幅画日。夏收时节，婆婆晒谷子，陈女为了让婆婆知道她父亲的画有多么神奇，将雨图挂起来，天便下起雨来，婆婆十分着急，叫儿媳妇来帮忙收谷子，陈女笑着说“别忙”，将日图挂起来，即刻云消雨散，出现晴天。漳州有“陈北溪好字画”的俗谚，但不见陈北溪的字画传下来，史志也没有说陈北溪是画家。

写在《漳州府志》名人传记里的陈北溪是理学家，他为学务实，与务虚的理学流派不同。他精心研究濂洛遗书（“濂”指道州濂溪的周颐，“洛”指洛阳的程颢和程颐，都是北宋著名的理学家），感到理论深奥，不能理解，得知朱熹在武夷山讲学，想自带粮食前往求学，因筹不足路费未能成行。淳熙十六年（1189 年）朱熹以宝文阁学士改知漳州（调任漳州长官），陈淳大喜，就以所作《自警诗》为贽见礼去拜谒朱熹。朱熹与他谈话后，知道他功底深厚，相见恨晚，即尽心启发他。陈北溪经过朱子教诲，经过深思，化解了以前所不能理解的问题。从此，陈北溪常到郡斋与朱子讨论，朱子也曾到陈北溪家中讲解。朱子离任后常对人说：我到漳州得到一个安卿，是一大喜事，安卿能理解深奥的道理，其他学生所不能及。又说：近来接安卿来信，感到他的学问大有进步，前途未可限量。陈北溪再经过十年自学，又感到一些问题不能理解，特地不远千里前往请教朱子，朱子喟然感叹他的苦学，指点他“为学之道当大作下学之功，毋专任上达之见。当如曾子专事子所贯，毋遽求一；当如颜子专事于博约，毋遽求卓。”陈北溪回家后，便无书不读，无理不研，旁求博览，终成著名学者，著有《大学中庸口义》、《字义》及《北溪集》五十多卷。65 岁病逝。

萧状元故事

漳州府历史上只有一个状元，即明代的长泰人林震。然而漳州东门外接官亭（今新华东路教子桥附近）萧姓聚居地萧厝社却曾有一座“状元府”。当地萧姓，及由萧厝社传衍于东乡（今步文镇）、书都（树兜）村的萧姓据说都是萧状元的后裔。在萧厝附近且有一座萧状元墓。

漳州一带有“萧状元”故事流传：接官亭这地方有一个萧凤，自少读书，但一直考不上秀才，与妻子贫困度日。妻子替人“挨土磨”碾谷、舂米，赚点工钱维生。自从生了儿子，为哺育婴儿，工做少了，生活更加困难。萧凤一心想考出一个秀才，进而中举做官，还不甘心弃书不读，不能赚钱养妻育子。妻子埋怨他，他一气之下跑到池塘边想投水自杀，被一个好心人发现，劝说挽救，并拿一些钱供他做小本生意。他拿到钱，不与妻子说一声，便负气出外。他一路打杂工，十多天后，来到广东一处地方，天色已晚，见有一座朱门豪宅，便上前求宿。主人是一个员外，引他进一间空房休息。他十分疲倦，倒头便睡。半夜里突然被奇怪的声响惊醒，睁眼一看，有两个人跪在床前，叩首道：“主人啊，我们在这里等候好久了，你的财宝金银六缸，埋在床下，我们为你保管完整，今天你终于来了，现在就交给你掌管了！”萧凤还没有反应过来，那两人就消失了。

萧凤半信半疑，把床下砖石挖起，果然有金银六缸。天亮后去拜谢员外留宿之恩，要求多住几天，员外豪爽地答应了，并且供给伙食。原来，那间房一直在闹鬼，家人没有一个敢住，员外见萧凤连宿几夜无恙，知道他是一个贵人，就留他在家做工，后来见他诚实可靠，便将小姐嫁他。他用那六缸金银开设粟行、布行，家财超过他的丈人。他与员外的小姐相亲相爱，生了一个儿子，俊秀聪明，读书过目成诵。

萧凤富贵之后不忘家乡糟糠妻。一天，雇船载米粟回漳州。先泊船于浦头港，独个儿来到接官亭故居，进去见到一个小伙子，问明是“萧凤的儿子”，便说：“我是你家远房亲戚，十多年没有来了，难怪你不认识我，你父亲近来可好？”小伙子说：“家父在我小时便离家而去，我们母子自己苦撑到现在，不知他是死是活。”萧凤问：“难道你不想念父亲？你母亲不想念丈夫？”小伙子说：

“他与我们无关，想他做什么？”萧凤听这么说，留下一张字条，扫兴而去。小伙子与母亲都不识字，拿去请邻居一位老先生看，才知道萧凤运来白米一百石，叫他们到浦头港搬运。母亲叫儿子去追，萧凤已走，只搬回白米一百石。

几年之后，萧凤在广东的儿子中状元，回漳州竖旗拜祖，任官归休后回漳州，在接官亭父亲故居建状元府定居，死后葬在接官亭附近，称萧状元墓。

这故事是由子接官亭附近有一座萧状元墓而编造出来的，流传至今。乾隆《龙溪县志》卷十一《古迹》记载：“萧状元国梁墓，在东厢新亭道左。国梁永福人，宋乾道二年进士第一。相传为衣冠之藏。”原来，萧状元是宋代乾道年间永福（今永泰）人，萧厝人是萧状元在漳州的后裔，萧状元墓是漳州城东门街萧厝人为纪念祖先而造的衣冠冢。所谓状元府是祀萧状元的祖祠，清同治年间太平军入漳之役，该祖祠被毁，只存萧状元牌位。民间传说萧凤之子在广东中状元回居漳州，是子虚乌有的故事。

南宋末代皇帝的传说

南宋末代皇帝赵昺于祥兴二年（1279年）二月在广东崖山败亡。民间将风物附会于宋帝昺的传说很多，自福建至广东被人们认为他南逃的路上，不下二十多处，单单漳州一带就有：

一、嵩屿。传说，护从宋帝昺从福州南下的船队，因为泉州守将蒲寿庚降元，仓促离开泉州港，到鹭岛对岸时曾停留。那天是帝昺诞辰，大臣们拥他上岸，筑台朝拜，同声呼“嵩”，恭祝万寿，因而那地方叫嵩屿。

二、太武山下驻跸处。传说，宋帝昺的船队到港尾南太武山

下曾停留，帝昺中暑，采山上所生香薷草煎服而愈。

三、马口策士溪。马口地处南溪中游，小船可上达山区，下通海口，陆路是闽粤交通要冲，形势险要。传说，帝昺南逃至此，曾驻跸，开科取士，尚未揭榜而元兵追来，大臣们拥帝昺继续南逃，临行揭榜溪沙“尽赐进士”。

四、梁山封螺。传说，宋帝昺曾避难梁山，肚子饿了便在山涧捕螺充饥。吃螺要敲掉螺尾，煮熟，然后用口吮吸，螺肉便落入口中。宋帝昺吃了螺肉，将壳放回涧中，赐它再活。再活的螺没有尖尾，因为是皇帝敕封过的，所以叫封螺。

五、帝昺泉。盘陀岭路边有一口山泉，涓涓细流而大旱不竭，过路人在“盘陀岭上几盘陀”之后大都口干舌焦，用此泉止渴，更感甘洌异常，沁人心肺。传说宋帝昺当年流亡经过这里，用它止渴，加以敕封，因此甘洌。

六、皇帝茶。传说，宋帝昺的船队曾在古雷头停靠，汲井水烹茶，将茶渣倒在地上，长出茶树，叫做皇帝茶，井也叫皇帝井。

七、玉带泉。传说，宋帝昺御舟经过古雷海域，所带淡水已用完，眼看就要断炊。杨太后取帝昺的玉带投海中，祝祷道：“天未亡宋，愿海涌甘泉。”果然在那玉带箍着的圈内，一股淡泉冲咸而出，腾涌不息，叫做玉带泉。

这些故事娓娓动听，但与史实多有不合。按《宋史》，元军于德祐二年（1276 年）陷临安（杭州），俘获了年仅四岁（全太后所生）的皇帝赵㬎至上都（今内蒙古多伦西北的石别苏木）。翌年，大臣们拥立杨淑妃所生的皇子赵昰（八岁）称帝于福州，尊杨淑妃为太后，改元景炎；俞修容生的皇子赵昺（六岁）封为卫王。这小朝廷从海路向广东迁移，景炎三年（1278 年）五月，赵昰病逝于广东吴川南的海中小岛碙州，元帅张世杰、丞相陆秀夫拥立赵昺为帝，改元祥兴，在崖山（雷州半岛新会县南）建立行都，于

次年败亡。在福建境内流亡的“宋少帝”应是赵昰而非赵昺。这一支宋朝残余力量还有庞大的船队和数万大军，应是航海南下广东，在沿海的崖屿、南太武山下、古雷头等处可能停靠，在东山、南澳等岛屿可能停留，而不会在梁山打游击。诸如梁山“封螺”、盘陀岭“帝昺泉”等传说无非附会。说皇帝泡过的茶叶能长出茶树，说皇帝的玉带抛在海上能涌出淡泉，如果宋朝末代皇帝有如此神力，何至于亡国？

揭开马口“皇帝城”谜底

马口桥边曾有一座小城，传说为宋帝昺的行宫。民间传说总是不断添枝加叶的，宋帝昺在马口的传说“揭榜溪沙”与南太武山“驻跸处”同时流传，明末清初名士张士楷有诗分别吟咏这两处传说。传说的是“宋少帝”，未指明是“宋帝昺”，而民间多不明白在“宋帝昺”之前还有一个“宋帝昰”，谥号端宗，所以将本应是宋帝昰在福建境内之事一律说成“宋帝昺”的事。

张士楷一首题为《马口溪》的七律，首先注有一行字：“相传宋室南奔，策士于此，时野草齐花，河山改色。”下面才是诗：“宋士临危贪释褐，公车射策满平沙。阁将丞相千行泪，开遍春风百草花。野殿宵衣能立国，宫袍画锦已无家。久谈久被书生误，谁执干戈卫翠华？”当时传说的还只是马口溪“开科取士”的故事，那时马口城未建，无“行宫”说法，所以张士楷诗的题目是“马口溪”，并在诗中说“宫袍画锦已无家”。

马口城实际是清朝为对付郑成功之子郑经面厉行“迁界”时的兵营城。康熙《漳浦县志》卷十五《建置志》记载：“马口城，在二十八都邑北尽境，康熙二年总兵王进功建议，督院李率泰建，

刻记石上，俯溪桥。原有千总驻于此。”按，清廷于顺治十八年（1661 年）下令“迁界”，翌年（康熙元年）在漳州沿海一带建石码、霞陵、秦溪等兵营城守“界”，再翌年建马口城，驻千总。因为马口是距“界”不远的水陆交通枢纽，驻重兵以利调度，所以总兵王进功这一建议得到福建总督李率泰采纳。在清朝统一台湾后，此城失去军事作用，变成一座空城，南来北往的行人穿城而过，不能理解在这荒野上为什么有这么一座城。由于早有“马口溪开科取士”的传说，马口城便被附会为宋帝昺的行宫。赤湖莆头澳（即将军澳）海滨小山上也有一座废弃的明代青山巡检司城，被传说为南宋末代“皇帝城”。

黄侍臣之裔“五狮”

南宋崖山败亡之际，保护闽冲郡王赵若和逃难到浦东的黄材，字国栋，是皇帝的侍从官（随从秘书），人们称他黄侍臣。在赵若和离开黄侍臣家迁居佛昙积美后，黄侍臣仍居浦东（以前为漳浦县东部，今属龙海市港尾镇）。他的后裔：第二代两翁（燮翁、炳翁）；第三代四库（制库、盈库、置库、永库）；第四代十三夫（宽夫、信夫、敏夫、惠夫、廉夫、庸夫、应夫、膺夫、必夫、寿夫、仁夫、义夫、慎夫）；第五代二十二均，以下子孙就说不完了。

倭寇祸患始于元代，浦东地处海滨，曾受浩劫。黄侍臣的第四代孙宽夫于至正六年（1346 年）在手志《谱序》里记述惨痛家史，说他十二岁时，倭寇登陆，他全家遭害，将他掳载出海，因船超载，将他抛弃海中，他幸而抓到一块木板，漂流到大担岛外，遇嵩屿人林世英从广东贩货回航，将他捞救，视如己子，养到十六岁，以次女林二姐婚配，然后送回浦东。宽夫找到出嫁许家的

姑母，在她指点下，讨回一部分被人侵占的田产，重建家园于岭西，从此浦东改名浦西。他在《谱序》里嘱咐：希望以后黄姓分居地以“西”字命名。因而以后有五处地方以“西”为地名的第一字或第二字。因为闽南方言“西”与“狮”同音，号称“五狮”，寓奋发图强之意。五狮（西）是：

浦西，今属龙海市港尾镇，为本支黄姓发祥地。

西墘，在漳浦县佛昙镇，得名为西墘的原委是：寿夫于元末迁居莆田，于明初任指挥使，驻防佛潭桥（今佛昙镇），在一次抗倭战争中，牺牲在香山之下，谥鸿熙。子均安、均寿居佛潭桥西，命名其家园为西桑园，俗称西墘，建梅月城防倭。自明末至清初，黄姓陆续迁入湖西。梅月城已废，今地名岸仔头。

湖西，在海外编的黄姓总谱中也写作“乌狮”。湖西旧名官塘。明末战乱，清初“迁界”，佛昙一带划为“弃土”，黄姓尽迁入官塘。由于官塘是四面环山的盆地，闽南方言称盆地为“湖”，黄姓新聚居地在官塘西部，按宽夫遗嘱，命名为“湖西”。

西头，又写作狮头，始祖是宽夫的第四子均助。他于元末明初天下大乱之际在旧镇附近建隆兴寨，招集流亡，受明太祖命名为镇宦。后裔形成村落，按宽夫遗嘱命名为西头。嘉靖年间建黄家寨，又称狮头堡，防御倭寇。

西厝，今名前亭，为仁夫的次子均禄所分衍。清初，均禄的后裔为纪念黄道周及随黄道周抗清而牺牲的“四君子”和西厝64位壮士而盖一座梅亭，人们就称西厝附近原有的一座亭为后亭，而称梅亭为前亭，以至前亭、后亭都成为地名（“亭”读音如“陈”，后亭在旧县志里写作“后诞”，今写作“后陈”，前亭成为总地名）。

杨国舅的后裔

南宋度宗皇帝三十多岁病逝，遗下三个年幼的皇子。全皇后所生的赵㬎接皇位，改元德祐，尊他的祖母谢太后为太皇太后，他的母亲全皇后为太后，由谢太皇太后垂帘秉政。元军逼近南宋京城临安府（杭州），右丞相文天祥前往元营谈判，临行奏准谢太皇太后，封杨淑妃所生皇子赵昰为卫王，俞修容所生皇子赵昺为广王，带一些人臣往福建经营后方。文天祥被元军扣留，左丞相陈宜中临危潜逃回家乡，元军直入临安，谢太皇太后、全太后只得携幼帝投降。幼帝与全太后被挟北去。赵昰在母杨淑妃携带和舅父杨亮节扈从下仓皇就道，赵昺也在母俞修容携带和舅父俞如珪扈从下同行。元军随后追赶，他们匿山中七日，后脱险逃到永嘉（温州），被南逃的大臣们拥到福州，文天祥从元营脱身来会，同立赵昰为帝，改元景炎，尊杨淑妃为太后，垂帘听政，国舅杨亮节任处置使。景炎元年（1276 年）十一月，元兵逼近，文武大臣率众兵将拥皇室航海南下，至泉州港，遇掌泉州军政大权的蒲寿庚降元，闭城尽杀皇族，这支南宋船队匆促启航继续南奔。杨亮节在外召兵，不及同行，只得带着三个儿子到漳州一带沿海寻觅，到漳浦佛昙，听说宋皇室已南下广东，便将患病的第三子寄养在佛昙，自己带长次二子往鹭岛（今厦门），准备找船去广东。到厦门听说宋室已亡，便带长次二子到浯洲（今金门）官澳，耕山渔海为生。杨亮节的这三个儿子便分别在金门和漳浦传下众多后裔，分衍于台湾和东南亚一带，曾在新加坡会亲，共同缅怀祖地和祖先。

杜浔小山东

漳浦杜浔通往古雷半岛公路边有村庄名小山东，村后的山峰名山东岭。山腰“鸡母岫”有一座简陋的古墓，墓碑上方左角镌横书“公讳维邦”四字，下镌直书两行字，合起来为“不恭宋丞相南迁隐浦之山东北山鸡母岫”，中间镌一行大字“丞相始祖杨公墓”，右下角镌两行直书小字，一行“大明天启元年仲冬吉旦”，一行“九世孙杨文仕灵鳌右”。

据《漳浦杜浔小山东谱记》，杨维邦原籍山东兖州泗水，南宋理宗时进士，因抗元有功官至尚书右仆射（理宗时已不设尚书左右仆射，当是担任过同等级官职，后世修谱者记错），后受卖国的丞相贾似道排挤失权。元兵陷南宋京城杭州时，杨维邦携眷逃到福州，追随于端宗（赵昰）小朝廷，播迁南下。他忧愤国事，在船中捶胸吐血而死，端宗皇帝追赠丞相。宋船队至古雷，少帝与群臣曾上岸休息，维邦的两个儿子杨考和杨敞将父亲遗体火化，骨灰用罗衣包着，背往寻觅葬地，而一路都是沙滩，来到半岛与内陆交界处看到一座青翠的山峰，问当地人，知道地名鸡母岫，认为风水甚好，就把父亲的骨灰安葬。葬毕回古雷，宋室船队在元军船队追击下已仓皇开走了。两兄弟只得再来到鸡母岫山下，垦荒种地。由于他们原籍山东，就将现居地命名为小山东，鸡母岫也就叫做山东岭，只有杨维邦墓地仍叫鸡母岫。

后来杨敞去广西梧州，杨考在小山东传衍子孙，形成村庄，分衍于六鳌东门和绥安镇后港村。

杨考享寿 103 岁，至明初洪武三年才逝世，亲眼看到元朝的兴起和衰亡。

陈碧娘一门忠烈

诏安浙山人（一说云霄陈岱人，两地毗邻，同宗族）陈碧娘和他弟弟陈植、陈格，是南宋名士陈景肃之孙，参知政事陈肇的子女。陈碧娘的丈夫张达，浙山隙口村人，文武全才。元兵陷南宋都城杭州后，各忠臣拥少年皇子赵昰在福州称帝，张达在故乡授徒练武，准备勤王。传说，宋少帝南奔至诏安梅岭港，元军船队尾随追击，幸张达率乡民砍来很多树木，横阻港路，少帝才得脱险。

张达率义军要追上南宋君臣，参加抗元序列，碧娘送到南澳岛钱澳，依依惜别，该地遂被称为“辞郎州”（广东有潮剧演这故事），后张达随南宋播迁，一再转战，以战功升官都统，曾在广西抗元，后参加崖山决战，于祥兴二年（元朝至元十六年，1279年）二月夜袭元军大营，双方死伤甚多，《元史》卷四十七有简要记载。

陈碧娘之弟陈植，十八岁为太学生，安定郡王赵伯泽择为女婿，封郡马，赐食邑。于淳祐四年（1244年）中进士，淳祐九年任龙溪知县，转任漳州司理。后奉命提督岭南海路兵马，保卫临时帝都崖山。其弟陈格，任宋帝舅海船监簿。兄弟俩曾回浙山探亲，碧娘作《平元曲》托二弟送给丈夫张达，辞气慷慨曰：“虎头将军目如电，领兵夜渡龙舟偃。良人腰悬大羽箭，广西略地崖西战。三年消息无鸿便，一纸凭谁寄春怨。日长花柳暗庭院，斜倚妆楼倦针线。心怀良人几时见，忽睹二郎来我面。植兮再吸倾六罐，格也一弹落双燕。何不将我张郎面，协义维舟同虎帐。无术平元报明主，恨身不是奇男于。倘妾当年未嫁夫，请效明妃和西

虏。虏人不知肯我许，我能管弦犹长舞。二弟慨然舍我去，目睹江头泪如雨。几回闻鸡几滨死，未审良人能再睹。”

崖山决战前夕，陈格作《崖山六咏》诗。其中一首云：“战舰冲风起怒涛，北船晓挫暮犹多。强胡难满吞天欲，志士横罹伏海号。一剑挂腰随我去，万方引领奈君何。”

陈格和张达都在崖山决战中与宋帝昺同殉国。碧娘往崖山以重赏认回张达尸体，葬于渐山。陈格之尸没有认到。陈植于战败时砍断船船相连的铁缆，率六船突围夺港而出，逃到诏安梅岭港，收集散兵，并发动诏安山区畲族继续抗元。他将陈格生前所穿官服和所用奏板装成人身入棺，葬于渐山书院。后来抗元失败，陈植隐姓埋名，辗转避匿于大芹、白叶、九侯等大山之间。临终，遗嘱将他葬在海滨，墓地向南望崖山，不愿向北望元都，以示抗元到底。

陈碧娘将儿子寄丈夫张达的姑母抚养，与弟陈植继续抗元，最后战败被杀（一说绝食而死）。张达族人被元军杀绝，只有寄养姑母家的独生子幸免于难，后来成为诏安东峤村张姓始祖。该村祠堂楹联云：“孝可作忠，痛先人斩木救驾，特表奇勋千古；思堪锡类，念我祖依姑承祧，犹存祀典万年。”

漳州帖姓源流

帖姓是元朝漳州路最后一任“达鲁花赤”（长官）迭理弥实（一译德里密什）的后裔。元史《忠义传》记载：“迭理弥实字子初，回回人（《漳州府志》载为‘西域人，姓合鲁温’），性刚介，事母至孝，年四十犹未仕，或问之，曰吾不忍舍吾母以去也。以宿卫年劳，授行宣政院崇教，三迁为漳州路达鲁花赤，居三年，民

甚安。”后面说到他于明兵入漳州城时自刎之忠烈。《漳州府志》说得明白一些，说元末福建行省平章政事陈友定打败漳州路总管罗良而占有漳州，任用张理问为总制官，朝廷还没有派来“达鲁花赤”，张理问擅自苛征朘剥，民众十分痛苦。迭理弥实到任后，“厘正庶务，兴利锄害，民用少康”。洪武元年（1368年）明将汤和、李文忠兵取福州，守将柏帖木尔举家自焚。兴化、泉州等地元军皆望风投降，福建行省平章陈友定在延平自杀未遂，被俘死节。迭理弥实力图保卫漳州，面守将已先逃遁，总制官已纳款投降，迎接明朝招抚使入境。有人劝迭理弥实出城迎接明朝招抚使，他不回答，穿好朝服，向北跪拜以后，仰天长叹，说：“吾不材，位居三品，受国恩厚矣，今力不能支，报国惟有死耳！”便用利刀刺股取血，书“大元臣子”四字于笏板，置案上，然后自刎而死。死后还执着刀，踞坐大堂上，毅然如生。其妻、奴婢、卫士都投井死。漳民闻讯，会集于庭，哭声震地。众人为之备棺，敛葬于东门外（今新华东路芗城区税务局内）。

明永乐元年(1403年)，朝廷派专使来漳州为迭理弥实修建坟墓，立石镌“元漳州路忠烈守臣迭理弥实之墓”。后墓圮，地为人侵占。成化五年（1469年），福建按察副使何乔新视察漳州，听迭理弥实的玄孙朝辅投诉，修复了迭理弥实坟墓，并就墓地建表忠祠，立表忠碑记事。而不久祠墓皆荒颓，成化十九年漳州知府姜谅加以修复，并为表忠碑作跋，说他感慨元侯（元，元朝；侯，对地方官的尊称）的忠义。何乔新已亥（成化十五年）出任漳州知府，特来拜谒元侯墓，见祠已荒颓，墓碑无存，询元侯的玄孙朝辅，知道他竟是姓帖，就问原因，才知道迭理弥实的遗孤名普颜帖木儿，入明朝，摘其中“帖”字为姓落籍，生帖德合，帖德合生一子，未满月，帖德合便逝世。邻居涂思齐怜悯婴儿是忠臣的后代，将其收养，爱护如同亲生，改其姓为涂，取名逊，培养成

为龙溪县学庠生（秀才），将自己女儿配其为妻，生子阜文、阜质。这两人一直不知道是迭理弥实的后裔，所以不知道曾祖墓地被人侵占，墓碑遗失。至涂思齐临终立下遗嘱："忠臣之后不可失嗣，能出仕者当恢复原姓为帖。"阜文生三个儿子：涂兴、涂宾、涂成，都未仕而卒。阜质有一个儿子名雍，为太学生。雍与朝辅兄弟都复姓为帖。姜谅慨然为表忠碑作跋，记载迭理弥实后代复姓为帖的经过，跋文最后说"斯固上天默佑忠义，使元侯不泯其传，又使涂思齐有子有孙，以继先志，皆可以为世劝也。"（见《龙溪县志·杂记》）。

迭理弥实另有一个儿子，名普颜帖木儿，元末任吏部尚书，督师援广西，至滕州，守将降明，明大军入境，普颜帖木儿走入丛林，而元军已溃散，招呼莫应。他以孤军力拒明将朱亮祖的追击，血战十天，最后力尽死难。其忠勇节烈经360年无人表彰，至清雍正九年（1731年）其二十世孙响（人名）疏请，才配祀于其父迭理弥实的专祠。

表忠祠年久失修，后遗址被人买去，成为店铺，为笃诚赐记、天元参行所有。乡人悯其祠之荒废，捐金修葺，以"表"、"忠"二字撰一联："表里河山犹带砺；忠贞珉石自春秋。"

帖姓衍族无多，现在在芗城区南门头及东铺头、官园等处居住。至子改姓为涂的，已不能考其源。

姜知府兴利除弊

姜谅，字用贞，浙江嘉兴人。明天顺八年（1464年）进士，成化十五年（1479年）任漳州知府，在任六年，做了许多惠泽百姓的好事。在他逝世后的弘治十五年（1502年），漳州人为他建庙塑

像纪念。至今五百多年，人们还在缅怀他的功绩。

《漳州府志》记载，姜谅到任时，漳州水旱灾频仍，民不聊生，很多人沦为盗贼，姜谅散粟赈灾，并采取招抚政策，“募盗捕盗”，社会秩序好转。当时以富家为里长甲首，他们勾结吏胥，转嫁田赋负担于贫民，姜谅认真理断。姜谅又倡建社仓，储谷数千石以备赈灾。这些措施都有利于社会安定，而治国安邦的根本在于发展生产，姜谅倡导水利建设，筑陂疏塘，筑海堤，围垦埭田，完成很多工程，促进了农业生产。其他还有兴学校，设义冢等功绩。

姜谅的最大功绩是兴修水利工程。他领导群众在龙溪、漳浦二县筑海堤186处，围垦埭田，其中在龙溪县沿海的一百多处（龙溪沿海于隆庆元年划属海澄县），如一、二、三都的林头、西埭、后林、石囝、北市、埕边、澳头、京口、石甲头、林尾、陵坑、大观后、将军澳、赤石、钟林尾、暂尾、长屿、庄水头、山头、东坑、马厝前、后泾、后浦、刘厝前、排头、吴贯、郑墩、陈观、石龟、东头、苏埭、南外等32埭，堤总长3997丈，高1丈5尺，宽1丈8尺。在内河疏浚港汊，如蓬莱港，灌田百余亩；官港，上通柳营江，下通石美，长30里，灌田二百余顷。建闸蓄水，如二十九都李厝闸、石厝闸，通惠民港。建海门溪头陂，灌田十余顷。重建南溪广济陂（俗称南陂），灌溉漳浦、龙溪（今龙海）二县毗连处良田千余顷，且可阻挡海潮淹田。又浚疏龙溪县十二三都（今龙海市九湖镇）邹塘、浯淇塘；二十七都（今龙文区）郭坑塘，用于蓄水灌溉农田。

漳州于明弘治十五年建姜公祠于内申桥，祀姜谅，后移建于南厢大路头（威镇阁附近），今庙尚存，群众称为姜太爷庙。

状元林震的传说

漳浦县与龙海市交界处海上有一个小岛叫林进屿。这一带民间传说：长泰状元林进小时患麻风，被兄嫂逐出家门，流落到那个荒岛上，栖身洞穴，以蛇为食。由于蛇肉有治麻风病的功效，林进多年的顽疾痊愈，在孤岛发愤读书，终至状元及第，那荒岛因此名为林进屿。

但检阅旧《漳浦县志》，那小岛原名“连进屿”，检阅旧《长泰县志》，明宣德五年状元实名“林震”。由此可知，一是人名谐音，一是地名讹音，形成那个离奇故事。

民间传说的产生，有其时间和地域因素。由于漳浦与龙海毗邻处海岸可望见那人迹罕至的小岛，引起人们浮想联翩；又由于连进屿讹称林进屿；林震人名误称林进，使这两个原来不相干的名称结合起来。全漳州府历史上只有一个状元，十分稀罕，有许多故事流传，这个“林进屿”也就成为其中一部分。但这故事只能在漳浦与龙海毗连处流传，而不能在林震的家乡长泰县流传，因为传说所说与长泰人心目中的林震形象完全不同，而且长泰人知道状元叫林震而不叫林进。

长泰人认为，林震是自幼聪明、健康、勤劳、好学的孩子。长泰民间传说，林震出生于山区枋洋乡科山贫苦农家，曾入村塾读书，祖父见他聪明好学，为让他深造，特地带他迁居长泰县城南门。那年春节，邻居互相请酒欢宴，独林震的祖父因为家贫，没有人愿意和他交往。祖父为此闷闷不乐，独自躺在床上叹息。林震问祖父为何苦闷，祖父信口回答：“缘因南门请酒公无份。”林震即对答：“且看北京出榜孙有名。”祖父见他才思敏捷，志气不

凡，决心悉心培养，但是交不起“束脩”（学费）。那时长泰有一位著名教师唐泰，是永乐十二年进士，曾任祁州知州，为侍养老母而辞官归家，设馆教书。少年林震天天徘徊在唐泰学馆门外，侧耳倾听读书声。唐泰见到了，问明原委，十分同情，准他免费入学，并送给必需的文具、课本，还谆谆教导，尽心讲解，因此林震学业有了成就。

林震是自有漳州以来惟一的状元，出生在穷乡僻壤，真是石破天惊，对漳州各县社会的震动很大。因此关于他的传说很多，小说《大明英烈传》更把他说得神乎其神。各种传说可以并存，但不可尽信为真。如果要知道林震少年时代的生活，还有旧《长泰县志》的记载可以参考：“林震字敦声，又字起龙，家贫力学，每樵耕必挟书自随，休卧树下，仰读不辍。”

浪荡公子谢能舍

今芗城区南昌路西段原名上街，明宣德二年（1427年）进士第三名谢琏在那里建府第，并立“探花”牌坊，谢琏的府第被称为探花府，上街被叫做探花街。清康熙年间，探花府被镇守漳州的一等海澄公占有，改称公爷府，探花街改称公爷街。公爷街有公爷街的故事，探花府的故事也一直流传下来。

谢琏原是漳州南乡锦浦村（在今龙海市颜厝镇古县村边）人。民间传说，他原是一个穷书生，在乡间当塾师，收入很少，生计艰难，为免被人看轻，用木头削成鸡腿形状，用它沾酱油吮舐佐餐。一次，他搬出书箱，打开晒太阳，邻家的鸡过来啄食书箱中的蚯虫，触动箱盖的活动关节，箱盖猛地扣下来，鸡被关在箱里。谢琏收回书箱时，不知道里头有一只鸡。邻家主妇到处寻鸡未得，

听说谢老师天天吃鸡腿，心想，那寒酸秀才连米都一两升零星买，哪里有钱买鸡，村中常有人失鸡，莫非都是他偷的？她跑去向谢琏讨鸡，谢琏不承认，她说："伽蓝爷很灵验，我们到庙里问杯，看伽蓝爷怎么说。"谢琏被纠缠不过，只得答应跟她到伽蓝庙问杯。心想，神明不会冤枉人。"杯"是用竹头劈成两半，作为向神问卜的器物，问卜人在神像前烧香祷告之后，将两只"杯"掷在地上，若是一只"杯"的凹面朝上，一只朝下，叫做"圣杯"，表示所问的事是肯定的；若是两只都朝上，叫做"笑杯"，两只都朝下叫做"阴杯"，都表示否定。那妇人烧香祷告道："我失去的鸡若是谢先生偷去，就圣杯！"而两只杯都侧立，既不朝上也不向下。谢琏烧香祷告说："我若偷了邻家妇人的鸡，就圣杯！"两只杯同样侧立。谢琏连续祷告投杯十二次，都是这样。那妇人的丈夫说："伽蓝爷不置是否，搜查一下便见分晓。"结果，在谢琏的书箱里搜出那只失去的鸡，一时村民大哗。谢琏有口难辩，感到斯文扫地，关闭私塾，刻苦读书，终于考中进士，殿试第三名，称探花，与第一名状元，第二名榜眼合称三及第，照例骑马游街三天，十分荣耀。谢探花怪恨伽蓝爷当初没有否定他的偷鸡行为，于游街时将伽蓝爷神像绑在马后拖着走。伽蓝爷则认为，鸡分明在谢琏书箱中，他没有肯定是谢琏偷的，也算公道，谢琏这样侮辱神明，太过分了，立志报仇，就投胎出世为谢琏的儿子，来破他的家财。谢琏为儿子取名"能"，人人叫他谢能舍。谢能舍玩世不恭，视功名如浮云，曾考中秀才。在考举人的时候，主考官出题"吾四十不动心"，谢能舍在考卷里写道："倘若秦之妃、宋之姬与夫子同游于花月之下，动心乎不动？吾知之动动！"主考官批"黜乎不黜？吾知其黜黜！"谢能舍的秀才资格便被除名了。他视金钱如粪土，挥霍无度，一些酒肉朋友来陪他玩，不但有吃有喝，而且可以得到金钱奖赏。他在父亲死后，家财散尽，将剩下的三两银装在一节竹筒里，向南

门溪走去，连头也不抬，与一个老妪撞个满怀。老妪骂道："你这个少年家这样紧狂，是要赴死！"谢能舍大喜道："啊，我的志趣无人理解，只有你最知我心，我真是要赴死哩！"就把剩下的三两银送给老妪，自己跑到南门，跳进溪里。随后，水上浮起一尊伽蓝爷神像，人们把它送回锦浦村伽蓝庙照旧奉祀。

"伽南爷投胎"的传说是讽刺笑谈，而从古至今，像谢能舍那样的公子阿舍可真不少。

"机易山"事件

明朝隆庆元年(1567年)开放月港与东南亚各地通航贸易，输出土产、手工业品，赚回很多银元（西班牙在拉丁美洲殖民地开采银矿铸造的)，于是，有"吕宋、噶喇吧，钱银好洗脚"的谚语。

万历年间，皇帝派出太监到处监督采矿，收取矿税。海澄县人张嶷通过税监高寀奏报皇帝，说海外吕宋岛机易山产金豆，每年可采得黄金十万两、白金三十多万两。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四月，皇帝下旨，派海澄县丞王时和及镇海卫百户于一成带一些士兵，同张嶷往吕宋机易山勘察。当时，吕宋为西班牙所占领，殖民地总督对吕宋华侨之多本来就心存恐惧，突然听到中国派出钦差前来的消息，十分惊疑，在派传教士前往迎接的同时，于路边搭盖帐篷，陈列士兵，以示威武。正中另设一帐篷，作为临时接待所，沿途布置鲜花，迎请中国来使入帐篷内，盛宴接待。席间，西班牙官员问王县丞此行来意，王县丞说奉皇帝圣旨，为采金豆而来。西班牙官员问："金豆长在什么树上？"王县丞不知道，用眼神示意张嶷回答。张嶷说："我们知道这里的机易山地里有黄金、白金，不是长在树上。"西班牙殖民统治者认为张嶷欲利用中

国国威来占领吕宋，故放王县丞和随从的兵丁回国，留下张嶷准备治罪。后来经过当地华侨斡旋，才将张嶷驱逐回国。

王县丞经历这场戏剧性的“出使”，受气不过，回国后一病不起。张嶷以奏事不实，犯欺君之罪，被处斩。（据《海澄县志》）。

周起元之冤

太监之祸，明朝最突出，万历、天启两朝达到高峰。许多士大夫攀附当权太监，另外许多士大夫反对太监专权，展开生死斗争。

海澄人周起元，字仲先，号锦贞，是天启年间因反对太监专权祸国殃民，因而受到监禁、酷刑致死的“后七君子”之一。他于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中解元，翌年中进士，先后任浮梁、南昌知县，万历四十年任湖广道监察御史。那时，皇帝派太监高寀管征福建工商各税，高寀看中海澄是一个对外贸易港口，于每冬商船回航时，带着他的卫队来到海澄，对商船进行检查，以进贡皇帝为名，强索进口的珍宝和贵重物品。市民相率向地方官控告，高寀派爪牙杀死检举者二十多人，放火烧毁三十多家，民众群起斗争，包围高寀设在月港的官衙。地方官怕事态扩大，加以制止，群众只得含冤解散。而高寀还埋怨地方官镇压不力，于翌日率领他的卫队驰回省城，威胁巡抚袁一骥必须惩办府、县官。省里官员都不屈服，调动武力对抗，并由巡抚、巡按、按察使联名，上疏报告朝廷。周起元也参奏一疏，要求皇帝惩办高寀。万历皇帝只得下旨，令福建地方官派妥员将高寀护送回京。从这事开始，周起元被权倾朝廷的秉笔太监魏忠贤所痛恨。

后来，周起元历任广西参政、通州兵备道，天启三年任太仆

寺少卿，升佥都御史，巡抚南直隶十府。魏忠贤的亲信太监李实管理南直隶织造业，以进贡皇帝为名，加征税银十多万两，并将勒索不遂的富户报为匠户，强征服工役。周起元屡次上疏参劾，魏忠贤对他更加痛恨。兵科都给事中朱童蒙攀附魏忠贤，外放为苏松兵备道，骄横跋扈，任意打死漕运工人，激起民众聚集抗议，周起元上疏参劾。结果，朱童蒙反而升官为太常寺卿，周起元被削职归里。苏州老少随送，涕哭之声塞市。朱童蒙怀恨周起元，于天启六年嗾使给事中李鲁生疏劾周起元以讲学为名，与高攀龙、周顺昌等朋比，讽刺朝政，又取李实盖印的空白奏疏，令李永贞填写，诬告周起元阻抑上供，冒报鼓铸，贪污十万两银。魏忠贤矫旨，将周起元、高攀龙、周顺昌、周宗建、李应昇、黄尊素、缪昌期等七人逮捕入狱。负责逮解犯人的禁卫军到达漳州，周起元没有钱应付他们的需索，绅士和民众在四城门设木柜，贴告示请过路人捐助，不几天，钱投满柜，送给禁卫军，周起元得以受到禁卫军宽待，护送到北京。他被投进监狱时，高攀龙已投水自杀。缪昌期、黄尊素、周顺昌、李应昇、周宗建已先入狱受酷刑而死，后周起元也死于酷刑之下。世人对他们十分同情，称为“后七君子”。崇祯帝即位后，惩办魏忠贤及其“阉党”，对受魏忠贤迫害的冤案一一平反。追赠周起元为兵部侍郎，谥忠愍，赐祭葬，运棺回乡，葬于漳州西门外西渡头。建祠特祀于漳州府学之西。崇祯帝并允准御史袁鲸的奏请，将“后七君子”与“前七君子”，即天启五年因疏劾魏忠贤擅权乱政而被刑毙于狱中的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顾大章，同建祠于京师奉祀。

林钎正直无私

林钎，字实甫，号鹤胎，龙溪县洞口社（今龙文区步文镇蓝田村洞口自然村）人。早年在岐山瑞竹岩刻苦读书，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38岁“探花及第”（进士第三名），授翰林编修，升国子监司业，又升为祭酒（太学的长官）。天启年间，秉笔太监魏忠贤专权，结党营私。很多朝臣和地方官攀附魏忠贤，正直的朝臣则鄙视他们，称其为“阉党”，与之作生死的斗争。国子监有铜鼎铜缸，是贮水防火灾的设备，魏忠贤不尊重朝廷制度，声称要提取国子监的铜鼎铜缸去铸钱，暗中占为己有，林钎坚决抵制，魏忠贤怀恨在心。那时，全国各地的“阉党”们，纷纷为魏忠贤建生祠。国子监中有一个名叫陆万龄的监生，受阉党指使，来见林钎，说“魏公功德巍巍，宜立像于太学，以魏公配孔子，以魏公父配启圣公。”林钎驳斥道：“孔子圣仁，依礼享受帝王朝拜，魏如和孔圣并列，他日皇上入学拜释奠，君拜于下，臣偃于上，能安乎？”阉党遂不敢再议在太学为魏忠贤建生祠，还是计划在朝廷其他地方建魏忠贤生祠，发起募捐，要林钎也列名为发起人之一，将募捐册送到林钎手上，逼迫他在发起人名下签名。他接过募捐册，气愤地提笔将“募捐启事”涂抹。阉党们将林钎的态度报告魏忠贤，魏忠贤矫旨，指责林钎不称职。林钎知道在朝中不能容身，将自己的乌纱帽挂在太学的棂星门上，换上便装，连夜逃离京城。他日夜兼程走到湖北省黄州，因为连夜赶路，触犯宵禁，被巡夜士卒扣留，送至守将那里盘问。林钎咏七律诗一首回答：“舟到齐安日已西，故人邀我醉琼卮。贪看赤壁两篇赋，不觉黄州半夜时。塞北将军原有禁，江南士子本无知。贤侯若问真消息，姓

字于今达凤池。”守将知道他有些来历，就把他释放。

林钎回到故乡，做了许多诸如兴修水利之类的公益事业。那时，荷兰侵略者窃据台湾，常派出舰艇侵犯闽南沿海，又有本国海盗经常在漳州一带登陆劫掠。林钎听取乡人意见，建议漳州杜知府，在岐山与鹤鸣山之间的万松岭建一座关城以捍卫地方。刚挖好地基，杜知府调任，继任知府施邦曜于崇祯二年（1629 年）完成万松关建设，林钎为其作碑记。

崇祯元年，魏忠贤受惩办，畏罪自杀。林钎官复原职。升任礼部侍郎兼侍读学士。崇祯七年，崇祯皇帝召对朝臣，林钎陈述用人、理财、靖寇、宁边四项建议，得到崇祯皇帝赞许，用为东阁大学士，为内阁成员，因此，人们尊称他为“林阁老”。郑芝龙受明朝招抚，林钎曾加以帮助。林钎五十大寿，郑芝龙派人送上一千两银作为祝寿礼物，以示谢意，林钎婉谢，复信说：“成人之美，君子也，因之以为利，非君子也。”

林钎因国务繁杂，积劳成疾，于崇祯九年病逝，谥文穆，赐祭葬，并赐御书“淡泊宁静，中正和平”牌坊。墓初修在龙溪县仑门，后迁至洞口，与母陈太夫人及元配杨夫人合葬，至今保存完好，墓前石狮、石虎、石羊、石烛移存村中。石牌坊在万松关附近，今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颜继祖之屈

颜继祖，字绳其，号同兰，龙溪县南乡下宫社（今龙海市颜厝镇下官村）人，万历四十七年进士。在万历、天启两朝，秉笔太监魏忠贤结党把持朝政时，他任工科给事中，与魏忠贤及其“阉党”进行尖锐斗争。在崇祯朝，他受到重用，升吏科都给事中，

再升太常寺少卿，后升任佥都御史，巡抚山东。那时，明朝处在农民起义军和满洲兵内外夹攻之下。崇祯十一年，山东省大部分地方已被满洲兵占领。京畿岌岌可危，兵部尚书杨嗣昌惊惶失措，在50天内对颜继祖作三次调防，后令他专守德州（在山东省西北部，邻近河北省）。颜继祖部下只有三千兵，主力调守德州，以致战略要地济南空虚。颜继祖请杨嗣昌令刘泽清、倪宠等将赴援，皆逗留不进。翌年，满洲兵攻占济南，俘获德王朱由枢。朝中一些平时与颜继祖不和的人交章疏劾颜继祖。继祖上疏申诉："臣兵少力弱，不敢居守德州之功，不敢不分失守济南之罪，请以爵禄还朝廷，以骸骨还父母。"就是自请受撤职处分，而要求免其一死。崇祯帝动辄处死臣下，十年间单单巡抚就已被处死11人，对颜继祖照例不能宽恕，下旨将他逮捕斩首。（以上据《明史·列传》）。

颜继祖死后，与他有仇的人散布流言，把他说得奸邪透顶。清代有一本根据传说写成的《明季拾遗》说：颜继祖以向崇祯帝进"白妃"而得宠，官升至尚书，他纵容家奴到处欺压良民。白妃赐给他一只白鹤，他将白鹤弄死，拖着鹤尸到处跑，相中哪一块田地，就将鹤尸丢在哪里，诬称白鹤飞到那田地上，被田主害死，说白鹤是皇家所赐，害死白鹤犯欺君之罪，弄得田主不敢认田，他便占为己有。他建花园，随意移植别人的花木。以"挡路"为理由，强拆民房。还有其他种种不法劣行。漳州的民间传说，还将颜继祖作为乡贤杨联芳的对立人物，说杨联芳对颜继祖的种种不法行为都加以制止。其实，两人为官不同时，据《龙溪县志》卷七《坛庙》记载"杨副使祠在十二三都，祀贵州副使杨联芳。明天启七年，乡人以其有功于民，为立祠焉。"可见，杨联芳在天启七年（1627年）以前便去世了，而颜继祖成为大臣是崇祯元年（1628年）以后的事，最高官职是以佥都御史巡抚山东，更没有任尚书。

崇祯帝的后妃中没有一个白妃，最受宠爱的是田妃，并非颜继祖所进，而是“选秀女”时入宫的。颜继祖生前著有《双鱼集尺牍》，李初华在序言中说：有一次，颜继祖奉命要去广西册封桂王，路过扬州，看到一个年方及笄的姣姣女子，头插草枝，跪在路边，知道是要卖身的，就用500两银买下，晚上备酒肴准备成婚，作为侍妾。见她泪流满脸，问其故，知道她姓田，叔父谋财害命，埋尸后园。事情败露，叔父行贿于官府，嫁祸父亲，致使她父亲被无辜判定死罪，狱中候决，她卖身是要救父，还不知道事情能否办妥。颜继祖听后十分同情，叫她闭门自睡，自己在厅上观书达旦，打发她回家，然后到江都县衙见知县，请他重新审理此案，果然水落石出，确定杀人凶犯是田氏叔父，她父亲无罪释放。田氏父子到旅舍叩谢，而颜继祖已去广西，连500两银也不曾要回。该《序》没有说明田女的结局，写《序》时田妃尚未入宫。传说那田氏女后来成为崇祯皇帝最宠爱的田妃。据《明史·后妃传》，田妃的父亲田宏遇，原陕西人，移居扬州，颜继祖正是邂逅田氏女于扬州，那田氏女即后来的田妃之说似乎可信。田妃聪明伶俐，为崇祯帝所特别宠爱，封贵妃，其父官至都督。颜继祖连连升官，是否与田贵妃有关，不得而知。《明史·后妃传》记载，田贵妃后来失宠，被谪居别宫，所生第五皇子死子别宫，她悲痛致病，已于崇祯十五年七月逝世，否则，她也许可救恩人颜继祖一命。

黄道周之忠烈

黄道周，字幼玄，号石斋，明万历十三年（1585年）出生子漳浦县铜山所（今东山县铜陵镇）。25岁迁居漳浦县城，设“东皋

书舍”教书。天启二年（1622 年）中进士，任翰林编修，为经筵讲官，因不满魏忠贤把持朝政而辞官回漳浦，继续设馆讲学。崇祯三年（1630 年）为母守制满三年，入京复职。那时满兵犯边，崇祯帝中反间计，冤杀督师蓟辽屡获大捷的兵部尚书袁崇焕。袁崇焕的荐举者内阁首辅钱龙锡受牵连入狱，黄道周上疏为之申辩，被崇祯帝罢官，逐出京都。他游历各地名胜之后回漳州，在紫阳书院讲学。崇祯九年奉诏复职，历任左谕德兼司经局、经筵讲官、少詹事、翰林院侍讲学士兼管玉牒等职务。崇祯十一年，连上三疏痛斥首辅杨嗣昌、宣大总督陈新甲、辽宁巡抚方一藻向满洲纳地求和的行为，并于皇帝召见时与之当面争辩，被降职六级，贬为江西按察司照磨。他请假回漳浦北山讲学。崇祯十三年，江西巡抚解学龙举荐黄道周，说按他的品德，可以入阁办事。崇祯帝怀疑他们结党，将两人逮捕入狱，拷刑追究同党，朝臣十多人上疏为之申辩，也被疑为同党，逮捕下狱。黄道周被遣戍（充军）于辰阳。崇祯十五年，崇祯帝为讲经的需要，传旨复黄道周原职，而他以老病请假，翌年回到漳州，在江东邺山和漳浦明诚堂讲学。统计黄道周在朝时间总计不过 3 年。

崇祯十七年三月，崇祯皇朝覆亡，凤阳总督马士英等拥福王称帝于南京，改元弘光。黄道周应召出任吏部左侍郎，晋升礼部尚书，他上疏献收复失地七条策略，未被采用。翌年，他被派到浙江祭禹陵，事毕尚未回朝，弘光已为清军所败。潞王在浙江称监国，不上十日也亡。总兵郑鸿达奉召守镇江，不战而逃，路上遇唐王朱聿键，拥至浙江，欲入闽。黄道周谒见唐王于桐庐船中劝阻，又上书说：“闽自五代以来，割据偷安者率不能自拔，宜审地势通塞，暂驻衢州。”书上，郑鸿达已拥唐王过仙霞岭。闰六月，郑鸿达与兄郑芝龙（福建都督）拥唐王称帝于福州，改元隆武。黄道周派人入贺，自己从间道归里，唐王派人追及于途次，邀入朝

任武英殿大学士兼吏、兵两部尚书。道周草创区划，建立朝廷。而兵权和财权掌握在郑芝龙手中，他另有打算，无意抗清。道周名义上虽属首揆，实无可作为，乃自请募兵出战，于七月与几位学生离开福州，八月至延平，一路经建宁（今建瓯）、崇安，募得义兵三千多人，编为十营。又有江西义军二营来投。粮饷全靠捐献。乃出分水关至广信（上饶），又有江西、浙江义军来投，共集万人之众。道周命令分路出击，一路出抚州，一路出婺源，一路出休宁。义军士气旺盛，但未经过严格训练，只凭热血勇进，在小胜之后便骄兵冒进，不听调度，有的孤军深入，以至首尾不能相应。出兵不上十日，三路皆败。黄道周向隆武帝请调救兵，帝命郑鸿达出兵支援，而鸿达阳奉阴违。黄道周与诸将商议道："与其坐败，不如一决死战。"十二月从广信反攻婺源，至童家坊明堂里被清军包围。黄道周与追随在身边的几位学生被俘至南京，拒绝洪承畴的劝降，翌年三月五日从容就义。

黄道周"不二色"

后人评论黄道周，除了称赞他的忠烈和学术上的成就以及书法的精湛，还有私生活的严肃，尤其对男女关系的严于律己，被认为旷世少有。清康熙进士、雍正朝礼部侍郎方苞的《方望溪文集》中有一篇《石斋黄先生逸事》。据明末遗老杜苍略说，崇祯年间，中丞（副都御史）余集生与名士谭友夏在南京组织一个文社。黄道周一度游南京，与他们结交，感情融洽。文社诸友佩服黄道周的人品，又认为他过于拘泥礼法，想试试他果真是循规蹈矩的正人君子否。那时有一个被誉为"国色"的名妓顾氏，不但颜貌体态姣好，而且聪慧，通读史书，能诗善歌，为名士们所醉心。一

天，文社诸友集合在余集生家园，设宴招待黄道周，召顾氏来陪酒。诸友极力向黄道周敬酒，将他灌醉，然后把他扶到一间卧室里，只放一张床，一套被褥，叫顾氏入内共眠。到四更鼓响，黄道周醒来，转过身子，顾氏假装无意，向黄道周贴近。道周不理会，过一会儿又睡着了。翌晨，黄道周辞别而去，顾氏对文社诸友诉说黄道周全无苟且的情况，并说："诸位都是名士，但只知道赋诗饮酒作乐而已，为佛为圣，成忠成孝，终归黄夫子。"从此，黄道周"不二色"（除妻子以外，不与别的女人发生性关系）被传为佳话。

陆希韶"一夜渡南台"

漳州东乡港口村是陆姓聚居地，据传是宋末崖山殉国的丞相陆秀夫后裔。港口村附近有解元洲，因该村秀才陆希韶于明末崇祯年间中解元（举人第一名）而得名。

陆希韶父母早亡，自幼依附于叔父过活，田园都被叔父霸占。叔父有一个儿子，与希韶同龄，同是龙溪县庠生。二十岁那年正逢大比年（三年一次省城考举人），两人都准备往福州应试。

一天夜间，叔父到村边厕所方便，仿佛听见厕边竹丛里啾啾有声，他注神一听，听到有声音说"本科解元属此乡"。叔父自揣：这是土地神的指示。本乡只有我儿子和侄儿是庠生，才有资格去考举人，本科解元不是儿子就是侄儿了。

考期将届，叔父将希韶锁禁于书房中，只叫儿子上省应考，到考期前一天才把希韶放出来。漳州距省城福州有数百里之遥，希韶要赶考已来不及了，只有搓手顿足长叹命薄而已。他苦闷行吟于溪畔，突然见一个老渔夫摇船而来，问道："考期已届，相公为

何还在这里闲游?”希韶诉说因由，老渔夫道：“我有办法在一夜之间送你到福州南台上岸，你若得高中，可不要忘记我呀!”希韶大喜，即刻登舟。只闻呼呼风响，拂晓果然船到南台。希韶一口气赶到考场，赴上考试。

发榜之后，捷报传到港口陆家，叔父迎接报子入内，才知道考中的是侄儿，自己儿子名落孙山。

陆希韶中举后，到广西任知县，行前曾在家乡村口竖立旗杆，光宗耀祖。他不忘当年老渔夫“一夜渡南台”之恩，但在东乡一带找不到这个人。后来游览浦头港码头，见到“周爷楼”上所祀周仓将军形象与当年那个大眼睛大胡子的老渔夫一模一样，才知道那老渔夫是周爷之神所化，就尊周爷为“渡人侯”，将周爷楼庙宇修葺一新。庙里有“琼花魁首”匾额，因为据《北游记》，周仓是琼花转世；“魁首”即解元，是后人按周爷在一夜之间将陆希韶送到南台，赶上考期，中了解元的故事而设置的。这故事有虚构成分，而陆希韶中解元属实。乾隆《龙溪县志》卷十三《选举》篇记载“崇祯六年解元陆希韶”。“一夜渡南台”的故事有夸张，但浦头港曾是漳州的重要港口属实，在陆路交通困难时代，是漳州通省城的捷径。

“贝勒夫人”传说

郑成功占据闽南沿海一带坚持抗清，与清军争城夺野，反复战斗，漳州为争夺重点，战斗非常激烈。最著名的是“壬辰之役”，即顺治九年（1652 年）郑成功围攻漳州城事件，自三月至九月共围城六个月。府、县志记载，城中粮尽，食人炊骨，死者七十多万人。后人认为，当时漳州城人口没有那么多，饿死人数有

夸大。其实，四乡及邻县人漳州城避难者甚多，就是守城清军也由夺取民食至“分街食人”，饿死二万多人。漳州坚城将被郑成功攻破的时候，清廷派固山额真金砺救援漳州（“固山”是清军最大单位，即“旗”，“额真”是长官，“金砺”是人名）。郑成功见势不敌，解除漳州之围，撤退至古县，在古县战败，退守海澄和厦门。

翌年十一月，清漳州协守将、千总刘国轩往厦门约郑成功来取漳州城。十二月初一夜，郑成功派大将甘辉、洪旭率领战船千余艘，开到漳州东门外浦头港，以放火箭为号，刘国轩开城门迎接郑军，清漳州总兵张世耀、知府房星叶只得投降。漳州府所属各县闻讯也都投降。

顺治十二年，清廷调大军反攻漳州。民间传说在这次战斗中有一段故事，被收入小说《台湾外志》，说书人采为蓝本，广为流传。故事说，清廷派来一员力大无穷，能使一口 120 斤大刀的“贝勒王”罗托，其大军所至之处，如秋风扫落叶，刘国轩兵败退出漳州城，来到南乡洪塘村东边的乌垅仔底，从西绕过凹形山垅，向东逃去。贝勒王罗托率领骑兵追到村东山上，看到对面山冈上的刘国轩败兵都是徒步的，不难追上去杀他一个片甲不留。想不到所经过的山垅是一片烂泥田，表面上的草皮是刘国轩令兵士从别处连根带土锄来铺上的，伪装成一片坚实的草埔。贝勒罗托与跟随他冲锋的骑兵们一个个陷进烂泥里不能自拔。刘国轩从对面山岗上万箭齐发。贝勒罗托挥舞大刀如风轮旋转，射到他身边的利箭纷纷落地，但结果还是抵挡不了连续不断的乱箭，与随他冲锋的骑兵们都成箭下之鬼。后继部队见状，掉头败逃。贝勒罗托阵亡的消息传到北京，朝廷大为震惊。贝勒夫人身穿孝服哭上金銮殿，要求让她带兵十万到漳州为夫报仇，得到顺治皇帝允准。贝勒夫人率大军浩浩荡荡而来，早有探马报知刘国轩。刘国轩设计

一个对付办法，村人答应听从。贝勒夫人亲率大军来到洪塘村口，只见一大群身着孝服的村人跪在路边迎接，人人大骂刘国轩设计杀害贝勒王爷。贝勒夫人进入村里，看到家家祀贝勒王神位，人人披麻挂孝，哭求抓拿刘国轩来剥皮活祭贝勒王。贝勒夫人本来咒誓要杀绝洪塘村人，这时见到洪塘村人如此悼念贝勒王，就后悔错怪了村民，反而同情起洪塘村人来。村人大摆宴席款待贝勒夫人，并到清军营帐犒劳兵将，把人人灌得酩酊大醉。这时，高阜上起火为号，预先埋设的地雷火炮齐发，震天动地，十万清军尽成炮灰，贝勒夫人也被砍杀。

洪塘村转危为安，但村民感到杀了那么多人，心中不安，纷纷传说，夜间常听到荒埔上有冤鬼啼哭之声，弄得人心惶惶。为此抬神像来镇压，在每年正月十二日消灭清军那一天，抬着洪塘大庙里的“都天元帅”等神像，从相反方向对冲而来，用神像的轿椅互相碰撞，叫做“磕厄”，借以镇压冤魂，那地方就叫做“磕厄埔”。

根据史料，顺治十三年率清兵人闽克复漳州的是被任命为定远大将军的世子济度（郑亲王之子）。乾隆《漳州府志》记载：“顺治十二年春，世子王济度。贝勒巴尔处浑，贝子吴达海等率大兵入闽，郑成功度势不支，六月堕漳州及漳浦、南靖、长泰、平和、诏安各县城。”江日昇《台湾外记》写为“贝勒世子罗托统满汉官兵平海至闽”，可见“贝勒罗托”即是“世子济度”。“济度”是满语人名的官方汉语音译，闽南话则译为“罗托”。“贝勒”是清朝地位仅次于亲王、郡王的封爵，“世子”是亲王嫡子的封号，这次“人闽平海”的是郑亲王的嫡子济度（罗托），有的史志称其为“世子”，有的称其为“贝勒”，有的按汉人称谓加一个“王”字，称“世子王”或“贝勒王”。

乾隆《海澄县志》记载：“顺治十二年春，世子王率大兵恢复

澄城，贼深沟重垒，攻者多伤。”翌年郑成功部下黄梧献海澄城降清。清世子济度奏报朝廷，封黄梧为海澄公。（以上见于地方志及《清史稿》、《台湾外纪》等书记载。）可见，济度（罗托）并没有在洪塘战死，“贝勒夫人”率十万大军复仇而全军覆没之事纯属民间虚构的故事。按史志记载，济度率三万大军入闽平海，已迫使郑成功堕城转移，十万大军怎能是洪塘村招架得了的。而洪塘村确有“磕甩”风俗，故事相传至今，有可能是清军曾在该处打过一次败仗，损失很多兵马。

漳州“前五虎”

郑成功起兵抗清，漳州许多英雄投入他麾下，其中五人以战功升官至镇将（总兵）、提督，参加过围攻南京城的战役，在民间传说中叫做“五虎闹南京”。后来漳州又出现五个英雄，称为“后五虎”（另详）而称先前“闹南京”的五虎将为“前五虎”。

前五虎中，最早投入郑成功麾下的是海澄县东园乡下房村人甘辉。这人矮小精悍，勇猛刚强，而且富有战略眼光，以战功升官中提督，是郑成功的最主要部将，永历帝在封郑成功为延平郡王的同时，封甘辉为崇明伯。地位仅次于甘辉的是万礼，原名张要，平和小溪人。是“以万为姓”结盟兄弟的首脑，与他的盟兄弟万二（郭义，海澄县人）、万五（万礼的胞弟，道宗和尚）、万七（蔡禄，漳浦下店村人）等，于崇祯末年组织“九甲义军”反抗官府。崇祯亡后，他们转而抗清。万五为僧，与郑成功有往来。南明永历四年（1650年）四月，郑成功率主力经诏安攻潮州，万礼与郭义、蔡禄率九甲义军来归附（其他万姓兄弟不详）。他们屡立战功，万礼升官至后提督，封建安侯，郭义、蔡禄也升官镇将

（总兵）。

“前五虎”中还有一个是赤脸大汉刘国轩，长汀人，原任清军把总，协守漳州。他乘张世耀接任总兵伊始，人生地未熟之机，于顺治十一年（南明永历八年）十月秘密到厦门，约郑成功来取漳州。郑成功派甘辉等于十一月初一日率船队开到漳州东门外浦头港登陆，放火箭为号，刘国轩开城门迎郑军入城，清军总兵张世耀只得投降。郑成功于初四日到漳州，任命刘国轩为护卫后镇，张世耀为监督。

郑成功于南明永历十三年（清顺治十六年）六月初打过长江，围困南京城。郑成功过于自信，误中清南京总督管效忠诈降的缓兵之计。围城一个来月，兵将警惕性逐渐松懈，虽然布置大炮于阵地对准各城门，但是出乎意料，清军突然从久已堵塞并建了民居的神策门挖墙冲出，援兵从后面打来，郑军前后受敌，仓皇应战，而将士又争功冒进，郑成功下“不得吾令不得进兵”命令，致部下不能灵活作战，结果溃败。甘辉受围，力战不退，终至被俘，坚决不投降，被杀。万礼被乱箭射死（一说落水溺死），郭义泅水逃生，蔡禄、刘国轩杀出重围。郑成功退到长江口崇明岛，收拾残兵，退回厦门。

郑成功于永历十五年（顺治十八年）正月率主力征台湾，留儿子郑经守厦门，派郭义、蔡禄带本部兵马协助守将张进镇守铜山。郭义、蔡禄不接受郑成功“将家眷送往台湾”的命令，受前已叛郑降清的黄梧策反，率部下渡过八尺门降清。后郭义任清军广西总兵，蔡禄任河北总兵。清康熙十三年（1674 年）镇滇的平西王吴三桂勾结镇闽的靖南王耿精忠起兵反清，并策动郭义参加叛乱，打进广东。那时，镇粤的平南王尚可喜老耄，其子尚之信幽禁老父，响应叛乱，形成“三藩之乱”。蔡禄受郭义策反，密谋响应叛乱，被清廷察觉，将其处死。刘国轩则前已随郑成功至台

湾，后成为郑经的主要将领，乘“三藩之乱”打进福建、广东，于康熙十九年三月兵败退回台湾。郑经于康熙二十年病逝，十二岁的儿子郑克塽继位为延平郡王。那时三藩都已平定，清帝于康熙二十一年任用施琅为靖海将军，出征台湾。刘国轩率船队到澎湖迎战，失败，请郑克塽投降。清廷封郑克塽为汉军公，与其族人迁往北京居住。任用刘国轩为天津总兵。刘国轩很称职，病逝于任上，他是“前五虎”中的惟一善终者。

“后五虎”的传说

民间传说中的“后五虎”是柯彩、陈龙、许凤、吴田、蓝理。民间传说写进《台湾外志》，成为说书人的脚本，更助长故事流传。“后五虎”故事主要说那五个英雄卑微时的狼狈相和显贵以后的飞扬跋扈。柯彩，南门人，自幼丧父，靠母亲替人纺纱为生，三餐不继。柯彩自幼失管教，只与人学武术，不务正业。有一个舅父名李富。在浦头盐鱼市一家鱼行当司秤，工钱不多，要养活一家三口，还要每月挤出一点钱去周济自己的妹妹——柯彩的母亲。柯彩三番两次去骗舅父，不是说母亲病了，要钱买药，就是说母亲死了，要拿钱雇“土工仔”埋葬。后来他的母亲真的死了，去向舅父要钱，舅父以为又来骗钱，不给。柯彩哭哭啼啼，拿不到钱不走。鱼行老板对李富说：“这回你的妹妹可能真的死了，我叫账房先付三千文，以后在你工钱项下扣抵吧。”李富点头。柯彩拿到三千文钱要回家埋葬母亲，路过赌场门口，听到里面喝一喊六的声音，不禁动了赌瘾，心想：三千文钱刚好买一口薄棺和雇两名“土工仔”抬尸，若能在葬穴上加一层灰，那就更好，何不进去赌它一把，赢得买灰钱再埋葬未迟。心里想着，两脚已跨进赌场。他

一连下了几个赌注，都输给“庄家”了。他垂头丧气地回到家里，天已黑了。他的拜把兄弟陈龙来探望。陈龙也是一个市井无赖，本来在龙溪县衙里当差役，负责传讯诉讼双方当事人，因为向当事人敲竹杠，被一个绅士检举，丢了差事，来与柯彩结伙，靠向卖零食的小贩强赊食品充饥。这夜他到王爷公庙偷到一些火油（花生油）来点灯，与柯彩守尸到天亮，就用草席将尸体卷了，抬到公冢去埋。逢到一阵雷雨，两人滑倒，尸体掉在山坎下，被山洪冲下来的泥沙掩埋了，就这样草草填上土，做成墓堆。过后，柯彩的舅父来察看，连声称赞这是一处“螃蟹穴”，如果不用棺材，用草席卷尸更好，因为螃蟹喜欢栖息在草丛里。柯彩实说正是这样葬法，舅父说：“子孙能出一品官。”柯彩的房子已经破漏不堪，母亲死后，就到浦头庙与陈龙同住。两人常在衙上向零食摊强赊食物，每每赊账不还钱，弄得挑担子卖零食的小贩看到这两人走过来便赶快收摊走避。

许凤，父亲是江西人，来漳州当武官，家住南门外蜈蚣山范爱亭。他得父亲传授武艺，后来父母染时疫去世，他凭借一身飞檐走壁的本领，以逾墙入户盗窃为生。一天，许凤入城游荡，来到东门，见从马道底过来一个富裕人家的女婢，挑着两大篮供品，举步艰难，走不上几步就停下来休息一下。许凤上去搭讪，问道：“你挑这担供品是要去巷下玄天上帝庙还愿吗？”女婢答：“是的。”许凤说：“我正闲着没事，让我来替你挑，工钱三文钱就好。”女婢见工钱便宜，自己身边也还有几个钱，就让他挑了。他挑起两大篮供品，飞也似的奔出东门，一会儿就到巷口，女婢怎么跑也跟不上。许凤右转弯向柑仔市奔去，女婢连忙喊：“走错路，要向左转才是巷下庙！”许凤只当没有听见，继续往前奔，又一连拐了几个弯，女婢再也找不到他了，只得哭着回去告知主人，挨了一阵骂也无可奈何。许凤躲到一个厕所里，将两大篮供品吃得只剩

下一大块熟肉，揣在怀里，将两只大篮和一对锡酒瓶便宜卖掉，继续游荡。来到天后宫前，见一个彪形大汉迎面走来，人未到，那些摆零食摊的小贩都喊："柯彩来了，赶快走！"纷纷收摊，挑起担子，匆忙逃避。许凤想："这个柯彩威头这么大，了不起，应该结交。"就上前搭讪，互道姓名身世，语言投契，相见恨晚。

一路走，一路谈，两人来到新桥头，看到一群庄稼汉人人手持扁担，一齐围攻一名大汉，那大汉靠在墙壁上，并不还手。打了一阵，那些庄稼汉以为对手必死无救，呼啸而去。许凤和柯彩见那大汉竟然无恙，赞道："这人功夫真了不起！"有意结交，上前问原委。那大汉诉说：他叫吴田，古县社人，幼年就死了父母，靠叔父抚养长大，长到十六岁，独立谋生，常与人赌博。他们吴姓在古县是小姓，郑姓是大姓，他与姓郑的人赌钱，输了就白白把钱送人家，赢了却拿不到钱。他为讨赌钱而被打得遍体鳞伤，气愤不过，立志报仇，跑到凤阳府拜师学得一身武艺，然后回漳州，寻机报仇。古县郑姓人多势盛，吴田不敢去，只在古县人人城所必经的新桥头，口喷铁珠，打穿古县人人城挑粪的木桶，作为挑衅，因此引起古县结队人城的挑粪人，一个个抡起扁担向他乱打，而一个个被他夺去扁担。吴田正要将那一群人横扫，他的叔父气喘喘地赶来，连喊"住手！"劝道："田啊，你这样一来，我在古县就不能容身了！"他体会叔父的处境，恐怕叔父受连累，就任古县人拾回扁担来向他乱打，一直没有还手。

过后，柯彩和陈龙邀吴田到浦头庙同住。后来又来了一个蓝理，是漳浦茨坑人，长得十分魁梧，虎头燕额，武艺高强，却因为不务正业，盗窃为生，族长要抓他去活埋，他跑到山洞里隐匿，日间睡觉，夜间到人家园里偷挖番薯，以火烧烤熟了吃，吃久了，感到很"燥"，就到人家蔗园里偷甘蔗吃。时间一久，村人纷纷喊番薯被偷挖，甘蔗被偷折，吃过了的蔗渣留在园里。有人看到，那

是蓝理做的好事。于是，族长下令搜捕。蓝理连夜逃脱，跑到漳州，投入柯彩那一伙。

五人十分投契，结拜为异姓兄弟，平时去强赊一些食品，或到田间偷一些大豆、番薯，有福同享，捞不到食时一同挨饿。衣服穿得破破烂烂，上衣不蔽体还不要紧，裤子太破见不得人，后来，五人剩下三条可以蔽体的裤子；只好轮流让三人穿着，出去搞一些吃的，还有两人光着屁股躲在破棉絮里睡觉。

浦头码头附近有一个行商名徐报，对这一伙人很同情，常周济他们，并送给衣裤。当时漳州是清军占领区，厦门是郑经占领区，徐报常雇船偷偷到厦门办货，知道郑经在招兵，就鼓励五条大汉到厦门投军。五人大喜，同往厦门投入郑经军队，后屡立战功，升任参将。

郑经要攻漳州，命吴田为先锋。吴田要乘机报仇，要求郑经让他先攻古县，郑经答应了。这风声很快传到古县，古县人恐怕会被杀得鸡犬不留，急忙由族长挑选几位代表，用船载运猪羊美酒去厦门与郑经认亲，犒劳将士，要求郑经不要让吴田来攻古县。郑经感到，军令如山，不可收回，就想出一个两全的办法，对古县人说，已经答应吴田了，军中无戏言，只能缩短时间，要吴田“傍晚从厦门出兵，鸡啼回来缴令”，叫古县人在这个时间内暂避其锋。吴田认为古县地方不大，在短时间内就可将它踏平，答应依令而行。但尽管吴田用十八桨快船渡海，来到古县已经是下半夜了。古县人躲进土楼内，一时攻打不下，一会儿，鸡啼了，吴田只得收兵回厦门缴令。

郑经乘“三藩之乱”攻入闽南，后来败回台湾。柯彩、陈龙、许风、蓝理降清，屡立战功，都升官至总兵以上。独吴田不降，为郑经坚守蚶江，壮烈牺牲。

这些故事符合历史情况，但情节不全是真实的。蓝理《清史

稿》有传，他与柯彩、许凤、陈龙不是同伙，只因为石碑坊同立在东门外岳口街，被传说为同路人。

史志记载的“后五虎”

民间传说的“五人穿三条裤”、“抢灰输棺材”等故事虽不一定全是事实，而“后五虎”却实有其人。其中吴田一人为郑经抗清而战死，《福建通志》的《兵纪》篇记载：康熙十六年，福建总督郎廷相奏：“长泰天柱山贼寇（指郑军）已荡平，又进击东埭、塔潭，击毙伪将军吴田，贼将远遁。”其余四人为清朝立功，身经百战，幸而不死，升官至总兵、提督。乾隆《漳州府志》的《选举志》“国朝特用武职”篇记载：陈龙，龙溪县人，任金门镇总兵。许凤，海澄县人，任漳州镇总兵。柯彩，海澄县人，任威宁等处总兵。蓝理，漳浦县人，任福建陆路提督。又在《规制》卷记载三人的石牌坊（独陈龙无牌坊）：“楚滇伟绩，闽越雄声”坊，康熙年间为总兵许凤立，在东厢（今新华东路，尚存）。“三边节钺，八命元戎”坊，康熙年间为总兵柯彩立，在东厢（无存）。“勇壮简易，所向无前”坊，康熙年间为提督蓝理立，在东厢（尚存）。蓝理之弟蓝瑗也官至都督，立“折冲之才”坊于南厢（无存）。

“后五虎”中只有蓝理一人在《清史稿》和地方志中有传记，蓝鼎元写的《义山公家传》（见《鹿洲全集》）尤其详细。按传记，蓝理不曾投入郑经队伍，他是二十岁时纠集本族中的勇夫去打败占据井尾、岱嵩二岛的海盗卢质，向漳州府报功，想借此为进身之途，想不到反而被怀疑为也是海盗，监禁于死牢。至康熙十三年（1674 年）靖南王耿精忠反，尽释囚犯，叫他们去投军。蓝理却走间道出仙霞关，投入清康亲王杰书麾下，在温州战胜耿精忠

的大将曾养性后，于康熙十五年随军入闽，任建宁游击，后调来闽南与郑经作战。康熙十八年任灌口营参将。翌年，福建总督姚启圣驻漳浦筹饷，令蓝理驻同安高浦筹饷，派亲信向蓝理索款，蓝理不买账，将姚的亲信捆打，姚疏报蓝理虚兵冒饷，撤职。蓝理的一名部下与人斗殴，误伤人命，他念那部下老母无依靠，自认是凶手，被关进监狱，他请准军前效力。康熙二十一年施琅征台湾，慕蓝理英勇，用为右营游击，担任前锋，其胞弟蓝瑗、蓝珠，族人蓝法等从征。郑克塽的主将刘国轩守澎湖，令曾遂等领兵万人迎敌，战船蔽海。蓝理督兵奋战，自辰至午，战斗越来越激烈。一颗炮弹从蓝理身边擦过，蓝理战袍着火，他急忙倒在甲板上翻滚，将火压息。曾燧大喊："蓝理死了！"蓝瑗扶蓝理起立，蓝理仍疾呼："蓝理没有死，是曾燧死了！"一面叫蓝法拿刀来，蓝法送刀过来，见蓝理肚破肠流出来，将肠装入蓝理腹中，蓝瑶用衣服替他缚住，蓝珠拿布来包扎。这时，对方战船迫近，有几个号称"飞天鼠"的郑军特种兵从那边桅杆跳到这边桅杆，滑到甲板上，要杀蓝理。蓝家兄弟力敌，杀了"飞天鼠"。蓝理继续督战，大呼杀贼。他的炮兵击沉敌舰二艘，其余敌舰溃逃。蓝理指挥追击，施琅恐其有失，发号收兵，退驻荒岛。施琅请随军洋医为蓝理医伤，医嘱七天后才可下床走动。可是才过三天，蓝理听说施琅又出战，便登上鸟船（大船）赶到战阵。这时施琅的楼船突出战阵，因"冲犁"过猛而搁浅，受包围。施琅一只眼被炮弹碎片击中，血流满脸。蓝理乘鸟船赶到，船篷上大书"蓝理"两字，对方兵将惊呼："蓝理来了！"连忙退却。施琅移到蓝理船上，继续指挥总兵吴英、陈蟒、魏明、董义、康玉、朱天贵、林贤等合力追击，自辰至申，焚敌舰百余艘，占领澎湖，迫使刘国轩逃回台湾，请郑克塽献台湾投降。清廷论功，以蓝理为第一。

蓝理受康熙帝赏识重用。他热心公益事业，在任天津总兵时，

兴修水利，辟大片洼地为田，号“蓝田”，首创北方种水稻之先声。任福建提督时，修复因战争破坏的江东桥，建漳州田里港岸及浦头街，还有其他种种建设，经费由自己献款倡导，发动文武各官捐献，并向有劣迹的富人罚款。他部下乘机借蓝理之名敲诈勒索，被福建总督梁鼐及巡抚觉罗满保奏劾“贪婪酷虐”，朝廷派侍郎和托廖腾煃来福建与督、抚会审，论罪处斩。康熙帝念其功，诏从宽免死，编入旗籍住北京。康熙五十四年自请从征策妄阿喇布坦的叛乱，赐总兵衔。后病逝北京，妻子运棺归葬漳浦。

黄公爷与公爷街

黄梧，字君宣，平和县人，清初曾任平和县衙皂役，后投入郑成功队伍，以战功升官至镇将（总兵），于顺治十三年（1656年）献海澄城降清。在漳州主持“剿海”军事的郑亲王世子济度奏报皇帝，封黄梧为“海澄公”。黄梧曾向清廷献“平海十策”，包括“迁界”，并为清廷招降许多郑军官兵。康熙二年（1663年）清军攻厦门，黄梧与福建总督李率泰出嵩屿，水陆夹攻，克复厦门、金门、浯屿三岛。郑成功已病逝于台湾，其子郑经退守铜山。清靖南王耿继茂令黄梧率兵驻云霄防剿。翌年，黄梧又招降了郑军大将周全斌、陈升、黄廷、何政、许贡、李思忠等，遂与耿继茂、李率泰及提督王进功渡海夜袭，攻克铜山，郑经退守台湾。这时黄梧上疏：“自海上归诚十二年中，先后招抚文武官员二百余，兵数万人，有蒙赐封侯伯且世袭者，臣公爵未定何等及承袭次数，乞敕部严议。”清廷下诏，定封黄梧为一等公爵，世袭十二次。

清廷令黄梧镇驻漳州，人们尊称他为黄公台，或称黄公爷。民间传说，黄梧占据明代谢琏的“探花府”，改为“公爷府”，而人

们总习惯叫那一条街为“探花街”，他为改变街名，就于正月初一起，在这条街的中心地点搭台演戏，引诱人们来看戏和做买卖。他派兵在街的两头把守，对要过街的人都问“去哪里？”若答“去探花街”，便用藤条鞭打，若答“去公爷街”，便叫他从瓮中自己抓一把铜钱。至十五日，黄公爷见群众都改口叫“公爷街”了，就停止演戏。以后，每年自正月初一至十五都演戏半个月，作为民间一大乐事。这惯例一直沿袭下来，民国时期不改，半月间天天热闹非凡，凡去逛游的都叫做“赴公爷街”。解放后这条街改名为南昌路，每年春节初一至十五日在这里演戏和做买卖的活动改称“游春场”，而人们仍按习惯称为“游公爷街”。后公爷府改建为漳州市（今芗城区）人民政府，一年一度的游春场改设于别处，往往一年更换一个地点，而无论迁设何处，人们都称其为“公爷街”。每年春节未到，便有人在打听“明年公爷街要设在哪里？”“文革”时期游春场（公爷街）的习俗也废止了。

第二代三次海澄公袭爵

据《清史稿》，康熙十三年（1674年）第二代靖南王耿精忠响应平西王吴三桂叛乱，传檄到漳州，海澄公黄梧正患毒疮（背疽），得知政变消息，又惊又愁，毒疮暴发而死。（另据江日昇《台湾外纪》，耿精忠封黄梧为平和公，而郑经乘这机会，由台湾率兵至厦门，进占海澄，也传檄来，封黄梧为德化公。）黄梧死时，其独子芳度年方二十三，表面上接受耿精忠对他父亲的封号，袭爵为平和公，一面招募六千人充实武力，共一万兵将经两个多月准备，见时机成熟，便袭杀耿精忠派来的都督陈豹，用蜡丸密藏奏疏，派黄蓝到北京陈奏对清廷的忠心，得康熙皇帝嘉许，下诏

以黄芳度袭爵海澄公。(另据《台湾外纪》，黄芳度一面又应付郑经，表示愿意接受“德化公”封号，而且容纳了郑经派来的漳州知府)。清廷发来上谕，说已派兵从浙江、江西、广东三路入福建，问黄芳度“调何路兵先到迎会合剿”。黄芳度上疏：“漳州介耿郑二逆间，自八月以来坚与耿拒，伪与郑和，因得阴行招募，练成劲旅万人，分布漳城及龙溪等五县。二逆构怨已深，势必俱败，诚得粤者乘胜进攻，臣当率师迎会，迅奏扫除之功”。(另据《台湾外纪》，郑经要黄芳度到海澄相会，黄芳度托辞不赴，郑经知道黄芳度只是虚词应付，开始进攻漳州城。)清廷援兵迟延未到，漳州城受郑经包围经年。康熙十四年黄芳度又上疏清廷：“臣拒耿弥郑，固守一载有余。近二逆通好，谋已泄，郑逆遂撤回各镇，蜂聚海澄，备粮缮器。臣知其狡谋，派总兵杨仕猷守平和，并令臣从兄芳泰突围赴广东接引大兵，斩其将黄鼎新、卢黄等。但孤城缺粮，百计难支，计粤路援师旦夕可至，乞密敕浙江、江西两路兵迅速进发，俾二逆不能相顾，臣可会合奏功。”

漳州城自康熙十三年五月被围，至翌年七月，郑军增兵，架云梯攻城，并开炮击毁城墙三十多丈。黄芳度率将士边战边补筑城墙，而郑军围攻愈紧。黄芳度连连上疏告急，请求催促援兵速来解救，并拨粮接济。清廷的战略是，先剿打入浙江的耿精忠部队，然后平闽。至十月，漳州城粮尽，主将吴淑叛变，引郑军入城。黄芳度率兵巷战力竭，赴开元寺投井自尽，终年25岁。郑经为报黄梧挖掘郑家祖墓之仇，派人从井中捞出黄芳度尸体，加以戮磔；挖掘黄梧之墓，破棺毁尸；杀黄梧之弟黄枢、侄芳名、芳声、芳佑及亲族、部下三十多人。

黄梧兄子黄芳世，早先于康熙元年携黄梧的奏疏晋京觐见皇上，被留在宫廷任一等侍卫。至康熙十四年黄芳度派黄蓝上京告急，芳世自请随大军从广东进援漳州，得康熙皇帝嘉许，任命为

“福建随征总兵官”。芳世至广东，其胞弟芳泰也从漳州突围至广东讨救兵。逢平南王尚可喜（已老耄）之子尚之信叛附吴三桂，芳世、芳泰与广东巡抚杨熙杀出重围，要来救漳州，在行到距漳州还有两天路程的永定时，郑军已攻破漳州城，并且向闽西进军，攻取耿精忠地盘。芳世、芳泰退守广东惠州。清廷降诏，以黄芳世袭爵一等海澄公；任命黄芳泰为江南省京口总兵。后清廷令暂驻惠州的黄芳世赴浙江康亲王杰书军中效力，俟漳泉收复，收集海澄公旧部失散官兵，仍镇守漳州。耿精忠、尚之信先后战败降清。康熙十六年，康亲王杰书指挥清军收复漳泉，郑经退守厦门。黄芳世镇漳州，黄蓝任总兵守海澄。

康熙十七年二月，郑经令刘国轩、吴淑再度进军闽南大陆，围海澄城达四月之久才攻破。清福建总督郎廷相以师老无功被撤职，由原布政使姚启圣任总督。黄芳世镇守水头山弯腰树，被刘国轩打败，险些被俘，逃入漳州城，惊悸病死。临终以儿子年才九岁，疏请以胞弟黄芳泰袭爵。

海澄公的跋扈传说

姚启圣任福建总督期间，清军在闽南打击郑经部队连获胜利。那时黄芳泰袭爵为一等海澄公。据《清史稿》载，姚启圣一再疏请把黄芳泰调离漳州、福建。起初上疏说“黄芳泰年少不能辖标兵”，朝廷令芳泰往京师，黄芳泰上疏请求暂驻汀州，以便为兄黄芳度营葬，得到朝廷允准。接着，姚启圣又上疏，说：“海澄公标下旧兵闻芳泰在汀州，皆走依之；伪将吴淑兄弟以曾害芳度，不敢来降，请敕芳泰速离福建。”康熙十八年，黄芳泰被调入京，他上疏申辩：“臣久经行阵，不为幼弱；离漳已十月，不闻吴淑投诚，

督臣无计办贼，以臣借口。臣当壮年，仍乞驻闽疆，以报主恩。”康熙皇帝加以慰谕。康熙二十二年，准他回籍安葬，翌年卒，以子应缵袭爵。按史书，康熙二十二年清廷已经统一了台湾，本来在漳州主持“剿海”军事的福建总督在福州修建了总督府，居住福州，黄芳泰则在漳州享受他的太平公爵生活，虽然距离他离开人世只有一年，而在漳州民间传说中，黄芳泰十分跋扈。

传说，黄芳泰年轻气盛，处处展威风，偏偏漳州百姓不懂得“公爷”是什么官，权力有多大，只把他与漳州最大的地方官“道台”和“知府”相比。他为使群众懂得“公爷”地位有多么高，在府邸所在地的“公爷街”路口立一块“文官下轿，武官下马”的石碑，弄得不甘受辱的地方官员绕道而走，不愿从“公爷街”经过。黄芳泰放出一道“王令”，叫漳州知府来见，知府因恐冒犯，徒步前来，因此迟到。黄芳泰等得不耐烦，放出第二道“王令”去调，持令人路上遇到知府却不认识，到府衙找不到知府。等到知府来见，黄芳泰责以迟到之罪，知府稍有申辩，便被喝令推出，斩于硕仁桥。知府夫人申诉于朝廷，而冤屈终未昭雪，不知黄芳泰用什么理由瞒过朝廷。夫人将知府尸体人殓，悬棺于硕仁桥下，以示抗议。

黄芳泰斩知府，目的要使群众明白，他有御赐十三支王令，有先斩后奏的特权。偏偏有一个蓝理不服，来与黄公爷“比大”。黄说：“我是世袭一等公爵，有御赐十三支王令，要把你斩杀，可以不看日历！”蓝说：“我是福建提督，是你的父母官，有御赐尚方宝剑，可以先斩后奏，要把你斩杀，可以不等时辰！”两人争论不休，时已入夜，不能解决。后来两人同意，到厦门找施琅将军评说。两人连夜乘船到厦门，已是后半夜。值班官见是两位要员来到，连忙报告施琅。施琅在睡梦中被叫醒，以为有什么重要军情，披衣接见。问明来意，原来只是为了争论谁比谁大，施琅觉得好

气又好笑，就敷衍说："两人一样大，不用争论。"把两人打发走。

黄芳泰被施琅说成与蓝理一样大，于心不服。又听说有一个朝廷大臣唐朝彝告老归休，百姓称他唐大人，说"这个唐大人应该可以抵得上黄公爷"。这使黄芳泰更加气愤，于是决定召见唐朝彝，让群众看看唐朝彝在他面前下跪的场面，面唐朝彝拒不奉召。黄芳泰乃决定自己去见唐朝彝，带着十三个旗牌官，各背王令旗牌，骑着高头大马，直趋唐朝彝住处。原以为唐朝彝见十三支王令必然下跪，哪里知道唐朝彝的厅堂上摆着香案，展示着"敕书铁券"，上面张着一把御用的曲脚凉伞，连忙下跪在厅前天井里，只有十三个旗牌官因为身背王令，才得免跪。那时刚好下过"西北雨"（雷阵雨），唐朝彝的天井里没有铺地板，满地泥泞，弄得黄芳泰一身泥污，狼狈不堪。

黄芳泰故事体现群众的善恶观念，但在时间上是不吻合的。那三人在《清史稿》和地方志里有传记可稽。蓝理于康熙二十二年在清朝收台澎的战争中立大功，却因回乡看望父母后又为父母守丧，到康熙三十年起才先后任定海和天津总兵，康熙四十五年升任福建陆路提督时，黄芳泰已病逝 20 年。唐朝彝则是康熙六年中进士，历任太常寺卿、宗人府府丞等官，康熙三十四年归休时，黄芳泰已逝 11 年。其他如蓝理的"尚方宝剑"、黄芳泰的"十三支王令"、唐朝彝的"曲脚凉伞"、"天官琐"等，实际是不存在的，黄芳泰再跋扈也不至于敢滥杀知府吧！

刚直正义的唐朝彝

地方志记载：唐朝彝，铜山人，康熙六年进士，选入内弘文院为庶吉士，学习满文，期满散馆，先后任广西道御史、通政司

参议、太仆寺少卿、太仆寺卿，最后任宗人府府丞，至康熙五十四年归休。宗人府是管理皇族事务的机关，文书都用满文，长官“宗正”由亲王以下皇族担任，内部职官本来都是满人，这次由汉人唐朝彝来担任府丞(类似现在的秘书长)，皇族们大都不以为然，后来看他处理满文文件十分在行，才心悦诚服。

民间传说，唐朝彝大义凛然，在任宗人府府丞期间，对违法的皇族敢于办罪，康熙皇帝正需要这么一个执法不阿的大臣来替他维持朝纲，以巩固政权，所以给予大力支持，具有很大权力的皇族也无奈他何。有一次，一个亲王的独生子犯强夺民妻，滥杀无辜之罪，被唐朝彝逮捕法办。那亲王向康熙皇帝哭诉，请求从宽处理。康熙皇帝认为应该惩办，但不忍让那亲王绝了后代，审讯完毕定罪必须经皇帝批准，可保无虞，只怕在供讯过程中被唐朝彝重刑毙命，特令唐朝彝，供讯时只限打三下大板。唐朝彝意识到，皇帝有意让那无恶不作的世子法外超生，为了儆戒效尤，就叫负责施刑的衙役，将犯人的睾丸夹出大腿后面，在打屁股时，一个大板就把犯人的睾丸打破致命。那亲王（犯人的父亲）十分痛恨唐朝彝，而康熙皇帝为了保持对唐朝彝的信任，使他执法无阻，并没有埋怨唐朝彝。唐朝彝在年老归休时，康熙皇帝考虑到，唐朝彝为执法而得罪了很多权贵，恐怕会受到报复，特赐他三件护身法宝，一是“曲脚凉伞”，本系皇帝御用，无论什么官，见到这把凉伞如见皇上，必须跪请圣安。二是“敕书铁券”，一打开来，无论何人都要摆案烧香，跪听宣读。三是“天官锁”，锁着圣旨，无论官有多大，要办唐朝彝的罪，必须打开这把锁，而锁匙放在皇帝身边。唐朝彝就凭着这三件法宝，一路挫败要来报复的皇亲国戚，顺利回到漳州，住在新桥头一座平房里。他在屋前建一座小石塔，上面镌“万岁万岁万万岁”，人称万岁塔，今已无存，那地方得名为塔仔脚，地名沿用至今。

民间传说与史实总是有一定程度的距离，但传说的产生和流传必有原因。从这则传说可见唐朝彝在群众心目中有很高的威望，在人们的想像中，只有这么一个既受皇帝信任，又能为群众排忧解难的好官，才能抵敌一等公爵的嚣张气焰，因此流传“唐朝彝与黄芳泰斗法”的故事。

乾隆年间的海澄公

黄芳泰死后，由其长子黄应缵袭爵为海澄公。据乾隆《漳州府志》及《清史稿》记载，黄应缵患病21年，在家中休养。他没有儿子，在未去世前10年，已经请准由其弟应绵之子仕简为嗣，袭爵海澄公。乾隆初年，仕简晋京朝觐，皇帝以仕简年尚幼，令他回乡待命，至乾隆十九年，授衢州总兵，乾隆二十四年，升湖广提督，后调任广东陆路提督，最后调任福建水师提督，驻厦门。当时，台湾（为福建的一个府）常有匪患，黄仕简几次渡海剿匪，得到乾隆皇帝嘉奖，他再次晋京朝觐，皇帝赐给黄马褂、双眼花翎、黑狐皮端罩、人参、清心丸。后发生高山族袭杀淡水同知事件，黄仕简率兵渡海镇压，又得到皇帝嘉奖，加太子太保职衔。

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底（1787年1月）台湾林爽文起义，朝廷令黄仕简与陆路提督任承恩各率兵两千多人往台湾合力进剿，后闽浙总督给予增兵到一万多人，而两提督皆畏缩不前，皇帝以其贻误军机，降旨逮京问罪，刑部拟判处斩，皇帝感念其先人有功，特赦免死，但令赔偿军费，黄仕简罚银三十万两，任承恩也量力罚款。乾隆皇帝派协办大学士福康安带兵数万平定林爽文后，于乾隆五十三年二月下谕：“黄仕简、任承恩上年朝审句到，并经格外加恩免其一死，现在大功已届蔵事，所有黄仕简、任承恩二

犯俱着加恩释放。但伊二人身获重愆，经朕曲加矜宥，全其躯命，若仍靦颜安居辇毂之地，有何面目对人，俱着勒回原籍，闭户静居思过。”（据《东华录》，乾隆朝，卷一〇七）。

黄仕简之子秉淳早逝，乾隆五十二年黄仕简革职后，朝命以其孙嘉谟袭爵。嘉谟初任头等侍卫，后历任苏松、正定、温州总兵。道光年间，由黄仕简长孙庆春袭爵为海澄公，庆春任徐州总兵，死后由长子黄懋澄袭爵，懋澄任乾清门侍卫，传裔于北京（据《清史稿》及乾隆《漳州府志》）。

蔡相爷和他的何夫人

被人们尊称为蔡相爷的清乾隆朝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蔡新，民间有许多关于他的传说，其中有“姐妹易嫁”故事。

民间传说，蔡新自幼丧父，家境贫寒，年轻时从漳浦家乡赴漳州考秀才，因为早先一次赴漳州诗钟会经过九龙岭时，一个卖汤丸的小贩出一则上联“九龙岭上日日冬节”，要他对下联，他未能对上，无颜再从那里经过，而取道官浔、石码。当他经过官浔时，恰逢下雨，躲在拴牛的草棚下避雨。当地何员外见他穿的海青长衫很单薄，冷得发抖，动了怜悯之心，请他到家里喝茶，见他谦恭有礼，谈吐文雅，想起昨夜梦见一条小青龙在草棚的柱间盘绕，莫非应在此人身上，想他以后必有功名。因此，问明他家住漳浦县城南门外十多里处下布村时，就请媒人到他家为自己大女儿说亲。蔡新的寡母和兄嫂探听得官浔何员外是书香门第，就答应了这门亲事。

蔡新中了秀才，第一次到官浔拜见未来的丈人。未婚妻何大小姐拉着妹妹作伴，在屏后偷相未婚夫，见他身着粗布长衫，一

副寒酸相，吃了作为待客佐茶常品的“麦牙膏”，还用舌头吮舐“膏匙”，好似从来不曾尝过这种滋味的馋相。她本来以为，未婚夫是一位才子，必然颜如冠玉，貌似潘安，衣冠楚楚，风度翩翩，现在看到的，与理想中的郎君相去甚远，大失所望。从此，大小姐不断吵着要父亲为她解除婚约。父亲苦苦劝慰，说：“读书人自然不似武士那样威风凛凛，也没有优伶那样楚楚标致，容貌平平正是诚实可靠的人才，有什么不好？”妹妹也帮着劝解：“姐夫虽然貌不惊人，却是斯文端庄；穿着虽不华丽，却朴素整洁。至于吮舔膏匙，正表现他的节俭美德，人不可貌相，我看他才不外露，而从谈吐间可窥见他满腹经纶，前途不可限量。”但大小姐悔婚之意已决，无论如何不肯践约，何员外斥为忤逆，搬出“三从四德”的妇道要她遵守。大小姐见父亲如此固执，索性大吵大闹，哭哭啼啼，弄得慈母忧伤，饮食不进。小妹一再苦劝，惹得大小姐恼怒，骂道：“你惬意，你就嫁他吧！”妹妹被这一骂气急了，脱口答道：“嫁他就嫁他，有什么不好！”何员外正因为大女儿悔婚感到有失声誉，十分苦恼，听到小女儿说愿嫁蔡新，心想：姐妹易嫁，两相情愿，外人只知道我何某嫁女，不知底细，不会说三道四，正可以了却一件心事。因此，劝小女当真成就这桩婚姻。小女体谅父亲的苦衷，对那个穷书生也不嫌弃，就在那择定的吉日上了花轿，成为蔡家新妇。婚后夫妻恩爱，同甘共苦，蔡新刻苦攻读，考中进士，在朝为官，何家大小姐后悔莫及。

蔡新，字次明，号葛山，《清史稿》及地方志有传。他在乡间度过多年清贫生活，刻苦学习，于乾隆元年中进士，在朝任职三十多年，终成一品大臣。妻何氏荣封一品夫人，至乾隆四十五年病逝，享寿 71 岁。蔡新作《诰封一品夫人亡室何夫人行略》（见《缉斋文集》卷七）纪念其平时勤俭持家、相夫教子的美德，说：“夫人姓何氏，同邑太学生讳鸣玉，号蓝仲公长女，幼而端静，父

母俱钟爱之，年十五择配未字。雍正甲辰，余年十八，年初人泮，蓝仲公见而属意，归与夫人母许孺人谋。时求婚者众，余少孤，家最贫，孺人未有以决也，夫妇乃斋戒焚香祷天卜之，独余得吉，遂定婚焉。余贫未能娶，授徒于外，越五年，己酉如于归。甫旬日，余即赴馆，夫人偕嫂氏亲人厨下操作，事姑惟谨，太夫人喜曰："夫人能安贫，吾无忧矣……"可知，蔡新是考中进入县学为生员（秀才）时被官浔太学生何鸣玉择为女婿，而不似民间传说那样在草棚下相识。"姐妹易嫁"之说更不是事实。

"尿鳖"换"大厝"

20世纪30年代，漳州城内有一个贩卖古董的小商叫阿溪，他与一些下乡挨家逐户收购鸡毛、肉骨、废旧五金器皿、瓷器的小贩挂钩，收购到一些古董，然后以较好的价钱转卖给上海古董商，上海古董商以更高的价钱转卖出国。阿溪时运未兴，还未曾收购到被上海古董商看成珍宝的古董，只能赚到一点钱养家糊口而已。

一天，来了一个上海客商，阿溪在作为个人卧室兼客厅的房间里设便宴招待他。席间，阿溪拿出一些古董让那上海客商鉴赏，都没有引起客商的兴趣。饭后，上海客商问小便处，阿溪从床下提出一把旧得发黑的尿鳖让他小便，很抱歉地说："你们大都市的人也许不曾见到过这种东西，这是专供男人小便用的，很不雅。"那客商接到手，细细察看，露出惊喜的颜色，随即收起笑容，装作毫不经心地说："我确实不曾见到过这种东西，看起来倒是蛮有意思的，让我试试看。"客商试用过后，说："好用，卖给我吧，我要让上海人开开眼界。"阿溪警觉起来，担心上了上海古董商的当，虽然这尿鳖是他用两块大洋从收购废旧物品的小贩手里收购过来

的，从未曾将它当作古董看待，而还它以便溺器的本色，现在见上海客商这么看重，便试探道："我这东西已经用得很脏，你如果有兴趣，我可以去买一把新的送你。"那客商说："不用麻烦，就这一把就好。"这一来，阿溪已感到这尿鳖有些古董价值，说："不行，我这尿鳖是祖传的纪念品，不能卖。"那客商说："既是祖上遗传下来的，那就算是一件古董吧，我用比市价多几十倍的价钱收购，五十元，可以买米十石。"阿溪见这么说，越意识到这尿鳖非同寻常，就说："家传之宝，不能卖就是不能卖。"上海客商也不再说，告辞而去。阿溪赶快跑去找收购破烂的小贩，问明那尿鳖是从什么地方收购来的。

那客商住在全漳州城最豪华的九龙饭店，翌日差人来邀阿溪赴宴。饮宴间客商全不提什么事，宴毕款待小盅茶，才提起尿鳖。那客商说："你说那把尿鳖是祖传的，我不相信，你祖上不是什么朝廷大臣吧？"阿溪这时已明白那尿鳖是从哪里来的，就坦率地说："那尿鳖是收购破烂的小贩用一块大洋从漳浦蔡相爷的后代那里买来的，我用两块大洋买来，它一定是宫廷用品，现在既落到我的手里，要卖多少钱就由我决定了。"原来，"蔡相爷"是人们对乾隆朝文华殿大学士蔡新的尊称。传到第九代，蔡家出了不肖子孙，竟然连稀世珍宝、天然有两处黑点雕琢成眼睛的一尊白玉观音及蔡新与皇子们在一起的肖像画《八友图》都卖掉了，一些旧瓷器就更不在话下。蔡新任上书房总师傅，辅导诸皇子（包括嘉庆皇帝）读书十多年，那把尿鳖是皇子送的御用品，蔡新的第九代孙却将他当一般旧瓷器贱价卖给收购废旧物品的小贩。这会儿，上海客商和阿溪都已弄清楚那"古鳖尿壶"的来历，就坦率地讨价还价，结果以五百块大银洋成交。阿溪用那卖尿鳖的钱在东门街买了一座比较堂皇的"大厝"。而据传，那上海客商又以一千块大洋的高价将那尿鳖卖给一个外国人。

漳州“活佛”奇闻

清代，漳州城通省城的驿路第一站叫赤岭铺，距城5公里。铺的下方有一个小庙叫玄坛宫（在今龙文区下尾店与铺下社之间，现在只遗留墙基和一块拜石），庙中有一尊和尚“圆寂”后肉身不腐的遗体。这种和尚遗体在佛教界认为是精神不死的悟道活佛，十分受人崇拜。然而到了清末，漳州的佛教已是强弩之末，故这个悟道活佛不受重视。当地群众虽常到庙中膜拜，而俗称“活佛遗体”为“和尚干”。在该地为村民补齿的日本牙医山崎彪乘中国辛亥革命时局不稳定的机会，于1911年夏天一个凌晨，将那“和尚干”偷走，经厦门，转往日本。当地群众传说，庙里原有一个和尚在看管那“和尚干”，在村民发现“和尚干”不见的早上，那看管“和尚干”的和尚也失踪了，很可能他受日本牙医收买，帮着偷走“和尚干”，同时偷走的还有庙里的一块据说能收蚊虫的石蛤蟆，到厦门要上岸的时候，石蛤蟆“溜”到海里去了。

民国5年（1916年），山崎彪将那“和尚干”当作“无际大师”（又称石头和尚）的不腐肉身在日本大正博览会上展出。1912～1923年，“无际大师”肉身收藏于京都大学博物馆。1924年，山崎彪写了《无际大师的由来》一书，说“无际大师”来自漳州“活佛堂”（山崎彪知道祀佛的场所应是庵堂，而漳州也有称为“宫”的小庙祀佛，为免日本人费解，称漳州的玄坛宫为活佛堂），日本成立“石头和尚无际大师仰赞会”。1930年，日本东京青梅铁路开通，“石头和尚无际大师”被请到青梅，佛教徒平野善吉在青梅石头山建庙供奉。1935年，山崎彪在该庙出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1940年，该庙被日本政府占有，成为结核医院。1945年

日本投降，“石头和尚无际大师仰赞会”解散。1947 年，山崎彪、平野善吉相继逝世，该庙无人管理，逐渐荒废。1951 年，“石头和尚无际大师”由平野善吉的长子平野善一郎保管，于 1961 年 3 月 14 日以 5 万日元卖给日本肉身研究小组，转移到早稻田大学安藤更生教授研究室。1964 年，早稻田大学为其整容，收藏于文学部仓库里，1965 年将其转移到新潟大学医学部小片保博士的解剖学研究室，1969 年，小片保博士从人类学、解剖学的角度对它进行详细研究并著书。1975 年 6 月 18 日，应日本曹洞宗总本山总持寺副贯首乙川瑾映禅师的请求，将它转移到总持寺供奉。

无际大师原法号希迁，是湖南衡山南岳祖师，以结庵石上修行得名为石头和尚，称石头希迁，贞元六年圆寂，唐德宗赐谥无际大师。他是从印度遁入南海，从广东登陆的南宗佛教开宗祖师慧能的法孙，在佛教界享有盛誉，被日本曹洞宗佛教奉为祖师，其所著《参同契》在日本流传甚广。这是山崎彪要把漳州和尚干说成无际大师的原因。山崎彪在《无际大师的由来》一文中说，无际大师在建立衡山南寺弘扬佛教之后，走向东方，在漳州一个台状的石上结庵，在庵南侧的盘石上坐禅修成正果，肉身不腐。后来，文益和尚在深林里迷路，夜里听到有微弱的声音在叫他名字，他循声来到盘石处，见到无际大师。大师对他说：“我是南宗开祖大鉴禅师的法孙，我凭神力把你领到这里，你要相信我的话，北禅法统经过沩山、仰山，到唐末衰落，丢掉其宗风，就会豁然开朗。你等要弘扬世尊教义，使佛门隆盛。”文益于是供奉无际大师尊体，建立庙宇，命名活佛堂，香火不断。后来南方发生革命，漳州活佛堂成为无人看管的荒庙，日本人山崎长之助及其子山崎彪避乱于活佛堂，听到有灵音说：“你们应一心念诵观世音名号，如果让大家念诵，在怨贼中也可以得到解脱。”山崎父子捧起活佛尊体，看到尊体下面挂一块木牌写着“石头希迁”几个大字，好像

是希迁自己写的。父子俩将它作为守护佛来拥戴，搬到厦门，运回日本。这是山崎彪为使日本人相信他弄来的“和尚干”就是“无际大师肉身”而编造的神话。

新闻媒体忽略山崎彪所说“衡山南岳无际大师走向东方，在漳州结庵坐禅成正果”和“山崎彪于1911年从漳州活佛堂将无际大师肉身运到厦门转运日本”这段话，或者不相信这段话。1975年6月20日，香港《快报》以“无际大师肉身供奉东瀛”为题，说一个日本牙医在衡山南岳将石头和尚肉身偷到日本。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长吴立民闻讯后，托衡山南岳文物工作者找到希迁墓塔，又经佛教界调查研究，找不出希迁遗体被迁运的痕迹。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教授杨曾文在《石头希迁及其禅法》一文中说，据宋代陈田夫《南岳总胜集》记载，南岳庙以西15公里处的楚宁寺是葬希迁遗骨处，可见希迁没有留下肉身。而新闻媒体相继转载“无际大师”肉身在日本。吴立民在1997年第一期《法音》上发表《石头希迁禅法及石头肉身》，说南岳区宗教局曾委托日裔华籍女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滕颖与日本曹洞宗联系归还希迁肉身。滕颖于1995年1月10日与美国学者詹·罗伯森见面，了解到新出版的松木昭所著《日本的弥勒佛》一书里记述，1911年辛亥革命时，日本牙医山崎彪在漳州将“无际大师”（希迁）肉身运往日本及在日本收藏、研究、供奉经过。恰好滕颖在会见罗伯森的当晚，接到日本总持寺监院斋藤信义来电，表达向中国归还无际大师肉身的意向。1995年4月3日，日本总持寺干部会正式决定将无际大师肉身归还中国。7月10日，日中友好协会事务局长酒井诚一行3人专程来华，与中国佛教协会洽谈有关归还该肉身事宜。10月中旬，日中友好协会会长平山郁夫委托该会交流部部长来华，送给中国佛协会会长赵朴初一封信，表示日方归还该肉身的条件已经成熟。中国佛协于11

月及12月，先后派吴立民、张琳、何云等到漳州，在漳州市宗教局、佛教协会帮助下，查遍有关资料并实地调查，证实“无际大师”肉身是1911年从漳州玄坛宫被日本牙医山崎彪偷运到日本的。

海上贸易



明代海禁与寇乱

明代，漳州府沿海曾因“海禁”致生“寇乱”。这是全国历史的一个缩影，其起因得从全国性史事说起。明朝前期，朝廷只准外国来“朝贡”物产，而严禁民间对外贸易。朝廷视“朝贡”为“外夷”归附的表现，定若干年来朝贡一次，朝廷“赐”以加倍价值的珍贵丝绸、瓷器等土产作为回报，并准许贡使随带货物，在市舶司管理下与民贸易。那时日本处于割据局面，号令不统一，由于到中国朝贡利益很大，引起争贡。嘉靖二年（1523年），日本的宗设、宋素卿两个贡使，分别来到宁波，互争真伪，市舶司中官赖恩受宋素卿贿赂，袒护素卿，宗设大闹宁波，肆行劫掠。嘉靖皇帝接纳给事中夏言的奏议，撤销市舶司，停止日本朝贡。从此，中日之间的贸易只有走私，主要由日本的海商经营，中国海商与之勾结，由武装走私发展到登陆劫掠、杀人放火，这便是嘉靖年间倭寇猖獗的主因。那时还有葡萄牙人在浙、闽、粤三省沿海亦商亦盗。又有饶平张琏、诏安吴平等在闽粤毗连处造反。

那时，政治腐败，海防卫所的军官以有功之将的后代世袭，不重操练，器械不整，船只破烂失修，巡逻不力，且霸占屯田，士兵形同农奴，失去斗志，致使倭寇及其他海寇长驱直入。负责漳州海防的镇海卫及所辖陆鳌、铜山、悬钟三守御千户所被袭破，内陆受蹂躏。

月港一带受倭寇及其他海寇蹂躏最惨。该地为龙溪县八、九都地，九龙江入海口，明朝前期没有在那里设官驻兵，不少富商私造违规大船，出海贸易，正德年间（1506～1522年）已形成一大都会，有“小苏杭”之称。嘉靖年间（1523～1566年）发展到

海商与海寇勾结，武装走私，抗拒官军，战斗激烈，百姓遭殃。由海商而沦为海盗著名者有龙溪县（后为海澄县）人洪迪珍。浙江总督胡宗宪所著《筹海图编》说："此福建积年通番巨寇，漳泉福兴之祸连绵不已，皆迪珍为之。"《漳州府志·纪遗》说到洪迪珍由商而盗的原因和结果："洪迪珍初只通贩，嘉靖三十四、五年，载日本富夷泊南澳得利，自是岁率一至，致富巨万，尚未有引倭为寇实迹，或中国人被倭掳，辄以物赎，遣还其人，人颇德之，戊午复来浯屿，诸恶少群往接济，络绎不绝，官府不能禁，设八桨船追捕，无一获，又妄获商船解官，于是迪珍始轻官府，又拘系其家属，自是无反顾之期，与倭表里为乱，事穷势败方就抚，官因其就抚而擒之，反张其事为功。"

《漳州府志》在《寇乱》篇记载：月港一带有张维等二十四人合造大船，与日本海商交易。嘉靖三十七年冬，巡海道邵懞派兵剿捕，张维等率众抗拒于许坑，打退官军的进攻后，分别占据几座民建的城堡，号称"二十四将"，张维占据九都城，吴川占据八都草坂城，黄隆占据港口城。龙溪县（包括后来分设的海澄县）一些地方造反头目起而响应，号称"二十八宿"、"三十六猛"，分别占据九都的草尾城、征兴寨、八都的谢仓城、六七都的槐浦等九寨，四五都的方田、溪头、浮宫、霞郭四寨。他们联合作战，进攻到距漳州城不远的东山、水头等处，攻破虎渡城，烧杀甚惨，又攻田尾、合浦、漳山等处，漳州城岌岌可危。

嘉靖末年，戚继光、俞大猷二总兵由浙入闽，合力剿平倭寇及饶平的张琏、诏安的吴平。月港二十四将也为巡海道邵懞所招降，旋为后任巡海道周贤宣所斩杀。地方相对安定，朝廷批准福建巡抚涂泽民奏议，划龙海县沿海一至九都及漳浦东北部沿海二图设立海澄县，以加强对这一带地方的统治；并认识到"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的因果关系，开放月港通航东西洋

贸易，独禁航日本。（“东洋”指从东海航线出航的菲律宾一带，“西洋”指从南海航线出航的马来亚、中印半岛、今印尼一带，《东西洋考》说文莱是东、西洋的交界）。

月港外贸利国利民

明隆庆元年（1567 年）开始开放月港通航东西洋（东南亚）贸易，当时税收由海防馆管理，只规定每船每出一次洋须领“引”（执照）一张，纳银三两，后增为六两。万历年间设督饷馆管理税收。万历三年（1575 年）开始分“水饷”“陆饷”收税。水饷以船为对象，每年一航次，经丈量，船宽一丈六尺者，每尺征银五两，一船共征 80 两，船每加宽一尺，每尺税率增加半两，二丈六尺以上，每尺征银十两，一船至少共征 260 两。陆饷以进口货为对象，按种类逐项厘定税率。贩“东洋”的船多是带回银元而少有进口货，“陆饷”少，加征“水饷”十分之七。出口货免征税。每年出洋船只限额 88 艘，万历十七年增为 100 艘，万历三十三年再增为 130 艘。每年所增税额，隆庆年间（1567～1572 年）每年 3000 两，万历三年 6000 两，万历四年 1 万两，万历十三年 2 万两，万历四十一年 3.51 万两。

万历二十一年（1593 年）发生日本侵略朝鲜事件，明朝一度停止对外贸易，而海商违禁走私，有的借县发的捕鱼、贩谷船引出海，远航外国。福建巡抚许孚远深虑海寇祸患皆因海禁，请准恢复对外贸易。朝廷诏谕：凡海外贸易船只，不论有引无引，滞留时间过长或犯规，都准许回航，所有走私和“压冬”（逾年未归）情罪，一概宥免，今后可按照以前规定，继续输饷出口。万历三十二年，税额由中止海外贸易以前的最高年份（万历十一

年）2万多两骤增至2.9万多两。

万历二十三年发现税官事久生弊，撤换了海防同知。从万历二十五年起，由全省各府逐年派一名佐官来主持。但只轮到邵武府推官赵贤意一次，翌年皇帝派御马太监高寀人闽榷税，专断海澄督饷馆。高寀以进贡皇帝为名，于正税之外多方勒索，地方绅民及在朝为官的漳州人上疏弹劾，皇帝只得于万历四十三年六月二十八日下旨福建地方官“差得当官员伴送来京定夺”，原管福建税课兼摄广东税务之责由江西税监潘相兼管。潘相只来视察一次，海澄督饷馆由漳州府五位佐官（同知二员、通判二员、推官一员）每年轮流一人负责，税款缴省转解朝廷。

以上根据的是龙溪人张燮于天启年间写成的《东西洋考》。当时任佥都御史巡抚南直隶的海澄人周起元为《东西洋考》作序说：“穆庙时（隆庆皇帝的庙号穆宗）除贩夷之律，于是，五方之贾，熙熙水国，刳艎艘，分市东西路，其捆载珍奇，故异物不足道，而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公私并赖，其殆天子之南库也。”

民间也深受海外贸易之惠，生活大大改善。万历年间写的《闽书》说海澄“屋有新瓦，身有具衣”、“家殷户足”。万历《漳州府志》描绘漳州城内“甲第连云，朱甍画梁，负妍争丽。”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文教事业的发展，万历《漳浦县志》说“读书之家，无问贫富，每岁首各延师就业，虽乡村数家聚处亦有师。”《海澄县志》说：“建县以来，衣冠之物顿齿上国，民间延师教于，诣塾授经，遂至青钱待选。”

番银滚滚来

明代，中国与东南亚、南亚许多国家有外交和贸易关系，而

与欧洲各国还是不相往来。自15世纪末16世纪初欧洲人“地理大发现”后，相继航海而来。1510年葡萄牙占领印度果阿，1517年起先后占领马来半岛的马六甲、南美洲的巴西、我国的澳门。西班牙于1519年占领墨西哥，接着又占领南美洲的阿根廷、秘鲁，1570年跨越太平洋，陆续占领吕宋及附近一带岛屿，名之为菲律宾群岛。从此，欧洲人以东南亚殖民地为基地，进行欧、亚、美之间的贸易。

西班牙殖民者在秘鲁开采银矿，制成银币，通过墨西哥的大帆船在吕宋购买中国的生丝、棉布、丝织品、五金、器皿、瓷器、活的牲畜、肉制品、蜜饯、鲜果、木家具、刺绣等等，一部分转输欧洲。当时月港与吕宋的通航贸易急剧增加，赚回来的大都是银币，而很少贩回货物。张燮在《东西洋考》卷七《饷税考》说吕宋“夷人采用银饯易货，故归船自银钱外，无他携来，即有亦无几。”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九三说：“东洋中有吕宋，其地无产，番人率用银钱易货。钱用银铸造，字用番文，九六成色，漳人今多用之。”

据傅衣凌教授《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一书记载：“万历十三年间，每年从菲岛流入中国的银有三十万比索，特别在这一年达五十万比索之多”。据《东西洋考》，“比索”当时译名“黄币峙”，一比索合中国秤七钱五分。据说当时有一位西班牙海军上将惊叹：“中国皇帝可以用秘鲁的银矿造一座宫殿！”

从墨西哥经吕宋流入月港的银币是中国使用银币的开始。而当时，中国各地最通用的货币是铜钱和银锭（马蹄形的元宝、馒头形的小课）及碎银。早期的墨西哥银币是手工制作，不成圆形，状如锄头楔子，被叫做“锄头楔子银”，含银率“九六”，而官府收赋税非“足色纹银”不可，所以“锄头楔子银”只在漳州一带使用，一部分被回炉，加足成色，铸成银锭，与各地贸易，流往

各地，或制为银饰品、银器皿；部分窖藏于地下，漳州各地陆续有出土，它与后期的圆形银元不同。

引进农业新品种

嘉靖以前的“朝贡贸易”进口的多是供给宫廷和高官富人侈奢生活的香料、珍宝、象牙、犀角、玳瑁、珠翠等。从隆庆开始，从月港进口的货物只有少数贵重物品，而大量的是普通百姓的生活用品，如番米、绿豆、火炬、粗丝布、西洋布、番被、香藤席、草席、番纸、番镜、番泥瓶及皮革、漆、五金等手工业原料，共有116种（详见《东西洋考》卷七《陆饷》）。

从月港引进作物新品种，使中国农业结构产生变化，影响民生至大。最重要的是引进香薯，在此之前，中国只有山薯，产量极低。万历年间《小方壶斋舆地丛钞》说：“番薯，万历中闽人得之外国，瘠土沙砾之地皆可种。初种于漳郡，渐及泉州，渐及莆，近则长乐、福清皆种之。盖渡闽海而南有吕宋国，国渡海而西为西洋，多产金银，行银如中国行钱。西洋诸国皆载于此以通商，故闽人多贾吕宋焉。其国有朱薯，被野连山……中国人截取其蔓尺许，挟小盒中以来，于是入闽十余年矣。”

另有长乐县人陈振龙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冒险从吕宋携回薯种之说，时间较后，但由其子陈经伦秀才呈报福建巡抚金学曾进行推广，繁殖较快。又经陈经伦的四世孙陈以桂于康熙初年往宁波经商，将薯种推广到鄞县。陈以桂又与朋友刘曦、金瑞元运薯种及犁、锄等农具到山东胶州的古镇，乾隆九年推广到北京通州一带（据陈世元《金薯传习录》）。又据山西和顺县文献，漳州古县进士郑玉振于乾隆年间任和顺知县，从漳州传去薯种进行

推广，使百姓度过饥荒，群众立庙奉祀，称为“番薯王”。此外，广东电白县有从越南传入薯种之说。番薯的引进和传播有不同途径，但开始引进的时间都在万历年间，除广东可能是从越南引进外，福建都是从月港传入的。由于番薯生命力强，成为海滨斥卤沙质地的主要粮食作物，解决了沿海缺粮问题，并促进畜牧业发展。

花生也是隆庆至万历年间从月港引进的（宋元间从海外传入的是小花生）。清初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引据万历《仙居县志》：“落花生原出福建，近得其种植之。”

烟草原产南美洲，传到吕宋，也于万历年间从月港引进漳州，传植于全国各地。万历年间莆田人姚旅所著《露书》说：“吕宋国出一草曰淡巴菰，一名曰醺。有人携漳州种之，至反多于吕宋，载其国售之。”“醺”是漳州人给淡巴菰起的中国名字，后来用闽南话同音字“烟”为通用名。李时珍时中国未有此物，故《本草纲目》无载，清初赵学敏记人《本草纲目拾遗》：“此物自古未闻，近自万历时种于闽广之间，自后吴楚地土皆种植之。”

大约在同一时期，传人闽粤的热带种植作物还有菠萝、木瓜、番石榴、番茄、番荔枝等，使我国农作物更加丰富多彩。畜牧方面，引进的番鸭与本地母鸭配种，所生“土生鸭”肉质肥腴鲜美。

商贸促进工农业发展

海外贸易促进农工生产，漳州一带农村出现“田妇登机急”的景象；城里“百工鳞集”，“纱绒之利，不胫而走，机杼轧轧之声相闻，非尽出女手也。”纺织原料丰富，“漳自古为善蚕之乡，岁五蚕，吴越不能及”，吉贝（棉）、麻在农村大量种植，又有叫做

王梨丝的菠萝叶纤维和采自野生的葛纤维。丝织品漳绒、漳绸、漳缎“机制云蒸，殆夺天工”。水果也是农村经济一大支柱，“果贵荔枝，俗多种，家比千户侯”，这些情况都记载在明、清漳州地方志里，《福建通志》又说漳州“种蔗煮糖，利较田倍，多夺五谷之地以植之。”

瓷器也是漳州一带大宗的出口产品。瓷器在宋元时代已大量生产，但比较粗糙，主产地在龙溪、漳浦、云霄、诏安一带：如漳浦沙西罗苑井、赤岭竹树山、南山、赤土西洋、鹿溪之滨南门坑、葛后仙洞、诏安肥窑、侯山、东山瓷窑山、云霄水头等地；宋元时代窑址，均遗留大量瓷器残件。明代漳瓷主产地在华安、平和，烧制技术已大大改进，并绘有花草、禽兽等图画。著名的东溪窑在华安高安东溪头，产品有碗、盘、杯、盒、炉、盅、匙、勺、花瓶、笔筒、瓷像、鼻烟壶、水注等，釉色以青花为主，也有青白、青、白、黄等色。平和南胜窑所产最著名，《漳州府志》特加称赞，于明清时代大量外销，主要产品有碗、碟、瓶、杯、罐、炉等，多绘有花草、禽兽图案，或写吉祥文字，釉色以青为主，也有五彩、三彩、蓝、白、黄等色。考古发现，现南胜、五寨一带，以及与五寨交界处的漳浦石榴镇澎水等地，多处有明清时代窑址，遗有很多瓷器残件。

月港的衰落

西方殖民者在东南亚殖民地对华侨的压迫和屠杀，在海上对中国商船的拦劫，对中国沿海土地的侵略、蹂躏，是月港衰落的主要原因。

《东西洋考》在“麻六甲”条目下说：“本夷市道稍平，既为

佛朗机（注：指葡萄牙）所据，残破之后，售货渐少。而佛朗机与华人酬酢，屡肆辄张，故贾船希往者。直诣苏门答腊，必道经彼国，佛朗机见华人不肯驻，辄迎击于海门，掠其货以归。”《海澄县志》“灾祥”卷记载：“万历三十一年，吕宋（注：西班牙于1571年即隆庆五年占领吕宋，此指统治吕宋的西班牙统治者）杀华人在其国者二万五千，澄人十之八。”《东西洋考》“吕宋”条目下记载：万历三十七年，海商唐元鲸由月港发船，海上遇红毛（注：指荷兰人），船货被掠。该书又在“红毛番”条目下记载：万历四十五年，红毛在吕宋港口截劫月港商船。

葡萄牙曾在西班牙国王统属下，荷兰则是后起的殖民者，与西班牙和葡萄牙争夺海上霸权，1662年（万历三十年）起，陆续占领了南亚的斯里兰卡，东南亚的北大泥、爪哇、马鲁古、努沙登加拉等群岛，组成拥有武力的“东印度公司”统管这一带殖民地。荷兰于1622年（天启二年）4月派出远征舰队，向澳门发起三次进攻，被葡萄牙人开炮击退，转入台湾海峡，侦知明朝驻防澎湖的军队已经撤出，轻易地窃据了澎湖岛。《明史·荷兰传》记载：荷兰人泊舟风柜仔澳，出没于漳州沿海的浯屿、白坑、东碇、莆头（将军澳）、古雷、甲洲（菜屿）、洪屿（红屿）、沙洲一带。这支舰队的赫伦宁根号船长威廉·庞德古退役回国后写了一本《难忘的东印度旅行记》，说荷兰船队“于1622年（天启二年）10月18日奉命开往漳州港和其他中国沿岸，看看能否使他们惧怕我们的敌意和武力而不得不和我们通商。”接着记述了许多诸如烧毁民船，掠夺牲畜、货物，滥杀群众，掳人为奴的暴行，还自鸣得意地说：“中国人再也无法自由地前往马尼拉及其他各地。”翌年7月，窃据澎湖的荷兰舰队司令雷约兹（一译雷尔生）派两艘战舰到厦门，向明朝都督提出“只与荷兰人在澎湖贸易，不要让商船到吕宋和其他不属荷兰管辖的地方贸易”的要求，遭到拒绝。雷

约兹调动八艘战舰，以法兰士为指挥，开往漳州港，用烧、杀、掠人为奴、抢劫财物等手段，企图使中国方面惧怕他们的武力而答应他们的无理要求，双方在厦门谈判破裂，发生战斗。《熹宗实录》卷三十记载："红夷自天启二年六月入我澎湖，专人求市，辞尚恭顺，及见所请不允，突驾五舟犯我陆鳌，陆鳌逼近漳浦，势甚岌岌，该道（漳南道）程再伊、副总兵张嘉策多方捍御，把总刘真计沉其一艇，俘斩十余名，贼不敢复窥铜山，放舟外洋，抛泊浯屿，此地离中左所（即厦门）仅一潮之水，中左所为同安、海澄门户，洋商聚集于海澄，夷人垂涎，又因奸民勾引，蓄谋并力，遂犯中左所，盘踞内港，无日不搏战，又登岸鼓浪屿，烧洋商黄金房屋船只区，遂泊圭屿，直窥海澄，我兵内外夹攻，夷惊而逃。已复入厦门，入曾家澳，皆即堵截，颇被官军杀伤。"《海澄县志》也记载："天启二年，红毛据澎湖，入厦门，迫圭屿，守备高冠先遁，知县刘斯垛却退之。"

天启四年五月，福建巡抚南居益派水师向澎湖荷兰海军基地发起进攻，进行围困。七月，荷兰人被迫毁城撤往台湾。明朝处在满洲军队入侵和农民大规模起义双重威胁下，无暇顾及东南海域，荷兰人以台湾为基地，又在闽、浙、粤沿海亦商亦盗。朝廷只得再施行海禁。《天下郡国利病书》在《福建·兵防》篇说："自红夷肆掠，洋舡不通，海禁日严，民生憔悴。"《海澄县志》说："洋船多被劫掠，月港洋市乃趋衰落。"

与荷兰舰艇猖獗同时，中国海商纷纷转为海盗。朝廷于崇祯元年（1628年）招抚了郑芝龙，授职游击，剿平其他海盗，并多次打败侵犯厦门的荷兰侵略者，官升总兵，至任都督，驻厦门，被朝廷倚为"海上长城"，让其收税自养军队，商船要向他缴税领取令旗才能出海。从此，月港的外贸地位为厦门取代。

清初外贸政策

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清朝统一台湾，翌年解除海禁，设江、浙、闽、粤四海关，负责对进出口货物的检验和收税。按朝廷规定，闽海关设在漳州，但由于月港淤塞，实际正口设在厦门，只是文汛口归汀漳道管理。雍正六年（1723 年）厦门海防同知张嗣昌报准改由厦防厅查验。

康熙五十六年，以据报“愚民私聚吕宋、噶喇吧地方，盗米出洋，盗卖船料诸弊”禁止商船往南洋贸易。

雍正二年（1724 年），漳州人蓝鼎元作《论南洋事宜书》，指出：南洋产米比中土更饶，船料比中土更好更便宜，盗卖米粮和船料于南洋“虽至愚不为也”；并将所谓的“愚民私聚吕宋、噶喇吧”说成“游手无赖亦为欲富所驱，尽出番岛，鲜有在家饥寒窃劫为非之患”。又说“内地贱菲无足轻重之物，载至番境皆同珍贝，是以沿海居民造作小巧技艺，以及女红针黹，皆于洋船行销，岁入诸岛银钱货物百十万人我中土，所关为不细矣，南洋未禁之先，闽广家给人足，既禁以后，百货不通，民生日蹙。”

当时，蓝鼎元以太学生奉征调参与编写《大清一统志》，他这篇据实际情况而作的论文，以书信方式在朝野广为传播，引起重视。两年之后的雍正五年，福建总督高其倬以和蓝鼎元所论述的同样理由，奏准恢复对南洋通航贸易。雍正六年，福建为解决粮荒问题，规定免除米谷进口税。

乾隆二十年（1755 年）发生英国洪任辉（James Flint）驾兵船闯入宁波、定海、天津事件，清廷撤销江、浙、闽三海关，只留广州一口对外贸易。但限制的只是英国、荷兰等侵略国家，南

洋商船仍常来厦门贸易，漳州商船仍常往暹罗贩米回来。乾隆四十七年，准到厦门贸易的洋船照粤海关例征税。

乾隆年间，西方国家所铸银元继续从南洋流入闽广，回炉加足成色，铸成中国各地通行的纹银锭（元宝或小课），输往北方，使以银为通货而银矿贫乏的中国，不因缺银流通而影响物价。乾隆五年发生噶喇吧（今雅加达）荷兰殖民者大规模屠杀华侨的“红溪事件”。翌年，福建将军和巡抚奏报朝廷，请“禁与南洋贸易以困之”，朝廷大臣议论不决，大学士方苞知道当时任翰林编修的蔡新是漳州人，熟悉海外贸易情况，写信征询他的意见。蔡新复信主张继续与南洋贸易，其理由的重要一条是：“闽广两省所用皆番钱，民自幼至老有不见纹色等银者，自正供、杂税以及关、监等课，俱用番钱输纳，补足银水，一经炉匠之手，遂成足色。统计两省洋银岁入内地近千万，今天下各省不闻有产金银以资民用者，而东南之银岁输西北者且数百万，其西北之流通东南者岁不过数十万耳。如此，而东南财力未至大匮者，恃南洋岁入之数也。若一概禁绝，则每岁既少千万之人，而输于西北者如故，不独闽广之民病也。”（见《缉斋文集》）。

朝廷大臣以蔡新说得有理，便否定福建将军和巡抚“请禁与南洋贸易”的奏议，继续与南洋通航贸易。

乾隆朝鼓励番米进口

据道光《厦门志》等资料，乾隆年间从厦门出口的主要货物有漳州的丝、纱、绢，漳州及德化的瓷器，及各地出产的布匹、木屐等。进口货物有米、象牙、沉香、速香、槟榔、砂仁、苏木、铅、锡、珀、玉、燕窝、玳瑁、沙藤、打火石、水牛皮、鱼翅、海参、

海菜、胡椒、鹿茸、鱼肚（鱼鳔）等，以米为大宗。

乾隆年间福建连年灾荒，官府对本国商人进口番米给予官衔奖励。福建巡抚陈大受上奏："近年来探知暹罗木料甚贱，以造船之多利摊补米价之少利，尚为合算。乾隆九年，内则有龙溪县商人林捷享、谢冬发等，源源赴暹买米回来粜济，较之夷商听其自至者尤为便捷。"朝廷指示闽浙总督喀尔吉善："乾隆十九年以后，该督等就节年南洋回厦各船人口带运米石，奏请就厦粜卖，分散漳泉二郡，接济民食，并运米之商人，酌量议叙。"（据清《皇朝文献通考》卷三十三）。乾隆二十四年（1759 年）十一月二日，闽浙总督杨廷璋奏："乾隆二十二年，南洋回厦各船共计运回米三千九百余石。海澄县船户黄顺祥运回米五千二百余石。"（据《明清史料庚编》）。杨廷璋于乾隆二十五年十月十六日又奏："有海澄船户陈福顺，运回米二千五百石，系殷商陈芳炳自备资本，附搭船只购回，应请照议定二千石以上至四千石之例，给予九品顶戴。"乾隆三十四年正月八日，闽浙总督崔应阶奏："龙溪县船户吴正色运到米二千三百石，系殷商赖逢贵备资附托购回；海澄县船户陈福顺运到米一千五百六十石，系殷商姚殿策备资附托购回，俱经按照时价陆续粜卖。赖逢贵购米二千三百石，请照例给予八品顶戴；姚殿策购米一千五百六十石，请照例给予九品顶戴。"（引自《历史档案》1985 年第三期）。

乾隆朝还对番船运米入闽给予减税优惠。乾隆八年规定，外国商船运米来闽万石以上者减税十分之五，五千石以上者减税十分之三。十月，准暹罗米船免税。

近代的进口商品

自从清朝在鸦片战争中失败，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与英国订立《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埠为通商口岸（后又开放多口岸），各国侵略者接踵而来，援例与清廷订立不平等条约，向中国进口货物享有低税率优惠，一般按货物价值的5%收取关税，只需再纳一次2.5%的子口税，便可转口到国内其他地方，不得再征税，而本国商品每转一口便要再纳一次税，而且沿途站站征收“厘金”等地方税，因此洋货便宜，土货贵。洋货是机织机造，外形美观，土货比较粗糙，没有竞争能力，作坊纷纷倒闭，家庭手工业和农村副业大受打击。只因土布厚密，比进口货坚实，所以仍有销路，家庭织布业仍少量存在。

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家在中国的通商口岸开设商行，称洋行，通过内地代理商倾销工业品。漳州各集镇均有洋行代理商，一方面推销进口的洋货如煤油、化肥、卷烟、水泥、布匹、火柴、西药及其他日用品，另一方面替洋行收购土产如烟叶、花生、花生油、红糖、干果、水果等。进口的工业品以煤油、化肥、卷烟为最大宗。

煤油，俗称番仔油、土油、水油。美国的美孚、德士古，英国的亚细亚等石油公司在厦门设立办事处，分别在鼓浪屿、嵩屿设立油栈、油库。美孚在漳州城区的代理商，初为长美行，后为大孚行，再后为美南行；在石码的代理商有成美行、福元美行、金丰成行；旧镇的代理商为蔡荣的美孚行，杜浔也有李记美孚行（即云霄李记美孚行）；东山有义和行。德士古在漳州城的代理商

为大同行，在石码的代理商为兼成行。亚细亚在漳州城的代理商为联成行，石码为集成行，东山为鼎盛兴行，旧镇为振成行和新捷发行。

当时进口的化肥，主要是英国、日本、德国、意大利生产的肥田粉（硫酸铵）和智利生产的硝石粉（磷肥）。肥田粉以英国的月眉牌、意大利的卜内门、德国的狮马牌、日本的大连牌在中国销量最大。石码的裕美行，旧镇的捷发、振成、宝成等行均为重要代销商。

卷烟，主要是英美烟草公司在上海厂所产老刀牌、哈德门、大中国等不同档次的“香烟”，东山的玉安号，云霄的仁发号、华安号，旧镇的新捷发均为代销商。

近代的出口商品

“五口通商”后，漳州出口商品结构发生了变化。

茶叶，在清朝前期是禁止出口的，“五口通商”以后，闽西闽南茶叶开始从厦门运销往英、美及南洋。（闽东闽北茶叶从福州出口，光绪年间增辟三都澳口岸）。长泰、南靖、平和等县茶叶由九龙江航道运至厦门，安溪茶叶一部分经同安运至厦门，大部分经漳州九龙江航道运至厦门。龙岩、漳平茶叶小部分由九龙江西溪经漳州转运至厦门，大部分由九龙江北溪经浦南、石码转运厦门。从厦门出口的茶叶统称厦门乌龙茶。光绪前期，每年出口茶叶九万担以上，后由于茶园老化，又因很多闽南人移居台湾，开辟新茶园，老茶园产品不及新茶园好，又遇到日本茶叶竞争，“厦门乌龙茶”在海外的销路日减（据厦门《海关十年报告》）。

烟草，清代石码的“金丝烟”已名扬海内外，主要烟庄有石

麟、名麟、华山、万山等几十家，采办平和烟叶，加工成金丝烟，内销闽台，外销南洋各地。长泰县的烟丝鹿牌、虎牌同样畅销台湾、南洋。日本占领台湾后，以三井株式会社垄断台湾烟草市场，对中国商人运往台湾的烟叶、烟丝课重税，使之无法经营。“三井”在厦门设“出张所”（即厦门三井洋行），派人到长泰岩溪和平和小溪设收购站，收购烟叶运往台湾，加工成烟丝销往台湾各地，并运销南洋各地。平和、长泰烟庄除沦为“三井”附庸外，无法打进台湾市场，在南洋的销路也大受打击。

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国际烟草托拉斯英美烟草公司在伦敦成立，派人来中国经营，相继在各埠成立十一家烟厂，推广种植美国烤烟，收购为原料，以机器制成“香烟”（添加香味的卷烟），很多原来吸烟丝的人改吸香烟，漳州各地许多经营烟丝的烟庄受打击而倒闭。

土纸主产地在九龙江上游的龙岩、漳平、宁洋、华安、南靖、平和等地，年产十多万担。多经九龙江航道汇集于浦南、漳州城、石码镇，运经厦门出口。1902～1911 年《厦门海关十年报告》说：“从厦门出口的纸，全部用竹做原料，主要来自北溪的浦南，也来自龙岩和溪南。较好的竹浆用于生产供作书写和印刷用的纸及较好的锡箔，较差的竹浆则用于制作包装纸和较次的锡箔。没有引进任何可用其他原料造纸的机器”。

据 1880 年（光绪六年）《厦门海关年报》，从九龙江航道运到厦门的出口土产还有：南靖的麻袋、咸萝卜干，龙溪县的水仙花球茎、丝质品和丝线、柚子、荔枝干、土布、烟丝、真金、箔、锡箔，海澄县的植物油、桂圆干、柿子、花岗石、苎麻等。水仙花球茎和“神州妙药”片仔癀、八宝印泥，是新崛起的出口特产，下面专条记述。

日本占领台湾后，漳州糖出口量大减，反而进口台湾糖，另

行专条记述。

漳州近代糖业

自清末光绪甲午战后，割让台湾予日本，福建不但在日本军事威胁下，经济上也大受打击，闽南首当其冲，漳州制糖业受打击最重。

漳州自明代以来，农民家家种蔗，一般自然村都有一个糖寮，用牛力带动石碾榨蔗，蔗汁煮成红糖，有的再加工煮成土白糖，从各港口运销江、浙、津、鲁、汕头、香港，并由厦门口岸输出国外。厦门口岸出口的蔗糖，大部分来自漳州地区，《厦门海关十年报告》载：光绪二十八年至宣统三年（1902～1911 年）十年间，蔗糖出口额由在此之前十年的 9.9 万担上升到 19 万担，民国元年至 10 年（1912～1921 年）十年间，蔗糖出口大减，民国 11 年至 20 年（1922～1931 年）十年间，厦门口岸糖的进口多于出口。显然，闽南糖业衰退了，原因是竞争不过日本统治下的台湾新兴糖业。民国 23 年，福建省建设厅的调查报告说："本省糖业夙称发达，闽南各县本为著名蔗区，每年产额不下百万担，行销国内各省为数至巨，自受洋糖侵人，本省糖业日形衰落。查本省洋糖之输人，在 1905 年（清光绪三十一年）仅占本省输人货物之第十位，值 126.4 万元，至 1930 年（民国十九年）则已升至第二位，值 630.7 万元。二十余年间，以产糖省份之福建，而洋糖之输人竟增至五倍以上，此可证本省糖业之失败矣！"

清末至民国初年，已有闽南实业家决心改革糖业，如印尼爪哇有过机器制糖经验的龙溪县华侨郭祯祥回乡建"华祥公司"，宣统元年投人生产。这一创举被厦门海关税务司列人 1902～1911 年

《海关十年报告》："华祥号建于1909年，现（1911年）拥有三个装置着新式机器的糖厂，一个在同安水头，一个在海澄洪坑，第三个在龙溪田边。第一个糖厂每天能榨70～80吨的糖蔗，后面两个则大约每天各榨60吨。华祥号每季度的糖产量估计为1.5万～2万担。"该《报告》又说："水头的另一家糖厂为林本源所有，每年能榨糖蔗约40吨，每季度糖产量约6000担。在平和县山格的糖厂，属新兴公司所有，使用尤利克机器，用水做动力，每天榨糖蔗约40吨，每季度糖产量约4000担。"这些新兴的制糖企业已初见成效，厦门的糖出口额逐渐回升。但好景不长，民国初年军阀混战，企业只得停业。后来，民国18年，泮茂华侨林秉祥投资3万元，委托漳州陈紫汀设立丰祥农林公司于漳浦万安，由紫汀之弟陈季龙任经理，以机器榨糖，但没有制白糖设备，仍以土法煮成赤砂糖。民国26年福建省建设厅投入官股3.1万元，改丰祥农林公司为公私合营，准备添置制白糖设备。但7月抗战爆发，翌年5月厦门被日军占领，该公司机器内迁散失，仍然用牛力榨蔗，后并入省办大南坂农场。抗战期间闽南公路被破坏，蔗糖滞销，生产一落千丈。抗战胜利后生产有所恢复，而直至解放前夕，漳州地区未有一家机器制糖厂。

漳州水仙花

水仙花是我国十大名花之一，也是闻名世界的漳州特产。民间传说，只有圆山山影遮蔽的地方才能长出好的水仙花头。然而水仙花原来并非漳州特产，《广群芳谱》说："水仙花，江南处处皆有之，惟吴中嘉定种植为最。"（吴中嘉定即今上海市嘉定县）。据漳州水仙花产地蔡坂张氏族谱记载：其祖先张光惠于明景泰年

间（1450～1456 年）在河南汲县为官，告老还乡时，船过洞庭湖，于水面拾到水仙花头两颗，携回植于园中，繁衍于圆山之麓，起初只供自家观赏和赠送亲友，后乡人竞相种植，投放市场。而据专家考证，圆山下繁殖水仙花的历史没有那么早，蔡坂村原是蔡姓聚居地，张姓是清初“迁界”时从海澄县迁来的，现在张姓后人还年年回海澄祭祖。由于圆山下的自然环境特别适宜种植水仙花，虽然水仙花于清初才随海澄移民开始在圆山下繁殖，但发展极快，至乾隆年间已极繁盛，运销各省，甚至吴中（江苏一带）反而要购销漳州水仙头。乾隆《龙溪县志·物产志》记载：“闽中水仙以龙溪为第一，载其根至吴，越冬发花时，人争购之。”

漳州水仙花虽在乾隆年间已行销国内，而大量外销出国则是清末“五口通商”以后。据厦门《海关年报》及《海关十年报告》，漳州水仙花头从厦门出口，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只有 160 万枚，第二年就增加到 234.8 万枚。宣统三年（1911 年）又增加到 386.7 万枚，值关平银 4.5353 万两。

20 世纪 20 年代至 30 年代，漳州水仙花头产量从 5000 担增至 1.7 万余担，输出国内外约值银元（或法币）30 万元。据民国 23 年（1934 年）龙溪县政府统计，该年共销国内外 445.6 万枚，其中销海外 273 万枚。每千枚按等级值 28～64 元。

抗日战争期间海路受阻，公路破坏，水仙花销路呆滞，产量锐减。

新中国成立后，漳州水仙花于 1956 年恢复出口，外销途径主要是运往香港，除部分留在当地销售外，其余转输英、法、美、加、澳、芬、荷及东南亚各国。8 月至翌年初为旺销期，欧、美、澳三洲 8 月至翌年 2 月都畅销，尤其临近圣诞节最为旺销。本国则以临近春节最为旺销。

历史上，漳州南乡（今九湖镇）种植水仙花头曾达数百亩至

上千亩。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种种原因，水仙花种得不多，50年代每年只出口10多万枚。60年代初种100亩左右。“文化大革命”期间，水仙花被诬蔑为卖国花，说种花是为资产阶级少爷小姐服务的，种植面积逐年减少，至1974年已“砍掉”90%，剩下20亩。1974年总产仅65.7万枚，符合出口的只有30.7万枚。

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水仙花生产迅速恢复，至80年代，每年种植600多亩，出口40多万枚水仙花头，创汇30多万美元。

水仙花许多地方有种植，但总比不上漳州的好，所以自清代至今，漳州一直是畅销全世界的水仙花主产地，这除了圆山下水土特别适宜以外，还与当地花农勤劳智慧，经验丰富有关。

水仙花以球茎分蘖，从小球茎第一次下土，需反复培养三年才达成熟期。《广群芳谱》诀云：“六月不在土，七月不在房，栽向东篱下，寒花朵朵香。”漳州水仙花的培植过程是：霜降前后下土，植后不可缺水，园地以选择在较温暖的低洼地为好。“圆山影能蔽荫到”的九湖蔡坂、新塘、梅溪一带，有圆山挡住西北风，日照充足，水利条件好，土地肥沃，是最理想的水仙花培植地。第一次小球茎下土，培育至翌年芒种前后挖出，稍微晒干，收藏至霜降前后再种植入土。初冬只剪收花枝，下一年（第三年）再按此法种植，种植前要“阉割”，使大球茎中孕育着的花穗按照人意安排的方向发展。至芒种已届成熟期，便可收获，挖出球茎，涂以田泥，晒干，便可包装运输。在运输销售过程中，花穗继续孕育生长，待浸水后，视气温高低，约20日才能凭三年积蓄开放于一时。

漳州有不少人精于水仙花头雕刻艺术，可通过雕刻控制花蕾开放时间，并能使花枝、花叶呈现龙、凤等各种形态。

水仙花盛开期10天左右，一般半个月后凋谢。水仙花除观赏之外它还有药用价值。《广群芳谱》说它“根味苦微辛，寒滑，无

毒，治痈种及鱼骨鲠；花作香泽涂身、理发，去风气。”近来还有人研究从水仙花球茎（俗称“头”，古书上称为“根”）中提炼抗癌药物。

神州妙药片仔癀

漳州三宝之一的片仔癀，是一种闻名海内外的漳州特产，具有快速消肿退癀（消炎）的特效，这种成药虽有400多年的历史，但直到近代才开始出口海外。

相传，明嘉靖年间，太医院有一位御医，因不满奸相严嵩当权，尤其厌恨严嵩的儿子严世蕃和义子赵文华借严嵩权势陷害忠良、擅杀无辜、胡作非为。因受迫害逃出京都，隐姓埋名，辗转来到漳州东门外璞山岩（即拍山，今属龙文区）落发为僧。他看到璞山岩的武和尚使刀弄棒，常有刀伤骨折的痛苦，就按照秘方炼制成一种既可以口服也可以外敷，专治跌打损伤，能够快速消炎止痛的特效成药，叫做“八宝丹”，为岩寺中的和尚消除伤痛之苦，附近居民也多得到施治。璞山岩以它为传家至宝，传内不传外。

清末，“八宝丹”秘方和制作方法传到延侯和尚手中，丹药才开始制作应市，托东门街馨苑茶庄独家代售。茶庄老板死后，延侯还俗与老板娘结为夫妻，继续经营茶庄。他广交文人、名士，经常聚集在店中品茗谈天。在文人、名士宣传之下，“八宝丹”逐渐出名。当时每丸药重一钱，售价银元五元，一般炎症只需用上一小片即能消肿止痛。为了适应广大群众的需要，经营者采取切片零售的办法，每小包重量二分，已够一次服用或敷用。群众以它能一片止癀，就称它为“片仔癀”，此名既出，制售者也乐于采用

这名称。民国初年，片仔癀用“僧帽牌”商标注册。为了防止假冒，在外包装的正中加盖“僧延侯”的印章。延侯死后，此药的秘传处方和生产技术为其妻李氏珠娘所掌握。当时，川行于东南亚一带的水客，看到东南亚一带居民好斗，常有跌打损伤，就携带一些出洋试销，由于功效显著，极受欢迎，遂成为水客回国必办的外销物品。归国探亲的华侨也多购买作为居家必备的常药，有的特地多购一些，作为赠送亲友的礼物。片仔癀在海外声誉日高，销售日广。

解放后，随着片仔癀畅销，代销片仔癀成为馨苑茶庄的主要业务，因而馨苑茶庄划属中药行业，以售药为主。由于当时制作技术落后，产量不多。1956 年全行业实行公私合营，该店并入公私合营同善堂制药厂，片仔癀就成为该厂的主要产品之一，仍以僧帽牌为商标。后该厂由公私合营转为地方国营漳州制药厂，1965 年改以“荔枝牌”取代“僧帽牌”商标。从此，逐步改进制作工艺，精益求精，并重新进行包装装潢。1979 年该药获国家银质奖，1984 年又获国家银牌奖。产品远销东南亚及美、法、英、加等国及港、澳、台等地，单 1984 年就为国家创收外汇 1400 万美元。在国际上被誉为“安家至宝”、“神州妙药”、“中国特效的抗菌素”。经中国科学院药物研究所进行系统的药物实验，肯定了片仔癀的药物价值。临床鉴定确认此药有止痛、解毒、消炎、消肿功效，可以治疗蜂蜇、蛇咬、痈疔肿痛等症。对癌症，尤其对消化系统的癌细胞，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能减轻患者痛苦，增加患者的存活率。

八宝印泥

八宝印泥冬不凝固，夏不吐油，用于印章，人火经水不褪色，

是漳州历史悠久的特产之一。它为书法艺术增辉添彩，驰誉海内外。但它起初却是一种红色膏药。

清康熙年间，漳州东门街有一家魏氏药材行，专门经营参茸燕桂、南北药材。老板的儿子魏长安，随父在店中经营药材生意，并深入钻研各种药材，参考各种医药书籍，用店中经售的溧硃、金箔、梅片、珍珠、艾绒等贵重药品，合制成一种红色药膏，可治刀伤、灼伤、狗咬伤、皮肤溃疡等症，称为“八宝药膏”，经患者试用，效果很好。魏长安喜爱金石书画，平时也喜欢自己挥毫作书画，常感到当时用硃粉和蜜做成的印泥盖章，容易褪色，心想，那种印泥可能还不如我的八宝膏药，一试，果然色泽鲜艳。将盖上印章的书画放到水中再捞起来，墨迹都漫漶，独印章鲜明如故，用火烤干，印章也未褪色。他就将八宝膏药装了几盒，称为“八宝印泥”，分送爱好书画的朋友，大受赞赏。他继续琢磨，改进制作方法，用艾绒为胎，使印泥不易干涸。

乾隆十一年（1746 年），汀漳龙道道台是一个爱好书画的文士，在用过魏长安送来的八宝印泥后，大加称赞，派人请他到衙门座谈，鼓励他专门设店制售八宝印泥。魏长安开始挂出“魏丽华斋八宝印泥”的招牌，装盒出售。道台于晋京面圣时，向魏长安要了几十盒八宝印泥，进贡皇帝。皇帝用后十分满意，把它分发到各部门去使用，官员们都大加赞赏。从此，八宝印泥成为漳州地方官每年必须送到朝廷的贡品。同时，漳州八宝印泥的声誉传遍全国，各地纷纷来漳州采购。魏长安死后，其子孙继续经营。清末，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漳州八宝印泥畅销于海外。

但到了民国年间，魏家子孙竟将“魏丽华斋八宝印泥”注册商标卖给一个叫林仲山的朋友，林仲山又转卖给上海商务印书馆，失去了“漳州特产”的味道，因而销路大减。漳州除魏家子孙外，还有南升斋、不夺斋等几家，黄稷堂名画家也开“慧庐”经营八

宝印泥，却因为不能用“魏丽华斋”商标而打不开销路。“不夺斋”抗战前已停业，“南升斋”至解放后也停业。

解放后，魏家后裔尚有掌握八宝印泥配方和制作方法的，把它献给国营文教用品厂，纳入国营企业生产计划，定名为“漳州八宝印泥”。并用江西景德镇特制的圆形瓷盒，外加樟木方盒做包装。由于具有“冬不凝固，夏不吐油，下水经火永不褪色”的特点，得到海内外人士赞扬，销量日增。现分为特别贡品、一级贡品、贡品、珍品、上品等六种等级。包装分一两庄、二两庄、四两庄等各种规格。

抗战时的特殊贸易

1937 年 7 月 7 日抗日战争爆发，翌年 5 月厦门被日军占领，福建军政当局下令破坏沿海公路，港口沉船坠石筑防锁线，以防日军入侵。敌我双方互相封锁、禁运，造成双方物资紧缺。厦门日军为解决副食品严重不足，派人潜入我方防区，勾结流氓及投机商人，贿赂海防军官，走私禁运物资，厦门对岸的嵩屿、岛美一带为走私的主要地点，并蔓延到浒茂、海沧、东屿、港尾，漳浦县的佛昙、赤湖、六鳌等地。走私到厦门的主要物资是家禽、家畜、蔬菜。日军在厦门虎头山架设探照灯，发现有走私船，即开出小艇接应，拖到厦门收购。走私船大都运回外国输入的鸦片、吗啡及其他工业品。

厦门外商洋行的市场在内地，单靠走私船输往内地的货物不多，乃通过英、美驻厦领事向日方请求网开一面，准许若干以悬挂英、美国旗的“交通船”往返厦门与石码之间运货。日军正需要这样的船只为他们运去副食品，便答应英、美领事的请求。厦

门的洋行通过其石码代理商向福建省政府及漳州驻军师部申请，当时福建最缺乏的是汽油、煤油，乃批准以三艘悬挂英、美国旗的漳、码民船往厦门运载煤油、汽油、机油入内地销售。实际运油船不只三艘，除运油外，并夹带其他日用工业品，经贿赂哨卡，便得到通融上岸。省当局也知道这种情况，不但不加干预，而且组织驿运站将“交通船”运到石码的工业品收购运往腹地。

厦门和漳州、石码都有一些持有中日双方许可证并与英、美洋行挂钩的商家，通过“交通船”将内地土产如香菇、笋干、土纸、篾器、红糖、水果、纸箔等运到厦门，转输出口；将进口的小百货、煤油、棉纱、布疋、西药及英美在上海租界设厂生产的肥皂、香烟等，及日占区的绍兴酒等土产运到石码，转销内地。

“交通船”都是雇用九龙江小型帆船，可以越过“封锁线”。

“交通船”越来越多，原因是：一、漳州特务机关、驻军、宪兵、警察局等，以收集敌方情报为理由，请准经营“交通船”。二、石码历来是漳州地区的水果集散地，又是主销南洋的纸箔主产地，为解决这两种行业的经营困难，经省政府建设厅批准，通知漳州驻军师部发给5艘“交通船”许可证（后增加到十多艘）运载水果、纸箔到厦门，转输出口，回航时运入工业品。三、厦门燃料极缺，日军甚至毁民房拆门窗及栋梁用于烧饭，厦门十全善会派人到漳州申请，得允准在石码雇船采购柴草运至厦门供应居民。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事爆发后，厦门被盟军海空封锁，粮食极缺，福建省政府批准“交通船”运米接济厦门民众，回航无货可载，只有偷带一些鸦片回来贩卖而已。

民风民俗



漳州岁时风俗

闽南人的祖先来自中原，他们也将中原的岁时风俗一并带入。但在长期的发展演化中，闽南各地风俗的地方特色开始逐渐明显起来，大同中存在着诸多小异，漳州地区也是如此。

漳州的传统节日，有年节（春节）、元宵（上元）、三月节、五月节（端午节）、六月节（六月半）、中元（普渡）、中秋等。漳州人最重视年节，也就是过旧历年。

旧俗，旧历十二月二十四日“送神上天”，这便拉开“过年”的序幕。从前人们相信，诸神都是玉皇大帝（又叫天公）派来人间管理人的，“附神”于偶像，每年都要回天庭过年。所以，在十二月二十四日清晨各家要备好清茶、“牲醴”，点上香烛，跪拜行礼，向神饯行，焚化“甲马”（用木板印制的一种有神、马形象的小纸张）供神骑乘，叫做“送马上天”。送“灶君”最特别，“灶君”神位在灶上，贴一张印制的“灶君”神像和一张“司命灶君”，两边加“上天报好事，下地保平安”对联。送“灶君”除了牲醴，要有糯米饭，因为相信“灶君”最知道家内事，希望他不要将家人的不端行为报告玉皇大帝，要用富有粘性的糯米饭粘住他的嘴巴。

除夕（旧历十二月的最后一天，大月为三十日，小月为二十九日）家家贴春联，早上祭祖先，晚餐特别隆重，全家团聚餐饮，桌下放新烘炉，炉内放炭生火，叫做围炉。桌上除鱼肉鸡鸭蔬菜外，必须有蚶，蚶壳象征财宝，餐后不可即扫除出门，要暂放在门内一边，待过了年再处理。餐毕，要放鞭炮，并放一些大豆在锅里，家人个个轮流掌煎匙炒几下豆，然后烧掉旧灯架，换上新

的。除夕之夜灯火通明达旦，叫做守岁，要给小孩压岁钱。

正月初一日叫新正，要早起祭拜祖先。几乎一切农工商各事暂停，且不可做针线、洗衣、扫地等家务，人人休闲、游乐，即使还有做生意的，也都是卖儿童玩具、水果，以及能消油腻助消化的腌橄榄、余甘之类。休闲玩乐持续到初四日，初五日恢复各种营生。初四日清早再备牲醴迎神，叫做“接危下天”，即是认为神和人一样，要结束过年假期。

除了年节之外，漳州地区的其他节日也很有特色。

正月十五日为元宵节，也叫上元节，各寺庙、祖祠自十四日至十六日张灯。有的祖祠扎灯棚，由长辈妇女陪伴新婚媳妇从灯棚下穿过，拜谒祖先神位，叫做“新娘穿灯脚”。有的祖祠将灯架扎成“鳌山”，有很多层，下层较宽，向上逐层收拢。各层都安装纸扎的官宦人物形象，第一层状元、榜眼、探花“三元及第”，第二、三层为戏曲故事的整套人物，任人观赏。

清明节（有的在三月三日进行，叫上巳节）家家制薄饼（用面粉制成，薄如纸张）用它包卷切细的竹笋、豆腐干、猪肉、韭菜等，也有卷碾碎的花生加糖的。除了在家祭拜祖先，也到山间扫祭坟墓。有的妇女伏在新墓痛哭一场。

四月立夏日吃“麦卷煎”，这种食品形状和“薄饼”一样，但比较厚。

五月初五日为端午节，在门首挂菖蒲、艾，并汲井水浸蒲艾，加上雄黄，用于沐浴。许多村社有龙舟竞赛习俗，胜者得锦标。赛前先祭江，即是祭吊屈原。除有人去世的家庭外，家家都要包粽子。

旧俗以六月十五日为“半年”，叫做六月节，要制米圆子祭祖。六月半的米圆子多用粳米舂成细粉搓成，与冬至的糯米圆子不同，汤则同样用红糖加水煮成。

七月十五日为中元节，在佛教则称盂兰盆会。要摆很多糕、饭以及煮熟的猪肉、鸡、鸭等，祀无主之鬼（叫做人客公），称为“普渡”。各个市镇，各乡村，自初一日至月底，逐日轮流做“普渡”，互相请客，互送糕馃。由于七月为盛夏，供品容易被苍蝇玷污，往往造成霍乱流行，所以，此俗已被禁止。

八月十五日为中秋节，人人吃月饼、赏月。乡间有制糯米糍敬拜“福德正神”（土地公）的习俗。每一个“社”（自然村）都有一座小小的土地公庙，有的在田间垒几块石头，上面盖一片石板，没有神像，写上“福德正神”四字，也算土地公庙。有些妇女喜欢在夜间躲在别人屋边听人说语，用别人的话意来预卜来年运气，叫做“听暗卦”。

九月九日重阳节，有登高览胜习俗。儿童放风筝，乐趣盎然。人们在这一天要吃番薯、柿子、甘蔗等。因为旧俗认为，在这一天吃这些东西有特别的寓意。如：吃番薯、芋头、柚子寓意补头，吃丹红的柿子寓意补血，吃甘蔗寓意补脚骨、手骨等等。

十月十五日为下元节，有演戏向神“祈安”的习俗，这习俗已逐渐冷淡。

十一月冬至日为“冬节”，家家制糯米圆子，用糖水煮成汤圆，但只能用红糖水，而不能用白糖水。俗语说“吃了冬节圆子多一岁”，因为快要过旧历年了。

端午节挂菖蒲和艾

漳州一带旧俗，端午节（农历五月初五，俗称五月节）家家门首挂菖蒲和艾。艾是摘取几支，菖蒲是连根带泥从沼泽地拔来，利用泥土的粘性，将艾一并粘贴在门首壁上。菖蒲、艾都有一股

异香，端午节采这两样东西结扎成束用于驱蚊，是全国性风俗。而漳州一带演变成悬挂门首，相信它能辟邪，并附会上一则故事：传说，黄巢起兵打天下经过漳州。他在队伍未到漳州之前，已化装成平民先到漳州城外，看到群众扶老携幼，纷纷逃难。其中有一个老头子，背上驮着一个比较大的孩子，手里牵着一个比较小的孩子，正匆忙赶路。黄巢感到奇怪，问道："老伯，你这么大年纪，还匆匆忙忙要跑到哪里去？"老头子答道："黄巢就要来了，他是天煞星下凡，见人便杀，我死了倒不要紧，孩子可不能让他死在黄巢刀下。"黄巢说："我就是黄巢，其实我并没有像人们传说的那样可怕，好人我是不杀的。"老头子听说这人便是黄巢，吓得浑身发抖，连忙跪下叩头求情道："大王饶命！"黄巢扶起老头，安慰道："不要怕，我杀你老人和小孩做什么？但我要问你，你为什么小的孩子不背，却背大的孩子呢？"老头子解释道："我背的孩子是我兄遗下的一点血脉，我兄死了，我一定要尽心保护他的孩子。而这小的孩子是我自己的儿子。"黄巢听后大受感动，说："你是一个义人，我一定要保护你和你带的孩子。"老头子说："感谢大王不杀之恩，但大王说要保护我一家，你的部下不知道，兵荒马乱，难保你的部下能放过我。"黄巢就随手拔来一把草，有菖蒲、艾两项，递给老头子，说："你回去将这些挂在门首为记号，我要传令，凡是门首挂这两种草的，必须特加保护。"老头子谢过恩回家，照黄巢的吩咐办了。邻家看见，问明缘由，也采来那两样草，照样挂起来。这事传开来后，人们纷纷仿效。黄巢军进城后，门首挂有这两种草的家庭果然得到保全。那天是五月五日，以后人们采其逢凶化吉的好兆头，年年五月五日都在门首挂菖蒲、艾，认为可以辟邪，由此成为风俗。

清朝死人穿明朝服

漳州民俗，在殓尸时要为死人穿明朝服装。这风俗的起因有一个故事：

明朝万历进士洪承畴，字亨九，南安人，崇祯时以兵部尚书总督蓟辽军务，抵御清兵。崇祯四年（1641年）率领十三万人马，与清兵大战于松山。次年松山陷落，洪承畴被俘。他本要绝食而死，后被诱降清。传说，他在投降时曾与清朝订约："生降清，死归明，汉女不入宫，状元无满人中。"所以，民间就传下了这一习俗，人死后要穿明朝服装。

旧俗，尸体入棺要穿"七重寿衣"，由死者的长子（若长子已逝，由其弟代，无弟由孙代）头戴大竹笠，足穿木屐，站在小凳上，由"土公"（专门以殓葬为业者）将"寿衣"先依次套在其子（或孙）身上，套的时候要反穿，即将后摆穿在面前，衣襟在背后。七件套好，然后整套作一次脱下来，正穿在死人身上。套衣时，被套者作为死者的代表，为什么要头戴大笠，足穿木屐，而且要蹬在小凳上呢？这也有一则故事：

天启二年进士黄道周，字幼玄，号石斋，漳浦县铜山所（今东山县）人，二十五岁迁居漳浦县城。崇祯时任右中允，崇祯亡后，在福州拥立隆武帝，任武英殿大学士，自请募兵出江西抗清，在婺源战败被俘，拒绝洪承畴的诱降，隆武二年（1646年）就义于南京。据传，他在狱中有"头不戴清朝天，脚不踏清朝地"的誓言，入清以后，人们感念黄道周的忠烈，所以行"头不见天，足不着地"的葬礼，相效成俗，相沿至辛亥革命后还未消除。

其实，"汉女不入宫"是由于满族怕在血统上被汉化，"状元

无满人中”是由清帝怕满族因为过分学文而放松习武，失去原来的骁勇善战本色，规定满人可以不经科考而授官，未必真有和洪承畴订立“生降清，死归明”的条约；黄道周的“头不戴清朝天，足不踏清朝地”传说也只比喻其忠贞不屈的“节义千秋”精神。而且黄道周就义后已被人收埋于南京城外，后由他的儿子到南京收回遗骨（一说齿发）归葬于漳浦北山，只是象征性地将黄道周的一套衣冠做成尸身模样，平卧悬挂在他生前讲学处漳浦明诚堂书院（今黄道周纪念馆）房间梁上，以表示其“头不戴清朝天，足不踏清朝地”而已（辛亥革命后已归葬于北山墓地）。漳州殓葬风俗起源可能比上述传说的时间更早，这些传说的产生虽出于附会，而故事的流传则显示了人们头脑里“忠”的观念之浓厚。

死后女皆孺人男皆进士

漳州旧俗，新婚穿红袄，头戴凤冠，无论贵贱，都可暂充一日的贵妇人。妇女死后，也可以不分身份，出殡时用一幅“铭旌”引路。铭旌上、神主牌上、墓碑上，都可标上“例赠孺人”头衔。据传，这是由于南宋末年，元兵占领南宋都城杭州以后，恭帝赵㬎被挟北去，杨淑妃所生皇子赵昰在福州称帝（即端宗），杨淑妃被尊为太后。太后、少帝与群臣在元兵追击下南迁广东，经过漳州沿海时，杨太后想找一些妇女谈谈，大臣说：“太后不可接见无爵的妇女。”杨太后为了要亲近民妇，传旨：“此间妇女尽赐孺人。”以后民间援此例，女子结婚时，身穿红袄，头戴凤冠；死后标“例赠孺人”衔头。

而漳州地区的男人凡读过书的，尽管连半个秀才也没有捞到，死后出殡时的铭旌上、神主牌上、墓碑上都可标“例赐进士”衔

头，这是援引“宋少帝马口溪开科取士”故事。传说，宋末少帝为元兵所逼，由福建南下广东，经过马口溪，曾驻跸，在那里开科取士，尚未揭榜，元兵已迫近，少帝急忙登上銮舆继续南逃。参加科考的文士攀住銮舆，要求发榜，少帝乃传旨，尽赐进士。

又有旧俗：闺女出嫁，可由两人提一对宫灯为先导，由娘家送到夫家，悬挂厅堂。据传，这风俗是援引一则故事：明嘉靖十四年“探花”（进士第三名）林士章，万历年间携眷在朝任职时，夫人郑氏曾朝见李太后，座谈至天黑，太后赐宫灯，差太监送她回家。林士章原籍漳浦，归休后住漳州城东北部赤岭铺附近长桥。此后，漳州地区便逐渐有了这一风俗。

出嫁不见天立地

漳州旧俗，女子出嫁途中不露头脸，足不踩土。这种风俗的来源有好几种说法：一说，从前有一种“煞神”，能飞行云端，俯瞰地面，专门摄取出嫁女子的灵魂，所以女子出嫁途中要蔽盖头脸，使“煞神”看不到，为此要采取以下这套“防煞”措施：出嫁时头戴“凤冠”，或用绸缎扎成的大红花代替，脸罩红帕，手捧花枝和一把粉红色纸扇，由父母或其他长辈扶上轿。轿前挂长帕，帕上插石榴花枝，叫做花轿。花轿不能在半途停放，抬到男家时，男家已在门前放一个叫做“筅筜”的竹编圆形大平筐，由新郎的母亲或其他女长辈搀扶出轿，走过“筅筜”进屋，新郎的父亲（无父亲者由叔伯代）手捧一个画八卦的米筛遮在新娘头上，护送新娘进屋。这时要奏乐。

另一种传说，这种风俗是遵循“周公礼法”。是按照“周礼”的规定来执行的。

又有一种传说，这种风俗是对“周公礼法”的抗拒，起源于“桃花女”。因为周公定的规章制度压制妇女，桃花女极力反对，周公决定给予惩罚，乘桃花女出嫁时，调来天兵天将，要把她杀死在路上。桃花女就采取了上述那些防范措施，使天兵天将看不到她，避过灾难。后来女子出嫁时仿照桃花女不见天立地的一套做法便成为风俗。

在别种传说里，则把桃花女说成妖女，认为桃花女是一个女巫，她编造鬼话，首创上述女子出嫁时的风俗，借以敛财。在现在某些风气闭塞的乡村中，仍有一种专门教嫁娶双方如何置办物件，如何按“规定”行事的妇女，叫做“紫阁姆”，由嫁方雇请，随新娘到新郎家，嫁娶双方都必须给予报酬。人们认为“紫阁姆”正是继承“桃花女”衣钵的女巫。

带路鸡与连尾蔗

旧俗，男婚女嫁但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夫妻双方大都事先未谋一面，互不了解，终身大事听天由命而已。媒人为了赚钱，往往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尽说双方好处，夸大其词，对子缺点则尽量隐瞒，有时运用双关妙语，含糊支吾，以便日后发现所言不实，有理由推托。当然，双方父母不是对子女的终身命运漠不关心，但只能打听了解对方家况而已。闺女足不出户，外人很难知道其人品、相貌，虽与男方行聘订婚，也是不准男方来相面的。女方则“不大择婿”，这是记载在漳州旧方志上的话，就是说，女方只注重男方家况是否富裕，不重视女婿的才能、学识、人品。对男方的了解，最多是由上了年纪的妇女到男家去座谈，乘机观察，并从交谈中不露目的地勾引话题，侧面了解，对男方情况还是不

甚明白。俗语说“女儿菜籽命”，就是说女儿嫁出去好似菜籽卖出去一样，有的会被好农夫培育成茁壮的植株；有的则因为生长环境不佳而长势不好，甚至会受到摧残，但也只能“自叹命薄”。而父母对女儿出嫁后的命运总是牵挂心怀，因而采取以下一些措施，以祈女儿“好命”。人们互相仿效，也就相沿成俗。

在婚事议定，男方向女方送聘礼时，要加上从南洋输入的荖叶和槟榔，取“白头偕老，相敬如宾”之义。

在女儿出嫁之前，父母便要准备好一雌一雄的雏鸡，出嫁时用红纱绳绑住鸡脚，装在鸡笼里，放在轿后，叫做“带路鸡仔”，到了婆家，解开红绳，放入新房床下，看看是雄的先出来还是雌的先出来，以卜先生男还是先生女。明清时代的移民将这风俗带往台湾，由于那时台湾人口少，人们求嗣心切，改用一只“鸡角”（刚学啼的公鸡）和一只“鸡媛”（将要初次生蛋的母鸡），以祈快生男育女。漳州一些地方，除一对“带路鸡”，还有两头猪崽，叫做“带路猪仔”，以祝六畜兴旺。现在城市里一般家庭已不养鸡鸭，这风俗也就不存在。

女方将女儿嫁出之后，总是放心不下，思念女儿初入别人家，能否得到公婆疼爱，夫妻是否和谐，第二天便要叫新娘的弟弟到男家去探望，成为风俗，称为“舅爷探房”。第三天，新娘步出新房，在厅堂上拜见翁婆及长辈，并与小辈答礼，叫做“三日出厅”。第四天便要让新郎陪新娘回娘家去安慰双亲的思念，叫做“四日回礼”。当天就回婆家，娘家要备好两根连头带尾的甘蔗，用红纱绳扎在一起，让新娘带回婆家，竖放在新房门边，祝新婚夫妇今后的日子似甘蔗从头到尾节节甜。

妇女的“哭调”

长歌当哭，亘古有之。闽南，特别是漳州一带妇女的“哭调”别具韵味，富有浓厚的音乐感和乡土气息，声调委婉，余音袅袅，催人泪下。

哭而有调，是众多妇女发自内心情感的共鸣，经过历次不断“修改”而定调。在哭丧时，无论哭的是丈夫、父母、长辈、兄弟姐妹、儿女，都可用“统一的曲调”自己“编词”，痛哭一番。女戚来吊丧，照样地哭，死者的女亲属要陪哭。有的人家亲属不多，还拿钱雇人来哭，力图造成死者亲族甚多的假象，以尽“哀荣”。“哭调”有一定模式，“女”既成“妇”，人人不教自会。而哭有真哭，有假哭，有的悲痛欲绝，有的虚与委蛇。

“哭调”并非哭丧专用，妇人如果心情抑郁，或悲愤难平，也常痛哭一番，以发泄郁积心头的感情，或寄托哀思，或诉说身世，用的虽是同一哭调，而此时却显得格外凄切。有的妇人借题发挥，发泄怨恨，以哭代骂，淋漓尽致。从前妇女受封建礼教束缚，所受委屈无从排解，惟有哭是最可发泄感情的方式，并且可以利用哭调作为骂人的“武器”。哭，多少能引起“听众”的同情，不似“泼妇骂街”那样令人厌恶。

每逢清明日，几乎家家要上山扫墓，致祭亡人，妇女触景伤情，便要在墓前痛哭一番。这时，在各处公冢之间，悲哭之声相闻。

也有哭着玩的，大多是农村小女孩的即兴之作。从前，女人一到“及笄”之年便只能在家中织布，作女红，不轻易出门。而一些小女孩，往往要上山放牛、拾柴，山野间是她们的自由天地，她们便学起大人的哭调，自己“编词”，胡乱“哭”起来，其实只

是把它当山歌唱，大多是“哭嫁歌”之类，算是为长大后应用作练习吧。

闺女出阁要“哭嫁”，用的是与哭丧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哭调，不似哭丧那样放声号啕，而是喁喁低吟，如泣如诉。词句大都是致谢父母养育之恩，以及表达离别的衷情。也有为感到前途茫茫而饮泣。因为从前女子出嫁只能凭媒妁之言，父母之命，丈夫的长相、性情、品质，以及家庭状况，翁姑的性格，妯娌的为人等，都与自己有切身关系，却都无从了解，“终身大事”只能听命运摆布，“闺女上花轿，既喜又怕”。加上告别父母的依依惜别之情，心中百感交集，自然禁不住一番哭泣。何况已经成俗，也不容不哭。

随着时代的发展，妇女社会地位提高了，从前那种“哭调”只在乡村有若干保留。

漳州品茶之风

漳州民间品茶之风由来已久。南宋淳熙《临漳志》已记载漳州产茶之盛及品茶之风。明代漳州人所用茶叶大都系本山所产，质量甚佳，是每年必上供朝廷的贡品，正德年间每年上贡叶茶 378 斤、芽茶 500 斤，嘉靖年间增为叶茶 400 斤、芽茶 511 斤（据万历《漳州府志》）。明末清初漳州战事频仍，茶园管理不善，质量下降，战事平定后仍未能恢复，很多漳州人便转往武夷山经营新茶园，漳州民间也兴起品尝武夷茶之风。康熙初年会元、漳州人陈常夏在日记上写道：“康熙十年十月二十三日……值僧闻复往沧桑亭，松窗竹榻，别作岩栖调度，代余为茶水主人，果聪佐之。”从这篇日记可知道文士品茶讲究意境和情趣。而农村野叟的品茶情趣亦不亚子文士。乾隆三十一年永安知县彭光斗在《闽琐记》中

说："余罢后赴省，道过龙溪，邂逅竹圃中，遇一野叟，延入旁室，地炉活火，烹茗相待，盏绝小，仅供一啜，然甫下咽，即沁透心脾，叩之，乃真武夷也。客闽三载，只领略一次，殊愧此叟多矣。"当时漳州民间有沿自宋代的斗茶之风，乾隆《龙溪县志》卷十《风俗》记载："龙山寺茶（古龙山寺在今芗城区北斗），俗贵之。近则远购武夷茶，以五月至，至则斗茶，必以大彬之罐，必以若深之杯，必以大壮之炉、扇必以琯溪之箑，盛必以长竹之筐，凡烹茗以水为本，火候佐之，水以三义河为上，惠民泉次之，龙腰石泉又次之，余泉又次之，穷山僻壤亦多耽此者，茶之费岁数千金。"从这则记载可以知道清代漳州人品茶之普遍，茶艺之考究。这种小盅、小杯，讲究火候，猛冲细啜的品茶之风，流传到现在。每泡一小盅茶，刚好灌四小杯，每杯仅供啜一口，如果四人在座，每人分啜一杯，两人对饮，一人可啜两杯，四人以上则有的必须留待下遍才得一啜。每遍饮过，茶杯用开水冲洗一遍。

乌龙茶工艺源于漳州

乌龙茶原是茶树品种名称，后来凡按这种品种制作方法制作的茶叶皆称为乌龙茶，包括水仙、铁观音、乌龙、色种等茶树的茶叶。色种乃"多色品种"之谓，如本山、黄旦、毛蟹、梅占、奇兰等，共数十种。乌龙茶介于全发酵的红茶和不发酵的绿茶之间，为半发酵的茶叶。半发酵茶俗称匡金边，对茶叶中的酶既有发挥又有抑制作用。它的汤色金黄，气味芳香，饮后口齿留香，喉底回味甘美，有生津止渴作用，具消暑清热之效，提神、消食、醒酒敌烟之功，因而为消费者所喜爱。乌龙茶原产福建、广东，清代闽粤人大量移居台湾，开垦新的茶园，质量后来居上。然而

“五口通商”之初，台湾未辟为通商口岸，产品必须运到厦门出口，徐珂的《清稗类钞》说“台湾茶均名乌龙者，尤为输出洋之大宗。”据清末厦门海关《华洋贸易年报》，甲午战争前，台湾乌龙茶从厦门出口的最高数量曾达到一年19万担。

乌龙茶制作技术源自漳州，这可从阮旻锡所作《武夷茶歌》及《安溪茶歌》知之。阮旻锡，厦门人，《海上见闻录》作者，曾入郑成功招贤馆，后见抗清事业无望，遁入空门，法名释超全。《武夷茶歌》当是他在武夷山为僧时所作，后回闽南，又作《安溪茶歌》。

《武夷茶歌》载于《崇安县志》：“嗣后岩茶亦渐生，山中供此少为利。往年荐新苦黄冠，遍采春芽三日内。搜尽深山粟粒空，官令禁绝民蒙惠。种茶辛苦甚种田，耕锄采摘与烘焙。谷雨期届处处忙，两旬昼夜眠餐废。道人仙山资为粮，春作秋成如望岁。凡茶之产视地利，溪北较厚溪南次。平州浅渚土膏轻，幽谷高岸烟雨腻。凡茶之候视天时，最喜天晴北风吹。若遭阴雨风南来，色香顿减淡无味。近时制法重清漳，漳芽漳片标名异。如梅斯馥兰斯馨，大抵烘焙候香气。鼎中笼上炉火红，心闲手敏工夫细。岩阿宋树无多枞，雀舌吐红霜叶醉。终朝采采不盈掬，漳人好事自珍秘。积雨山楼苦昼间，一宵茶话留千载。重烹山茗沃枯肠，雨声杂沓松涛沸。”

《安溪茶歌》载于《泉州府志》：“安溪之山郁嵯峨，其阴长湿生丛茶。居人清明采嫩叶，为价甚贱供万家。迩来武夷漳人制，紫白二毫粟粒芽。西洋番舶岁来买，王钱不论凭官牙。溪茶遂仿岩茶样，先炒后焙不争差。真伪混杂人啧啧，世道如此良可嗟。吾哀肺病日增加，蔗浆茗饮当餐霞。仙山道人久不至，井坑香涧路途赊。江天极目浮云遮，且向闲庭扫落花，无暇为君辨正邪。”

从《武夷茶歌》中的“近时制法重清漳，漳芽漳片标名异”和

《安溪茶歌》中的“迩来武夷漳人制”及“溪茶遂仿岩茶样”句可知道，漳州制茶工艺传入武夷山的时间在阮旻锡作《武夷茶歌》之前，即康熙九年（1670年）以前，当时漳州战乱，茶园荒芜，许多漳州人转往武夷山经营茶园，在崇安县打石街办茶厂，按漳州工艺制茶，仍名“漳芽”、“漳片”，至今武夷山有些村落，乃漳州制茶人的后裔在当地定居而形成，仍操漳州口音的闽南语。由于武夷茶出口价高，销量大，安溪就仿照武夷茶的制作方法。以后，随着闽南人大量移居台湾，开辟新茶园，并带去福建的制茶工艺。当时台湾大量种植乌龙茶树，茶叶外销超过内地。所以说乌龙茶的总名称始自台湾，而工艺源于漳州。

百花村长福

漳州南乡（今龙海市九湖镇）有塘北社（自然村），以在明成化年间漳州知府姜谅所发动疏浚的邹塘北边得名，雅称长福。村人种花卖花历史悠久。乾隆《龙溪县志》卷十《风俗》记载：塘北人“种花为业，花之利视谷胜之，盖其地……宜花故也。又能于盆中种古松及各花树，枝干扶疏，古致异常”。村人姓朱，以是南宋理学家朱熹后裔为荣。据族谱记载，其开基祖是朱熹第八代孙朱茂竹，明永乐年间因失库银从远方逃难而来，看到这里地形如彩凤展翼，周围山水秀丽，花木葱郁，四季如春，便定居下来。由于这位始祖早有种植花卉的兴趣和技艺，这片气候、土地适宜花木成长的地方便使他得以一展所长。其子孙继续发展，再加上此地距漳州很近，花卉有市场，以至塘北成为著名的花卉之乡，历明、清至民国，繁盛不衰，被称为“卖花长福”，解放后就更加“推陈出新，百花齐放”了。

1963 年，朱德委员长南巡至漳州，看到塘北到处种花，各种花卉如红梅、丹橘、绯桃、皓李、珍贵的茶花品种“十八学士”和“五宝”、水仙、池荷、海棠、杜若、荸荠、幽益、佳菊、丹桂、月桂、各种形态的古榕、仙人掌……应有尽有。朱委员长高兴地称赞道：“这真是一个百花村啊！”从此，人们都称塘北为百花村。朱德委员长素来爱兰花，对百花村兰花品种之繁多，尤其称赞。百花村里的兰花有拜岁兰、鹤顶兰、素心兰、白兰、一点红、四季兰、大青兰、剑兰、蕙兰……朱委员长感到，漳州是种植、培育兰花的理想地方，特意将一套自己心爱的日本版《兰花谱》寄来送给百花村。

1980 年 10 月，陆定一到漳州视察，特地访问百花村，参观之后，欣然提笔写下“百花村”三个俊逸的大字。村民们把这幅字装在花圃进口的门额上。

百花村形形色色的花卉琳琅满目，盆艺巧夺天工，被文人称为“无声的诗”，“立体的画”。各地花卉爱好者不远千里而来采购盆景和花种，连海外侨胞，国际友人都慕名而来。百花村的人们也将好花运到各地销售，近如漳、码、泉、厦，远及于北京、黑龙江等十多个省市，都有漳州百花村卖花人的足迹。

“文化大革命”期间，百花村被扣上“封、资、修”三顶高帽子，30 多亩花圃及数以万计的盆艺尽被捣毁、焚烧。本来生机勃勃的百花园变成荒凉的废墟。幸而逆境不长，“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百花村重获生机，村人以惊人的毅力迅速恢复花卉的栽培和盆艺制作，并把百花园扩大到 100 多亩。家家户户的屋前屋后也建立了小花圃，培植各种奇花异草，使百花村变得更加美丽，吸引了更多的海内外游客和顾客。

在世姓廖死姓张

诏安官陂乡有“死张活廖”的风俗，因为元末明初官陂有个富翁廖三九郎（即廖化），家财万贯，惟苦于膝下无男儿，单生一女。村中有一个年轻的教书先生张愿仔（也写作元仔），是云霄西林人。廖公见这教书先生为人忠厚，就招为女婿，当作亲生儿子一样看待，全部产业交付掌管，要他分一个儿子继承廖家香火。但愿仔单生一子，于是他就想出一个“死张活廖”的办法，遗嘱后世：“生则姓廖，以报其恩，死则姓张，以记本源。”所以官陂这一系子孙，在世姓廖，死后在神主牌上、墓碑上都写姓张。后来，更想出姓“张廖”的办法。但有的只写姓廖，有的只写姓张。在清末至民国初年，盛行宗族械斗，大姓欺小姓，廖姓在诏安是一个小姓，张则是大姓，为了免受别姓欺压，就一律改写姓张，一下子使张姓与林、沈、许并列为诏安四大姓，有“姓沈的沈半县，姓张的张半山”的谚语（官陂为诏安山区）。

明末清初以后，已有大量姓“张廖”的官陂人移居台湾，传下众多后裔，“张廖”成为台湾云林县大姓之一。当地建有祖祠，编有族谱记载本源，以不忘祖地在福建漳州的诏安官陂。

台湾张廖家族中有一位张廖富源，于1943年移居日本，经商致富。新中国成立后，他坚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被推选为大阪华侨总会会长，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做了大量工作，获日本裕仁天皇赠予“五级瑞宝勋章”及奖状。这种勋章的外国获得者只有两人，一是当时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一是张廖富源，两位都是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做出杰出贡献的人。

张廖富源的江滋株式会社在日本销售中国土产，漳州的石板

材也是他经营的项目之一，并为中国引进各种先进设备。他曾托人到诏安官陂寻根认祖，在当地乡亲帮助下，按张廖富源所存族谱记载的地点“后堀（厚福）溪边枫树下”找到张廖富源这一分支的祖墓，经摆“罗盘”核对其“字向”与族谱记载相符。之后，张廖富源亲自前来漳州认祖会亲。

王游两姓闽台亲

在诏安县秀篆乡祖地和从秀篆分衍于台湾省台北县和桃园县、宜兰县的王、游两姓，世代联婚，两岸两姓共用一座祠堂“盛衍堂”。同姓不同宗而共祠堂已很罕见，不同姓而共祠堂，别处所无。

原来，王、游两姓不仅是裙带关系而已，还有以男性世系为血缘标志的两姓交流。两姓都是明代永乐年间开基秀篆的客家。王氏第二代（开基祖念八郎之子）王先益，过继给游氏第三代（开基祖念四郎之孙）游信忠为嗣，改姓游，解除了游信忠无嗣之忧，后裔繁盛，分居于龙潭、溪厝、北坑、安美、拱涯洋一带。

嘉靖年间，剿倭名将俞大猷从福建追击倭寇入广东，经过秀篆，游姓第五代（其“骨”是王姓第四代）四位健儿加入剿倭行列，立下战功，俞大猷奖给“四勇奇勋”匾额，游氏族人就在龙潭建起祠堂，命名“盛衍堂”，将这匾额挂在祠堂中堂。

明末清初，秀篆游姓很多人加入郑成功的抗清队伍，赶走荷兰侵略者，据守台湾。清朝统一台湾后，游氏又有一些人前往台湾开发土地，建基立业。乾隆年间去台湾的人更多。往台湾的秀篆游氏族人有的定居台北、桃园等地，有的随吴沙开发三貂岭（今台北县贡寮乡），又越过三貂岭，垦拓了噶玛兰平原（今宜兰

县）的大片荒地。游氏后裔分布在今台北市贡寮乡、宜兰县番割田、北角庄、北六斗，桃园县的南圣角等地，人口众多。

诏安秀篆的王氏，起初人丁稀少，是游氏传衍于台湾的第十四代孙游祖送回祖地过继给王姓为嗣，子孙才兴旺起来。由于游原是王，王原是游，所以秀篆王氏也以游氏始建的“盛衍堂”为祖祠。

秀篆王氏缘于游氏在台湾已建基立业，也陆续到台湾开垦。两姓在台湾与在祖地一样，也是同村共处。

有清一代，两岸王游交往频繁，即使在日本占领台湾期间也不间断。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两岸断绝往来。

抗战胜利，台湾光复，王、游两姓在台湾的后裔回秀篆谒祖会亲。两岸宗亲共同筹款修建“盛衍堂”，《碑记》一直保存，永为纪念。

秀篆盛产茶叶，起初王、游二姓乡人过台湾，带去家乡茶叶在台湾种植；以后，又将在台湾经过改良的茶种携回祖地。

秀篆乡龙潭“盛衍堂”祖祠，每年元宵佳节都举行灯会，王游两姓家家户户制灯送到祠堂参展，五光十色挂满灯棚，互相辉映，竞彩争光，男女老少同欢乐。

两岸同祀大道公

被祀为医神的大道公，原来是民间草药医生，姓吴名夲（音滔）字华基，号云冲。祖上是河南濮阳人，于唐代中和四年（884年）入闽，初居安溪石门，后移居漳州龙溪县青礁（今属厦门海沧），再移居泉州同安县明盛乡积善里白礁（今属龙海市角美镇）。吴夲出生于白礁，长大后结庐于青礁与白礁之间的龙湫坑，采药

炼丹。

吴夲终身不娶，专门研究医术，采药炼丹，到各地行医济世，救活无数人性命，解除了无数人的病痛，因此远近敬仰。上至皇家，下至贫民，都感念他的医术高超，医德高尚，以至在他死后为他建庙塑像，尊为医神，祈望他继续救人济世。其他地方的人为去病消灾，也都到祖庙“挂香”，带回当地另立庙宇，加以供奉。

民间奉祀吴夲为神始于北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 年)，乡人在他生前结庐炼丹的岐山下龙湫坑建一座小庵，称龙湫庵。远近群众纷纷到龙湫庵祈求保庇平安。宋高宗绍兴二十一年（1151 年），下诏建立“医灵神祠”，赐名“慈济”。青礁、白礁两座慈济神祠同时兴建。乾道二年（1166 年）宋孝宗加封“忠显侯”，乾道七年又加谥号“大道真人”，宁宗嘉定元年（1208 年）加封“英惠侯”，理宗嘉熙四年（1240 年）又加封“冲应真人”，至淳祐元年（1243 年）将多次所加封号连称为“慈济忠显英惠康祐灵护侯正祐公冲应真人”，诏改“庙”为“宫”。明成祖皇后患乳疾，百药无效，用“吴真人”药治愈，因此又于永乐十七年（1419 年）加封“医灵妙道真君”和“万寿无极保生大帝”，从此，人们以他的最高封号称为“保生大帝”，在他的塑像上戴“冲天冠”，披黄龙袍。

白礁、青礁虽历来属于不同的行政区域，而两座慈济宫相距只一里多。为了易于区别，称青礁的慈济宫为东宫，白礁的慈济宫为西宫或南宫。两宫规模一样，都是前后三进，层楼叠殿，富丽堂皇。历代修建，800 多年来一直保持辉煌。西宫殿中有一只石狮，据传是永乐十七年明成祖加封“万寿无极保生大帝”时皇后特赐的。另有精工雕刻的十二根蟠龙青石柱竖立在殿里和前廊上，据传是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 年）移居台湾的闽南人后裔得知故乡要重修慈济宫，特地运来贡献的。

自白礁和青礁建立慈济宫后，闽南各地相继建立奉祀吴夲的

庙宇，都称为慈济宫，大都要从青礁或白礁祖庙“挂香”。以漳州渔头庙最为著名，而漳州东门亭顶大道公庙（现今生大厦）有东门第一宫之称。

台湾的慈济宫始建于郑成功收复台湾后。郑成功于南明永历十六年，（即清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赶走了荷兰侵略者，次年，随郑成功入台的闽南人便在初登陆地台南学甲兴建一座“保生大帝开基祖庙”，即学甲慈济宫，并将登陆学甲的农历三月十一日定为在学甲遥拜大陆慈济祖宫的节日，以缅怀故乡和祖先。以后，学甲慈济宫被“分灵”到台湾各地建庙，据不完全统计，有140多座。祖籍闽南的台湾同胞常常结伴组团到白礁、青礁祖宫朝拜。

“关帝”崇拜与传说

闽南数量最多的宏大庙宇是关帝庙（土地庙虽多但大都很小），有官建的、民建的。关帝是关羽的神化。关羽生前不过是三国的蜀汉大将，最高的官职是“前将军”，最高的封爵是曹操给的“汉寿亭侯”，后世却称其为“帝”，原因在于历代帝王宣扬其“忠义”精神，一再加其封号，以激励臣民为统治者效忠：北宋时封为“显烈王”，徽宗封为“武安王”，南宋高宗封为“壮缪义勇王”，孝宗封为“壮缪义勇武安英济王”，元朝文宗封为“壮缪义勇武安显灵英济王”，明太祖认为封得过头了，只按其生前封号封为“汉寿亭侯”，而万历皇帝竟封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加冕旒，如帝王一般着装，清顺治帝封其为“忠义神武灵祐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雍正帝封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乾隆帝改其谥号“壮缪”为“忠义”。在

统治者的如此推崇下，各州县均立有武庙，与祀孔子的文庙相对应，老百姓则以关帝为能伏魔降妖庇佑万民的保护神，到处建庙奉祀，祈其保境安民。

漳州城内官建的关帝庙有两座，一为地方官所建，在城西，为古武庙，其地得名为古武庙街，在今漳州二中附近，一在芝山下开元街（今胜利西路西段），是明万历年间总兵呼良朋所建，称新武庙。漳州境内较著名的武庙还有东山武庙，赤岭武庙（在龙文区立交桥附近），石码武庙，有上码庙和下码庙两处，磁窑（扶摇）武庙（在龙文区郭坑镇），以东山武庙最著名。该庙于明洪武二十年与铜山守御千户所所城同建，起初甚简陋，后发展成为规模宏伟的庙宇，清初被移民分灵于台湾宜兰，再分灵到台湾各地，所建庙宇都很壮观，而许多台胞还以到东山祖庙朝圣为一大心愿，东山关帝曾渡海到台湾各地巡行，受到热烈膜拜。南靖关帝也被华侨分灵到印尼首都雅加达，称南靖庙，为华侨联谊聚会处。

各地武庙，正殿中央祀关帝，左右边侍立关平和周仓，关平执印，周仓持“关刀”。只有东山关帝庙为周仓另立一个神龛，免他持刀侍立于关帝旁边。传说，宋帝昺崖山败亡时，与同时殉国的丞相陆秀夫灵魂同到玉皇大帝那里要求给一个归宿，玉帝令陆秀夫附神于东山关帝，宋帝昺要求玉皇大帝给他投胎再做皇帝，玉帝说宋朝气数已尽，不可能让他转世再做皇帝，他只得到东山关帝庙附神于周仓，变成君臣倒置。陆秀夫子心不安，为免宋帝昺受屈，将塑像位置进行调整，做出与别处不同的布置。

龙溪县磁窑村（扶摇，今属龙文区）关帝庙从东山关帝庙分香而来。传说，村里有一个孤儿叫杨小，依附于叔父生活，因婶娘气量狭窄，他受气不过，离家来到东山谋生，为一个寡妇所收留。在她家帮工若干年后，寡妇将独生女水仙许配于他，叫他娶回故乡成亲。水仙的嫁妆中有一幅关帝神像，是她绣成的，到东

山关帝庙挂过香，她将关帝像挂在新房中。新婚之夜等不到新郎进房，她便独个睡了。半夜里被一声怪叫惊醒，非常害怕，再也睡不着。天亮时新郎回来了，却听他在窗外惊叫："不好，窗中有一摊血！"新郎快步进房，水仙问道："你昨夜怎么不回来？"杨小解释道："我们这里风俗，新婚之夜新郎不能入房，如果在房中睡觉会丧命。"杨小听水仙说晚上只听见窗外一声怪叫，并无受到其他打扰，便循着血迹找到磁窑寨，见到一只巨大公鸡的死尸，知道有"初夜权"的公鸡精已被杀死。村人闻讯都跑来看，相信水仙那幅关帝神像有东山关帝之灵，是关帝杀了公鸡精，于是，改称磁窑寨为镇安寨，在寨附近建关帝庙，每年到东山祖庙挂香一次，祈求关帝永远为村民保庇平安。

文艺源流



傀儡（木偶）戏

现在叫做木偶戏的，古代称傀儡戏，简称傀儡，传说始于汉代。三国时马钧所作木偶能表演各种技艺。唐代开始有演故事的傀儡戏，当时出版的《封氏闻见录》说："大历年间，有人刻木为尉迟鄂公、突厥斗将之戏，机关动作，不异于生。"宋代有杖头傀儡（夹棍木偶）、悬丝傀儡（提线木偶）等。据《武林记事》，宋代还有一种由人戴假面具表演的舞队，也叫傀儡戏。南宋绍熙元年（1190年）朱熹知漳州（任漳州长官），发布《谕俗文》，宣布要革除的十项陋习之一是"以禳灾祈福为名，敛掠钱物，装弄傀儡"。庆元三年（1197年），傅寺丞（伯成）知漳州，继续禁止城乡"戏头"逐家聚敛财物豢优人作戏，或弄"傀儡"。可见每年秋收后民间演戏和"弄傀儡"之风屡禁不止。当时所"弄"是何种傀儡，则没有资料。南宋漳州的傀儡与现在木偶戏有什么渊源关系，也没有资料。只有一点，从朱熹禁止"以禳灾祈福为名敛掠财物装弄傀儡"，可知"装弄傀儡"是一种迷信活动，现在还有演提线木偶戏"祭煞"或祝福祈安的，当是南宋"装弄傀儡"之风的遗存。

现在漳州一带所流行的有提线、手掌、铁夹三种木偶戏。

提线木偶戏。又名嘉礼戏。用线操纵木偶，使头能转动，手能移动，"小旦"的眼睛还能随头部的转动而"转轮"。木偶手虽能执刀，但动作比较机械，善演文戏而不善演武打。明代或清代由闽西传入漳州的提线木偶戏以汉剧的"乱弹"为曲调，说词通俗，善插科打诨。最著名的演员是平和五寨乡的吴猪哥及其子吴自东。吴自东解放后主持漳浦"艺明提线木偶剧团"，改唱潮调，

以包公戏为拿手好戏。在芗城区、龙海一带演出的南靖“九和堂”等则唱歌仔戏曲调。

手掌木偶戏。木偶头用木雕刻，油彩画脸谱，装在戏服上，演员手掌套进其中，以食指拿头，拇指和中指掌双手，演技灵活，善演武打戏。开初，手掌木偶戏，只用一个小小的简单戏棚，挂一块装饰如戏台的木板，演员藏身的后台狭小如布袋，故又名布袋戏。

漳州的手掌木偶戏唱“北管”（京剧曲调），与泉州手掌木偶戏唱南曲不同，故称“北派”，道白用漳州话。自清中叶起，漳州一带出现许多手掌戏班，形成福春、福兴、牡丹亭三个流派，表演技术各有特色。“戏文”都是旧小说故事，“头手”演员都识字，边翻书便演唱，道白通俗，而唱曲无多，所唱不过仿照京剧曲调，含糊其辞，其实无字。以连台的武侠戏最吸引观众，戏班一般只在一处演两三天，便因雇主改变而转移另一处演出，一些戏迷竟随演出地点而转移。手掌戏曾盛极一时，自抗日战争爆发后，百业萧条，手拿戏也随之衰落。解放后，由于文化部门扶持而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各位手掌戏老艺人先后恢复班子。1959 年成立专业的龙溪专区木偶剧团，以郑福来、杨胜、陈南田等高手为骨干，加上漳州艺校木偶科首届毕业生，作为艺术改革试验基地，使手掌木偶戏推陈出新，蓬勃发展，名闻海内外。且由于改唱芗剧而为本地观众所更加欢迎。以后又能用芗剧曲调唱普通话歌词，使外地观众听懂，更加扩大了手掌木偶戏的影响。

铁夹木偶戏。用三支铁杆操纵木偶的身手。清末从粤东传入闽南，剧目与音乐都仿潮剧。民国初年，诏安自沈和尚创办“老元华”开始，先后有林显的“忠正顺”、“玉春香”、“乐天香”、“中元华”、“万年春”等演唱潮剧的铁夹木偶戏班。以后又有仿照汉剧音乐和节目的“小昆冈”、“碧湖天”、“彩春华”、“新金华”等

铁夹木偶戏班出现。两种戏班都在诏安、云霄、东山、平和、漳浦一带演出。

铁夹木偶戏也于抗日战争时期衰落。解放后在文化部门扶持下，诏安有一些铁夹木偶戏班恢复活动。

古老的竹马戏

竹马戏源自民间游艺。小孩子用一根小竹竿拖在胯下便当是骑马了。大人则破竹为篾，缚成“马”的架子，糊上色纸，贴上吉祥图案，马头扎在胯前，马尾扎在胯后，状如骑马，于节日进行表演，由边游边演发展到搭台演出，并吸收别的剧种节目，形成竹马戏。南宋偏安一百多年，宫廷音乐流入民间，成为南曲，一时间社会上歌舞升平，人们“直把杭州当汴州”。南曲很快就传到闽南，兴起了许多“南管”曲馆，并被泉州的梨园戏和漳州的竹马戏用为主要曲调。

漳州一带城乡，每年秋收之后都要在适当地点搭台演戏，祈求来年再有“好年冬”，叫做“乞冬”。也许由于演出过盛，也许由于有演出爱情故事或一些淫秽表演，被理学家陈淳称为“淫戏”。宋庆元三年（1197 年），原大府寺丞傅伯成以朝散大夫知漳州（来任漳州长官），陈淳上书陈述情况，请求禁演“淫戏”。他说：“此邦陋俗，当秋收之后，优人互凑诸乡保作淫戏，号乞冬，群不逞少年遂结集浮浪无赖数十辈，共相倡率，号曰戏头，逐家裒敛财物，豢优人作戏，或弄傀儡，筑棚于居民丛萃之地，四通八达之郊，以广会观者，至市廛近地四门之外亦争为之不顾忌……”

竹马戏开台时要先由生、旦、丑、老生四个角色扮春、夏、秋、

冬，手执马鞭，象征性地骑马走“四门”，称为“跑四美”，分别唱春、夏、秋、冬四句唱词：“春游青草地，夏赏绿荷池，秋饮黄花酒，冬吟白雪诗”，歌颂四时美景。从这形式看，便是南宋秋收后演戏“乞冬”风俗的遗存。竹马戏的节目以表演爱情故事的“弄仔戏”为主，插科打诨，富有风趣。也有不堪入目的“十八摸”。早期的竹马戏不大化装，小旦都是男童饰演，只用淡红色水粉敷脸，头上缚一条挂珠串的白布，发髻一如一般妇女，盘在脑后成“咸菜团”；老旦发式也与一般妇女一样，头上裹黑巾；丑角画八字胡，鼻梁上涂白粉，俗称“滴鸟屎”；老生挂假须；小生戴书生帽，脸不装饰。几乎没有什么戏服，有的角色还穿着生活服装。曲调以南曲为主，加上锦歌等民间小调如长工歌、手巾歌、病囝歌、十月怀胎歌、跪妻歌、打妻歌、撑渡歌、雪梅歌等。剧目以“弄仔戏”为主，如拾柴弄、搭渡弄、士九弄、番婆弄、管府送、桃花搭渡等，都是一丑一旦或一生一旦的小戏。后期才有王昭君、赛昭君大报冤、陈三五娘、武松杀嫂、宋江征方腊、李广挂帅、六郎斩子、白蛇传等从外地剧种移植来的较长剧目。演员一般为七人，有“七角戏仔排万兵”的俗谚。

20 世纪 20 年代至 30 年代，漳州各县潮剧、歌仔戏等戏班兴起，竹马戏转而衰落，戏班改唱歌仔戏。

解放后曾对传统的竹马戏进行抢救。现在仍有唱竹马戏的曲馆存在。

芗剧与歌仔戏

糅合南曲、锦歌及其他民间小调为唱腔的漳州竹马戏，随着明清时代的大量移民传到台湾，增加了台湾当地的一些曲调，也

吸收同是由闽南传入台湾的京剧、四平戏、汉剧、梨园戏的服饰和演技，并移植了不少这些剧种的节目，在此基础上演变成为台湾歌仔戏。由于是由“歌仔”发展起来的，所以叫做“歌仔戏”。本来只在“歌仔馆”清唱，后来成队游唱，叫做“歌仔阵”，有时在广场演唱，叫做“落地扫”，最后发展为上台演唱。其特色是有凄切的“哭调”，感人肺腑，催人泪下。那是因为，自清光绪“甲午”战败，割让台湾于日本后，台湾人民在殖民统治下情绪忧郁，因此在原来漳州锦歌哭调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借“孟姜女哭倒万里长城”及祝英台对梁山伯的“二十四哭”和“五子哭墓”等歌，尽情倾吐心中苦闷。最早教唱“歌仔”的是宜兰员山乡头份村欧阳助（绰号歌仔助），由于“歌仔戏”曲调富有地方特色，方言俚歌通俗，很快便盛行于台湾各地，排挤了京剧、汉剧、四平戏、梨园戏、竹马戏等，成为台湾的主要剧种，并传回闽南。

民国初年，厦门已经有台湾同胞组织的“歌仔馆”教习“台湾调”。民国14年（1925年）厦门梨园戏“双珠凤班”聘请台湾艺人矮仔宝传授技艺，改唱歌仔戏。民国17年3月15日，台北“三乐轩”歌仔戏班回白礁宫（在今龙海市角美镇）进香，在白礁及厦门演出歌仔戏。民国20年海澄县浮宫镇“宝德春”竹马戏班首先改唱歌仔戏。翌年，台湾“金声团”歌仔戏班到石码文明戏院连演10天。从此，台湾歌仔戏在厦门、漳州一带风靡，许多竹马戏、梨园戏纷纷改唱歌仔戏。台湾的霓进社、霓光班、丹凤班、同意社等歌仔戏班也相继来漳厦一带演出。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在台湾推行“皇民化”运动，禁止演中国古装戏，歌仔戏只得按“皇民新剧”规定改着“时装”表演，皇帝改称“董事长”，丞相改称“经理”，而“戏文”与曲调仍旧。这种“皇民新剧”甚至推行到日军占领下的厦门。

而漳州的军政当局则蔑称台湾歌仔戏为“亡国调”，禁止演唱。

一时间，歌仔戏艺人全部失业。当时有一位歌仔戏师傅邵江海，曾于民国17年与龙溪县人郑泊水、陈金朝同往台湾，拜歌仔戏著名艺人温江涂和鸡鼻仙为师，一年艺成，回同安、海澄一带教演歌仔戏，演出《孟姜女》、《断机教子》、《陈三五娘》等剧，大受观众称赞，有“三日无火烟也要看宝德春”的俗谚流传。在国民党漳州军政当局禁演歌仔戏后，他为歌仔戏开辟一条新路，摒除特别凄凉的台湾大哭调，吸收锦歌的精华，创作“杂碎调”，融入一些南曲，形成一套“改良调”，吸收其他剧种的剧目，并自行创作，完成《六月雪》、《白蛇传》、《卢梦仙》、《白扇记》、《山伯英台》、《李妙惠》、《安安找母》、《战地啼鸳》等30多个剧目，称“改良戏”。

抗日战争期间及战后，漳州地区的改良戏班有二百多个，著名的有宝德春、龙凤春、金瑞春、艳芳春、新金春、金宝升、宝莲升、真艳升（成立于竹笋产地程溪，戏台桌围上绣竹笋为标志，被叫做笋仔班）、福恒春（成立于乌礁洲，演员平时无演戏时以割咸草织草席为业，被叫做咸草班）、新莲升（成立于石码，演员无演戏时以卖豆腐脑为业，被叫做豆花班）。

当时国民党龙溪县党部办的社会服务处对一些改良戏班进行集训，接受集训的有新艳春、新恒春、新金春、金宝升、玉宝升、金丽华等12个戏班，演出曾乃超等编写的《吕四娘》、《苏武牧羊》、《哭秦庭》、《骂延寿》、《风波亭》、《梁红玉》、《文天祥》、《史可法》、《花木兰》等剧目。曲调方面，加入一些“流行歌曲”，但因为与原来有地方特色的曲调格格不入，后来不被采用。

抗战胜利后，出现台湾歌仔戏与闽南改良戏合流融会的盛况。1948年，南靖都马改良戏班（抗建剧团）前往台湾演出，“杂碎调”为台湾歌仔戏所采用，称为“都马调”。

解放后，改良戏正式定名为芗剧，许多戏班也合并成为正式

剧团，如：新春班、霓光班合并成立漳州市实验芗剧团，海澄一带的改良戏班合并成立专业的芗剧团，漳浦“官浔戏仔”业余芗剧团也发展成为专业的漳浦芗剧团。其余的业余芗剧团则遍布各地。

1995 年 6 月，漳州市实验芗剧团前往台湾演出。从此，海峡两岸戏曲交流日益频繁。

闽南和台湾皮影戏

皮影戏古代已在北方流行，明代传入闽南。明末清初，闽南人大量迁居台湾，皮影戏随之传入台湾。因而台湾皮影戏富有闽南韵味，用闽南话说白，曲调是闽南锦歌，它在台湾流行的程度曾与闽南不相上下，但在日本占据台湾时代，皮影戏逐渐衰落，在闽南则持续发展。

皮影戏在漳州一带最盛行的时期是清代至民国初年。市区街头和农村广场夜间常有皮影戏演出。有的为庆寿或举行婚礼而请皮影戏班表演助兴，也有的为追荐亡魂而演出。郑成功的部队曾在闽南一带与清军反复战斗，人死了很多，尸横遍野，瘟疫流行，民间迷信厉鬼作祟，每年七月各村庄及市镇逐日轮流做“普渡”，追荐无主亡魂，以祈免祸。这时都要演木偶戏或皮影戏来助兴。

抗日战争期间，漳州芗潮剧社除运用话剧形式外，并采取皮影戏这种轻便的舞台艺术，在街头巷尾及乡村广场宣传抗日。芗潮剧社被反动派取缔后，其社员变换名义，继续以戏剧等方式宣传抗日。其中有一支以业余皮影戏表演艺术家陈郑煊为主干的“抗敌纸影戏队”（因为战时皮张较缺，用纸板代替，故改称纸影戏），日间从事小学教员等本职工作，晚上到处表演纸影戏宣传抗

日，剧目有《抗日英雄小白龙》、《金门失陷记》等。飞机、大炮等战争场面开始在影幕上出现，十分吸引人。当时人们也把传统的普渡节日活动改为“追荐抗日阵亡将士”，利用旧风俗各处逐日轮流做“普渡”而宣传抗日。

抗战胜利后，漳州皮影戏衰落。新中国成立后，文化部门对皮影戏进行扶持抢救。1952 年，龙溪专区举行民间文艺会演，长泰县官塘村艺人张建发整理演出传统剧目《临江驿》。1954 年，漳州、厦门皮影艺人联合组队赴省参加第二届地方戏曲观摩大会演出，漳州人陈郑煊编演的现代戏《一把菜刀夺机枪》获奖旗。

20 世纪 80 年代，厦门市“台湾艺术研究室”为了研究闽南和台湾皮影戏，特邀请陈郑煊作表演和写剧本，制作皮影角色。1991 年，厦门市群众艺术馆举办“庆元宵民俗风情之夜”，陈郑煊应邀演出皮影戏《抗日英雄小白龙》和《孙悟空戏弄猪八戒》。恰好当时有十几位台湾民俗学者和歌仔戏艺人来厦门参加地方戏曲研讨会，是夜特来观看皮影戏演出，双方互相交流，畅谈海峡两岸皮影戏艺术。现在台湾也有人在抢救皮影戏，已成立 4 个皮影戏剧团，高雄县有一个皮影戏馆。而陈郑煊也已把皮影戏技艺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漳州林龙潭布袋戏班。看来海峡两岸的皮影戏不会失传。

漳州民间舞蹈

漳州民间舞蹈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柔和优美，如竹马灯、穿灯舞，原来是庆祝丰收的游艺，后来用于节日表演，和谐富有情趣；一种气氛雄壮，如大鼓凉伞、大车鼓、大鼓弄狮，原是庆祝战争胜利的舞蹈，后来用于节日的欢庆活动，场面热闹。前者都

用灯来衬托，后者则靠鼓来助威。

穿灯舞

穿灯舞流行于平和一带，大都在元宵或中秋节表演。演员双手各托一盏灯于胸前，一手由上而下，一手由下而上，不停旋转，脚步由平步逐渐加快，音乐节奏随之加快。男女演员人数不限。

大鼓凉伞

大鼓凉伞舞起源于剿倭胜利。明代嘉靖年间，漳州一带饱受倭寇祸患，后来戚继光、俞大猷由浙入闽，屡次打败倭寇，百姓都用猪羊和米酒劳军，并表演“大鼓凉伞”，以音乐伴奏，以示庆祝。凉伞象征指挥官，大鼓代表用以指挥战斗的战鼓。后来倭患敉平，人们不忘倭寇祸患和剿倭胜利，每于节日表演这种舞蹈。演员十多人，有男有女，男的武士装扮，胸前挂鼓，双手握槌，两面敲打，随着鼓声的节拍旋转，对跳。女的头梳双髻，两手执凉伞，随着鼓声跳跃，旋转凉伞，既热烈又优美。

大车鼓

大车鼓起源传说不一，一般认为是唐代陈元光“开漳”时所遗传，象征战乱之后的和平。演员 8 人，一人饰车鼓公，手执烟斗（陈元光时代未有吸烟习俗，当是后人所加），一个饰车鼓婆，手执蒲扇，司鼓一人，顽童一人，少女 4 人，各人随鼓点节奏穿梭舞蹈。

大鼓弄狮

大鼓弄狮主要流传在漳浦一带，以元宵节前后十日的表演最盛，其他节日也有表演。表演时由一个强有力的壮汉背大鼓于胸前，配有两个打锣的，锣鼓都是跳一下敲一响，要配合得恰到好处，错落有致；一人撑狮头，一人撑狮尾，头尾之间的狮身用长布描画如狮毛的彩纹，表演时用四五人操持。鼓与狮周旋跳跃，显示武士斗狮的雄姿。群众举火把相随，沿途遇人放鞭炮欢迎便表

演一场，这种表演据说起源于庆祝狩猎胜利。

竹马灯

竹马灯流传于华安、南靖、平和、漳浦等地，据传起源于宋代秋收后庆祝丰收和祈求来年再有一个好年成的游艺。表演者扮成农村少妇，将马头形和马尾形道具绑在腰间，作骑马状，模拟马的跳、跑、踢和骑马人的颠、惊等动作，配合扮作牵马人的丑角，有说有唱有舞，诙谐滑稽。

漳州民间曲艺

漳州民间曲艺多种多样，有锦歌、南词、南音、答嘴鼓、说书等，都用方言演唱，通俗富有乡土韵味。明末清初，闽南人大量移居台湾，将这些民间曲艺传入台湾。

锦歌

锦歌原名“杂锦歌”，也叫“歌仔”。曲调有杂碎仔（又称四空仔）、七字仔（又称四空仔）、大调（五空仔）、小调（三空仔、六空仔）等。唱词一般七言，一段四句，作不规则押韵。曲目有称为“大柱”的长篇故事歌如《陈三五娘》、《山伯英台》、《孟姜女》、《雪梅歌》等，有生活气息浓厚的短歌仔如《牛犁歌》、《病囝歌》、《手巾歌》、《长工歌》、《赌博歌》、《鸦片歌》等。这些歌在民间广泛传唱，历久不衰，曾有木板本“歌仔册”畅销闽南及台湾各地。抗日战争期间，产生抗日内容的歌仔，芗潮剧社同人曾以龙溪抗敌后援会名义编印《救亡弹词》，在群众中传唱。新中国成立后，又有《思亲》、《寻祖》、《水仙情》、《乔先生回漳州》等新内容的曲目出现。

南词

南词演唱由十人左右组成，每人操一件乐器，有扬琴、琵琶、三弦、二胡、月琴、笛、箫等，配以打击乐器鼓、锣、钹、磬等，各个演员均边弹边唱，互相配合。曲调多种多样，唱调以七言为主，每曲八句，一句一韵。曲目多有故事性，如《花魁醉酒》、《紫燕盗令》、《陈女赶船》、《烟花告状》等。漳州曾有多家业余南词曲馆，后渐衰微。

南音

南音又叫南管，据传为唐宋遗音。主要乐器有琵琶、二弦、三弦、洞箫、扁鼓、木鱼、铜铃、响盏、拍板等。乐曲有《梅花操》、《四时景》、《八骏马》、《百鸟归巢》等。从前漳州各县城乡有多处南音曲馆，演唱自娱，并受雇请为人婚庆祝寿演唱。

答嘴鼓

答嘴鼓一般由两个演员对答，类似北言的对口相声。不同的是，答嘴鼓用闽南话对白，讲究押韵，插科打诨，并插唱民歌，别有风趣。有时，答嘴鼓演员分别戴青、红假面具，以加强气氛。

说书

说书闽南方言叫“讲古”，艺人以长篇小说为蓝本，以方言演绎，加以通俗化。多在休闲场所进行，听众自动凑一点钱送给讲演者。漳州城乡及各县、集镇有借讲古维生者。

漳州民间谜语

漳州一带在宋代已有灯谜活动，明清时代更盛行。每逢元宵及中秋佳节，一些绅士、文人在门前张灯结彩，并搭一座灯棚，挂着许多灯，灯上写谜面，利用其门前广场为猜谜场所，无论贵贱人等，都可来竞猜，猜中时，棚上发出“通通”鼓声，便可上前

领取一份奖品。

民间传说，清康熙年间，叛郑成功投清的黄梧，受封一等海澄公，占据明朝探花谢琏的府第为公爷府，值中秋佳节，便在府第门前搭灯棚贴谜语，其中一个大灯，做成一座漳州城模型，里面放一锭金元宝，用十多支蜡烛照耀。当时厦门是郑成功占领区，郑的大将刘国轩闻说黄梧在漳州夸耀声势，决定去煞一煞他的威风，便带十多名亲兵，化装平民，驶一条十八桨快船，入夜时分在漳州城南门溪上岸，来到公爷府门前，见到那一座漳城模型灯，没有谜面文字，只标“猜四书字句”，知道是一道物谜，便上前来猜，说“吾土地也！”接着将那模型灯踢翻，取去金元宝，说“毁其宗庙，迁其重器！”便带他的亲兵扬长而去。公爷府的亲兵骑马来追，哪里知道刘国轩一路撒下很多铁钉朝上的“三脚码”，刺进马蹄铁的中缝，马都走不动，刘国轩一行从容来到南门溪下船，顺流回到厦门。

这故事写进清末石印本小说《台湾外志》，故事不一定是事实，但从这故事可以知道，除文字谜面外，漳州很早就已经有物谜。

民间又有口头谜语，谜面大都押韵，如“荷莲藤，荷莲豆，荷莲来相勾”，猜纽扣；“深坑一阵猴，牵出来汗水滴滴流”，猜煮粽；“生在深山林底，死在窟湖之地，灵魂飞上天，骨头被挑去卖”，猜烧炭等。

漳州谜坛清代甚盛。民国时期未衰，有《芗城谜萃》、《锦江谜拾》、《墨庐谜语》等谜集出版。石码曾有“文虎”、“龙门”两个谜社，出版过《文虎半月刊》。各县的元宵、中秋灯谜活动均甚精彩。解放后，漳州一带谜语活动更加繁荣。1956 年漳州市（今芗城区）文化馆成立灯谜组，节日在中山公园举行灯谜会。1962 年举办灯谜擂台，连赛 6 晚，参赛者数百人。1981 年成立漳州市灯谜协会，各县随之相继成立，除了节日会猜，还编印刊物。20

世纪80年代，漳州市灯谜协会多次组织代表队参加全省及各县市灯谜会猜，屡次名列前茅。1989年2月19～21日，漳州市举办首届中华灯谜艺术节，海内外三十多个城市的150多位谜家前来参加会猜，其中有台湾3个代表队16人参加。1992年2月，漳州灯谜艺术馆落成，馆内收藏、陈列古今中外谜语书刊2700多册，其他谜语活动资料为数亦多。1998年元月，漳州威镇阁重建落成，威镇阁楼上设芗城区灯谜艺术馆。

漳州木版画

版画是造型艺术的一种，其特点是运用刀和笔，在木板上进行绘画和雕刻，制成版面，涂上墨和不同的彩色颜料，刷印在纸上。一幅画要用多片刻版，几次套印，有三色的、五色的，或更多的颜色，颜料都用水剂，不用油墨，用刷子刷印，题材有五谷丰登、春牛图、神佛绣像等。

漳州的木版画，兴于明而盛于清。清末至民国初年，有胡庆堂、俊记、锦源堂、文华堂、多艺斋等12家作坊。其中锦源堂、俊记、永华堂、文华堂为同一祖传的颜家老铺，其祖先于永乐年间从外省迁来永春，后定居于漳州杨老洲，以制作木版画为业。抗日战争前后，漳州的版画作坊陆续倒闭，独颜家继续经营，且将倒闭作坊的底版全部收购，成为销量大、流传广的颜家连锁作坊，产品除销闽南外，并远销至台湾及东南亚各地。

漳州木版画多为民俗吉祥图，也有被人们相信可以辟邪的图画，题材多种多样，居民按季节需要选购。供给过年张贴用的年画销量最大。年画的吉祥图有五谷丰登、加冠进禄、财神献瑞、鲤鱼图、春牛图、寿星图、财神赵公元帅等。供新屋落成和乔迁新

居用的有门神尉迟恭和秦叔宝、神荼和郁垒、姜太公在此、八卦图、狮头咬剑等。供端午节用的有龙船图，供元宵节和中秋节粘贴花灯用的有整套的十二生肖图、整套的八仙图、各种花草、各种戏剧人物如陈三五娘、梁山伯、祝英台、王昭君等。

漳州木版画的特色是：纯朴古雅，既有北方木版画的阳刚之气，也有南方木版画的秀美雅韵，可与天津杨柳青的版画媲美。

随着石印、铜版等印刷技术的出现，漳州木版画受到打击，逐渐衰落。然而，它的独特艺术风格是不可取代的。

1957 年，在有关部门鼓励下，漳州颜家版画传人颜镜明印制许多旧版木版画，参加中国民间艺术作品展，并被送到苏联及东欧各国展览，备受称赞。1986 年，这些版画在漳州首届民间美术展览会上，使一些“后生”知道漳州原来有这么精湛的古老艺术。同年 9 月，由颜文华印制的另一批漳州木版画，参加福建美术展览会，美术界的专家、学者见了大为惊奇，赞叹不已。胡平任福建省长时，选出漳州木版画赴英国展览，并作为珍品赠送外国友人。1987 年末，漳州木版画进京参加美展，前来参观的国内外及港澳台美术界专家、学者大加赞赏。同时还召开了漳州木版画的学术讨论会，并举行新闻发布会。《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台湾《雄狮美术杂志》等都刊登了漳州木版画。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央美术学院、上海、杭州、四川等各美术学院还专门求取、收藏漳州木版画。

漳州木版画于清代传入台湾，现在的台湾木版画与漳州有异版同工之妙，可谓一脉相承。而漳州的木版画更为“古版”，在艺术上有独到之处。海内外专家、学者，千方百计来向漳州求取，有的甚至千里迢迢来到漳州，但都不能如愿以偿，因为只有香港路颜姓一家藏有底版，而已无作坊，无法为求取者特地制作。

书画之乡诏安县

当人们一走进诏安县城，便会感到这里有一个特色：每一户人家，甚至店铺、庙宇、旅舍、饭馆、机关、学校，都喜欢用书画装饰门面、窗口、厅堂，整个县城有着一种非常雅致的氛围。

诏安人爱好书画，蔚为风尚。早在清代，已经形成“诏安画派”。列入《中国美术家名人词典》的诏安书画家有23人，其中，谢琯樵金石书画皆精，尤其善画山水、花鸟、兰竹、人物；沈瑶池以松、鹰、人物、花鸟见长；沈锦洲的花鸟，刘国玺的山水、沈祖文的墨竹等也都十分有名。当代著名书画家则有被推选为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的林林，上海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沈柔坚，四川美术学院院长沈福文，福州画院画家沈锡纯，更有与张大千齐名的寓台书画家沈耀初等。

先说清代“诏安画派”的奠基人谢琯樵，他于嘉庆十六年（1811年）出生在书香之家，九岁便琴、诗、画皆能，尤工书法，年轻时已名传远近，先后被福建巡抚和闽浙总督聘为幕僚。自咸丰元年（1851年）起，多次东渡台湾，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的《台湾省通志》将谢氏与吕世宜并列为寓居台湾工书画者的最杰出人物。当时台湾第一富豪，在籍太常寺卿林维源在板桥建一座规模宏大的林家花园，特地请谢琯樵设计。该花园集我国南方庭院之精华于一体，亭、阁、楼、台、榭、桥，形态各异，相映成趣，现被列为一级古迹，游人如织，无不叹为观止。谢琯樵的墨竹图被刻在台湾忠烈祠主壁上，他的许多书画挂在台湾历史博物馆，四幅名画被收进台湾出版的《中国书画》集上。

沈耀初是当代寓居台湾的著名书画家。他生于1918年，1948

年到台湾任教，1974 年获台湾“中国画学会”金奖。自 1975 年起，先后在美、日、德等国及香港、台湾等地举办画展 27 次，其作品为各地博物馆长期陈列，并为名家所珍藏。1990 年，埋首书画 60 载的沈氏终老诏安故乡，享年 72 岁。现诏安有“沈耀初纪念馆”供人瞻仰。

其他如沈福文、沈柔坚、沈锡纯等亦是当代驰名海内外的书画家。漳州市特在中山公园专辟一馆，珍藏与展览沈福文书画。

除了那些居住在外地的书画家外，留在诏安故乡的还有许沙洛、沈荣添、沈吉文、徐序行等。书画爱好者则遍布街巷村落。

诏安有一家书画院。有博雅斋、墨缘居、文心阁等十多家画廊和十多家书画裱褙店，还有人到北京、深圳、厦门等地开设画廊。县有关部门因势利导，多次组织画家赴新加坡、台湾、福州等地举办书画展；在闽粤边旅游区开辟工艺品市场，借以扩大诏安的知名度。

细腻雅致的漳浦剪纸

漳浦剪纸俗称铰花，它不同于陕西风格粗犷的窗花剪纸，也不同于泉州刻纸，而以一种细腻雅致的独特风格闻名海内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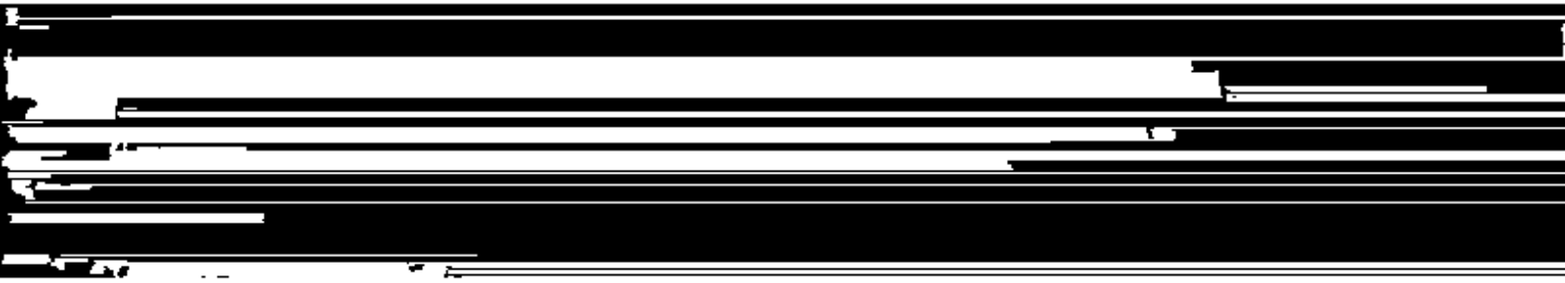
漳浦剪纸历史悠久。据旧县志记载，早在宋代，漳浦风俗自正月十日至十六日为灯节，神庙宗祠每夜灯烛辉煌，家家“剪纸为花”贴在灯笼上，送到神庙宗祠参展，“备极工巧”。自明清以来，婚嫁寿庆也以剪纸为饰物，所采用的都是表示吉祥的图案，如鸳鸯、龙凤、牡丹、花篮、鱼、鹿、瓶花等。在迎神和祭祀上，也应用剪纸为象征性供品，如在“普渡”祭祀的供桌上贴“猪头花”、“大饼花”，在饭上放一个“饭匙”剪纸等。平时，剪纸则被

广泛作为刺绣的底样，几乎每一个妇女都有一本专门夹藏剪纸的“花簿”，以备刺绣时选用适当的化样作为蓝本。凡妇女的弓鞋、头巾，小孩的狗头帽、虎头鞋、肚兜，老人的荷包等，都要绣上图案，都是按剪纸底样（贴在物件上）一针一线刺绣而成。

新中国成立后，县文化部门对剪纸艺术进行发掘整理，增加新题材。对散处民间的剪纸艺人，或请上来，或派人下去，帮助创作，总结推广经验，培训新艺人，举行展览会，出版剪纸专集，将这种剪纸艺术推向全国，推向海外。1983 年福建省群众艺术馆主办的民间剪纸艺术展览上，有漳浦作品 200 多件，占全部展品的三分之二。1985 年，在佛山、扬州、丰宁、安塞、海伦、望城、高密、蓟县、蔚县等十市县剪纸联展上，特辟“漳浦剪纸”专馆，共展出 84 幅作品。1992 年漳州市举办漳浦剪纸作品展，展出 186 件。随后，有漳浦剪纸 120 件被送往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参加福建民间美术展览。在此之前，漳浦剪纸艺人陈秋日女士于 1983 年 6 月应邀到斐济首都苏瓦参加“中国民间剪纸展览展销会”，所带去的 300 多件作品被争购一空。她在开幕式上表演的剪技，博得热烈掌声。会后，她应邀到斐济各地传授剪纸技术，轰动整个岛国。之后，她又参加“福建省杂技团及篆刻、剪纸、工艺美术家代表团”访问日本，受到热烈欢迎。

陈秋日是新一代剪纸艺人，与她同时活跃在剪纸艺坛上的还有吴碧娜、高秋云、洪淑金、郑小蕊、张峥嵘、高少苹等。她们都是剪纸艺术的佼佼者，而她们的成就得归功于老一辈艺人陈金、黄素、黄匏、林桃等的传授。陈金已逝，黄素、林桃等跨入新千年，已 90 多岁，仍有作品问世，并能当场表演剪技。现在，漳浦共有老、中、青剪纸艺人 100 多人。

由于漳浦剪纸艺术的盛名，1994 年 1 月被中央文化部授予“中国民间艺术剪纸之乡”称号。



谚语及谚语故事



处世谚语

众军杀人，罪在主帅。

水火大贼。

惹峰叮头，惹鬼捏咙喉。

有千年山，无百年官。

官无长期，贫无万世。

看土面恰好看人面。

未赢先想输。

菜瓜损（打）狗双头了。

和尚头舱（不会）搁得橄榄核。

愚（憨）狗想吃猪干骨。

媒人的儿子无“某”（妻）。

屎桶无目也有耳。

有样看样，无样看世上。

有样看样，无样自己想。

有时星光，有时月光。

虎咬歇（吹）螺的。（从前打虎队执武器的在前，吹螺号的在后）

想死不想想贲社。（“贲社”是取别人的村庄为己有）

跟好人行有布可经，跟歹人行有团可生。

（未嫁的女子与品行好的人交朋友，会认真织布，要是交

坏朋友，便会生下私生子。这谚语寓意不可交坏朋友）

仁义莫交财，交财仁义绝。

买卖算分，相请无（议）论。

食水得想开井人，食果子拜树头。

伓嗵（不可）桥过丢拐杖。

双脚踏双船，船开人沉沦。

滥马也有一步踢，好马有时也会着牴。

贫贱之交不可忘。

大石也要小石鲠（顶），红花也要绿叶扶。

众人一条心，泥土变成金。

勤俭是宝，吃穿免烦恼。

小小工艺学在身，胜过家传千万金。

教团泅，也伓（不）教团上树。

蚯蚓一粪箕，恰输鸭母一只。

儿孙自有儿孙福，莫把儿孙当马牛。

树身徛正，不怕树尾摇风。

烂柑翳（迤）笼。（寓意腐败会传染）

海水阔阔也会相抵着。

交官穷，交鬼死，交有钱人做马子。

富字穷字头，贪字贫字壳。

鸭蛋再密也有缝，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恶马恶人骑。

蜈蚣怕鸡，鸡怕蛇，蛇怕蜈蚣。

草蜢弄鸡公。

（喻弱者向强者挑衅，好不自量力）。

一人主张，也要两人相量。

鸡不可窜（跟）凤飞。

吃菜会成佛，牛马上西天。

“厄”（神像）是扛的，人是妆的。

馃是米磨的，“谴”（忌讳）是人号的。

疑心生暗鬼。

魔鬼天使变，耶稣世间人。

有心打石石成穿。

三厅官难断家内事。

少年不拍（搏）拼，吃老无路行。

打铁趁炉热。

入港随弯，入乡随俗。

山中没有千年树，世间难留百岁人。

无日不知午，无须不知老。

女的惊人嫌“痄世”，男人惊人讲无钱。

（惊，怕也。嫌，厌也。痄世，丑也。）

行船走马无三分命。

多衣多寒，无衣不怕寒。

讨食煞肥，借衣穿煞美。

食鱼食肉，也得食菜甲。

食些菜头食些姜，免请医生免烧香。

坐食山崩，“急计”（勤劳）“好康”（富裕）。

“大空”的狼狈，“咸涩”的员外。

（“大空”即铺张浪费，“咸涩”即节俭）

伓嗵（不可）有做虎斩，无做虎撑颔。

钱未赚到手，不可大虾配烧酒。

不知精打细算，枉有家财万贯。

徼（赌）和婊，家伙（家财）了（完）。

好布靠好纱，好新妇也着好“大家”（婆婆）。

紧纺无好纱，紧嫁无好大家。
愿嫁担葱卖菜，不嫁双人一婿。
嫁人吃番薯，不嫁人做“细姨”（妾）。
歹田望后冬，歹“某”（妻）一世人。
惠（惯养）囝不孝，惠猪撬灶，惠某哭闹。
拍（打）某猪狗牛，惊某大丈夫。
百忍全家福，家和万事成。
过瘾恰好吃补。
拍折手骨倒勇。
工换工，补被换挨砻。
替人举枷，不替人领债。
前岭未是崎，后岭恰崎壁。
猪母肉未吃不知韧。

世态谚语

一缘二钱三美四少年。
（指择偶的条件）
相亲看家宅，娶某看外家。
无“翁”（夫）受人疑，无囝受人欺。
坐船爱船走，生囝爱囝“傲”（贤）。
济（多）囝饿熬爸，济（多）新妇饿死“大家”。
爱花连花台，丈姆惜囝婿。
姑表无三代亲。
亲堂相欺无药医。
做田要有好田边，住厝要有好厝边。

徼（赌）鬼恰水（美）旦，没博也爱看。
鸦片本是土，越食（吸）越糊涂。
鸦片烟管可牵过水牛。
食“乌烟”（鸦片）害子又害孙。
老戏做到跌落棚。
曲馆边猪母也会打拍。
滥戏“厚”（多）锣鼓。
做生无才，做丑欠诙谐，做旦软猉（不会）来。
九笼糖十个头家。
有功薛仁贵，得功张士贵。
三国尽归司马懿。
死孔明惊死活仲达。
吴王败在西施，纣王败在妲己。
吃像三战吕布，做像桃花搭渡。
象过河吃卒。
借钱一号面，讨钱一号面。
拿别人的拳头打石狮。
大食假细腻，妖精假恬治。
细腻猫踏破厝瓦、细腻“查某”走过社。
站高山看马相踢。
水牛相触踏死泥鳅。
有须禁人胡。
无肉怨人大脚腿。
宁犯三厅官，莫犯“鲈鳗”（流氓）。
傍神作福。
恶狗恶门口。
上冬死牛，雨来倒厝，中年丧夫。

（喻人间痛苦事）

掠（抓）龟走鳖，掠蚌走蚬，掠虾姑走麻蜞。

（喻事情太多无法兼顾）

焰火好看不大久。

“串”（专）干水头田，串饿单身汉。

七月半鸭知死不知走。

济（多）子好名，独子好命。

济（多）牛踏无粪，济（多）团饿煞爸。

别人吃米粉你喝烧。

打人叫救人。

裆底蚊无拣“脚穿”（屁股）。

田螺吃过坎。

破砖假四角。

（指品行不好假正经）

死鸭硬嘴巴。

（指理屈还要争辩）

“水龟”变成蜂。

（“水龟”是一种浮游在水面的小甲虫）

本地“凤阳”变无“猴弄”。

（“凤阳”指走江湖演杂技的，“猴弄”即猴戏，一般本地人不会耍，这谚语是说本地人不相信本地人有好本事）

本地胡椒不会辣。

（也是“本地人看轻本地人”的意思）

日头亦炎炎，各人顾性命。

无鬼怪家神

（“家神”指已死的长辈）

恁（傻）鬼掠（抓）自己。

（这谚语是说死者的灵魂要抓亲人去同住阴间，用来譬喻“做事害亲人”）

敢死有鬼可做。

（喻敢于犯法不怕死）

烧烧（热）脸熨人冷尻川。

（尻川：指屁股）

熟侍骗厝内。

跟乞者相争巷仔路。

六月芥菜假有心。

杀猪的灌水，做戏的生见鬼。

做好无赏，打破要赔。

富人一席酒，穷人半年粮。

小身厄爱“上童”，小官爱骂人。

（“上童”是神汉假托神意欺骗信徒）

官恰济（多）兵，“动葛”（手杖）恰济（多）铳。

（指民国初期军队官多于兵的现象）

脚踏马屎傍官屁。

宁做太平狗，不做乱世民。

家衰出歹囝，国败出奸臣。

查母婢（女婢）歹（提）肉，自己无份。

乌龟假大爷，乞食假老爹。

（“乌龟”指妓院的男老板；“老爹”指官）

懒惰猫专吃死老鼠。

嘴念阿弥陀，身藏杀人刀。

杀头生理有人做，蚀本生理无人做。

眼睛看在“双糕润”（海澄的名点：糯米糕），头壳撞在华表石。

祖公无圣，兄弟相拼。

“三介娘仔”也敢赴“天公大濑”。

（“三介娘仔”是一种很小的鱼，“天公大濑”是北溪一个急流险峡，这谚语的意思是不自量力）

饮（饿）鸡不惜冠，饮人不惜面体皮。

爱水（美），不惊流鼻水。

（指有些女人为显美而少穿衣服，“流鼻水”即患感冒）

只惊跌落岩，不怕火烧厝。

（指有些男人穿得很漂亮，但他没有自己的房子，家中没有值钱的物件）

金胡蝇（苍蝇）一肚屎。

（喻有些人打扮得很漂亮，但却胸无点墨）

有钱人乞者性命。

（指有些富人过于吝啬，把金钱看得比性命更重要）

烧瓷的吃缺碗。

（瓷窑老板把好瓷器都卖出去，留下有缺陷的瓷器自用，这谚语譬喻节俭）

头家手一比，伙计做到死。

饲老鼠咬破布袋。

（譬喻忘恩负义）

得罪土地公，鸡母鸡仔煞（不会）饲得。

贼劫贼，鱿鱼吃墨贼。

面前有佛仔（不）去拜，想要西天拜如来。

（譬喻舍近求远）

看高无看低，半路认老爸。

（譬喻阿谀奉承，依附权势）

济（多）虱不知痒，济（多）债不堪想。

气象谚语

春看山头，冬看海口

（山头或海口有云会下雨）。

春节四十九日乌。初三圣，十八定。

（俗称农历十二月初三若阴天，十八日再阴天，就叫“乌龟报”，就会连续四十九日阴雨）

春寒雨至，冬寒断滴。

春雷拍马走。

春天囡仔（孩儿）脸，一日变三次。

正月寒死牛，二月寒死马，三月寒死过路客。

正月寒死猪，二月寒死牛，三月寒死播田夫。

立夏小满，雨水相赶。

四月芒种雨，五月无干土，六月火烧埔。

未食五月节棕，破裘不甘放。

春南夏北（风），无水磨墨。春北夏南，雨水满潭。

夏至雷，割稻披棕蓑，播田得犁水。

六月无善北

（六月刮北风会下雨）

久晴雷鸣，大雨不停。久雨雷鸣，天将转晴。

六月十二，彭祖是忌，无风也有异。

六月一雷破九台，七月一雷九台来。

夏季出北风，不久有台风。

夏至东风摇，大水淹过桥。

夏至起西南（风），雨水积满潭。

夏至雷，做大水。

西南乌，田园成草埔。

虹出东，大水流“飞”。

小暑起东北（风），大水淹头壳。

小暑惊东风（有雨），大暑惊红霞（有台风）。

处暑南（风）转北，无久台风到。

鲢鱼浮头，雷雨快到。

秋季吹西风，不久雨叮咚。

秋濛（雾）风，冬濛霜，春濛日头光。

春濛曝（晒）死鬼，夏濛做大水。

六月濛，七月水底滂。

澹地出星，雨落烩（不会）停。

星光照澹土，明日烂糊糊。

早日不成天，猛晴无好天。

日围箍（晕），会落雨，月围箍（晕），晒死虎。

农家谚语

小英开花人动工，大英开花人“播田”（插秧）。

（小英指野蔷薇，大英指金樱，蔷薇科，常绿蔓性灌木，都长在荒野、田边，小英开花就开始春耕，大英开花为插秧季节）

早田早播，无水得戽。

恁（傻）要死，清明不播播谷雨。

（早稻插秧的最佳时节是清明）

惊蛰后，好种豆。

清明前，好种花生。

早麻四月底，晚麻五月节。

秋前插秧正当时，处暑插秧无米煮。

栽种莫过秋，过秋一半收。

立冬早，大雪迟，小雪种麦正当时。

冬至前犁金，冬至后犁银（冬耕）。

春分秋分，日暝（夜）平分。

暝（夜）长到冬至，日长到夏至。

十月日生翅，憨慢查某（妇女）理赡（不会）直。

憨慢查某看无初三月。

月上水上。

初一、十五，水涨中午。

初八、廿三，早满，暗满。

初三、十八大流水。

八月十七、九月初三、十月初四大潮。

谚语故事

嘴吃尻川（屁股）痛

曾有一个时期，人们在传说“九龙岭土地公很灵验”。因为有些路过九龙岭的人中暑之后，只要向路边土地公庙小货店买一些香烛、糕饼，敬拜土地公，将糕饼塞一些到土地公神像口中，再从那神像的屁股上挖一点木屑，煎汤服下，便能治好头晕腹痛。其实，那土地公偶像是樟木雕刻的，樟木屑煎汤服，有治中暑腹痛的功效。那塞到土地公口中的供品，被小贩收回去，谎说被土地公吃完了。但那些病好的人则认为是土地公很“灵验”，这话一传开来，便有很多人特地到九龙岭拜土地公，只花不多的钱买香烛和供品，膜拜之后，将供品塞一些到土地公口中，便心安理得从土地公神像屁股上挖一点木屑去治中暑腹痛。但有人仔细一想，认为土地公会“吃”东西，那么也和人一样有感觉，被挖屁股不是很痛吗？因此便不是称赞土地公甘愿舍施屁股肉为人治病的牺牲精神，而是揶揄土地公贪吃忍痛，于是有“九龙岭土地公嘴吃尻川（屁股）痛”的谚语流传。后来，人们用这谚语作为“利益无多，代价不小”的譬喻。

王公斗（凑）鬼吃弟子

漳州方言称神像为王公。民间一般认为，王公是人的保护神，

可以向它祈求攘灾除祸，庇佑平安添福，可请它驱鬼镇邪。同时又认为，有时鬼怪会“附神”于王公。还有一种，以鬼为神，塑像奉祀，称为“王爷公”，如南宋理学家陈淳指出的“太保”、“舍人”之类，在迷信者的心目中，竟是神鬼不分的。也有人认为，鬼和神有时会互相勾结，欺骗、作弄“弟子”（信徒）。有一则故事说：某处王公与鬼勾结，王公叫鬼去作弄人，使人生病，不得不去向王公祈求庇佑献上供品。王公与鬼分享病人家属送来的这些供品，如猪头、猪腿、糕饼、水果等之后，便停止对那病人的作弄，病人痊愈了，认为王公很灵验，于是备下更丰盛的供品去拜谢。这样神鬼勾结，因而香火旺盛。但有的人觉察到“神鬼勾结”的秘密，大呼上当，因而有“王公斗（凑）鬼吃弟子”的谚语流传。人们用这谚语来譬喻社会弊病，如官匪勾结、贪官与恶霸勾结、治贼的与做贼的勾结，坑害良民等情况。

细汉偷割匏，大汉偷牵牛

有故事说：从前有一个寡妇，抚养独生子，十分溺爱，对孩子的一举一动，不论是好是坏，都认为是灵巧的表现，只有夸奖，从不教育。孩子常常去人家瓜棚下偷割匏（葫芦瓜）拿回家去，他母亲贪小利，只是称赞孩子头脑灵活，手脚敏捷，并没有责骂。孩子受到鼓励，从偷割匏开始，偷的东西越来越大越多。长大了，专门与偷杀牛的“牛灶”（宰牛场）勾结，乘更深夜静时，偷偷挖开农家牛栏的后墙，将牛偷去卖给“牛灶”宰杀。

从前，牛是农民的重要生产资料，官府出于维护农业生产的需要，也对牛十分重视，偷牛、杀牛是头等大罪，重至杀头。那一伙偷牛、杀牛的团伙终子被官府破获，个个判处死刑。在杀头

示众的那一天，那偷牛犯的老母跑到刑场哭别，问儿子还有什么吩咐。儿子说："愿母亲让孩儿再吮一次奶头，死才瞑目。"母亲答应他的要求，想不到儿子不是要吮奶头，而是一口将母亲的奶头咬下来，吐在地上，说："就是母亲从小把孩儿教坏，才落得今日下场！"

"细汉偷割匏，大汉偷牵牛"这条谚语便来自于这则故事。后人用这谚语启示天下父母，要从小教育好孩子。

四书读透透，不识鼋鳖龟鳖灶

中国文字自古以来不断简化。从前，鼋、鳖、龟、鳖、灶等字笔划既繁，字形又相近，较难辨识。故事说，有一个书生，书读得不少，能背诵"四书"，认字却不认真，写字常有"鲁鱼亥豕"之误，对"鼋鳖龟鳖灶"也常读错。一次，竟将贴在灶间的"司命灶君"读成"司命龟君"，被引为笑话。后人就用"四书读透透，不识鼋鳖龟鳖灶"这谚语讥笑常读错字和写别字的书生。

九归熟透透，半斤歼（提）头缕

"九归歌诀"是学珠算的人所必须念熟的，只有这样，才能进而对各种演算运用自如，这是以前商人所应有的本事。另外，如俗语所说，做官不离印，做贩不离称，商人除了懂算术，还要能熟练应用各种度量衡器具如尺、斗、秤等。故事说：漳城南门头有一个干果食品店的账房（会计）算术很精，记账很明，但不曾亲手出售商品。一次，门市伙计去上厕所，托账房暂时代为看管

一会儿，刚好一个顾客来，要买半斤线面。他拿起秤杆来称，因为操作不熟练，一时间没有想到应该提用来称两斤以下的第二纽（俗称二缕，方言“缕”音如“漏”），而误提用以称两斤以上的第一纽（头缕），当然就称不出物品的重量来。那账房虽然很快改正过来，但已经被人当作笑柄。不知道是故事形成谚语，还是后人编造故事以附会谚语，总之，“九归熟透透，半斤扜（提）头缕”历来被用以讥笑那些只懂理论而不能实际应用的人。

乞食恰猛庙公

从前，每一间小庙由一个“庙公”（庙祝）管理，靠“卜签”为生。但小庙也常被乞食（乞丐）占住。乞丐有丐帮，由丐头带领，称霸“角头”，凡他势力范围的乞丐，都要拜他为“老师”，时常孝敬钱财，否则不可“赚食”。如果乞丐受人欺侮，乞丐头便率领群丐大打出手。乞丐们往往乘人家举办婚庆喜事，强索硬要，人们不敢得罪，都要送给一些财物。就是平时乞讨，人们也不敢辱骂驱逐。因此一般小庙若是被几个乞丐占住，庙公便被乞丐制服，赶到走廊里住，一举一动都要看乞丐脸色而行，因此有“乞者恰猛庙公”（恰，更加之意，猛，凶恶之意）的谚语流传。后人将喧宾夺主之事叫做“乞者恰猛庙公”。

无某（妻）无猴

有故事说：一个单身汉，养一只乖巧的猴子，能替他管门、烧饭和做家中杂务，使他得以安心出门做工。后来，他积蓄一些钱，

托媒人替他说成一门亲事。按风俗，送聘金之日，还要备好一桌酒菜料，送到女家，让未来的丈人请客，必须有十二道菜。那单身汉买了一些新家具，备好聘金，送了媒人酬金，已几乎将几年的积蓄化尽，又要备办十二道菜料，便很感困难。他备办了十一项，还欠一项，实在是无力置办了，心想，以后有妻子管家，这猴子用不着了，就杀了猴子，凑足十二道菜料，借来两只大篮盛了，托人挑到女家。那未来的丈人检点一下，发现有一项菜料很特别，问来人，知道是未来的女婿杀了平时相依为命的猴子，觉得那家伙心太狠，连心爱的猴子都杀了，我的女儿嫁过去，将来如有不顺他意，是否也会惨遭毒手呢？即时悔婚，将聘金和酒礼一概退回。

那单身汉杀了猴子又娶不到妻，到老打光棍，要做工维持生活又要自己烧饭、洗衣，劳碌一生。

这故事的流传，产生了“无妻无猴”这句谚语，用于譬喻光棍一条。

无猫无加令

“无猫无加令”这谚语意思是说：都没有了。这谚语的来源有两说，一说，从前有一个官家少爷，喜欢养各种小动物，尤其珍惜一只会学人语的加令（八哥）和一只乖巧机灵、善解人意的猫，还有几只善斗的蟋蟀。一天，他将加令放出鸟笼，与它“说话”，又拿出养蟋蟀的木匣子，将其中两只放在一起，观它们相斗。突然，一只斗败的蟋蟀跳出匣子外，被加令啄食了，少爷一气，要抓加令，身边的猫立即扑上去，由于用力过猛，将加令咬死了。少爷更怒，顺手一棍子将猫打死了。等少爷醒悟过来，才发现为时

已晚，不由得悲愤交集，气恼成病，一连几天吃不下饭。他父亲来问："你是怎么啦?"少爷答："无猫无加令。"

另一传说：南宋名士陈淳（号北溪）善画，画的鸟类栩栩如生，他将所画一幅加令图挂在壁上，他的一只家猫竟误认那加令是真的，扑上去，把加令图抓破了，家人一气，把猫打死，落得"无猫无加令"。

七十二万造响水桥

漳州谚语"七十二万造响水桥"用于指责乱报虚账的行为。这条谚语源于一则故事：传说，清康熙年间，福建总督姚启圣坐镇漳州，贪污挪用公款，造一座响水桥，竟浮报造价七十二万两银。有人向清廷举报，皇帝派钦差来查，姚启圣善于应付，被搪塞过去，没有受惩办。这传说不尽可信，然而不是无因。

响水桥在龙溪县二十六都（今龙文区步文镇），确是姚启圣修建和命名的。乾隆《龙溪县志》卷六《津梁》记载，该桥原名东港桥，始建于明初洪武九年（1376 年），后被洪水冲坏，清初修建，改名济津桥，清军平定台湾后，福建总督姚启圣再度修建，改名响水桥，以上几次所建都是木桥。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 年），才由龙溪知县曹家甲改建为石桥。

民间传说姚启圣造一座木桥浮报造价七十二万两银，显然过分夸大。但姚启圣贪污公款受检举，经他一番申辩化为无事，死后又加以清算，康熙皇帝念其"平海"功劳，准免予追究，于史有据。《清史稿·姚启圣传》载：康熙二十年，左都御史徐元文劾姚启圣"疏请借司库银十二万经营取息，侵占民利；题报军前捐银十五万，皆克军饷、朘民膏而得。闽民极困，启圣不能存抚，拆

毁民居筑园亭水阁，日役千人，舞女歌儿充牣房闼，又强取长泰戴氏女为妻……”康熙皇帝令姚启圣复奏。姚启圣奏：借用库银于贸易，是将营利用于犒赏，招致郑军来降；自愿捐献军饷十五万两银，是任香山知县时因“擅开海禁”被撤职后经商七年赚来的，并非克扣军饷和剥削民膏；修建总督衙门，一日不过征用十棚（班）兵；衙门外员役私舍系令其自行拆除，不是拆毁民房；至于强娶长泰乡绅戴玑的孙女，不是事实；自己年纪老大，并无歌儿舞女……当时康熙皇帝正要用姚启圣对付郑经，故对姚启圣的私生活未加追究。在平定台湾后，施琅封靖海侯，启圣不得封，于康熙二十二年忧愤而死，年60岁。翌年，“部议以启圣修缮船舶军械浮冒帑金四万七千有奇，应追缴。上念其劳，免之。”

民间传说虽不是史实，但却更易在民众间流传，“七十二万造响水桥”的故事也就逐渐演变为谚语。

水鬼叫摆瑞

漳州有一句俗语，叫做“东门的孩子不怕鬼，南门的孩子不怕水”。因为，东门外有一座东岳庙，庙中有许多面目狰狞的鬼卒偶像，令人望而生畏，可是东门一带的孩子经常在东岳庙里玩，看惯了鬼卒形象，便不感到有什么可怕；南门外有九龙江西溪流过，称南门溪，水深流急，人们从桥上经过都感到触目惊心，而那边的孩子们经常在溪里洗澡、游泳，深谙水性，也就不觉得泅水有什么危险。

传说，从前漳州南门有一个孩子，自幼患足疾，虽医好了病痛，已成为跛子，方言称摆脚，父亲给他起名叫“瑞”，人人叫他“摆瑞”。父亲见他连走路都很困难，一直禁止他下溪洗澡，甚至

不准他走到溪边，以免发生危险。他也许是南门惟一不会游泳的孩子，在父亲教督下，养成不走溪边的习惯。摆瑞渐渐长大了，父母感到这孩子很懂事了，也就逐渐放松警惕，相信“不会泅水便不会溺死”这句熟语。可突然有一天，这孩子竟然浮尸溪上。于是，邻居们纷纷传说，他们常在更深夜静时听到有声音在喊：“摆瑞，摆瑞，到溪里洗澡很痛快，泅水很好玩。我带你去吧，我教你泅，不会泅，枉为南门孩子！”邻人们都说，那是水鬼找“交替”，找这个惟一不会泅的孩子下手了。

这故事的流传，形成一句“水鬼叫摆瑞”的俗谚，后人用这俗谚譬喻“受坏人引诱做坏事”。

王爷公的火油也敢偷倒

漳州人用谚语“王爷公的火油也敢偷倒”指责毫无忌惮的惯偷。这谚语出自一则故事。传说，清康熙年间，漳州人柯彩、陈龙叛离郑成功之子郑经，归降清廷，以战功升官总兵。这两人本是市井无赖，意气相投，结拜为兄弟。陈龙是一个单身汉。柯彩有母亲，舅父李富在浦头咸鱼市当司秤。柯彩的母亲死了，柯彩向舅父要来三千文钱，要买一口薄棺。但是还未将母亲收埋，就把钱赌输了。家里连一盏灯也没有，夜里黑洞洞。陈龙来看望，说：“我是你的结拜兄弟，理应给你送一串纸钱来烧脚尾，送一点油来点灯照尸。”就跑到一家小店的窗口，叫店主拿两串纸钱来卖。他接过纸钱转头便走，店主出门来，已追不上，骂道：“就送你去做烧脚尾纸吧！”陈龙回头应道：“我就是要去做烧脚尾纸的。”随后就来到王爷公庙，取过一只碗，将神案上灯盏里的油分去半碗。庙祝追来，骂道：“你连王爷公的火油也敢偷倒！”陈龙答道：“是啊，

我就是敢倒王爷公的火油!”说罢扬长而去。随着故事的流传，这条谚语也便形成了。

做事要有“班母”

漳州人把做事所根据的准则叫做“班母”，凡建筑、裁衣、制造器具，以及处事、待人等等，若按照一般准则去做，叫做“有班母”，否则，叫做“无班母”。叫惯了，人人以为很“俗”，其实来源饶有兴味。

当木匠需要定基准的时候，便将准绳拉出墨斗，按测定的位置拉直，在木板上一弹，便出现一条黑色直线，作为施工的标准，很利便。传说，墨斗准绳是鲁班发明的，而起初还不是在准绳的末端扎一根小铁钉，可以钉在木头上定位，而是由鲁班的母亲帮拉绳子。有一次，鲁班正急着要母亲来帮忙，而他母亲在忙着炒菜煮饭，于是她便想出一个办法，从厨房里跑出来，取一根小铁钉，扎在绳子末端，钉在鲁班测定的位置末尾，又回厨房忙着照料饭菜去了。鲁班一看大喜，连连称赞母亲聪明，从此就运用这办法，不用再劳烦母亲拉绳子了。人们更是称赞鲁班母亲的这个好办法，称为“班母”。

后来，漳州人把“班母”一词引申为做事所应根据的准则。凡根据别人成功的经验或模仿别人的好办法，或按书本上的图样制作器物，或按照公认的行为准则做事，都叫做“有班母”。

“陈仔雪”成口头语

民国初年，漳州新桥头有一个殷实商人陈雪斋，人们叫他陈仔雪，信用卓著，南来北往的客户都喜欢与他交易。他与人应酬从不失体面，对亲族邻里的孤苦寡幼也乐于资助。有一些专爱吃喝的人们，想揩他的油，常常来邀他上馆子宴饮，而在散席时争先溜走，留下他一人付账。次数一多，他也聪明了，以后他总是乘大家酒兴正浓，猜拳最热闹的时候溜走。但他从不白吃人家的，在溜走之前，总是估算这一席酒自己该分摊多少钱，将款放在桌上，决不占别人一点便宜。等到同桌吃客兴尽而散时，已不见陈仔雪，只好各自掏腰包，凑足酒食钱。以后，这种分摊出钱的聚餐方法成为那些常在一起吃喝者的惯例，名之曰“陈仔雪”，在相约一同上馆子时说：“我们去陈仔雪吧！”陈仔雪遂成为共同出钱聚餐的代名词。

恰猛蔡牵

漳州有一句俗语，称蛮横的人为“恰猛蔡牵”，“恰”是“更加”的意思，就是骂蛮横的人比蔡牵更凶猛。

语中提到的蔡牵是漳州龙海市角美人，为清代嘉庆年间横行海上的风云人物。蔡牵从小练就一身武艺，因为得罪钟姓族长，被衙门派兵追捕，他被迫逃亡入海。由于有胆略，被海盗拥戴为头目，其队伍也不断壮大，发展到有大船七八十艘。横行于福建、浙江、广东、台湾一带海上，拦劫商船，收取“出洋费”，并屡次打

败进剿的清朝水师，自号“镇海王”。嘉庆九年（1804 年）七月初一日，清廷命浙江提督李长庚统领闽浙两省水师会剿。嘉庆十年夏，蔡牵从福建转入浙海，一再受挫。然而他于嘉庆十一年正月却又集合了战船百余艘，再度进犯台湾，清廷调集广东、福建、浙江水师围剿，将蔡牵追击到广东黑水洋，蔡牵还率残部继续战斗，而且击毙了李长庚。嘉庆十四年，在浙海舟山外，又与清军水师展开激战，蔡牵炮弹用尽后，用银元当炮弹。最后，他的坐船被福建水师提督王得乐击伤，船底入水，蔡牵不愿被俘，自己炸船，沉海而死。

蔡牵的勇猛名闻远近，所以漳州人用“恰猛蔡牵”这句俗语来骂凶猛的人。

邱蒙舍放大炮

传说明代，漳浦杜浔（一说诏安丘厝城）有一个官宦子弟邱蒙，人人称他邱蒙舍（舍，少爷），他玩世不恭，以作弄人为乐。当地有很多人在他背后说：“不知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上当，受邱蒙舍作弄？邱蒙舍有什么好计，我就不会上他的当。”这种话一再传进邱蒙舍耳中，邱蒙舍就想出一个当地人都会受作弄的恶作剧。他张贴告示，说本公子得到一个客商进献的一颗硕大无朋的纸炮，作为寿诞贺礼，决定于某日本公子寿辰燃放，它能爆出五彩缤纷的烟花，欢迎参观。到时，便有很多人出于好奇心而到邱蒙舍府第门口观看，看到埕上果然用木架安放一颗有几尺见方的大纸炮。邱蒙舍一看来看热闹的人已经不少，就宣布，这大炮虽是纸卷的，但里头包着几十斤火药，威力不小，这里地场太小，为了安全，现在决定抬到旷野去放。便将那大纸炮连木架一起用粗绳捆好，叫

四个家丁抬着走。围观的人群也跟着走，一路上看热闹的人越聚越多。抬炮的家丁说路狭不好走，故意从麦田穿过，田里的麦苗便被众人踩倒了一大片。转了几个地点，邱蒙舍都说，这地点太小。最后选定在一处园埔的中心点，架好炮，点燃导火线，邱蒙舍喊道："炮就要响了，大家站远一些，避免被炸伤！"站得很近的观众信以为真，纷纷后退，哪里知道炮炸了之后既没有五彩缤纷的烟花，声音也十分小。原来邱蒙舍用大量破棉絮和废纸裹着一颗小纸炮做成一颗所谓的大炮仗，把众人又骗了一回。观众空跑一趟不要紧，受损失的是那些自家田里的麦苗被踩死许多的农民。

随着故事的广泛流传，"邱蒙舍放大炮"成为一句谚语，后人用这谚语骂人"吹牛"。

破"尿鳖"拼孟臣罐

孟臣罐是一种极珍贵的紫砂茶壶，甚至连官宦子弟邱蒙舍也没有。他表兄倒有一把，是传家之宝。邱蒙舍出高价恳求表兄割爱转让，被婉言拒绝。于是他便想出一个打破"尿鳖"换取表兄孟臣罐的妙计。

尿鳖是一种专供男人小便用的粗瓷器，与水罐有些相似，不同的是略呈扁形，且比水罐小，有点像鳖，所以又叫尿鳖。邱蒙舍事先在自用的尿鳖里放几条活的土虱（即胡子鲶，亦称塘虱），然后请表兄到家里品茗谈心，又备下酒菜，两人边谈边饮，显得十分愉快。过了一会儿，表兄要找小便处，邱蒙舍提出尿鳖供表兄使用。表兄没有想到尿鳖里有土虱，热尿撒下去，土虱受到刺激，便游动起来，发出咚咚声响，表兄猛然一惊，失手将尿鳖掉

落地上，摔得粉碎。邱蒙舍大叫道："我这古鳖尿壶是传家之宝，你怎么这样不在意把它打破了！"表兄慌忙道歉，说："我买一把新的还你就是。"邱蒙舍说："我这种尿鳖是无处买的。"表兄说："我叫瓷窑特地烧一把与你的尿鳖完全一样的。"邱蒙舍说："我的尿鳖是传家之宝，你再烧也没有那个尿鳖。除了你的孟臣罐，没有什么东西比我的尿鳖宝贵。"邱蒙舍纠缠不停，表兄只好拿心爱的孟臣罐来赔。

随着故事的流传，"再烧也没有那个尿鳖"和"破尿鳖拼孟臣罐"都成为谚语。前者用于譬喻"再也不可能有更好的事物出现"；后者用于譬喻"不惜牺牲不值钱的东西以拼取贵重的物件"，或用于譬喻穷人与富人拼命。

给人卖去吃

清代后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开发东南亚及中南美洲殖民地的需要，在厦门、汕头、香港、澳门等埠头设立招工机构，挂"洋行"招牌，雇用流氓，到内地招工。那些流氓花言巧语，说洋老板招工，工钱多，工作轻松，还有生活上的种种优惠待遇。有些贫民受骗来到洋行后，被带上一条船，随即被禁闭在底舱，好似猪仔一样受人摆布，所以叫做"猪仔"。洋老板强迫他们在"卖身契"上画押，运到目的地，卖给工厂或农场做苦工，三餐吃的是番薯和粗米饭，忍受着非人的待遇，老板发给的只是一点零用钱。等到契约期满，他们才可以选择工作，领比较高的工资。

"猪仔"的正式名称叫"契约劳工"。受骗当契约劳工的人很多，他们未上洋船以前，不知道要签订在一定期限内须受老板支配的契约，及至上船被迫签约，已经身不由己，所以有"被人卖

去吃还不知道”的谚语流传。后人用这谚语譬喻“受骗上当”。

乌吉隆仔拖给红毛仔吃

“乌吉隆仔”指皮肤黑色的马来人，“红毛仔”指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美国等头发赤色的白种人。东南亚各地土著大都属马来人种。自15世纪至19世纪，葡、西、荷、英、美、法等国先后占领了东南亚各地，实行殖民统治，奴役土著马来人。那些地方有很多华侨，对马来人受殖民统治的情况深表同情，所以有“乌吉隆仔拖给红毛仔吃，红毛仔还嫌乌吉隆仔不好”的谚语流传（闽南方言“拖”是艰苦做工的意思）。这句谚语意思是说，马来人艰苦劳动，西方殖民者坐享其成，反而说马来人懒惰、愚昧。这谚语由回国的华侨传到闽南，后人用这谚语譬喻“剥削阶级奴役被剥削者，还要骂被剥削者”。

糊兄吃饼屑

传说，清末漳州某衙门有一个“伙头”，专门烧火做饭，做事糊涂，有时将饭烧焦，有时将粥烧糊，因此得了一个“糊兄”的绰号，叫惯了，人们反而不知道他的原名。后来，他被衙门辞退，跑到厦门找工做。那时刚好有一艘侨轮从南洋望加锡开来，返航的时间将近，由于随船而来的船主的少爷态度傲慢，与专司导航的伙长发生矛盾，伙长一气之下跑回乡下，辞职不干，船主在望加锡，不知这事。少爷认为有钱不怕没有人效劳，对那负气而走的伙长不加慰留，而在码头上张贴告示，招聘有经验的伙长一名。

漳州糊兄刚好到厦门，在码头听人读那告示，以为要招聘“火头”，就上船去应聘。船主的少爷也是糊涂人，听糊兄毛遂自荐，说自己当过“火头”，以为是当过伙长，就决定聘用他，对他说：“从现在起，你吃公司，睡咨厘。”就是叫他住上等房间，而他听不懂“咨厘”是什么意思。他被一个差役领到“咨厘”安顿，还不知道应该到那里工作，就有舵工来问：“船要开了，要吃（闽南方言‘吃’有‘采取’、‘施行’等含义）什么方向？”糊兄正从口袋里拿出一块饼在吃，以为那舵工问他在吃什么，随口答道“吃饼”，舵工就按罗庚（指南针）的“丙”字方向行船，刚好避过风暴的袭击，顺利前进。糊兄要找伙房做那烧饭的工作，船上的人告诉他：“你享受吃公司睡咨厘的待遇，三餐有人给你送来，不用到伙房取饭。”糊兄便安安稳稳住在咨厘里，睡倦了就到甲板上观赏海景。不几天，船要进港了，舵工来问“要吃什么方向”，糊兄闲极无聊，正从口袋里翻出几天前吃剩的饼屑，放在口中咀嚼，以为那舵工又问他在吃什么，随口答道“吃饼屑”，闽南方言“饼屑”与“丙戌”同音，舵工以为伙长叫他改按丙戌字方向行驶，遵照施行，船果然顺利驶进望加锡港。这时，在望加锡的船主正在焦急等候，因为消息传来，海上起了风暴，许多船只船破人亡，自己这条船吉凶未卜，若有不测，船货皆空，他就要破产，而且心爱的儿子也要遭难。这时忽闻这船顺利返航，喜出望外，即大摆宴席庆贺，称赞儿子物色了这位经验丰富的新伙长，才能避过一场大灾难。糊兄如梦初醒，说：“都是主人的洪福，其实我只当过伙头，没有学过行船，望主人给我当伙头便好。”船主这才知道这是一场糊涂事，这次航行纯粹是侥幸脱险。

这事传回漳州，人们将“糊兄吃饼屑（丙戌）”作为笑谈，成为谚语。这谚语一直流传至今，人们见有糊涂事，就说是“糊兄吃饼屑”。

胡江舍怕江鱼仔

漳浦鹿溪桥村人故廷宴，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 年）进士，天启年间（1621～1627 年）官至陕西巡抚，集全省军政大权于一身，人们称他胡军门。故事说，胡军门在漳浦故乡有很多田产，并在县城应城口（今绥东小学附近）建一座富丽堂皇的府第。他的儿子胡江舍（官家子弟称“舍”，是“少爷”的转音）住在那府第里，婢仆成群，穿的是锦罗绸缎，吃的是山珍海味。有一次，胡江舍坐轿出游，经过市场边，嗅到一股腥臭味，掀开轿帘一看，见市场里摆着几摊江鱼仔。那是价钱最贱的炊熟小鱼，上面沾着成群的苍蝇。他感到一阵恶心，几乎要吐了出来，连忙对轿夫说：“我怕江鱼仔，赶快走吧！”

胡廷宴由于攀附权倾朝廷的秉笔太监魏忠贤而升官陕西巡抚。为了继续拍魏忠贤的马屁，又与巡按袁谦鲸同为魏忠贤建了一个生祠，结果，崇祯皇帝上台后，下令查处过去攀附魏忠贤的官员，胡廷宴也被列入“逆案”革职。漳浦群众素来对“阉党”祸国殃民的罪行深恶痛绝，在“逆案”公布后，即将胡廷宴建在县城应城口的府第烧毁，并控告他霸占民田。他为打官司而弄得破家荡产，只好跳井自尽。

过去的阔少爷胡江舍也变得穷困潦倒，日食难度，过着“稀粥配咸萝卜干”的苦日子。有时到市场上走走，对昔日一闻就要呕吐的江鱼仔腥臭味，这时感到香喷喷，望之馋涎欲滴。江鱼仔上面沾着成群的苍蝇，从前看到就害怕，这时全不在乎。他假装要买，东摊抓一点尝尝，西摊抓一点尝尝，一次又一次的白吃，却也可以解馋，然而弄得鱼贩十分讨厌，以后一看到胡江舍走过来，

连忙收摊挑走。因此有“从前胡江舍怕江鱼仔，后来江鱼仔怕胡江舍”的俗谚流传下来。后人用这谚语讽刺那些曾经“饶腻”而后来“寒馋”的人们。

按民间故事是这么说，而据《胡氏族谱》，胡廷宴的儿子胡思谦是一个太学生，胡廷宴死后他还有不少家产，崇祯十三年曾捐款给应城寺作修建费用，旧《漳浦县志》也有记载。他在应城寺附近的府第是明末清初战乱时毁于兵燹，不是崇祯初年被群众放火烧掉。由“怕江鱼仔”到“馋江鱼”的胡江舍应是胡廷宴之孙。至于胡廷宴于任陕西巡抚时为魏忠贤建生祠，后来失官之事，《明史》卷三〇六《阉党传》有记载。

茈（嫩）番老台湾

闽南一带有“茈（嫩）番老台湾”的谚语流传。茈，闽语音读“箭”，“稚嫩”的意思。要说这谚语的成因，得谈谈闽粤两省人民出国谋生和往台湾开发土地的历史。

明代及清代前期禁止国人居留国外，出洋都是偷渡的，妇女绝少，居留南洋各地只能娶当地土著为妻。自明代后期起，南亚、东南亚、中南美洲各地先后被西方国家占领，西方国家开发殖民地资源需要劳力，常派舰艇到闽粤沿海掳掠劳力，并勾结流氓，雇他们到内地诱惑和拐骗贫民去当苦工。鸦片战争后，清廷被迫与西方各国订立不平等条约，其中有一条，就是清廷不得禁止人民出国。此后西方资本家就在厦门、汕头等埠设立以“洋行”为名的贩卖劳力机构，被叫做“卖人行”，雇流氓到内地拐骗贫民去南洋做工。这些劳工上船后，便被关闭在底仓，强迫在卖身契上盖指印，成为“猪仔”，被卖到殖民地的工厂或农场当“契约劳工”。

契约期满，可以另择雇主或做其他工作，如果娶妻，一般也是娶土著妇女，后代成为有中国血统的马来人。自清末光绪年间起，殖民地已不乏劳力，“契约劳工”渐渐取消。与此同时，当地华侨的经济实力也已雄厚起来，兴起了“旧客带新客”之风。因亲戚朋友关系前往南洋各地做事的人也逐渐增多，才有较多的妇女前往南洋当“过埠新娘”。也是从清末起，才有较多的华侨回乡探亲谒祖，他们大都是年轻人。“偷渡”和“猪仔”时代华人的后裔已经“马来化”，不大有祖国观念。

大量的闽粤两省人民往台湾开发土地，也在明末和清代前期。自从光绪“甲午”清廷战败，割让台湾予日本，闽粤两省的人已很少再往台湾开发土地，而是更多地往南洋谋生。因此，清末至民国初年，回乡谒祖会亲的台湾同胞大都是老者。家乡的人们每每看到年老的“台湾客”和年轻的“番客”，成为明显的对照，因而有“（芘）嫩番老台湾”的俗谚。

未到台湾地，先食台湾米

漳州一带有一句谚语：“未到台湾地，先食台湾米”。这谚语形成的原因是：虽然郑成功时代，台湾南部已经开发，但中部和北部大都未开发，清代前期，派往台湾驻防的军队，生活仍十分艰苦，实行三年轮调一次的制度。当时台湾是福建省的一个府，驻军由福建内地调来，有“换班过台湾”的俗谚。随着闽粤两省人纷纷到台垦荒，使台湾农业有很大发展，有大量余粮输入内地（大陆）。福建沿海粮食不足自用，从前仰给于浙江，自台湾成为产粮区后，便改由台湾输入，人们在还未前往台湾垦拓以前，已经先吃到从台湾运来的稻米了。尤其是，福建沿海的福州、福宁、

兴化、泉州、漳州五府，田赋一半“折色”（改征白银），也有全折征白银的，军粮靠台湾供给，后来军眷粮食也靠台湾调拨供应。

福建与台湾的正口通航，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只有厦门与鹿耳门（台南安平港）对渡一口，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泉州复开蚶江与彰化鹿仔港（在台湾西海岸中部）对渡，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再开闽江口五虎门与淡水厅（台北）八里岔对渡。清廷的主要目的为了运军粮，商船都配有运军粮任务。台湾（今台南）、凤山（今高雄）、嘉义、彰化四县额定每年供给福建沿海各县兵米73740多石、军眷谷25890多石。其中，由鹿耳门发运到厦门，由海防厅负责转运给漳州府的稻谷有：由台湾县拨给龙溪县2370石、南澳厅3638石、漳浦县（包括云霄）5914石、海澄县993石，凤山县拨给漳浦、诏安二县3476石，遇闰年皆加一月之数（资料采自《厦门志》）。由此可见福建沿海各县的兵在还未“换班过台湾”之前，已经先吃台湾米了。

后　记

《漳州掌故》一书，属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福建掌故系列的一种。蒙曾五岳先生举荐，福建人民出版社的同志热情鼓励和支持，我们于2000年开始编写工作，从内容到体例都较认真处理，2001年完成初稿。在编撰过程中受到漳州耆宿王作人先生，以及陈怀曦、魏宝贵、张胡山、黄叶佗等位先生关心和帮助，兹一并鸣谢！

闽南的谚语和谚语故事很丰富，趣味性强，用闽南话读，童叟朗朗上口，若用普通话读就感艾艾拗口。为了表达准确又不脱乡音，我们请郭锦飙先生等对漳州方言有造诣的专家进行校正和修改。此外，漳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杨丽华主任、钟武艺先生以及芗城区地方志办公室主任汪照元先生、摄影爱好者郑文华先生等热情提供有关照片资料，为不没人善，在此尤致谢忱。

编　者

2003年8月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漳州掌故
作者＝
页数＝３０１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Ｖｓｓ号＝６８２１２２０４